

发现社会

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第八版)

(美)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著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EIGHTH EDITION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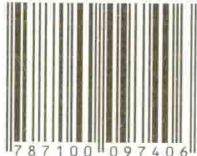
《发现社会》出版三十余年来，在英语世界不断修订再版，已成为理解近200年来社会学思想发展的经典文本。

本书以各位社会学思想大家为主线，勾画了19至20世纪西方社会学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作者描述人物生平，着墨不多而时有传神之处；评论思想，则多溯源追流，展现整体脉络。全书语言流畅生动、深入浅出，显示出著者作为杰出社会学家的深厚功底。

我们将会发现，社会学理论每一次的突破和积累，都在增进我们对社会的理解，都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息息相关。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9740-6



定价:39.00 元



发现社会

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第八版)

(美)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著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EIGHTH EDITION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李霞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社会/(美)柯林斯,(美)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 - 7 - 100 - 09740 - 6

I. ①发… II. ①柯…②马…③李… III. ①社会学—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C91 - 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3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发现社会

——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第八版)

〔美〕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科夫斯基 著

李霞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740 - 6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5%

定价:39.00元

Randall Collins and Michael Makowsky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ISBN:978-0-07-340419-6

Copyright © 2010 by the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2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2012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商务印书馆所有。

根据麦格劳希尔公司2010年版(第八版)译出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EDITIONS 2010

简明目录

前言	1
导言：社会与幻象	5
第一章 巴黎的预言者：圣西门与孔德	30
第二章 地下社会学：卡尔·马克思	50
第三章 最后的绅士：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87
第四章 尼采的疯狂	108
第五章 空想社会改良家、进化论者和种族主义者	133
第六章 德雷福斯的帝国：爱弥尔·涂尔干	162
第七章 马克斯·韦伯：世界的除魅	186
第八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非理性的征服者	223
第九章 发现不可见世界：齐美尔、库利和米德	248
第十章 发现日常世界：托马斯、帕克和芝加哥学派	280
第十一章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兴起：杜波伊斯、弗雷泽、 德雷克和凯顿	296
第十二章 社会系统的构建：帕累托和帕森斯	321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阴影：米歇尔斯、曼海姆和米尔斯	346
第十四章 欧文·戈夫曼和社会交往的剧场	383
第十五章 文化资本、革命、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布尔迪厄、 斯考切波和沃勒斯坦的理论	405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社会与幻象	5
幻象之根源	7
社会学的成果	21
社会学的边界	25
第一章 巴黎的预言者：圣西门与孔德	30
亨利·德·圣西门	33
奥古斯特·孔德	41
第二章 地下社会学：卡尔·马克思	50
卡尔·马克思	52
马克思的社会学	57
阶级与阶级意识	57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	60
马克思的经济学	65
劳动价值理论	65
剥削产生利润	66
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67

发现社会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67
资本主义的最后崩溃	68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哲学	71
马克思的遗产	76
恩格斯的性别分层理论	78
第三章 最后的绅士：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87
美国的平等	91
政府结构	96
地理和历史机遇	99
美国的文化	100
第四章 尼采的疯狂	108
尼采的生平	109
人类学的诞生和非理性的发现	114
对基督教的攻击	116
意志的动力学	119
重估一切价值	123
尼采的疯狂	125
评价	130
第五章 空想社会改良家、进化论者和种族主义者	133
弗格森和斯密的道德哲学	134
自由主义和社会改革：边沁、马尔萨斯和穆勒	135

社会进化论：达尔文和斯宾塞	139
美国的自由主义	145
科学的局限	153
社会生物学的复兴	156
达尔文的意义	161
第六章 德雷福斯的帝国：爱弥尔·涂尔干	162
涂尔干：社会中的劳动分工	164
越轨与社会团结	173
宗教与现实	179
第七章 马克斯·韦伯：世界的除魅	186
韦伯的社会学：分层、组织和政治	191
分层：阶级、权力和地位	191
组织：世袭制和官僚制	201
政治：传统合法性、卡里斯玛合法性和 法理合法性	205
韦伯的历史理论：世界的理性化	210
第八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非理性的征服者	223
早期生活及工作	225
梦的解析	229
压抑	231
弗洛伊德的解释体系	233
初始过程和次级过程	233

发现社会

性发展的各阶段	234
里比多理论	237
自我、本我和超我	239
性爱本能对死亡本能	241
后期职业生涯	243
弗洛伊德的遗言	244
第九章 发现不可见世界：齐美尔、库利和米德	248
齐美尔	248
库利的生平与工作	254
库利的体系	257
镜像自我与初级群体	260
对库利的批评	263
米德的生平与工作	265
米德的体系	266
社会自我	269
一般化的他人	274
对米德的批评与评价	277
第十章 发现日常世界：托马斯、帕克和芝加哥学派	280
托马斯的生平及著作	281
帕克与芝加哥学派	284
社会阶级的发现	288
组织社会学	292

第十一章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兴起：杜波伊斯、弗雷泽、 德雷克和凯顿	296
从大巴灵顿到哈佛和柏林	296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创立	298
理论影响	300
非洲裔美国人领导权的社会演化	301
NAACP与《危机》	305
杜波伊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	306
作为政界元老的杜波伊斯	307
社会阶级调查	309
黑人都市的社会分层	313
对种族关系的未来展望	319
第十二章 社会系统的构建：帕累托和帕森斯	321
帕累托的生平及著作	323
帕累托的体系	324
对帕累托的批评	328
帕森斯的生平与著述	330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	332
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	333
功能主义	333
社会整合	336
社会变迁	338
帕森斯的宗教社会学	340
帕森斯的贡献	343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阴影：米歇尔斯、曼海姆 和米尔斯	346
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	349
曼海姆的社会相对主义理论	355
曼海姆的现代社会政治学	362
赖特·米尔斯及曼海姆理论的现代应用	367
第十四章 欧文·戈夫曼和社会交往的剧场	383
标签理论	384
戈夫曼的社会生活剧场模式	389
民族志方法学者	394
戈夫曼的功能必需概念	398
哲学帝国主义	400
微观社会学的影响	402
第十五章 文化资本、革命、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布尔迪厄、 斯考切波和沃勒斯坦的理论	405
皮埃尔·布尔迪厄：符号暴力与文化资本	407
关于革命的革命性理论：西达·斯考切波	41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世界-体系	427
社会学如何解释全球化	435
索引	449
译后记	480

前 言

本书之取名为《发现社会》，其前提是，我们通常所经历的 ^{xi} 人类世界之种种秘密并不是显露在外的。我们所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世界是经过各种成见和歪曲所滤过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成见和歪曲称作意识形态、幻象、广告炒作或者政治口号。正如探险者必须离开舒适的家穿行于世界以探索各种奇异的地貌和陌生的人们，专业的社会学家则需要抛开熟悉的思想状态而走出去探求社会世界的实际面目。有时候这一旅程的最艰难部分在于他们自己社会内部，因为在此处，我们会习惯性地想当然以为我们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回事，而且在此处，我们倾向于接受戈夫曼称为前台现实所展现的东西而忽略后台所发生的事情。

本书是一次对社会的探险之旅。这一旅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二百年，而且还未结束。当然不能说我们毫无发现，我们了解到了关于分层和冲突的一些深度模式，了解到了文化信念的团结作用和建构过程，了解到了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以及个体自我的基本构建；但是社会现实这块大陆在不停地移动，这个世界在

两百年中（事实上是在远更长的时间内）一直在发生变化，在最近的变化中总有些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

在第八版中，我们增加了论述当前信息技术时代的全球化的章节。在此论题上我们同样必须将人为的渲染从现实中剔除出去，来探究表面之下的社会模式。当前各种全球化理论的前提是，世界已然缩小。时间和空间已被取消，因为信息可以在瞬间到达任何地方，地球上任一地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影响其他所有事物。不管怎么说，有关全球化的理论倾向于陷入一些陈旧的模式中。其中一种理论路线本质上说是自由主义的，它相信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是有益的，随之扩散的还有民主制和人权。这是自由主义改革家的现代版，其早期版本我们在第五章中会看到。全球化理论的第二种类型本质上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尽管马克思的名字在 1989—1991 年苏联解体后已很不时兴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潜在的主题：在全球世界中，资本主义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大公司和经济利益已经渗透到所有地方，它们不受如今已被取代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本书第二章阐述了这种理论类型，第十五章则论述了其更晚近的发展。可以肯定，这不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后者相信将来会出现一场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会导致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立；今天全球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是悲观主义者，他们不再相信革命，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由商品化和异化主导的。

第三种类型的全球化理论则着眼于后现代主义。这一立场起源于法国，1980 年代开始逐渐流行，扩散到英语世界的社会学系（尤其在英国）和文学系（其在美国的主要阵地）。后现代主义宣称，所谓的“宏大叙事”已经死亡。他们说的“宏大叙事”

主要是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指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整个现代主义工程，及其对理性、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后现代主义由此对左与右、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乌托邦都不抱幻想。尽管如此，但从《发现社会》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有一种奇怪的片面性：它所攻击的启蒙思想家（在第一章有论述）只是社会学走向成熟的开端；不管是创立后现代主义的法国哲学家，还是其美国各文学系中的追随者，显然都没有关注到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尤其是来自韦伯、涂尔干和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流派。他们似乎认为，如果马克思死了，就再没有其他分析历史变迁的途径了。但是，如果说马克思过于强调经济体制，那么韦伯路径的追随者们则在方法上另有深刻洞察，即结合经济市场、国家的政治动力学和社会运动这三种维度，再加上群体的文化认同，可构成一种整体分析，由此可以解释任何时期的历史。

最早从哲学中生发出的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认识论，即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它声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语言游戏的重复中；没有真理，也不存在通往真理或其他任何方向的进步，有的只是相互竞争的各种观点。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全球化和互联网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电子文档可以复制、再复制并传播到任何地方，谁能分辨出哪个是原始文档哪个只是复制品，是模拟物，是对模仿的模仿？他们假定我们注定只能生活在表面，而在此表面之下没有现实。后现代主义的全球化将这类轻薄的观念放大至无限。但又一次，社会学提供了对于当前状态的更为坚实的把握。观念的社会构建这一思想首先是在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涂尔干学派（他们强调观念是群体内成员关系的象征）和符号互动论（他们强调个体的心智是由社会交往的内在化所塑造的）告诉了

我们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对被感知现实的社会构建，其实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社会构建论并不是与国家、经济、社会运动和社会群体的存在相冲突的；^{xiii} 各种主导性观念总是锚定于某些特定群体中，而不是存在于随意漂浮的孤立个体中。社会学家们最近已经在调查人们实际上在怎样使用当代的通讯技术——用互联网、手机、便携式设备来传输音乐、文本和影像，他们惊奇地发现，人们运用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不是为了生发出多重现实，而是为了加强他们与那些在文化上与自己声气相通的人们的基本社会纽带。

简言之，全球化将一些新的东西——主要是新技术——与一些旧的社会模式结合了起来。社会学家已经获得的关于阶级、权力和地位的知识并没有变得毫无意义，而只是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社会学传统所揭示出的当前全球化状况在第十五章的结论部分有所阐述。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以往的社会理论有助于我们迈向新的理解和研究领域。

发现社会之旅还在继续。与前面几版的目标一样，我们希望读者能对以往发现者的旅途有所理解，并能加入到探索未来的下一阶段中去。

最后，我们要感谢多年来使用《发现社会》前几版并提出过各种建议的众多教师们，这些建议使本书能更有效地在课堂上使用。我们尤其感谢第七版的评论者，包括拉特格斯大学的罗伯特·伍德（Robert E. Wood）、康涅狄格大学的威廉·霍尔特（William Holt）、西肯塔基大学的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和道林学院的苏珊·布莱伯格·塞柏森（Susan Bleiberg Seperson），他们的意见影响了我们对此版的修订。

导 言

社会与幻象

我们都认为自己很了解社会。但事实上，社会世界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而由于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更加深了其神秘性。社会是我们当下的日常现实，但我们并不会只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就能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就像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必然作为有生命的身体存在就对生理学有更多的了解一样。社会学的历史漫长而艰辛，它致力于揭示那些隐藏在背后的或人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物：那些我们不知道其存在的事物——处于遥远的空间与时间中的社会，它们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自己生活的本质；那些被我们曲解了的事物，它们有别于我们自身的社会阶级与文化的体验；那些处于我们社会结构边缘地带的各种现实——从警察的巡逻车内到政治家和神父们紧闭的门户背后；那些被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的身边事物——由各种看不见的规则与

机制组成的系统，它控制我们的行为并操纵我们的思想，它似乎如自然景观一般永恒不变，但实际上它像孩子的动作一样变化不定。在所有事物中，最令人困惑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行动、思想和自我意象（self-image）——那些我们与我们的朋友、恋人、熟人和陌生人之间不断达成的默许协议，以及我们在各种情绪、习惯和信仰中所采取的掌控方式。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隐藏在我们通常的意识界限之下的。

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能通过选择成为自己行为——即使不是自己的命运——的掌控者；实际上，我们对这二者的情由都知之甚少。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世界还隐藏在我们的认识背后的话，那当我们向上追溯历史时，那时的社会世界之于我们更是一种幻象。在欧洲历史上，只要上溯几百年，就是一个国王和贵族的权威由神圣权力（divine right）合法化的时代。那时候，人们的一些反常行为被归因于巫术及被恶魔所控，而其他的国度则被认为不仅充斥着嗜血的共产主义者或可怕的野蛮人，还充斥着狼人和独眼巨人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声言：“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设法从噩梦中醒来！”社会学就是这种缓慢苏醒过程中的一部分。

就我们所了解的和已熟知的社会世界而言，其中大部分都是幻象。不过，如果我们已完全陷入此幻象，就没有必要试图对
2 社会进行研究和解释了，那么这本书也和其他著作一样毫无价值了。幻象的存在与事实和逻辑原则的存在并不是绝不兼容的。但事实和逻辑是不可避免地与概念和理论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社会研究中所用到的概念和理论也是我们日常行为所依据

的以及我们用来解释事物过程和原因的概念和理论。

社会学并不是一门不可能的科学，但的确是一门很艰难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从日常信念之网中疏离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想当然的假设被怀疑和被取代而一步步推进的。就像当年人们说到哲学一样，社会学也像是在漂浮于海面的一条船上替换一块块木板来重造这条船。社会学的历史是一个各种世界观发展的过程，每一步的向前拓展都在于它提出了一些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消除了以前的一些困惑，或者融进了一些以前未被观察到的事实。每一种世界观，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都存在着一些幻象，科学的旗号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作为真理的确实保证。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理解社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包括一些最近的成果，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确信，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幻象之根源

在那张遮蔽我们视野之网的核心是我们的这一认识，即我们的知识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事实”是各独立观察者能共同认可的东西，但是，为了能看到事实，我们必须先去寻找它们，而我们去寻找什么则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和理论。我们能回答什么问题取决于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但是，问题的形式并不是答案的唯一决定因素，否则我们的知识将永远不可能超越特定提问者的主观观点。任何完全主观的观点都会从根本上损害其自身的有效性，因为其他任何人没有理由去接受它。如果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标准，那么声称不存在这种标准的人也永远无法证明他的这一论

点是真实的。

因而，存在着一个客观性的领域，它以共享的观察与逻辑沟通的必需性为基础。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特定的理论，甚至哪一种特定的关于事实的信念是真实的。区分现实与幻象这一问题在社会学中一直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幻象本身就是在日常观念与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世界中产生的。除非我们开始关注并质疑各种现象，否则我们不可能着手通过事实来检验我们的理论，甚至不能着手通过我们细致的观察来检验我们所假定的事实。关于意识形态和实践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百年，一些人才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日常观念也许并不准确，因此需要经过逻辑整理和经验检验。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由那些有志于此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即便如此，人类幻象中的很多原始质素仍与社会学知识中较为坚实的部分混杂在一起。社会学的进步并不是因为社会学家坚信某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而是因为这个学术共同体

3 从其自身的论争和研究努力中打造出了一柄客观性利刃，是它推动社会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个事物除非有一个名称，否则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在物理世界中是如此——一个植物学家可以注意到几十种植物，而对于一个外行来说，他看到的只是一片田地——对于理解社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没有一个人见到过“社会”，虽然我们都见过属于某个社会的人；没有人见到过一个组织，我们只见过组织中的成员、属于它的建筑物和设备，以及写在各种标记和纸张上的它的名称和标志。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象征实体，如“财产”——如果没有某种社会惯例的规定，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这种社会惯例是关于人们在对待土地问题时应该怎样做、在谈论它的时候要使用哪些措辞等有一整套规则；也存在各种象征性行为，如“婚礼”——这种标记仪式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得以区分出一对男女是“非法地”居住在一起还是生活在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中，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使人作出这种区分。如果人们没有思考过这些象征事物，它们绝不会自然显现。作为与国家分离的社会这一观念是直到18世纪商业和工业变革之后才兴起的，法国大革命唤醒人们认识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各行其道的社会机制形式。100年之后，像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这样的思想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象征性质，因此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概念，使我们能够分析这个世界的运行，而后者在很长时间内被我们视为当然之事。

社会学的多数发展是由于发现了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事实，它们之所以不为人知，或者是因为这些事实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或者是因为它们先前一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社会学最早的成就是由欧洲人对东方、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探险而激发出来的。在这些与欧洲迥异的文化中的各种实践的观照下，欧洲熟悉的生活方式不再作为神的自然法则被接受，而需要重新解释。沿着这一方向所做的一些最初的思考是比较天真的，其中主要是进化论的教条，它简单地将欧洲文化视作其他文化的更高发展阶段。不管怎么说，这种理论归纳开创了解释社会的一种思想传统。正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位早期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家首先赋予了这一学科“社会学”这个名称，并因而有助于形成一个思想家的“隐形团体”，从那时起到一直到现在，他

们一直致力于提出各种关于社会的问题。

可以肯定，即使没有库克船长^①的航海，许多事实照样会被发现。但是，穿行到城镇的另一端比一次环绕世界的航行要更困难，而要在自己的家里进行一次发现之旅则是最最困难的。各种传统偏见抵制我们去探究和认识那些涉及我们生活的事实，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来说，这些偏见比缺乏事实本身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这些遮蔽社会现实的偏见阻挡了我们认识到它们之为偏见的性质。幻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相信它是事实。那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们都对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这是他们工作的内在组成部分。他们通过分析各种社会生活条件如何决定了我们意识的内容而打破各种幻象。4 社会学的历史一直就是不断揭示出我们先前没有意识到的偏见之源，从而逐步使我们自身的思想精密化的过程。

这一揭露事业是由卡尔·马克思开启的，他是第一个站在普通工人的立场上来观察生活的伟大思想家。当然，阶级并不是马克思发现的；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律和社会思想都曾公开地宣称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存在，这也确实是每个人在日常经验中所知道的东西。从意识形态上否定社会分层是现代美国的一项发明。马克思所发现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很多我们认为现实的东西只是我们的利益的一种反映，这种利益是社会性地决定了的。马克思也许过于狭窄地仅从经济方面来界定“利益”，但这一普遍原则无疑是有效的。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注

① 库克船长（Captain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主要在南太平洋、南极洋，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边界的海岸地带进行探险活动。——译者

意到以下现象的人：政府会撒谎，报纸、作家以及人们在交谈中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的事实和解释实际上都是根据他们的利益而被选择和歪曲了的。伏尔泰致力于揭露用超自然解释人类事件的荒谬性，这种努力概括了启蒙运动的大部分思想。而马克思超越了伏尔泰，他指出，教会所采取的保守的社会态度正是一个富有的、拥有土地的机构的头头脑脑们所期望的态度，这个机构的上层都来自贵族，他们的领袖，如红衣主教马萨林和黎塞留，就经常在国王的政府中效力。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表述本身就存在一个困境：如果观念是物质利益的反映，那么底层阶级是如何接受了并不反映他们自身利益的观念的呢？这就需要马克斯·韦伯和爱弥尔·涂尔干来提供解决这个困境的钥匙：前者分析了观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认识到了仪式所导致的团结效应。尽管一直存在着我们的观念会被模塑为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统保持一致的危险，但由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个初始问题从来没有退场过。

我们现在知道，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人们将有些观念作为惯例来保持，而且群体观念趋向于采取能够提高其地位和利益的形态。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和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人联系密切，而个人则会修正自己的观点以使其契合于他所加入的群体的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通过将各种观念竞争制度化，尤其是在那些其利益是建立在他们在科学和学术的集体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中的人们中进行这种制度化，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

马克思对于社会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并不是一个

绝望的告白。这种偏见不会仅因为我们希望它消失就消失，而是需要我们在解释社会的全面事实中，不懈地努力去充分审查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观念，从而使这种偏见逐步消退。这并不是说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不存在各种偏见。它们是深嵌于其中的，尤其是在政治、越轨（deviance）和分层领域中。但是，我们多少有这个信心，即坚持探寻最有力的解释理论会引导我们远离意识形态的歪曲，不管其是来自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

- 5 马克思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形成了描述现实和评价现实之间、“事实”（这里宽泛地包括经验数据以及总结与解释这些数据的理论）与“价值”之间的区分（马克思·韦伯首先强调了这一点）。这似乎是很显然的道理：发现世界上事物的状态如何是一回事，确定我们认为它是好是坏、是公正还是不公正、是美还是丑则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关于社会世界的大多数观念都是评价性的：我们感兴趣的是找出过失者来指责他们，找出英雄来赞美他们，而对于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是确定事实不感兴趣。二战后不久，有一种很盛行的观点，即将矛头指向宣传的“大谎言”（big lie）技术，将其作为极权统治的标志，同时也指向各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歪曲手段，将其作为极端主义政治思想的警示性标志。但如果以严肃的社会学方式进行更细致的辨析，就可以表明，这种区分是幼稚的：所有的政府都在试图控制其自身的合法性，所有的政治都与口号和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而流行的世界观都是由一些刻板印象构成的。如果我们要揭露独裁者或残暴者，观其行要比听其言稳靠得多。

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因而具有双重的效用：它提醒我们注意，哪些说法道出了某些现实问题，而哪些说法只是假设了某些现实，目的是要激起我们对其或善或恶的情感评价；它引导我们进行一种艰难的训练，及对知识体进行析分和检验，其有效性并不只是建立在我们的道德观上。

在社会学史上，与价值偏见的斗争还远没有取得胜利。确实，当前围绕这一问题仍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现在，尤其是在年轻的社会学家（他们个人的同情心强烈地倾向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美国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受压迫的农民一边）当中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即声称所有的社会学都是有价值偏向的（value-biased），因而唯一的选择就是道德的选择：你站在哪一边？为了支持这一立场，它指出，那些声称价值中立的学院派社会科学家们所创立的理论实际上赞美了美国民主的优越，淡化了被压迫群体的困境，并合理化了对智利、中美洲和其他地方残酷独裁统治的军事支持。但他们并没有很明晰地对这些教训加以总结。从智识上说，支持左派的宣传并不比支持右派或中间派的宣传更有价值，不管人们是否认为它在道德上更高尚。

即使在这一背景下，区分开事实和价值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评价理论和事实时不努力坚持智性上的客观性理念，那么任何有效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实践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宣称所拥有的关于世界问题的那种知识。如果不能保持客观性，那么严肃的理论和智性引导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成功的解释性理论是作为知识被普遍接受的，但在价值判断领域，每个人的基本价值观都与其他人的一样好，逻辑论证无法

强迫人们改变他们的观念。这就意味着应用社会学远比纯社会学更具多样性。正是在应用社会学领域，激进社会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它涉及你选择为谁的利益进行论争这一道德问题。因此，一些对老辈社会学家的攻击只是在针对其应用性工作方面才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纯社会学研究则应该依照学术上的客观性、广泛性和一致性的标准来判断，如果在这方面存在错误，可以通过正常的研究进展来加以纠正。如果有些人出于冷战政治的利益，为了使他们的应用工作的结论被他人接受而误导性地宣称其工作是价值中立的，那么不应该责难区分事实和价值的学说本身，而应该责难这些人对这一学说的滥用。最后，事实 / 价值的区分始终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是对客观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而言。不管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我们只有采取一种超然（detachment）的立场，才能更现实地认识社会，才能在影响社会方面更好把握我们的成功机会。

以下各章将始终贯穿着事实 / 价值的这一重要区分。我们始终在努力呈现社会学理论的各种连续性发展并评价其客观有效性。就其论证逻辑的形式化和检验其事实预测而言，这些发展的大部分都还远未完成；因而，我们对它们的评价就必须反映出在目前状况和充满希望的娴熟化前景之间的平衡。但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在客观社会学知识领域中所做的推进努力。我们也不时地在书中讨论这些理论对于目前一些特定的实际事务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应用的观点是从某一特定视角而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要求他人同意我们的观点，除非他们恰好与我们持有同样一套特定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扩大

个人的自由，并倾向于那些被系统权力所压迫的人们的观点。当然，关于理论的运用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我们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很少顾及军官、政治家、商人、管理者，以及统治阶级和高地位群体的观点。在社会学知识的理论方面，我们希望本书的阐释在社会学事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所提供的可能限度内达到尽可能的客观。而在实际应用方面，我们承认我们只是努力去准确地看待世界，而这种努力是带着我们自己特定的价值观的。

卡尔·马克思的洞见所遭受的命运提醒我们，通向社会学理解的路径是多么险峻。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推进了某种发展，但这并不能保证其他的社会思想家能继承它。马克思的思想对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有名望的思想家没有什么影响。它基本上一直是被压在地下，直到 20 世纪那一代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马克斯·韦伯、罗伯特·米歇尔斯、卡尔·曼海姆）才重新获取了其中一些重要的真知灼见。马克思的思想在地下革命运动中的遭遇也并不更好。马克思主义没有被当作一个理论，随着新事实和新认识的产生而不断发展和更新，而是变成了一种教条，能言善辩地拒绝任何变革。在他生命将要结束时，马克思被逼得向他自己的追随者们大声抗议：“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⁷ 不仅马克思是这样，韦伯和米歇尔斯的不妥协的政治现实主义同样也被证明是很难被大多数体面的思想所收编的，因此，它一直还半隐藏在学术的地下层中。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现了社会幻象的一个根源，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开端时也作出了类似的发现，他发现了压抑（repression）。弗洛伊德的发现甚至更加接近本质。如果说

意识形态阻止我们去理解更宏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分层将我们与无数的他人连接在一起——，压抑则阻止我们看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包括我们自己行动的动机。同样，他的这一发现所提出的看问题的方式比其观点本身更有价值。弗洛伊德并不是第一位注意到以下现象的人，即男人总是渴求除妻子之外的女人（反过来也一样），或者，人们之间尽管维持着彬彬有礼甚至是很亲密的关系，但他们相互之间却充满仇恨。弗洛伊德的洞见在于他看到了这类渴求与仇恨情感存在的普遍性，以及他认识到，虽然人们为意识到自己有这类感情而感到羞耻，但这类感情依然存在。弗洛伊德在 19 世纪体面社会最脆弱的地方，也就是隐藏得最深的地方，脱下了其面具。压抑，就像覆盖在身体上的层层衣物一样，其掩盖行为本身就指向所掩盖之物。

由赫伯特·斯宾塞和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们所代表的 19 世纪的主流社会思想将现代社会中的人看作理性的和高尚的，他们把握着契约式的规则，这些规则调节着个人向共同之善发展。弗洛伊德深入到那些意识层面的、理性主义的信念和那些适宜的、中产阶级的理想当中，发现可以用另一种东西来解释它们：交替出现在自我身上的爱与恨的激情，正是对社会限制它公开表达的一种回应。之前的思想家们将人视作理性的，能根据各种规则做出决定，弗洛伊德则发现了长久以来被这种世界观排除在外的一种认识，即人依然是一种生理性的动物，一种有着各种本能和情绪的生物，那些由社会化形塑出的文明和理性的部分并没有取代那个生物性的动物，而只是——有时是以一种毁损的方式——重新

塑造了它。

弗洛伊德的洞见的命运与马克思的颇为类似。他的观点在一些人中臭名昭著，这些人只是间接听说了他的观点，就认为可以以诸如“显然生命中除了性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之类的评论把他打发掉。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洞见本身就这样被压抑了，同时被压制的还有他的另一认识，即他认为我们的渴求、仇恨和其他情绪推动着我们的理性行为，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些情绪的后果。弗洛伊德也同样深受那些教条主义的追随者之害，他们使其理论在科学圈内名声很坏，尤其是在他们与同样教条的心理学行为学派的论战中。弗洛伊德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将我们的方向引向探索童年时期的社会化是如何使我们成为社会成员这方面，他贡献良多。他的一些核心洞见——将人类视为群居的情感型动物，揭示压抑与认同（indentification）的存在——⁸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得到研究，但它们并没有被丢弃。弗洛伊德的发现更适合应用于群体互动的研究，而非个人行为研究。只有在由心理学家弗里茨·珀尔斯（Fritz Perls）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这样的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取向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的洞见才开始在社会理论的综合体中得到阐述并获得一席之地。

我们已经涉及了导致我们在看待社会现实时产生幻象的一系列根源：我们不了解别的社会而把自己的社会设置看作天经地义的；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利益和视角导致意识形态歪曲；我们不能从某种价值立场中疏离出来；以及我们压抑那些使我们觉得羞耻和有罪感的东西。在这些偏见的根源逐渐暴露在阳光底下

之时，社会学正处在 20 世纪正在来临的时刻。我们将要谈到两种类型的幻象，由此将我们带入到当前的时代，它们是：心理学还原主义的缺陷和生搬硬套地将社会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所造成的误解。最激烈地打破第一种幻象的人是涂尔干。

人们通常都试图用个人行为来解释社会事件，如去寻找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暴动的煽动者、造成失败的叛变者。19 世纪末，那些著名的进化论思想家，特别是捍卫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思想家，将社会描述为个人决策之间的互动，因此精心策划的社会政策将收效甚微。归根到底，他们的基本解释模式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为生计而做的奋斗，以及他们在其中的沉浮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才能；现代社会本身因为个人之间的契约而得以存在。

涂尔干则开辟了一个新方向：社会机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永远存在，而其中的个人则不断进入而后消逝；社会有其自身的力量，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人不仅没有改变这些规范，而且会作为越轨者受到惩罚。更进一步说，在逻辑上社会永远不可能用个人的动机来解释。如涂尔干所说，社会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现实。诸如人们彼此强加于对方的那些规则、人们行动于其中的那些机制的形式，甚至他们所持有的观念这些“社会事实”，都不能通过考察某个个人的工作方式和千百万倍地复制其结果来进行解释。这些事实必须用社会的——即超个人的——因素来解释。虽然活的生物体是由化学分子组成的，但生理学必须在它自身的层面上进行解释，即从各部分在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功能角度进行解释。同样，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并不能简单地用个体心理学来解释。涂尔干将社会结构强调为社会学的首要问

题，为社会学这一领域确立了自身一个鲜明的中心。他同时向人们展示，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个人现象的事物，如自杀、犯罪、违背道德，甚至我们关于时间、空间和上帝的观念以及个人的个性等都是由社会决定的。涂尔干的学说使 19 世纪的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终于完结。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都是社会性生物，我们不会再回到 19 世纪天真的乐观主义上去，后者认为通过个人的理性教育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弊病。

社会学最后一项重大发展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主要是在美国发生的。社会学家们不再依靠历史学家、报纸和他们自己的推测，而是开始走出去亲自观察：开始是社区研究，然后是各种统计调查、对各种组织的参与观察，以及小群体实验，等等。这种研究传统与那些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其他偏见基础上的幻象形成了巨大的对立。举例来说，我们已经发现，保守主义者将犯罪归结为遗传退化或种族特性的说法（这类理论曾经在进化论学派中的生物学取向的社会学家中广为流行）是错误的，而自由主义者所大声疾呼的所谓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正在降低一说也同样是错误的。这种积极的研究传统的一个最大优点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我修正的，只要我们坚持理论必须是要解释事实的，那么其偏差迟早就会自己暴露出来。

但即使是这种研究传统也存在着危险和幻象。其中之一就是过于专业化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问题。社会学已经成为一种大范围的合作性事业，就像在所有大型官僚机构中一样，作为个体的成员有可能失去对整体目标——创立并检验各种理论，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和机制——的认识而陷入日常调查研究的当下细

节中。因此危险之一就在于研究的琐碎化以及用纯粹的技术标准（例如各种统计改进）来替代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实质性贡献的倾向。

自然科学为现代研究事业提供了一个模式，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的最终的、独特的现代幻象。很多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那些没有充分吸收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和米德的伟大思想突破的人，其观念还处于 19 世纪的传统模式下。像英国的功利论者及其美国追随者一样，他们继续把自然科学当作毋庸置疑的理解社会的模式。功利论的理性主义转变成了现代的行为主义，这一学说确信，人类的行为可以用外界的刺激——奖赏和惩罚——来解释，而不用援引任何未经科学承认的诸如“意识”这类概念。在社会学中，老式的实证主义学派有一个信条，即科学理论的唯一有效的材料就是量化的数据，比如大范围问卷调查中搜集到的数据、被精确测量的经验行为，以及普查报表。只有这些“硬数据”，包括那些可观察到的、能够被恰当量化的行为或细目才是有效的；而那些“软数据”，包括参与观察者的经验、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历史资料及内省，则被排除在外。

这种划分的价值逐渐被证明是一种幻象。人类社会行为及社会机制从根本上说是象征性的。社会之存在以及它影响个体的可见行为的方式，都是通过那些不可见的命名、规则以及定位系统来实现的，这些系统是个人进行认同及定向的对象。可以想象得出，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理论并没有在心理学方面孕育出很多成果，而是在认知发展及认知功能领域中取得了进展。在社会
10 学中，极端的实证主义者大多关注短期的技术性问题，因而并没

有为推进解释社会的理论做出什么贡献。只有坚持我们能够解释所有的事实这一原则，社会科学才能矫正自身，最终击溃那些是由于我们过于热心于仿效自然科学方法而导致的幻象。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象征现实是经验现实，是所有个体所经验的生活。向许多人提一些简短的问题，问他们相信什么、做过什么，然后对他们的回答进行统计，这远远不是这些个体生活的第一手经验，而后者才是我们最终要努力去解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夫曼和他的学生们是社会学中最为晚近的重要创新者，他们用第一手材料记录了人们怎样操纵社会现实，而这一现实是他们彼此使对方经历到的。

我们逐渐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必要在“硬”与“软”之间相互争执。量化但表面化的数据与某些情境中直接的现象学经验二者各有短长。如果我们用它们相互补充，就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深度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检验该理解的普遍性。正如航海家是以自己的运行中的船只作为起点来标示其他点的位置，我们也正在学习如何从几个视点来对我们的社会现实阐释进行“三角测量”。

社会学的成果

经常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科学总是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后者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如核战争、人口过量及工业变迁等现在则必须要由前者来解决。这一观点表现出一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所进行的简单类推，并忽视了要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来控制社会结构之不可测，除非采取某种政治控制的方式（而且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极大的组织方面的限制),而这种控制所制造出的罪恶往往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以通行的实用标准来评价社会科学,而是看它在创立广泛有力的关于社会行为及机制的解释理论方面的进展,那么,社会科学现已取得的成就要远大于目前对它的评价。这种解释理论在教科书中还没有得到集中阐述,但它的一些主要部分已经创立了相当的时间,我们正在逐步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当社会思想开始超越神话、意识形态和猜想,我们就开始打破一个又一个的幻象,随着每一次对一种原有信念的解构,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坚实的东西。

为我们的现代知识提供了基础的那些伟大突破大致产生于20世纪的开端期。涂尔干发现了社会团结的动力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社会作为一种伦理秩序如何运行的途径,而不是仅仅证明其正当性或是对其进行揭露。韦伯则阐述了观念与理想如何与物质与权力利益相互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可以将社会看作一个由各种群体和组织组成的分层网络,而不是某种具体化的抽象,由此我们能够在冲突之中来理解社会秩序。此外,韦伯还为我们

11 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世界历史的最具洞察力的观点。弗洛伊德揭示出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其中被文明化的意识和生物性的身体支配并折磨着每一个人。米德则向我们展示,个人的意识及社会的机制都是符号交流(symbolic communication)的结果。至此,我们看到,一种理论所不能解释或忽视的事实如何可以在另一种理论的洞见中得以澄清。韦伯综合了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所开启的思考路线;戈夫曼则综合了涂尔干、齐美尔和米德开启的论题。经验调查充实了我们的各种一般性认识,尤其是关于组织

和分层的，在此领域我们已看到一个能结合多数社会学理论和调查的核心开始出现。

这种进展至今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到。社会学大家中只有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名字在一般公众中广为所知。涂尔干、韦伯和米德在专业社会学圈子外鲜为人知。即使是在社会学内部，这些进展都显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因为“硬”方法与“软”方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其他关于社会学之应用于政治事务之类的争论。于是，那些陷入这类外围性争论的社会学家们——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预言过的方式——认识不到他们的论争对手对社会学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甚至忘记了，建立一种广泛的理解性理论才是这一学科的首要目标。不过，和其他领域一样，在科学领域中同样也是一事成则百事顺。当社会学的核心传统的力量逐渐被证明、被展示出来后，它也就会更坚定地向前发展。

这一社会学传统在整个上世纪影响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虽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点。它是政治世界观的主要来源：激进主义从马克思那里获取资源；不管是放任式自由主义还是主张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都从英国实用主义者和进化论者那里汲取源泉；欧洲的公司国家主义（corporate statism）来源于圣西门的传统；而法西斯主义的来源之一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一些极端变体。这一清单的令人震撼之处在于，所有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来自19世纪的社会思潮。而那些更为深刻的突破性思想——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及米德的贡献——对于我们思考社会及政治事务依然影响甚微。一般的公众观念较之社会学的知识前沿要落后50至70年。即使是学院派的现代美国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

倡导者，也并不比当年那些慈善性的改良运动家强多少，后者认定是“恶劣的环境”导致了犯罪和社会动荡，并相信社会工作和公众教育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政治意识形态学家们仍必须要去理解韦伯所指出的地位分层的动力机制和科层制几乎不受控制的发展趋势之严酷事实，以及和涂尔干和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在一个由非个人化的规则及非情感性的组织所构成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感。

现代社会学并不会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去寻求某些简单的解决办法，不管它是左是右还是中间路线。事实上，社会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揭示了中间路线其实和各种极端观念一样仍然是受某种幻象支配的。现在也许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社会学不能像电子学的突破之于彩电发展那样，提供一种简便的实际应用。如果希望我们的知识得到发展，我们就不能先于事实而明确说明这种知识会包含什么内容。事实并不是多数人希望其所是的状态，而社会科学不能是被召来对人们说一些他们希望听到的话。

早期的启蒙运动社会思想家们认为他们掌握了认识世界的钥匙：人类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专制和战争是由于无知和迷信造成的。如果人们能够学会以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事物，那么理想国就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已彻底被粉碎了。在认真的思想者看来，涂尔干这一代人已捣毁了它最后的残余，尽管它仍萦绕在天真的公众意识形态中——这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的社会行为与启蒙运动的梦想是何等南辕北辙。政治家和社会运动追随各自的意识形态，试图把他们的各种仪式加于现实之上；而那些劝告他们的应

用社会学家们所处的地位经常与那些告诉土著居民他们的丰产仪式之荒谬的人类学家一样。

如果社会学能有所贡献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能更现实主义地对待我们的世界，对社会组织的各种困境更为警觉，对社会协作的必要性和社会压制的危险性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更清楚地认清那些幻象——各种机制就是用这些幻象来构造社会现实的——的话，我们或许能够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适于居住。也许，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政治幻象与政治压迫之间的联系，认识到加诸我们日常交往之上的各种精神幻觉所造成的麻木，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能有极大地提高。新一代人已表现出了他们的显著特征，即比他们的前辈更为现实——他们更能戳穿有关性及政治的社会谎言，戳穿各种地位等级仪式和各种个人关系的幻象。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定，一种诚实和个人解放的新文化能否使我们控制现代社会的各种压迫和疏离（alienating）机制，但是，进一步照亮现实是我们手中不多的武器之一。

社会学的边界

最后，必须就学科边界的问题做一个说明。本书所努力要完成的是呈现社会学发展的简要历史，但我们并不拘于对那些思想家做任何严格的分类，有时候，我们的论述会大大超越涂尔干学派对这一学科范围的界定。之所以对学科界限持这样一种松散的态度，原因之一是，在 20 世纪以前，社会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直到那时，社会学还没有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很多重要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帕累托、帕森斯——在

很长时间内，甚至终其一生都是作为经济学家而度过的。后来，随着经济学越来越集中于对货币、价格、工资和雇佣等的分析，它逐渐成为一项特定的知识事业，并在学院内成为一个独立的系别。当然，即使是现在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阿尔吉雷·伊曼纽尔（Argyri Emmanuel）、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也讨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很多概念和问题。

- 13 罗伯特·海尔布龙纳（Robert Heilbroner）的《俗世的哲学家》中讲述了很多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在这里略去不提。

另一门其历史与社会学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学科是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的重要区别主要是历史性的：人类学家曾被界定为殖民时期新近发现的部落社会的调查者，而社会学家则关注现代社会。这种区分后来被打破。当原始部落被殖民化或被毁灭，人类学家开始研究现代的西方和非西方社会，而社会学家也开始研究传统社会。现在，很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做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人类学的某些领域——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与多数社会学家的的工作还颇有距离。本书主要出于篇幅的因素没有涉及那些伟大的人类学家，不过，斯宾塞、涂尔干和弗洛伊德在这两门学科的历史上都应被视为重要人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其中介绍了人类学中的伟大发现者。

政治学的起源则与社会学大不相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宪法的研究，它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公共管理者和公立中学老师。这一背景意味着政治学的取向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都是

有严重的偏见的，它不可能为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提供什么卓著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政治科学领域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behavioral movement），现在政治学家们也从事诸如政治社会学、组织学和社会变迁等领域的研究，这就与社会学有了交叉之处。

心理学长期以来既区别于社会学，又与社会学交织在一起。其区别于社会学的部分在于它在生理心理学、感知、学习和动机研究领域中对个人行为的非社会性因素的研究。它与社会学交叉的领域是社会心理学，即研究个体与他人间的关系。在现代美国大学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既设在社会学系里，也设在心理学系里，有时它自成一系。我们把社会学的边界极大地扩展到了社会心理学的领域，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学科界限在分隔开那些需要在广阔视野下展开的研究这方面所起的障碍作用甚于它在集中研究关注点方面所起的有益作用。弗洛伊德就是个很突出的例子，他也许首先被认为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我们却在本书中对他进行了很充分的论述，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涂尔干认为社会结构不能单纯通过个体来进行解释，虽然在这点上他无疑是对的，但不管怎么说，社会就是由各个个人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就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是如何运行的了解基础上，尤其是建立在了解个人如何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基础上。第二，弗洛伊德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已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超过其对心理学的影响（尽管他对前二者的影响未必超过他对精神病学的治疗领域的影响）。美国的学院派心理学是正统行为主义的堡垒，因此关于认知活动的很多最具创意的思想——由米德、

14 舒茨和弗洛伊德等提出的——只好在社会学中寻找栖身之所。心理学方面的损失成了社会学的收获，但是，随着象征互动主义学派、民族志方法论学派以及社会语言学家们的工作为理解人类个体的心理运行过程展现出了巨大进步的前景，心理学的这种损失最终将会获得补偿。

最后，历史学在相当程度上与社会学相互重叠。对于一些早期的思想家，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甫斯特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韦伯、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奥托·欣策（Otto Hintze）、米切尔·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和许多现代历史学家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和费尔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我们很难将他们截然地划在哪一个知识阵营里。与社会学相似，历史学也是个无所不包的学科：在社会世界中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是历史叙述的潜在材料，同时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潜在材料。这两个学科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取向：社会学的目标在于创立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而历史学的目标在于对特定的事件序列进行描述和解释。不过，普遍性的理论与特定性的历史之间并不是截然区分的。历史学家经常运用一般性的原则作为排列众多所获事实的手段，而社会学一直以来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描述一个特定的社会（通常是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情形以及解释导致我们目前社会状况的各种社会变迁。对于如马克思和韦伯这样的思想家来说，这两个目标——创立普遍性的理论和记录历史上特定事件——是并行不悖、相互增益的。随着历史学家对超出政治和外交事件之外的社会结构的探索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可以预

见，这两个学科将会越走越近。

我们社会学的历史就是这样与很多其他社会科学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要划出个界限，只是为了使我们的主题更为紧凑，以便把握。过去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受益良多，现在以至将来，它们将相互为对方提供更多的东西，只要我们能超越狭隘的分科标签。说过这些后，我们也许要请其他学科的同行原谅我们这点儿社会学的骄傲，我们要说——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看到现代社会思想中最辉煌的传统。

第一章

巴黎的预言者：圣西门与孔德

- 15 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就是它开始被浪漫化。对于 19 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法国人来说，中世纪的社会已是如此遥远，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对它的怀旧。他们认为那是个信仰真诚、秩序并然的时代，每一个人，从农夫到国王，都各安其位，不存在什么社会冲突；那时人们虽然贫穷，但很幸福，地主和牧师们像慈父般地照看着他们如羊群般的子民。而 18 世纪的思想家就绝不会有这类的幻象。他们距离中世纪的现实还很近，因此也很高兴自己能摆脱它。

那时人们自然是很贫穷的，但他们幸福吗？中世纪物质条件上的艰难是无法想象的——农民除了面包没有别的吃的，贵族常常也好不到哪儿去；住处狭小、阴冷、拥挤、不卫生，充斥着各种疾病。那时也没有什么秩序。罗马帝国以降，欧洲就陷入了连绵

不绝的战争中，暴力的威胁弥漫于日常生活之中。那是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人们只能加强自我防备。城镇关闭城墙以防强盗，主人对奴仆、父亲对孩子，都会施以严厉的惩罚。对公众嫌疑犯施以酷刑是平常的事，很小的罪行就可能招致死刑或肢体摧残的惩罚。人们之所以各安其位是因为他们被束缚于各自的地位上，秩序之得以存在是因为残暴的压制。

同样，那个时期也并不像浪漫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充满信仰的时代。信仰上的冲突几与政治暴力一样绵延不绝。新教改革与天主教的反改革只不过是精神世界领域中最重大、最血腥的斗争而已。在路德、加尔文和托尔克马达^①的宗教裁判所时期及其之后，到处充斥着异端和迫害。教会拥有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给国王们（有时也为他们的士兵们）提供财政及精神上的支持，这就使所有的冲突事实上都带上了宗教的色彩。只是在以下意义上，它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即教会无所不在，对天堂和地狱的信仰没有受到任何真正的质疑。

宇宙被视为高度秩序化的，如但丁所描述的，世界由天堂¹⁶之境开始，在那里，上帝和他的天使们住在一起，接下来是地面上的各种社会等级，最后到了地下的九层地狱，那些受诅咒之人在那里根据他们的罪行接受惩罚。事实上，所有人都在信念上相信这个世界秩序，他们相互间的分歧在于各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谁应该做教皇，哪些国王将得到合法地位，哪种神学该占统治地位，哪种道德是最崇高的。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真理观，

① 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 1420-1498），西班牙多米我会修士，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任职期间以火刑处死异端分子约2000人。——译者

准备着去杀死任何阻碍其信仰的人。总之，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噩梦时代。到 18 世纪，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和平到来，宗教力量消退，有思想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苏醒，是一次“启蒙”。

自古代以降，第一批在教会之外找到工作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巴黎沙龙上的座上宾。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孔多塞和杜尔哥等人后来以启蒙哲人闻名于世，他们在科学领域发现了神学的替代物。艾萨克·牛顿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 1687 年发表的关于运动定律的研究显示出宇宙是如何像时钟一样协调运行的。理性是那时的时代精神，而宗教是它的敌人。自由思想家让·梅利耶（Jean Meslier）宣称，当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勒死时，人们将最终获得幸福。伏尔泰赞同这一说法，虽然赞同得有些底气不足，因为他是靠经常光顾宫廷“启蒙”那些诸如腓特烈大帝这样的暴君来维持生计的。这些哲人们拒绝关于罪恶的神学观点，宣称自然是合理的、善的。人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去发现主宰着世界的自然规律，并使我们的社会与之相协调。历史不再被看作只是对人类在亚当和基督第二次降临之间的行为记录，也不再被看作一个自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以降不断堕落的故事。与之相对，人们开始将历史视为科学启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18 世纪作为一个理性的和乐观的时代卓尔不群。

1789 年的法国革命带来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机会。现在，他们可以完全摆脱掉那些老规矩，创建一套建立在理性和公正原则之上的新秩序。国王被推翻、斩首了，贵族们被剥夺了财产，

封建的秩序被废除了。但是紧接着，革命的自由派支持者开始衰退，共和派开始内讧。议会清洗了越来越多的成员，他们的脑袋在巴黎民众的欢呼声中依次滚下断头台。革命变成了一种偏执狂；在国内，处处是自由的敌人，在国外，针对它的战争已经爆发。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公安委员会建立了恐怖统治。最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上了断头台，而法国开始转向右倾。1799年，共和政府被一个叫拿破仑·波拿巴的将军推翻，这次伟大的实验就此基本结束。

这场戏剧还花了15年的时间才最后闭幕。在拿破仑征服伟业和他最后的失败背后，有一点却越来越清楚，即那个理念破灭了。理性也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很多人在保卫启蒙时也会像宗教法庭的大审判官那样狂热。1815年，一种立宪君主制重新回到王座上，巴黎表面上又恢复了秩序，但知识界则一片混乱。改革派、乌托邦派和信徒派都纷纷就错误的方面以及应该怎样做才能纠错等提出了他们的论点。在这个时候，圣西门出场了，我们的故事就此开场。

亨利·德·圣西门

克劳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孔德·德·圣西门（1760-1825），就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他是个贵族，出生于法国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才华横溢、自我本位，完全没有道德感。他的机会主义式生涯浓缩了他那个时代的诸种矛盾。最初他是个野性放荡的年轻人，这段时期他甚至被家里囚禁了起来，这是唯一能控制住他的手段（顺带提一下，他的一个邪恶的

同代人德·萨德侯爵^①也遭遇过同样的经历)。后来圣西门成了法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去了美国，参加过约克镇战役。但我们可别把他看作像拉法耶特^②那样的热爱自由的志愿者，他之服役完全是服从专制君主国王路易十六的命令，后者出于国家的考虑支持美国以对抗英国。圣西门的政治倾向并没有妨碍他成为美国爱国者成立的辛辛纳图斯社团^③的荣誉成员。如果说圣西门愤世嫉俗的话，这也不过是反映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论调。

回到欧洲后，圣西门引起了一小阵轰动。他设计出建造两条运河的规划，一条横穿中美洲，一条从马德里连通到海洋，但他没能成功地促成此事。法国革命来得恰是时候。圣西门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党人，他做各种革命性的讲演、主持他产业附近的当地议会、推进改革、与农民交朋友——而此时其他贵族的城堡正在被烈焰吞噬。圣西门的共和热情不断升温，他甚至宣布放弃他的头衔，而改用博诺姆这个名字，就像当今的洛克菲勒给自己取名为约翰一样。

在整个政治动乱中，圣西门也没忘关照些私人事务。在革命期间，教会和那些被斩首和流亡国外的贵族的土地被没收，圣西门忙着以很低的价钱将它们买进。因为共和国的纸币价值日跌，圣西门在货币上进行投机，他用没有什么价值的指券^④来购置产

① 萨德（Sade，1740-1814）法国贵族，色情文学作家。一生中多次因为其特别的性行为而遭监禁。其代表作有《美德的厄运》等。——译者

② 拉法耶特（Lafayette，1757-1834），法国君主立宪派将军，君主制被推翻后，逃亡奥地利，拿破仑掌权时回国，以参加美国革命荣立战功闻名。——译者

③ 辛辛纳图斯社团（Society of Cicinnatus），1783年由参加美国战争的大陆军官创建，乔治·华盛顿为其第一任常任会长。它是第一个老兵组织，也是最早的一个爱国主义社团。——译者

④ 1789至1796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法国作为通货发行的纸币。——译者

业。可以肯定，罗伯斯比尔对这种投机是有警惕的，圣西门曾经因被怀疑为外国间谍而被捕过。但他在各省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了他的共和党人的形象，而且集结了足够多清白的支持者，所以后来他得以获释。不过这个插曲被证明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低潮，当很多脑袋从断头台上滚下来时，圣西门却积聚了很多财富。他奢侈享乐，开沙龙，在客厅里与众多崇拜者和雅士们谈笑风生地讨论他重组社会的计划。

但这没持续多久。1799年，拿破仑政变，共和国走向衰落，¹⁸没多久圣西门就发现他已经花完了最后一文钱。他开始叨扰以前的生意伙伴、家人，以及任何能给他钱的人。他逐渐招人厌烦了。他又一次转向了思想，他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用陈情书的形式送给拿破仑，送给科学院的院士，送给其他任何能将它们付诸实施的人。他自己特别得意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科学家们能够组成一个国际性的委员会，来掌握社会的方向，那么这个世界就有救了。那样，战争与冲突会消退，人们可以将他们的精力放在修建运河以及普遍性提高各种境况方面。圣西门所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启蒙观念，相信科学，并使之多了点儿实践的基础。

但奇怪的是，拿破仑和其他显贵终日繁忙，没有时间顾及圣西门的规划。他的陈情书往往没被拆封就退回到他手里。圣西门日益潦倒。他越来越觉得那些科学家在阴谋反对他。他的偏执狂表现得日益剧烈，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了沙朗通的一家著名的疯人院里（这是彼得·魏因斯的剧本《马拉 / 萨德》^①中故事发生

^① 这是魏因斯1966年写的一个剧本，描写萨德在1808年被关在沙朗通精神病院时期写作并指导他的室友们排演一部戏剧的场景。萨德的这一剧本刻画了法国大革命中马拉被刺杀的情形。——译者

的背景)。他曾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

后来，他又积聚起了一些财产。1815年君主制复辟后，圣西门开始作为一名政治评论家来谋生。那些原来被没收的贵族资产现在落在了一个由金融家和企业家所组成的阶级手中，随着拿破仑的垮台，那些流亡贵族又回到法国，并要求收回他们的财产。政府成为这两派人进行斗争所针对的焦点，而圣西门对于哪一方能够获胜有着敏锐的认识，他出版了各种文章及小册子，为他称为“工业家”(industrialists)的事业摇旗呐喊。“工业家”这个词在社会上迅速得到推广。圣西门出版的那些东西总是无人问津，但他通过来回拜访他的支持者们，鼓动他们为他的每一次冒险投资，从而使自己得以维持生活。在这项事业之外，圣西门发展出了他的社会理论，并开始吸引了一些追随者。

圣西门的主要观点是，工业主义是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进步并不只涉及科学，而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新的社会脱胎于正在衰退的封建主义，它为解决之前所有的问题提供了基础。圣西门是最早认识到新秩序开始出现的人物之一，他还作为预言者，预言这一新秩序将如何运作。

圣西门的一段著名陈述概括了他的哲学：

我们设想法国突然失去了50名第一流物理学家、50名第一流化学家、50名第一流生理学家、50名第一流数学家、50名第一流诗人、50名第一流画家、50名第一流雕刻家、50名第一流音乐家、50名第一流文学家；
50名第一流机械师、50名第一流民用和军事工程师、

50名第一流制炮专家、50名第一流建筑师、50名第一流内科医生、50名第一流外科医生、50名第一流药剂师、50名第一流海员、50名第一流钟表师；

50名第一流银行家、200名第一流商业家、200名第一流农场主、50名第一流冶金厂主、50名第一流兵工厂主、50名第一流制革厂主、50名第一流染房主、50名第一流矿主、50名第一流棉纺织厂主、50名第一流丝纺织厂主、50名第一流麻纺织厂主、50名第一流铁工厂主、50名第一流陶瓷厂主、50名第一流水晶玻璃器皿厂主、50名第一流船主、50名第一流车马运输行主、50名第一流印刷厂主、50名第一流刻版厂主、50名第一流金银器皿作坊主和其他五金作坊主；

50名第一流瓦匠、50名第一流木匠、50名第一流细木工、50名第一流马蹄铁匠、50名第一流锁匠、50名第一流刀剪匠、50名第一流翻砂匠，还有100名从事这里没有提到的行业的而在科学、艺术、工艺方面最有才能的人。法国总共失去了 19
3000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

这些人真正是法国社会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是制造最重要产品的法国人，是管理最有益于民族的工作并使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法国人。在全体法国人当中，他们是对祖国最有用的人，是为祖国争得最大荣誉、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民族要是一霎间失去他们，便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立刻沦落到屈居于今天正同它竞争的民族之下的地步；只要这种损失没有得到弥补，只要新的领袖没有出现，

它将一直处于这种从属地位。要想从这种灾难中恢复过来，法国至少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因为精于有益劳动的出类拔萃人物是奇才，而天地间奇才本来不多，尤其这类奇才更是凤毛麟角。

我们再设想另一种情况。假如法国把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一切天才人物都保存下来，而在同一天不幸失去某某大人、国王兄弟、安吉雷姆殿下、贝利公爵殿下、奥尔良公爵殿下、波旁公爵殿下、安吉雷姆公爵夫人、贝利公爵夫人、奥尔良公爵夫人、波旁公爵夫人和龚德小姐。

同时，还失去全部高官显贵，全部在任或不在任的国家大臣，全部国家参事，全部稽查官，全部元帅，全部的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大本堂神甫和议事司铎，全部的省长和副省长，全部的全体官员，各级法官，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养尊处优的大财主。

当然，这个意外事件会使法国人悲伤，因为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看着这么多的同胞突然死去而无动于衷。但是，这3万名被认为是国家栋梁的人物的死亡，只能使他们纯粹出于感情而感到难过，因为这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政治损失^①。

碰巧的是，这段话在1819年发表后没几天，迪克·德·贝利就被暗杀了。圣西门作为煽动者被捕。但由于他站对了立场，后

① Saint-Simon,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Science of Man,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4), pp.72-73.【以上引文采用的是钱继大先生的译文，见《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5-237页。——译者】

来被宣布无罪。

旧时代深陷于战争和宗教中，贵族和教士们寄生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而新时代将致力于生产有益的产品和服务。圣西门没有区分开银行家、制造商、工程师、体力劳动者、诗人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是生产者，他们与寄生性的贵族形成对比。“所有人都必须工作”，不管每人做的工作属于何种性质，这成了圣西门的口号。他的这一原则后来演变成了这样一个表达式：“各尽所能”——这后来作为共产主义的一项信条闻名于世。

圣西门主义者非常乐意将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是在一种很模糊的意义上进行这种确认的。现代的各种意识形态那时还并不明确，圣西门主义者仍然相信私有财产，只不过他们不认为它很重要，他们更关注的是通过大型的和集中指导下的企业来协调各种社会活动。诸如运河、铁路和蒸汽船路线等大型事业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从本质上说，这些事业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

现代时期将是一个和平的时期。由于人们将力量用于如何战胜自然，而不是用于对抗他人，因此暴力将被废弃。国家从本质上说将不再存在，至少那种旧式的、强制性式的国家将不再存在；它将被一个由科学家、金融家和工业家所组成的世界委员会所取代，这些人将为所有人的利益进行规划和协调。

社会将会保留着等级的划分（hierarchy），但将不再会被看作层级化的（stratified）。人们只是拥有不同的内在能力：有的人在智力方面突出，他们可以成为科学家；有的人情感丰富，可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那些体力发达的人则可以成为工人和组织

者。这三类人中的佼佼者可以被授以领导者的地位，其他人可以在他们下面各得其所地工作。不管地位高低，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各尽其能，那么所有人都将获得幸福。总之，圣西门相信一种完美的精英统治。

圣西门所发展出的观念已经成为工业主义的典型的意识形态。现在，这种观念已流布全世界，从现代法国的技术专家统治论者、英国的行政系统，到美国的从大学到兰德公司（RAND）等各类机构。人们相信，进步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新的社会是从旧的社会中被创造出来的（在东西方的更为发达的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亦如此），完成这种转变不需要革命或冲突，只需让科学家和工业家执掌权力。如果每个人都工作并根据他或她的个人价值而获得提升，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阶级冲突。这个体系是精英主义的，但没有人会（或者应该）在乎这点，因为处于顶层的专家们只是在为大众的利益工作。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一种对被称为“无国家的国家”（the stateless state）的信仰：政府只是作为协调社会的技术性的、中立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种压迫的工具或是服务于某些特定人的利益的机制。我们将会看到，甚至共产主义者也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国家的存在。

1825年，圣西门去世，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们则开启了一种意外的转向。他们采用了圣西门晚年的一个思想，即创立一种关于社会和谐“新的基督教”。他们开始宣讲人类之爱，并在巴黎城外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社区，在那里，每人都可以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嬉皮士，不过风格更为古板和体面。这

个实验在一年后失败，他们的领袖昂方坦（Enfantin）被捕入狱，以公然违反社会道德罪被判了一年徒刑。在这次浪漫的越轨尝试之后，圣西门的信徒开始致力于成为工业家和金融家。他们中不乏佼佼者：如皮埃尔兄弟（Pireire brothers），他们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的金融家和著名的莫比莱信托公司^①投机买卖的组织者；又如费迪南德·德·列色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他甚至实现了圣西门最早的一个计划——1869年，他完成建造了苏伊士运河。

奥古斯特·孔德

1817年，圣西门雇佣了一个私人秘书，是个叫奥古斯特·孔²¹德（1798-1857）的严肃的小伙子。孔德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刚从拿破仑的新式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毕业，那里教授最先进的现代科学。由于这个新助手经过了数学和各种科学的训练，圣西门发现他的这个门徒能够将他的松散的思想表达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们合作了七年，发展了他们对于历史和工业社会的各种观点。在这项事业中将生发出一门全新的社会科学。

在经过了一连串的争吵后，他们于1824年分手。最后一次争吵是为他们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的署名权问题。由于失去了资助人，孔德陷入了一种极度窘迫的境地。他向他曾经求学过的综合工科学校申请职位，但一次次被拒绝。他给数学入门考试的试卷判分、在公共场合向那些愿意来听的人做演讲，一篇篇地写文章

① 莫比莱信托公司（Credit Mobilier），1867年在美国创立的一家股份公司。——译者

论述他的体系，以此艰难地维持生活。像他先前的雇主一样，他也用陈情书对欧洲各国的君主和官员狂轰滥炸，希望他们能支持他的工作。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巴黎的各阁楼上挤满了饥肠辘辘的各式各样的作家们，孔德的陈情书只不过是那些泛滥的邮件中的一部分而已。孔德痛斥那些拒绝接受他的思想的人，而他认为这些思想是可以拯救世界的。他也以那种典型的方式经历过阵发性的狂乱与癫狂，并被送到沙朗通精神病院中待过一段时间。他有两次试图自杀。慢慢地，他在自己周围集聚了一群信徒，他的实证主义体系也逐渐为人所知。

孔德的体系源于一个基本原理，即知识发展三阶段法则。孔德把这个法则称为“1822年最伟大的发明”（此时他还在为圣西门工作）；他甚至每开始写新的一页都要记下当时的钟点。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问题，孔德与圣西门发生了决裂。

三阶段法则表明：任何一种知识发展的初始阶段都是神学形式（即用万物有灵论、灵魂或上帝来解释事物），然后发展到形而上学形式（即用抽象的哲学沉思来解释事物），最后进入实证形式（即建立在观察、实验和比较基础之上的对于事物的科学解释）。相应地，科学的发展也有一个历史的序列：根据难度的高低级序，各知识领域分别经过这三个阶段。首先是最简单也最遥远的一些论题成为科学的，而后是越来越复杂和具体的事务。科学发展的序列如下：

数学

天文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社会学

人类将自己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首先是从 22 那些远离自身的领域中开始的，即数学和天文学。当人类能将科学用于自身的存在领域，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就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出现。事实上，直到这时，社会才第一次被认为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孔德创造了“社会学”一词为这个新领域命名。

以上这个学科名单似乎缺了一环——心理学。但这并不是孔德的疏忽。对他来说，个人的心灵或灵魂只不过是一种宗教和哲学的迷信；而真正科学的心理学应该将人视为身体与大脑的活动，这样，心理学就是生理学的一部分，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孔德当时对心理学的看法包含了一种颅相学（phrenology）的观念，这是一种把个人的性情归因于其大脑中不同区域的扩展的体系。现在，这一学说如今遗留下来的只是这样一种记忆，即可以通过触摸人脑袋上的结块来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孔德强烈反对一切主观性的心理学，他的这一立场在当代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那里得到了呼应。

孔德对心理学的拒绝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结果。他认为，每门科学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化的存在层级。社会世界虽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并不等同于个体，而是根据其自身的规则组织而成的。在这里孔德与流行的启蒙思潮分道扬镳了，后者是要

在人类本性的因素中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社会并不仅是个体的行为，而且还是很多代人积累下的某种东西。就像语言是由说话的个体创造出来的，但是语言所发展出的词汇表和语法却是没有谁能做很大更改的；社会遵照它自己的法则存在和呈现，而个人在其中来来去去。因此孔德触及了作为一种——如我们今天所称的——累积性文化的社会的概念。

作为新科学的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那些支配着这一社会实体（entity）的法则。这样，社会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和“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孔德将静力学定义为对社会秩序的研究，将动力学定义为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的研究。

在他那个时代，孔德自己在科学方面受过的训练已相当不错，他确信，社会学要通过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调查等科学方法才能得到发展。遗憾的是，虽然他精通历史，但他自己没有做过什么这类的研究。他非常急于完成他的体系，因为他相信这个体系中包含着对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怎样使一个被革命和斗争破坏了的社会恢复秩序。根据这一考虑，孔德提出了一些方法论的原则，作为达致目标的捷径。

第一个原则是：不能孤立地理解事实，而必须将它们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来理解，即如果要理解部分的功能，就必须先掌握整体。这一原则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思想，现代科学哲学也持这一观点，即首先要有一个组织范式（organizing paradigm）或成套概念，这样才能清楚怎样去观察我们的世界。但孔德忽视了一个现代的前提，即人们所由出发的概念只能是临时性的，这些概念要

根据其切合于实施的程度而不断被修正或被放弃。而孔德确信他 23
在第一次尝试时就已经把握住了整体的模式。

根据这一模式，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类似，社会由家庭、教会、国家等部分组成，正如身体由肝、脑、肾等各个器官组成，每一部分之于整体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孔德并不是说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社会是以意识的形式而不是以具体的个人存在的，各社会机制作为这一观念系列的组成部分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可以在此分析中看到现代功能主义的根源。

社会的各组成部分装配在一起，离开任一部分，其他的部分也无法生存。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建立在一致同意（consensus）的基础上的，后者是一种共同属于某一道德统一体的情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德比他的导师圣西门保守得多。圣西门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相信科学和实业，而孔德并不认为只通过理性就可以将社会整合在一起，而是需要信念（faith）。因此，家庭、教会和共同体（community）是社会的核心，因为正是在这些场合，爱、责任、忠诚和敬仰等感情压制了人们的私心。这样，孔德就综合了圣西门的革命的思想遗产和反对革命的保守派的观念，这些反对者用浪漫化了的封建社会图景做对照，抨击罗伯斯比尔时期的混乱。这些保守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是流亡贵族约瑟夫·德·迈斯特和路易·德·博纳尔^①，我们在讨论托克维尔时会再次提到他们。社会思想的很多发展都得益于这种综合。

这一原则构成了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另外两个原则则阐明

① 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29-1799）和博纳尔（Louis de Bonald, 1754-1840），这两人在社会思想上持有机整体社会观，认为社会是由固定的不同社会等级构成的和谐的有机整体。——译者

了他的社会动力学体系。这两个原则分别是：相信任何地方的社会变迁都要经历相同的序列；相信一个社会的各种因素是共同变化的。根据头一原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研究所有社会的历史，而只需着眼于最发达的社会，我们可以从它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看到其他社会必须要经过的各阶段。一个社会的进化可以显示出世界上其他社会未来的面貌。这样，孔德就将所有已知社会置于一个发展序列上，从探险家所描绘的美洲和东方的原始部落，经由历史上的各个王国，最后到达顶点，不用说，这是19世纪的法国。

后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进步是同时在这个各个方面进行的——智力上、身体上、道德上和政治上。这一原则源自将社会看作一个综合整体或体系的概念。这为孔德提供了另一条捷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变迁可以看作其他变迁的标示（index）。孔德选择将智力变迁作为重点，因为这是他最熟悉的领域。以下就是他所得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简要概括：

智力方面	物质形式	基本社会单元	基本道德情感
神学的	军事的	家庭	忠诚
形而上学的	法律的	国家	崇敬
实证的	工业化的	人类	仁慈

- 24 孔德的基本思想对于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不管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有机体，但它同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不像有机体。它既内在和谐也内在冲突；它既是由道德情感，也是出于压制和经济自利

而结合在一起（当它确实结合为一体时）。孔德有关社会变迁的观点尤为有害。它对那些智力懒汉们很有吸引力，他们不想去理解历史发展的各种复杂的道路，这些道路并不是被安排得直接便利，甚至不是朝向同一个目标发展的。社会的各因素并不都是同时变化的，而且，变迁的结果并不像孔德所确信的那样是不可避免的和一定有益的。对于人类的所有期望来说，当时的法国并没有为世界的其他地方提供未来的蓝图，就像当今的美国并没有为第三世界提供这种蓝图一样。正如我们现在开始理解到的，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显示出多少迹象，表明它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正在创立出我们社会中的这类政治、阶层甚至是经济，而且他们是否真是在“发展”，甚至也成了问题。当今的世界规划者们如孔德一样过于匆忙地得出了乐观的错误结论。没有任何捷径可以代替用科学方法对各种事实进行收集、比较和分析。

在实证方面，斯宾塞、涂尔干和其他一些人很好地利用了孔德的很多重要洞见：认识到社会必须在它本身的层次上进行解释，而不能还原到心理学的层次；认识到社会各机制间的分工；尤其是认识到道德情感在维系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以后的社会学家们摆脱了孔德思想中充斥着意识形态关怀，他们超越了只是提倡道德秩序这一层次、而是去分析它，研究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道德秩序得以产生的条件，以进一步理解情感与仪式，它们在人们的理性意识的层面之下将他们彼此维系在一起。

但这都是后来的事。孔德最后将他的新科学变成了一个教派。这个教派是在 1844 年成型的，那时孔德刚结束了一场与一个中年妇女的轰动一时而又绝对是柏拉图式的恋爱。他这次激情

的对象是一个叫克洛蒂尔德·德·沃的女士，她被丈夫遗弃，但仍坚守着她对婚姻的誓言。这场恋爱的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孔德一次试图与克洛蒂尔德发生身体关系，但没有成功。之后他们之间写过很多关于责任和荣誉之类的字条和声明，克洛蒂尔德始终拒绝与孔德的身体关系，但这却使孔德沉醉于对克洛蒂尔德的高尚道德的崇拜之中。不久后，克洛蒂尔德罹病将亡，孔德强行进入她的房间，将她的父母锁在门外，这样他就能与她单独在一起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之后，孔德开始了他的一系列仪式崇拜活动，由每天向克洛蒂尔德的一缕头发鞠躬为开端。他将他的追随者组织进一种人道教 (Religion of Humanity)，孔德自己是最高教主。他开始将社会称为“大我” (Great Being)，通过他的工业化秩序体系宣扬普遍的爱和和谐。他设想人类将会进步到一种精神上更高的层次，甚至想象将来的某个时候，爱可以完全无需各种物质形式，女人可以不经过性交就生育。他设计了一种新的日历，其中设定了一些崇拜日以纪念一些科学家、圣徒、诗人和哲学家。
25 家。他设计了一个由所有这些领袖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在人道教的最高教主之下组织起来，他们将会通过应用实证主义而仁慈地统治世界。

当然，孔德和圣西门的教派，像 19 世纪其他一些乌托邦方案一样，是不能拯救世界的，它们甚至都没能对世界施加什么影响。圣西门主义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它证明了 19 世纪一些金融家和工业家的行动的正当性。孔德的实证主义则吸引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追随者，主要是在美国和俄国，而在巴西的一些浪漫派贵族

的要求下，它成为了巴西的官方哲学。确实，我们现在还能看见孔德的 *Ordem e Progresso*（秩序与进步）的名言仍在巴西的国旗上，它对这个困扰重重的国家的现状来说真是个讽刺性的注释。

这些乌托邦式的预言者并没能改变世界，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世界。他们过于乐观，过于感性化，过于急切地想达成某种容易的变迁，以至于不能理解，历史是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挣扎才能压磨出某些结论。在下一章，我们要会见的是现代最成功的社会运动的创始人，一个愿意去探察事物核心处的冲突的人——卡尔·马克思。

第二章

地下社会学：卡尔·马克思

26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到的社会思想家们都是体面的上流人士，他们受到既定秩序的欢迎。他们总是谈论着各种理想，而不愿审视新的工业秩序中那些不如人意的现实。但是，19世纪并不只是一个科学、进步、正义和友爱的辉煌时代。圣西门关于工业社会中和谐等级的描述，或者是孔德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都近乎无稽之谈，除非人们对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业城镇上空开始飘起了黑烟，在日渐发迹的实业家们的宅屋后的街道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廉价房屋，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庭就挤在这些屋子里，辗转于污浊、贫穷和疾病之间。一群群患着结核病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矿井和工厂里劳作，他们每天要工作11个、13个或者14个小时，每星期工作六到七天，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除非他们被解雇，或者死

了。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基础就在这里，就存在于物质和经济条件下这些残酷的事实中，而那些哲学家、政治家和教士们的言论只不过是為了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現實中引開的煙霧而已。

马克思是一个对19世纪充满愤怒的伟人。出于对所发生在人民身上的一切的愤怒，也出于对那些掩盖现实之人的伪善和漠然的愤怒，他开始揭露现实中正发生着的一切，解释经济基础毫不留情的运作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欺骗。马克思不是只希望社会冲突不存在，而是努力去把握社会冲突的现实，在这方面，他是第一人。正因为此，他注定要过着一种地下生活。但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生活。他不为成名的种种幻想所困，他认定自己认清了这个正在把自己带向毁灭的体系，并从中看到了一种更新、更好的世界的轮廓。卡尔·马克思，这个充满矛盾的人，既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革命者。

毫不奇怪，马克思是所有现代思想家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这方面可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的著作已经成了革命者和未来的革命者的手册。随着他的追随者在俄国、中国和其他地方取得胜利，他的思想被上升到国家信条的层次。²⁷ 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忠实地记录下了马克思生活中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正统。另一方面，事实上所有共产主义的反对者都认为他们必须反驳马克思主义体系，他们指出这些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发生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只发生在一些落后国家，而这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1989-1991年在东欧和俄国发生的革命进一步使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规划的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场怪异的插曲，历史将会进一步地将其遗忘？我们应该对马克思思想的各个部分做一区分。他的社会主义规划没有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运行，但是，他对社会主义并没有进行很多论述，而只是将它作为未来的一个阶段，它会在它的时刻来临之际被创造出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及其内部冲突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的崩溃使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更为凸显了。如今资本主义体系无处不在，包括原来苏联阵营内的各个国家，它们目前正在引进这一体系。社会主义自然不是一种历史的乌托邦终结，但资本主义也同样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各种经济冲突，而如今由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冲突事实上已经消失，所以其内部运作方式就愈发成为聚焦的中心。

马克思对于社会学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对经济阶级和经济冲突的分析，并将其置于社会运行理论的核心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不尽正确，但其中心论点仍相当重要。知识的进步就在于我们利用并修订已有的思想，来解释我们发现的事实，扬长去短。从长远角度看，只要我们尽自己所能去发现真理，而不是仓促地去依照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或纯粹的幻想去行动，我们将最终获益。只有同时认识到马克思思想的弱点和力量，才能最好地运用它，而这正是本章要论述的内容。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出生在特里尔，这是莱茵兰的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州，位于进步的法国与德国较传统地区的交界处。马克思的父亲是一

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拉比世家中的犹太人，曾经为了保住他的律师职业，名义上改信了基督教——因为在德国，律师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而是地方官僚政府的一部分。马克思年轻时就读于柏林大学，那段时间他经常混迹酒馆、欠人债务、按惯例与人决斗并在脸上留下了通常会有的伤疤，同时——学习哲学。总之，他已准备好了做一个职业学者。

但是，形势却使他不能成为一位才华横溢、受人尊敬的教授。他被以青年黑格尔派而知名的知识分子运动所吸引。格奥尔格·黑格尔（1770-1832）是他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德国哲学家。28 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追随德国传统，也就是说，他相信法律的控制，而不是人的任意统治。因此，他支持普鲁士王国。黑格尔的哲学是康德开启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顶峰，它认为实在的本质是理性（Reason），但理性的精神是逐渐显现自身的，在时间历程中越来越多地展现其自身的各方面。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理性不断增长以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立宪的法治国家就是历史的最高形态。当拿破仑似乎要把法国革命的胜利扩展到全欧洲时，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一观点。后来，随着拿破仑在1815年的最后失败，黑格尔以某种审时度势的态度做出反应，他宣称普鲁士王国的官僚制国家形态是历史的最高形态，于是，他成了柏林的官方哲学家。

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历史会终止于普鲁士，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宪法的时候；黑格尔死后，他的学说中所隐含的革命性开始走向前台。黑格尔的一部分学生即左翼黑格尔主义者运用他的历史相对论来攻击这个专制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堡

垒：国家教会。马克思的老师，布鲁诺·鲍尔（Bruno Bauer）将圣经作为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宣称福音书是伪造的，而耶稣的存在是个历史之谜。因为这一观点，鲍尔作为国家的危险分子而在1842年被解除了大学教职。这就扼杀了马克思进入学术职业领域的机会，因为在当时的大学里，导师关系比现在更为举足轻重。有人曾断言马克思会成为他那一代学者中最杰出的教授，但这条路径现在已经对他关闭了。马克思开始转入地下。

马克思成了科隆——莱茵河边一座很欧化的城市——的一份自由派报纸的主编。他很快就陷入了经济窘境。他卷入了一场关于当局禁止农民在森林里砍伐木柴的争论，而砍伐木柴是一种传统惯例。马克思用尖刻的笔调写道，树木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些穷人们就让他们冻死得了。他开始将形形色色的哲学看作对残酷的物质现实的逃避。他后来写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历史本末倒置了，现在的任务是要将其正过来。这份报纸办了五个月，之后被政府查封。保守派的报纸指责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当时马克思并不太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他决心要去弄个明白。

24岁时，他去了巴黎，这个所有激进分子的精神家园。他阅读了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浸濡于圣西门的进步观念以及他关于工业社会打破封建社会束缚前景的描绘，并见过乌托邦社会主义社区的鼓吹者。在德国的黑格尔主义和法国的激进主义之外，他给自己的体系还加上第三个维度，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思想。这些思想家解释了在这个新时期，人和商品的流转是如何被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操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一位激进派朋友，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德国青年。他刚从他父亲在曼彻斯特开的纺织工厂回来，带回来他的一篇严厉的揭露文章，题为《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们的思想一拍即合，从此他们建立了持续一生的思想合作关系。很快，他们就由于其激进著述而被驱逐出法国。他们去了比利时，后来又到了英国。1847年，他们参加了英国的一个新成立的叫“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革命性劳工协会联合会（在当时是非法的）的一些秘密会议。他们写了一个宣言作为同盟的纲领，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

《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1月完稿。2月在巴黎的经济危机期间，一群示威游行的失业工人遭到士兵的枪击，整个城市爆发了暴乱。法国国王退位，他的政府也崩溃了，这一反抗浪潮蔓延至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城市。各处的贵族十分恐慌，开始采取自卫措施。在法国，富裕的有产者们控制了第二共和国；7月的一场左翼民众起义经过六天的血腥搏斗后

① 此节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译文，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译者

被军队镇压。在整个欧洲，右翼逐渐获得信任，开始重建权力。马克思由于在科隆起义期间在那儿负责编辑一份革命报纸，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

反动力量再度得势。马克思去了他最后的避难所——伦敦，在警方间谍的监视下又开始写作。他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她是他童年时期的心上人，一个德国贵族的女儿，曾是马克思在特里尔时的邻居。生活变成了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奋斗。有段时间，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担任国外通讯记者，后来又在在一个自由派主编手下工作，以此维持生计。他的家庭时常陷入几至挨饿的状态。他们住在伦敦最贫困的工人阶级居民区。他们典当了各种东西，向恩格斯借钱，后者当时正在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商行中打点生意。马克思的好几个孩子都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尽管这样，马克思仍然

30 坚持工作，他每天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七点坐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这样持续了很多年。他的研究最后终于在 1867 年得以发表，题为《资本论》，一本将击垮半个世界的书。

马克思毕生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部分：社会学，围绕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学说；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建立在异化的概念和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之上。这三部分的影响和效果不一。马克思的社会学被证明是基本正确的，并对后来的各种理论影响重大。另一方面，他的经济学尽管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但不断引起根本性的争议。而他的哲学，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各种价值前提和看待世界之方式的基础上的，人们可以将其作为某种灵感源

泉。总之，我们可以不接受马克思的整个体系，但仍可以从他那里汲取许多东西。

马克思的社会学

阶级与阶级意识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宣称。阶级是他分析的核心。当然，阶级这一概念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会不注意到这一现象，但危险在于将阶级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马克思所做的就是要提供一种理论，阐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他以唯物主义的前提作为起点。他推论道，因为任何人都必须要维持生计才能活下去，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来源就是决定他行为的最基本的因素。一个时期的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的经济地位是其基本阶级划分的根源。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由于经济制度是围绕奴隶制建立起来的，所以其基本阶级就分为靠拥有奴隶而生活的人（贵族或公民）、奴隶，以及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拥有者的人（平民或自由民）。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领地（manor）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其主要阶级是拥有土地并拥有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民的劳动的贵族和提供农业劳动的农奴或农民。在现代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围绕着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换而组织起来的，其主要阶级就包括拥有工厂、银行和进行交易的商品的资本家，以及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在这些阶级内部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划分。比如，在封建社

会，贵族可以按照不同等级从国王向下划分到骑士，其中还包括有权势的中世纪教会中拥有土地的教士。也还有一些小的阶级不是直接建立在核心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的，如仆人、行会首领、熟练工人、学徒和自由农民。对马克思而言，财产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标示着社会结构中的分裂界限。当冲突尖锐时，各阶级就必然会依照这些划分界限形成不同的群体。因此，现代社会就包含了以下阶级：金融资本家（如银行家、经纪人）、工业家和农村土地所有者；大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包括拥有自己的工具、商店和劳动的手工艺者和店主；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最贫穷和最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他们中间充斥着犯罪，人们仅能糊口。马克思运用这些阶级来分析现代社会的运行，但是他预计，随着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而沦为无产阶级，作为整体的财产所有者和无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会趋向极端化。

社会的这种基本组织产生了马克思称之为“阶级意识”的东西。人们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观；他们都是从自身所处位置的有限视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像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就将私有财产看作自然秩序中内在的一部分，封建地主们则将等级化的贵族特权看作天赋的，而古代的哲学家们甚至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奴隶制的世界。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能力做到客观，或者说他们整天就在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有时也会真正地对哲学、宗教、科学、文学、历史和艺术感兴趣，但是只要他们的观念一撞上社会世界，阶级意识就开始起作用了。

在各式各样可供选取的观念中，人们总是愿意相信那些最符

合他们的物质利益观念。所以，中世纪的贵族支持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家，后者宣讲世间权威的神圣性，将农民导向精神世界，从而使他们忽略现实世界中的压迫。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含义。偶尔宗教也可以起另外一种作用，如当路德宗教改革提供了另一些选择时，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是在一种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它相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即将到来。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对个人道德的信仰中找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道德赞美勤奋工作的美德、个人的成功、自我控制、节俭以及对法律和所有权的尊重，这些使得人们支持自由企业的竞争体系。同样，政治家们则宣扬他们的法律中所包含的永恒真理，尽管这些法律构成了一个所有权的体系，而政治家们所属的集团是受益于这个体系的。

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如果每个人都选择符合他或她的个人利益观念，那么宗教又怎么会成为“人民的鸦片”？人们如何会有“虚假意识”，从而被他们的对立者的意识形态所欺骗？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工人并不总是把资本家看作他们的敌人，但如果他们不这样看的话，革命就不可能发生。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了两个主要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人们的观念会被某种高压政治所控制。他本人对政府的审查制度、叛国审判以及那些不愿意他们的观点受到挑战的人对“颠覆性的”思想家言论权的剥夺等手段是很熟悉的。第二个稍微微妙些的答案是，意识依赖于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源以表达和交流各种观念。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级拥有绝大多数这种资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多机会成为学者，有足够的时间和金

钱追随新事物和新观念的发展。更进一步，他们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影响观念的生产，如通过付给教师或教士薪水、拥有报纸或通过广告（或者，像在当今时期这样，给予研究津贴）来控制报纸。一贫如洗的圣西门为法国工业家写宣传文章就是个显示其过程的很好的事例。低层阶级只能暗地里批评上层阶级，而不能使这种批评处于公众关注的中心；对于与他们的生活有一定距离的事物，他们也缺乏各种手段去加以阐述。这样，其结果就是，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每一个时期，统治阶级的观念就是社会的统治观念”。

随着历史的推移，意识也在随之变化。启蒙思想家的出现是因为在英国和法国，物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开始聚集资源以支持他们自己的思想家。马克思察觉到了另一种会在将来达到高潮的运动。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带入城市，使他们集中在各个工厂，这就创造了使工人们相互交流的物质条件。他们学会了识字、读报，这使他们有机会发展出一种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公众信仰之下，一种处于地下状态的意识正在发展。在这里，马克思为自己找到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角色：他要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水平，直至他们获得充分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

以上这些都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达到顶点。政治就是控制国家的努力。国家根本上是由社会中组织化了的暴力机器组成的，所以谁能控制它，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国家是经济制

度的至为重要的支持者，而财产体系就是在经济制度中建立起来的。财产并不只是指所拥有的东西，它更是一种其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财产的权利，而排除其他人拥有这种权利。例如土地，即使被使用了，也不“属于”任何人，除非有人声称他对其拥有独占的权利，而这种要求是凭借他或她自身的权力或凭借国家的权力作为支持的。用这种方式，国家在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中，以及在现代货币经济体系中制造出了财产权。马克思尤为感兴趣之处在于，既然国家能够制造出私有财产，那它也就能够废除它而代之以社会主义。不过，那是将来的事。

一般的政治是指为了控制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以使国家权力为某些人的私利服务。这种斗争有时是在同一阶级的不同成员间展开的（就像中世纪贵族们之间的权力争夺），有时是在同一阶级的不同部分之间展开的（如在现代社会，小资产阶级与工业资 33
本家之间的利益之争、金融家与地主之间的利益之争）。在政治家们激昂的演说之下掩盖的是政治所真正关心的世俗的经济事务——税收、关税、垄断、公民权、许可制度——人们为了这些东西而争斗、讨价还价，其目的并无什么高贵可言，不过是为了有更多机会获得经济利益而已。

有时，会发生更重大的冲突。这往往发生在新的经济阶级试图要改变现存的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时期。马克思生活在法国大革命 34
的阴影之下，在这场革命中，整个贵族特权和垄断的封建体系被扫除，以为市场经济创立基础，它将贵族变成可买卖的土地的拥有者，将农民变成自由劳动者，将企业家从原来的各种垄断和限制中解放出来。这种根本的、革命性的冲突使不同阶级各自的

成员团结起来。贵族们不再内讧，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共同利益上联合起来。整个系统摇摇欲坠。

谁会在这些斗争中获胜？有两个主要决定因素：物质资源的分配（它使人们为获取权力的斗争得以成功）和历史境遇（它青睐于那些符合历史潮流的阶级）。虽然这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日常政治中，第一种决定因素是至为重要的，而在革命时期，第二种因素则是决定性的。

例如，在封建时期，日常政治是由贵族垄断的，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参与政治的资源。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商人还只是一个小的群体，不拥有军事力量。谁只要有钱买得起一匹马和一套盔甲，就可以成为骑士；而大地主可以装备起一整套军队。这样，贵族就构成了唯一的“政治阶级”，唯一一个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来与其他贵族联合、来参与战争和参与朝廷阴谋的群体。

同样，在工业化时期，资本家控制了信息、货币和时间。他们对于政府所施加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因为他们控制着商业和金融资源。商业交往网络使他们有了阶级组织；其商业与金融事务使他们一直关注政府的那些可能影响他们的举措；他们的财富和组织基础使他们能够支持那些能在政府中代表他们的政治家。这种权力完全不是意识形态性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拥有最雄厚资源的阶级能够操纵传播手段，因而能够阻止其他阶级表达出他们的利益要求。在资产阶级内部，就像贵族统治时期的贵族阶级内部一样，那些拥有最多资源的人能够将其利益凌驾于他们的同伴的利益之上。但是，当受到另一阶级的

挑战时，拥有最多资源的那个阶级就会作为一个整体团结起来以取得胜利。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权力的第二个决定因素：长时段意义上的经济变迁史，这种变迁会青睐于某一特定的阶级，只是因为这一阶级的利益正好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利益相符合。马克思确信，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取得胜利，就像他们在法国已经做到的那样。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即社会更多地是依靠工业生产和交易，而不是依靠生计农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来维持，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就需要一个有利于它的国家政治支持它。而缺乏这种支持，就会伤害到所有人，尤其是当时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不想再回到工业化之前的生活水平。但是，在马克思的时代，原有的封建法律和政府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国王们原有的专卖政策、任意的税收政策和给予贵族的特权都只会侵害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超出了生产关系，这种束缚必须被打破。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马克思宣称。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国王上了断头台，后来另一个国王在1815年取代了他——但那时原来的所有权体系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新的体系。与原来的绝对君主制不同，现在有了一部宪法、一个代表大会，在那里，资产阶级可以依他们的经济需要影响法律。

资产阶级胜利了，这是因为它的时代到来了。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使他们拥有了可以用来竞争权力的资源、能表达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繁荣所不可或缺的优势地位。而如果在中

世纪发生一场类似的起义则只可能失败。即使资本家能侥幸拥有获得权力的资源，他们也不可能改变维持封建社会的法律，因为这会引起到处劫掠的武士们和无助的农民们的骚乱。他们只有等待，直到历史已经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马克思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另一个正在历史的子宫中成熟起来的阶级：无产阶级。正如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内部成长起来，直到这二者的冲突使这两个系统都无法运作，于是旧世界必须被打碎以为新世界开道，资本主义自身也将由于自身的矛盾开始崩离析。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破产和失业，只不过是将要到来之事的征兆而已。当工业经济逐步发展，它将越来越陷入与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制度之间的冲突中，而后者构成了工业经济的结构。慢慢地，一场危机就会爆发，而在这场危机中，只有工人的利益是与保持系统运行的需要相一致的。只有废除私有财产、建立社会主义，才能重建经济秩序。工人的利益最后会成为整个系统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将会被取而代之。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双重的。经济变化不仅会使工人必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它也会改变夺取权力的武器的平衡。工厂和工业城市将极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起，技术的变迁——报业、电报等等——会提高他们交流和组织的能力。现代的各项进展会使他们充分动员起来并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当那个时刻到来之际，他们会已然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的话，马克思的社会学基本上是正确的。
35 但这并不是说他关于资本主义垮台的预言是正确的，它显然是不正确的。但这一预言只是其理论的一个具体应用而不是其理论本

身。大量的现代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也就是他的职业）是其生活方式、兴趣和信仰的主要决定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变化会产生出新的阶级阵容；组织和通讯所需的物质资源，以及对于维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管理功能，都倾向于决定谁将赢得政治权力。马克思将所有这些都置入了一个关于经济将如何发展的特定理论之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主义内部发展起来并导致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浪潮的论述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趋势的论述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认识到，体系的其他部分并没有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运行。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并非没有考虑到，种族与宗教之争阻碍了工人的团结，而社会流动性会使工人们关注个人的升迁机会，而不是推翻整个体系以获得其阶级利益。马克思只是期望，这类冲突在经济危机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这种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只是为了生存也必须依据不同的阶级划界团结起来。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种族间仇恨减弱了，这一事实表明，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对的。与此类似，他也看到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时期，唯一可能的社会流动就是下向（downward）流动。

接着，我们转而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马克思的经济学

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是从一个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

济学家相似的前提开始的：任何物品的价值就是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总量。举例来说，如果生产一件衬衣需要一天的时间，生产一双鞋子需要两天的时间，那么，两件衬衣与一双鞋子的价值相当。尽管市场的供应与需求会有波动，但最终商品的市场价格与真实价值之间会保持平衡，两件衬衣的销售价格会相当于一双鞋的价格。因此，劳动价值理论论述了经济制度中生产与交换的基本机制。这对马克思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如果是劳动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要求获得其劳动收益就是正当的。

剥削产生利润

如果劳动价值理论是正确的，那就存在一个悖论：利润从何而来？市场是趋于平衡的；商品都是以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易的；一天的劳动交换一天的劳动。那么个人如何获得比他所投入的更多的东西呢？马克思在一种商品中发现了答案，它是以其真实价值出售的，但却能生产出超过其售价的东西。这种商品就是人类的劳动本身——工人们在劳动市场上出卖它后再使用它。根据马克思的演绎推理之链，劳动也趋向于按其真实价值进行出售，即其出售价格要与生产出劳动的劳动总量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满足1个人1天的吃、穿和住平均需要农民、织工、木匠和其他人6个小时的劳动，那么他就要得到相当于6个小时的劳动的等价物的报酬。但是如果雇主付给他6个小时工作的报酬，而他则能给雇主工作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14个小时，这在马克思的时代是很普遍的事）。这是可能的，因为那些雇主拥有生产

资料——工厂和劳动工具，所以他们可以要求更长的工作日，以此作为提供工人工作的条件。利润就来自这些额外的工作时间，它是工人工资的额外部分。这部分额外劳动被称为“剩余价值”，利润可以说是建立在剥削劳动的基础上的。

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现在整个体系就可以运转起来了。当资本家扩大生产，他们为了劳动而相互竞争。于是他们就抬高工资以吸引工人。但工资提高就会使利润降低。而这又反过来促使资本家安装能节省劳动的机械以降低其劳动成本。

但这样，资本家们就开始在自寻绝路了。根据马克思的图式，机器并不能产生利润，利润只来自对劳动的剥削。一旦其他竞争者赶上来装备上同样的设备，制造商依靠新设备获得的收益就会丧失。这会使机器的价格提高及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结果只是，相比之下，资本家降低了所雇佣的劳动的总量，而提高了机器和其他非劳动成本。这就意味着利润必须下降，因为剥削劳动是利润的唯一来源，而被剥削的劳动在减少。事实上，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利润确实在趋于降低。（现代经济学修订了这一原则：利润的减少只是在各产业圈内部，而不是跨越各产业圈，利润在这些交叉处是长期增长的。）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独具特色的一幕。在 19 世纪，每隔 10 年就有一次经济萧条。马克思的解释是，随着新的

机器被装备起来，人们大量失业。这就意味着更少的人能拿到工资，于是能买得起东西的人也更少了。但是，机器又提高了生产率。商品多了，购买者却少了。价格降低了，利润则下降了。制造商们努力你追我赶地装备更加节省劳动的机器，但这只使事情更糟。很快，仓库里堆起了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而失业还在增加，人们处于穷困之中。制造商们破产，而这又使更多的人失业。

37 最终，危机到达底线。一些更有实力的资本家以很低的价钱买断了那些破产者的工厂和机器并开始赢利。剩余的商品终于清空，工人能够以很低的工资受雇，就业率开始提高。不久这一循环又重新开始：先是扩大再生产和利润的繁荣期，接下来就是萧条期，利润下降、机械装置增长，还有失业。这个系统以可怕的规律性上升、下降，每经历一次，幸存下来的制造商就少些，而他们所占的市场份额则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的最后崩溃

于是，资本主义就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产业垄断。那些小的资本家被挤了出去，他们丧失了财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与此同时，系统制造出了一个失业的雇佣预备大军，这使就业竞争激烈，而工资水平仅使人免于挨饿。无产阶级因此更为数量庞大，不满情绪日益激烈。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危机都比上一次更为严重，因为较之小企业的崩溃，大企业的崩溃将更多的工人抛入了穷困的境地。在这一时期，经济通过这些大型垄断企业而集中化了，这就为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所需要做的就是推翻私有制，让工人们为了大众的利益来管理社会体制。

最后一次危机爆发了，作为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举行起义。军队、政客们和国家的捍卫者们都无力阻挡，因为所有人都不得不看到这个无法避免的结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后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们已经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可调和了，”马克思这样预言道，“这个外壳分崩离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剥削者们终将被剥夺。”

哪个地方出了差错？因为不管张力如何大，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在发达国家崩溃；长期来看，利润并没有下降；工资并没有停留在维持生存的水平。当然，一直是有周期性的危机，大型企业以近乎垄断的形式主宰了商业界；但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图景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出现。

对此主要有两种回答。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列宁（他的理论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①的思想基础上）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这样，更为发达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可以通过剥削世界其他地区来避免国内的经济病症。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它们就可以把剩余商品倾销到印度或南美洲的市场。多余的投资资本也可以投向这些地方；甚至劳动也可以被国际性地剥削，他们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便宜地生产各种原材料。总之，通过剥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那些富裕国家保证了它们的利润不断上升，而且还能付给令他们的工人满意的工资。

但是，危机只能被推迟，而不可能完全避免。一旦整个世界

① 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 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说。主要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译者

- 38 都被带入到资本主义的轨道，阶级冲突就会国际化。革命必然会伴随着战争。列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欧洲几大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市场而进行的斗争；其结果只能加速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避免的混乱。俄国在被德国打败后，在经济废墟上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古巴、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只不过是在通往资本主义最后崩溃之路上迈出的更多步伐而已。

关于马克思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这一问题，还有另一种解答，这种解答更接近问题的核心。那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相关的关于利润的劳动剥削理论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劳动并不是唯一的、从中可以通过获取超出其成本的产出从而获得利润的东西。机器和更完善的组织也能提供利润，因为它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美国 1970 年的人均生产量大大超过 1870 年的人均生产量，这是因为今天的科技已经大大发展了。这就意味着可以比以前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可以保持很高的利润，而工人也可以通过联合以及政府的福利项目而收益更多。对于生产过剩，政府甚至可以干预经济危机，运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技术（例如政府雇用、消费和税收），使大范围的失业和消费疲软不致发生。

如果马克思的无情的经济机器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运行的话，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发生；但是这个机器的核心已经被打碎了。马克思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完美的体系：经济产生了阶级、阶级意识和统治国家的阶级权力；劳动价值理论、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以及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发展转动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车轮。

但是，劳动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主发条脱落了。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学的决定因素还在起作用，但不再是由那些必然的基础所决定的。历史陷入了不确定性中。

我们还是可以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打捞出一些东西来。如果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不可避免，但说它可能发生或者有发生的危险，那还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自 1970 年代以来，日益向富裕和贫穷两极分化。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论及这两极间中产阶级的扩大；我们需要修正我们的理论认识以对这一现象进行思考。但是，中产阶级的存在并没有消除阶级间的经济冲突；它只是使其更加复杂化了。现在似乎存在着四个不同阶级间的冲突：顶端是富有的有产资本家，然后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处于底层的是贫困阶级，他们依靠福利生活，容易陷入街头犯罪之泥淖。目前的阶级冲突经常发生在中产阶级与贫困阶级之间，前者反对他们认为负担的福利体系并抗议来自底层的犯罪对他们造成的威胁。但这也是阶级冲突，尽管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复杂。我们也看到了中产阶级反对上层阶级的趋势，这主要是对 1980 年代已很突出的金融丑闻和税收不平等所做出的反应。显然，阶级冲突 39 并没有结束。马克思的理论将其动力学建立在经济机制的基础上，而他对后者的论述并不确切。它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但我们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贯穿于他所有的其他工作中。这一哲学以异化

(alienation) 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为中心,前者是人类历史的突出特征,后者则是历史的终结和异化的解决。

在 20 世纪,异化已成为一个普通的观念;现代人似乎被感染上了一种抑郁 (malaise),而这种倦怠在一百年之前是少见的。我们感觉到我们所创造出的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是有违我们的本性的——我们被非个人化的市场的强制力和非人化的官僚机制的种种决议所统治。我们生活在一个卡夫卡所描绘的世界中。马克思是首先发现这种抑郁情绪的人之一,尽管其经验意义还有待韦伯和弗洛伊德来进行发掘。对于马克思,异化是一个比基本公理更不易观察到的事实,它来自黑格尔,并且最终回到了神学上的罪 (sin) 之观念。为了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对西方哲学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要很好地把握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传统,最好从勒内·笛卡儿 (1596-1650) 开始。笛卡儿的名言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是他认为必定真实的一个原则,即使一个人怀疑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情。大卫·休谟 (1711-1776) 扩展了怀疑论的范围,他指出,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某些事导致了另一些事。如果一个事件总是跟随在另一个事件之后 (至少直到现在还总是这样),我们只能猜测这个事件是由头一个事件引起的。我们判断的是同样的序列会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因果关系是我们加诸外在于我们思想的事物之上的,而不是绝对存在“在那儿”的东西。伊曼纽尔·康德 (1724-1804),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奠基人,将这一观念更推进了一步。他论证说,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世界上的任何事,因为我们总是带着我们主观性的理解过滤去经历所有

的事情。不仅是因果关系，还有时间、空间、形状、数量、颜色以及实质都是我们自身观念框架的一部分。“事物本身”永远不可知；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自己思想中的内容，它被加诸不可知的现实原料之上。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马克思的导师黑格尔。黑格尔从康德那里得出结论：人们通过感知行为创造了他们的世界。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需要用整个历史来完成它。实际上，无活动力的物质（inert matter）不存在形态，直到进化出了能感知它们的生物；美和真理的高级形式不会出现，直到人类开始透过这类镜片来观看这个世界。而且，个人还在积极地形塑这个世界，他们制造出工具、艺术作品、法律、国家和思想体系。这每一项都进一步表明越来越多的形式世界中的东西进入到了实在世界中。逐渐地（我们就处于与黑格尔自己的时代相近的时代），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是某种高于他们自身的事物的代理人（agents）——世界是一种精神，它逐步展开自身的各层面，直至最后完全显现。这种精神就是理性（Reason），它在立宪国家和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顶点，也就是理性最终意识到自身。

异化之所以进入了黑格尔的体系，是因为它描述了人类在最终认识到现实的本质——逐步展开的理性精神——之前人类与他们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创造了事物，但不能认识到是他们创造了这一切。他们错误地将世界看作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至少在康德的发现之前是这样）。他们像傻子一样对各种事物顶礼膜拜，而看不到他们自身的创造力和流注于他们中的理性。于是，人们就与他们的基本自我（essential selves）隔断或

者说产生了异化。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这种分析方式，但是去除了其精神性的根基。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世界，但他们又被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事物所控制。他们通过自己大脑的想象创造出了宗教，但随后又拜倒屈服在他们的神灵面前，就像它们实际上存在一样。他们创造出了国家，但却不能摆脱它的统治。他们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创造出了一个经济体系，但却发现，在这个他们创造的市场上，他们被迫出卖自己。

在《资本论》的著名一章“商品拜物教”中，马克思描述金钱如何在一开始是作为用来买货物的交换手段，但很快就成了目的本身。物品只以它的金钱价值来衡量，而不是以它们对于消费者的用处来衡量。一座房子不再是一处供人居住的地方，而成了一处房地产，只有在保留它在市场上有利可图时，它才成为某人花钱住进去的地方。资本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不能享用自己的货物，而必须把它们转换成尽可能多的利润，否则他将被对手击败。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的异化程度是所有人中最高的，因为他们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售，他们被剥夺了与他们所生产的、资本家拿去出售的产品之间的任何有意义的联系。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异化程度越来越严重。于是，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将摧毁经济上的剥削体制，而且也会摧毁一个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体制。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将人类的异化扩展到了最后的边缘，在这个阶段，它最终要被废除。共产主义将是个消除了异化的社会，那时

的人们将不再被他们所创造的体制所控制，而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控制这个体制。劳动分工本身将被消灭。人类将最终达到完美实现。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并不是一个经验性的实体，而是看待世界、支撑评价世界标准的一整套方式。现代社会学家曾试图测量过从事不同性质工作的人的异化程度，结果是混合的。绝大多数工人认为，有些工种，如装配线上的工人，是最非人化的。而一些其他工种的工人（我们必须记住，有很多人，即使是在工厂工作的人，是不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则表达出相当程度的积极性的反 41 应；还有一些人，尽管是少数，甚至喜欢在装配线上工作。马克思对此的反应肯定是认为，由于在这一体制中所受的压迫过于严重，他们甚至会丧失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其最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寄希望于人类尚未开启的潜能，并提出了一个期望社会努力达到的很高的标准。

共产主义的理想更容易评价。马克思自己很积极地推动他所论述的革命。他帮助创立了一个革命性的工会运动，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他去世后，恩格斯继续担任了其领导职务。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德国，随着其组织获得政治上的承认，工联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unionists' Marxism）变得越来越浮夸和不切实际。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潜力并没有丧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具有穿透力的分析和他对推翻此制度的信心，激励了许多追随他的斗士，他们在俄国以及其他地方以他的名义创立了一种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中兴起了共产主义国家。

马克思可能会拒绝苏联体制，认为它曲解了他的本意。他所设想的体制是要赋予所有人以尊严，而不是牺牲一切以换得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他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将如何解决这一艰巨的问题。抽象地说人民控制体制而不是被其所控制，这很容易，但要考虑如何才能实现得了就难得多了。事实上，以后的社会学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马克思的幽灵进行辩论，如韦伯、索雷尔（Sorel）、米歇尔斯（Michels）、曼海姆（Mannheim）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都在质询这样的问题：如果说经济可以还原为对一般产品的控制，那么是否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控制权力。各种事件迫使我们要超越马克思。我们必须寻找到能摆脱国家这一利维坦^① 和市场这一玛门^② 的途径。

马克思的遗产

马克思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们常常被教条主义所束缚。他所启动的运动在组织上和情感上对其成员施以严厉的要求，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再自己去思考任何新的想法。不过，这一运动也不完全是停滞的，有一部分人希望扩展马克思的某些理论而放弃另一些。例如，在马克思 1883 年去世后的一段时期中，弗

42 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其他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科学性、物质性的一面。在 20 世纪早期，列宁、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① 利维坦（Leviathan），原意为《圣经》中所提到的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1651 年，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发表了他的有关国家组织的论著《利维坦》，借用它来象征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后来也用来指有庞大官僚机构的集权主义国家。——译者

② 玛门（Mammon），《圣经》用语，意为“财利”，尤指被视作偶像或罪恶的钱财。——译者

Hilferding) 在其经济理论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战争对社会的形塑作用。而政治取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声称，通过议会的和政治的途径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德国的“修正主义”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是这类预言家之一，他更喜欢说“进化” (evolution) 而不是“革命” (revolution)。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待了很多年的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并不只是等待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崩溃，而要通过控制国家而在政治上推翻霸权 (hegemonic) 阶级 (即事实上的统治阶级)。

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从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哲学。这一转向的第一步是一个年轻的匈牙利知识分子格奥尔格·卢卡奇 (Georg Lukacs) 走出的，他曾经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卢卡奇声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剥削和政治支配这些表面上的事物，而在于资本主义统治所控制的虚假意识形态 (false ideologies) 的物化 (reification)。如此，卢卡奇就给马克思的异化学说 (它无疑是源自黑格尔) 罩上了一种更为哲学化和社会学化的形式。根据卢卡奇的观点，正是由于人民依附于这种虚假意识形态 (它遮蔽了人民的社会抗争和社会权利)，从而使他们异化于真正的、丰富的现实和真正实在的自我。而工人阶级是最不受这种物化作用的支配的，因为它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依附最轻；因此，它的使命就是将异化程度更深的、支配性的社会从其自身的虚假意识中解放出来。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使马克思主义与

黑格尔更为融合在一起。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论证道，黑格尔的理性发展辩证法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进步哲学家，他为马克思铺设了道路。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致命的不合理性所导致的这个法西斯反理性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理性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成了法兰克福传统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论述了隐藏在现代政府和企业所建立的各项科学机制背后的意识形态利益，他们利用这些机制来使其各种决策合理化；他还论述了合法化危机，这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是可以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的。与此同时，在法国，马克思主义通过存在主义的首要创立者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与存在主义，通过萨特的论战对手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而与结构主义，结合在一起。

恩格斯的性别分层理论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另一支在近年显得越来越重要，即它关于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的分析。其主要源泉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的43 的一本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发表于马克思刚去世不久的1884年。恩格斯使用了马克思的笔记，认为这一著作所表明的是马克思的立场。

恩格斯利用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这一点导致了对这一著作的各种批评，因为当时对人类学资料的解释很多已经不被今天的学者所接受了。恩格斯的很多材料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路易

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后者住在纽约北部，是研究易洛魁的专家。易洛魁是个印第安部落，居住在他们的著名的“长屋”（long houses）里，每个长屋中住着好几个家庭。易洛魁社会中的一个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其妇女的地位：易洛魁社会是一个强悍的尚武社会，但也是个政治民主社会。部落的领袖是选举出来的，通常是男人；但女人也有完全的选举权，尤其是老年妇女有相当的权力，她们能够废除首领。

此外，易洛魁的各氏族基本上围绕妇女组织起来的。他们遵循着被恩格斯（和摩尔根）称为“母权”（现在称为“母系”）的原则。家庭谱系只通过母亲和她的孩子来上溯，财产在女性之间继承。氏族采取外婚制，禁止在自身所处等级内部相互通婚。这样，一个男人通过结婚进入了另一个自己氏族以外的氏族，但他在那儿始终是一个外来者。他的孩子不属于他的氏族，他也不从他那里继承财产。恩格斯、摩尔根和当时其他一些人类学家都将这一社会体系作为母权制（matriarchy）存在的证据，将母权制作为家庭早期发展中普遍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易洛魁社会中另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就是它的亲属称谓。易洛魁的孩子称呼他们的母亲的姐妹也为“母亲”，称呼他们的父亲的兄弟也为“父亲”，而这些另外的父亲、母亲们的孩子们相互之间不以表兄弟姊妹相称，而是以亲兄弟姊妹相称。恩格斯同意摩尔根的说法，把这看作人类历史早期阶段曾经存在过群婚制的证据。在那个时期，各兄弟与他们的妻子之间、各姐妹与她们的丈夫之间相互为配偶关系，不加区分，因此也就不可能区分出哪个孩子实际上是谁的。

在这一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家庭发展序列的各个阶段。首先是完全的杂交阶段，这时的社会完全自由、平等。接下来，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之间的乱伦关系被禁止，但另一方面仍保持了很宽泛的性关系的范围。再后来，乱伦禁忌扩展到了兄弟姐妹之间。这最终为恩格斯称为“对偶婚”的婚姻制度铺设了道路。易洛魁的氏族外婚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乱伦禁忌扩展到了氏族内的每一个人，于是必须在其他氏族中寻找性伴侣。

恩格斯把这几个阶段，尤其是对偶婚之前的几个阶段，都看作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形式。它们具有以下这些特点：

1. 不存在私有财产。作为一个集体的氏族拥有所有土地，不管是林地还是小块耕地。所有的氏族成员共同合作生产食物、共享食物。
2. 与前一特征类似，在性方面也实行共产主义。虽然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乱伦禁忌，但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形成一对一的排他性性关系，而是共享关系。（到易洛魁人的对偶婚阶段，性方面的自由度已大大受到限制，但早期阶段的称谓仍然保留了下来。）
3. 两性之间是平等的。妇女在社会中受人尊敬，经常享有政治权力。恩格斯认为，这种平等的关键在于其经济基础：妇女充分地参与了劳动。在园艺（原始农业）社会，她们是食物的主要生产者，即使是在狩猎社会，她们也通过采集野生植物而提供每天稳定的食物供给。妇女不疏离于她们的劳动产品，也不疏离于生产的中心社会过程，因此也就享有很高的地位。

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支配是由经济上的变化引起的；首要的一点是，由于犁地、灌溉等农业技术的提高导致了财富的增长。恩格斯认为，这一点产生了一个结果，即男人想要把他们的财产传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于是，他们推翻了“母权”（母系制），建立了“父权”（父系继嗣）。他们还推翻了古老的氏族外婚制——因为财产保存在男人的后代手里——建立起氏族内婚制，将财产保存在氏族内部。（以前在母系制下，外婚制也是为了将财产保存在氏族内部。）

伴随父系制而来的是一夫一妻制。因为一个男人要把他的财产传给他的孩子时，他就要确定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所以，乱交及群婚就不再被允许了。但是，这种新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只是单方面限定的。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夫一妻制只是针对妇女，男人则可以通过纳妾、购买女性奴隶以及找妓女等方式实行多婚，只要他们支付得起。

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妇女在家庭体系内处于屈从地位。“这一革命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具决定性的革命之一”，恩格斯宣称，“……母权制的被推翻是女性在世界历史上的失败”^①。当社会由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妇女被从公共经济领域排除出去而被委以家务劳动。男人接管了繁重的农业劳动，让妇女只从事琐碎的家务劳作。男人们完全控制了政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妇女从宗教和公共文化中排除出去。

于是，新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只是以财产为中心，爱情被排除

①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Marriag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884/1972), p.120.

在外了。妇女只被男人作为繁衍其财产和后代的工具。恩格斯似乎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即男人并不关心通过他们的后代来接续他们自身，而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传统需要有可靠的继承人。这样，
45 家庭体制就成为对永久性私有财产的一种礼拜形式。恩格斯将父系制的出现看作人类历史上的，而不仅是妇女的地位方面的，一次革命性发展。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私有财产本身的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社会的出现。恩格斯总结道：“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阶级压迫是与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男女两性间对抗的发展相重合的，最初的阶级压迫是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①

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论证说，爱情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外。他指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性爱的领域只局限在与妓女的交往和同性相好中。在中世纪的欧洲，在行吟诗人的诗歌中，爱情是以对通奸，以及对骑士与已婚妇女之间被禁止的爱情进行赞美的形式而被歌颂的。恩格斯接着嘲笑了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嘲笑它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了其自身的对立面：卖淫和通奸。只要婚姻首要的性质是一种财产关系，爱情就只能是在婚姻之外。就像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一样，卖淫是伴随着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出现而出现的，恩格斯认为，这种组合是无法解决的，只要一夫一妻制存在，卖淫就会永远存在。

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父母为孩子选择丈夫或妻子这一点已不再是合法的财产继承体制中的一部分，但婚姻中的

① 前引书，第 120 页。

经济因素依然在起主导作用。表面上似乎是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对象，但这只是一种形式。这与现代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类似，要赚取工资的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他是否将他的劳动卖给某个雇主，但如果他不卖的话，这个没有自己财产的劳动者就只有挨饿的自由。同样，妇女也有选择结婚或不结婚的自由，但实际上，经济的压力会迫使她们进入受丈夫压制的状态，因为后者有收入可以养活她们。

有什么途径可以跳出这一体制吗？马克思的分析指出了一条解决之道。马克思说，必须废除私有制；这就切除了一夫一妻制的根源，因为这将不再存在要传给后代的私有财产。妇女将与男人平等地成为劳动力，从而不必再为了获得经济供养而去结婚。孩子将由社会抚养；人们将不再关心所谓合法性的问题，如恩格斯所说的，加在“性爱”上的所有限制都将消失。于是，在资本主义末期，性的自由会再次出现，与此相随的是群婚制的重新建立，就像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一样。

事实上，恩格斯在道德态度方面是很维多利亚式的，于是他接着论述道，当一夫一妻制消失时，卖淫也就会消失。妇女将不再需要去出卖自己，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他认为，婚姻是妇女一次性地出卖自己（长期），而妓女则“像拿工资的工人一样，计件式地出租她们的身體”。^① 而如果没有了经济方面的动因，个体就可以以纯粹的个人间的吸引为基础结成伴侣。恩格斯甚至浪漫地设想这种激情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在未来的共产

① 前引书，第120页。

主义社会里就会有持续一生的爱情。

恩格斯的论述存在着各种缺陷，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一著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实践效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是第一场支持女性平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社会党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发挥了恩格斯的观点。随着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国会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他们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使其成为欧洲大陆声势最大的女权运动，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政治解放运动的最高峰。这场 20 世纪早期在德国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对性态度的颠覆运动，另一方面是一场追求性爱自由的运动，它构成了当时社会氛围的一部分，当时弗洛伊德刚开始走红。马克斯·韦伯的妻子，马丽安娜·韦伯（Marianne Weber）是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领导者，也是德国第一位被选为公共官员的女性。

在理论方面，恩格斯的理论中存在很多问题。它是一个开创性的阐述，而近些年的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它。对于其所描述的人类家庭早期发展诸阶段的观念，已经有很多的批评。是否存在一个没有任何乱伦禁忌的原始群婚阶段是颇有疑问的。许多狩猎-采集社会（最古老的经济形式）都是父系制的，更多这样的社会是采取双系制的（也就是说，他们按父母双方来计算世系，就像我们现在实行的一样）。母系社会似乎在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社会总体中都不占多数，虽然在农业社会，母系社会会相对多些，因为那时妇女在食物生产中作用重大。

不过，如果说我们必须放弃这幅人类进化阶段的图景的话，恩格斯理论中其他一些更为抽象的原则则开创了一些重

要的研究途径。恩格斯的理论是第一个论述性别分层（gender stratification）的社会学理论，它试图揭示是何种环境造成了两性间不平等或平等的不同程度。他关于一夫一妻制是与财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普遍性论述被证明是颇有贡献的，而他通过经济关系来分析性关系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路径也同样富有成效。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之中还在继续着这样的争论，即在多大程度上，妇女的地位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工人普遍斗争中的一部分。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通过再生产劳动力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但又是隐藏着的角色。这就是说，首先，妇女生育了将来要成为工人的孩子；她们给这些孩子喂食、穿衣、清洗，把他们养育成人。妇女作为母亲的工作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未获报酬；而没有了她们，资本主义就无法运行。妇女作为妻子的工作也是如此，她们从事种种照料家庭、准备饮食、洗涮衣物等家务劳动。另外，妇女还在精神上给男人以安慰，在普遍的意义上说，她们也承担了男人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承受的压力。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妇女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尽管她们没有直接被其雇佣。妇女为资本家的利润贡献良多，因为没有家庭妇女的无偿的女性家务劳动，资本家的利润将会大大下降。从这一观点看，要解决两性间的不平等就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改变滋长剥削女性的经济基础。⁴⁷

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妇女斗争是独立于（或许也平行于）工人斗争以及其他被压迫群体的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男人在家庭中也得益于他们对妇女的支配。性别歧视主义（sexist）的

传统做法是将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妇女安排在男女隔离的和其他报酬很低的工作岗位上，使她们不可能与男性进行竞争。提高工人的地位本身并不一定对妇女有益。社会主义国家中妇女的地位，如在 20 世纪多数时间中俄国与东欧的情况，与西方国家相比并无很大差别。妇女也主要是从事家务劳作，在家庭之外，她们所获得的也只是更低等的工作，很少能占据重要的政治职位。也有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通过组织起保护她们自身权利的独立的利益群体，使其地位获得了提高。她们能够获得一些高报酬的工作，她们的地位和权力有了提高，甚至在她们自己家中也是如此。随着妇女劳动力就业范围的扩大，恩格斯所尖刻描述过的那种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发生了变化，它被另一种更不固定的状态所代替，后者包括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婚前性生活、离婚以及再婚。实际上，这些都是恩格斯预言过的，只不过它不是通过废除私有制的方式来提高妇女对职业市场的参与。

不过，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女权主义运动最近在提高中上层妇女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还存在很大一批从事手工工作和办公室文书工作的妇女，她们是劳动力中报酬最低、最受剥削的一批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许有许多可争议之处，但它至少指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一个巨大的受剥削的妇女群体的存在将提醒我们，存在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爆发的革命性力量。

第三章

最后的绅士：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19 世纪早期的思想和今天的一样，也不是单一化的。就我 48
们已经讨论过的现代主义者而言，就有像圣西门和孔德这样的
工业秩序的预言家和像马克思这样对未来看得更远的激进主义
者。但并不是人人都相信进步。在大革命后的社会中也还有保
守派，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埃德蒙·伯克^①以及法国的贵族路
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迈斯特。后两人攻击现代社会是暴
徒统治的无政府状态，它与秩序、服从、仪式、信仰和等级的观
念——所有被认为存在于中世纪的这些品质——截然对立。复辟
后的法国制造出了重要的现代观念的病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和法西斯主义。

①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国哲学家和政论家，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反对法国革命。代表作有《法国革命论》。——译者

但保守主义的遗产比这更为复杂，从各种奇怪的混合体中产生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孔德将博纳尔和迈斯特的思想与圣西门的工业主义结合起来，创造出社会学这门作为研究新社会的秩序的科学。另外，保守主义生产出了一位旧秩序的完美体现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的保守姿态不是表现在他对新时代的谩骂上，而是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拉开距离，而这对于理解这个时代是必要的。

现代主义者从根本上说都是乐观主义者，而托克维尔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观点与经典的罗马希腊观念一致，人生是一场悲剧，各种永恒力量永远是平衡的。他的经典的散文体旨在赋予存在的困境以一种唯一可能的秩序——词语的和谐。的确，平等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平庸是我们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们在某些方面获得了自由，但这是以我们同时失去了其他方面的自由为代价的。托克维尔持有一种古典的平衡观念：在任一方向上的超越都会导致相对应的反应。在那个乐观主义的时代，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使他能够扯掉蒙住了其同代人的眼睛的那层面纱。他的同代人相信，国家的专制权力一定会消退，不管这是即将实现的（如圣西门和自由主义者相信的那样）还是在革命性的将来会实现的（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这些人相信进步的
49 观念，20 世纪的战争和政府的暴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托克维尔关于权力的各种危险的观点则超越了时代，使他的观点更具当代性，并且意义重大。

托克维尔的确是最后一个旧式的绅士 - 知识分子型的人物。这类人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商业写手，他们拥有一定的财产，有

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们给朋友们写的信词调优美，空闲时间都用来写作有关哲学、历史和其他任何事的论文或散文，然后通过信件传给朋友们阅读，有时在大家的要求下，他会将其公开发表。在大学及政府的大型实验室问世之前的时代，他们中的有些人以上述方式从事科学研究——达尔文恐怕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位。这种角色只能存在于贵族社会，而在贵族中也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如此行事。不管怎么说，这是贵族阶级为其存在价值辩护的一个最好的理由。

托克维尔自己属于法国贵族阶层的边缘群体——小贵族阶级（*petite noblesse*）。他的父亲是一位政府官员，出色地担任过法国很多地方的地方长官。他父母在大革命期间差点被处死，后来因遇上热月政变而得到解救，这一政变是1793年发生的一次反革命的转折，它将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但托克维尔的其他亲戚则没有幸免于难。

托克维尔学过法律，以律师为业——也就是说，他是皇家法庭系统中一名拿薪水的职员。1830年的巴黎暴动把查理十世赶下了台，但王位仍保留了下来，由查理的表弟路易·菲利浦继承，后者是与查理对立的奥尔良家族中的人。奥尔良派千百年来一直计划着要夺取王权，后来终于通过与立宪党人联盟而达到了目的（这一联盟只持续了18年）。托克维尔被迫向这个新政权宣誓效忠。但是作为一个正统的王朝拥护者，托克维尔很反对这一伪劣的君主政权。他的这一观点使他与上司之间磨擦不断。

革命的再次卷土重来使托克维尔确信，追求平等和摧毁贵族社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法国正通过一种错误的途径来到

达这一目标。他正好有一个机会离开法国一段时间，被委任到美国去学习其刑法改革，这是当时在法国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他想去那儿的真实原因是自己想摆脱当时那种他无法忍受的境况，到美国去看看能为法国的未来学习到一些什么。他于1831年前往美国，在那儿旅行了9个月。旅行结束后，他写出了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很喜欢美国，尽管它表面上似乎不太对一个贵族的胃口。这是一块“群氓统治”（mob rule）的土地，那里，政治是由煽动性的夸夸其词和当权政客的操纵构成的，这些政客为他的追随者们提供庇护；那里到处充斥着无尽的各种交易；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高雅文化和优雅的举止；那里法律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在西部地区的街道上，人们动辄相互射杀。换句话说，那时的美国与现在的美国近似，只是更朴野、更粗糙，总之，更清教徒化。“我原以为英国人是地球上最严肃的一个民族，当
50 我见到美国人时，我的看法变了，”托克维尔说，“美国人在空闲时间里不会像欧洲大多数地区的同阶级者那样，去公众场所里跳舞，而是自己在家关起门来喝酒。这样，他们就拥有了两种快乐：他可以想自己的事，并且，即使醉倒也是在自己家里的炉边，不失尊严。”^①

托克维尔喜欢这些。他自己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工作勤奋，有虔诚的信仰，循规蹈矩，因此他也赞美美国人的这些品质。在表面之下，他发现美国人与他所喜爱的罗马人颇为近似——他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2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5), p.232. Copyright Alfred A. Knopf, Inc.

们相信法律，并运用法律来统治自己；他们积极参加公共事务；他们具有爱国心、有信仰，遵守自我约束的道德原则。虽然托克维尔有点将美国人浪漫化了，特别是他没有注意到他所描述的美国的民主是由中产阶级，而不是由穷人，来行使的。除了这些方面，他对美国的分析至今还令人信服。

美国的平等

托克维尔的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平等制必将向前推进。托克维尔将这一点看作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不是把它看作体现上帝意愿的一个标志。平等制（托克维尔在使用这个词时总是毫无例外地将其与“民主”并提）作为组织社会的另一种伟大的形式，是与贵族制相对立的。平等意味着个人可具有自由的流动性，而贵族制则意味着各人的等级地位是由其出身决定的。平等意味着政治公民权从少数人扩展到了多数人。它还意味着法定的身份差异，贵族等级、头衔及其相应的特权，还有家庭内的长子继承制（即长子继承所有的财产）统统结束了。总之，平等意味着顺从的结束，这种顺从是建立在不可更改的社会各阶层的差异之上的。托克维尔相信，与这种平等相伴随的，是人们在财富、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

为了达到一种平衡，托克维尔试图通过他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展示平等制进展的正负效果。他指出，随着继承财产的支配性地位和长子继承权的结束，平等扩展到了父子之间以及兄弟之间。其结果是原来的家庭权威减弱了。但家庭并没有像保守派所预言的那样分裂，家庭成员间人为的财产纽带被更强烈的个

人间的感情纽带所替代。由于家庭成员间不再相互控制，他们相互之间就更可以产生感情。未婚的女子也享受到了类似的自由。因为她们的父母不再为了家庭间的联姻而用她们来做交易，她们可以通过爱情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配偶。其结果，如托克维尔所敏锐地指出的，这种婚姻与贵族的利益式婚姻相较，配偶间更为相互忠诚，而贵族的婚姻是不诉诸配偶间的感情的。

依照同一理路，托克维尔论述了平等对人们的举止所造成的影响。51 美国人和那些将谈话作为一种等级展示的辞令家不同，他们坦率明了地说话，不加什么表示敬意的语词。他说，英国人则介于法国贵族制的明确界限与美国的平等之间，有名的英国式的冷淡就是其结果。他们仍然保持着某种贵族式的观念，认为等级高的人应该得到恰当的尊重，但平等观念的渗透又使他们很难分清对他人何种程度的尊重是适当的。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避免跟他人说话，除非后者被正式介绍过。

托克维尔发现，平等也使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傲慢的主人与顺从的奴仆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个人之间的简单的契约关系，其中一方通过议价占有另一方的有限的部分劳动。雇工并不出卖他自身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以前的对上司的忠诚没有了，而被一些新的观念所代替，这些观念是所有人共享的。在政治领域，最普遍的一种感情是民族主义。在个人品德领域，以往那种要通过决斗来保卫的军人式的“荣誉”被诸如勤奋工作、值得信赖、生活节俭这类生意上的美德所代替。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没有荣誉感，而是以往适应武装自卫时代的荣誉变成了商业及工业时代所需要的荣誉。

托克维尔认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平等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他引述了17世纪一个法国贵族妇女写的一封信，信中她以轻快的笔调描述了好天气，同时以同样的笔调夹杂描写了关于参加反抗新税的农民是如何受到拷打的消息。这位妇女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托克维尔解释道，她的信表明了她的亲戚和朋友是充满关切的。只不过她的同情只扩展到与她自己平等的人之中，她不会设想她自己处在农民的位置上。相反，在美国，托克维尔意外地发现，这里的人对各类人都充满仁慈，甚至对完全陌生的人也乐善好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折磨拷打作为一种惩罚方式，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人们对待罪犯的态度转向改造他们以及普遍的宽容。托克维尔指出，这种同情的态度并不是美国文化所固有的，而是平等主义的产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美国白人对黑人奴隶的困苦境地就没有表现出同情感，因为他们不把黑人看作与他们平等的人：因此，是平等制的局限，而不是文化观，设置了美国人同情的界限。托克维尔的论述原则在今天依然给人以启迪。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经常在发生街头事故时能互相帮助，而亚洲人或拉丁美洲人则对公共场所中陌生人的遭遇更为漠不关心。

在消极方面，托克维尔注意到了美国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重商主义。他感觉到，平等导致了人们对社会地位的无止境的追求。因为所有人从本质上说都是同样的，落在后面就意味着孱弱，因此每个人都在追求迅速致富。托克维尔敏锐地指出，虽然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是农民，但他们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并不只是为了维持生计而种地，而是为了获得利润而开发土地。确

实，很多土地没有得到耕种，它们的买卖只是出于对土地价格的投机。因此，即使是在 1830 年，美国农民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人，他们往往超越农民而更像是投机商人。

所有这些对其文化都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商业注重的是实用性，而不是抽象的真理和美学的风格。因此，托克维尔论证道，美国人在谈到特定的实用性事务之外的领域时，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和夸大其辞，他们的意识中没有培养出精致和卓越的气质。因此，美国的文化既不十分高雅，也不过于低俗；他们每人都通晓足够的处理生活的知识，但没有什么动力或机会使他们卓尔不群。由于在智性发展方面缺乏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成为一个平庸者的舒适生活之地。

托克维尔发现的另一消极面是，持续的商业交易给美国带来了普遍性的单调化。所有事件的新奇性都只在同一平面上，再往上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发现了美国普遍存在的这种一致性的特性，而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其他一些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才使这一观点得到了普及。托克维尔宣称，“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缺乏思想的独立和真正的讨论自由。”他注意到，美国人的个体主义只局限在经济竞争的领域，而在观念领域中则很缺乏。

“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要求一个社会和它的政府做些什么”，托克维尔说。

假如你觉得理性的判断比天才对人们更有利；假如你的目的不是创造英勇的美德，而是建立温良的习惯；假如你喜欢看

到弊端少造成一些罪孽，而且只要没有重大的犯罪，你宁愿少见到一些高尚行为；假如你以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生活为满足，而不以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里活动为得意；最后，假如在你看来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量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国内的每一个人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涂炭；那么，你就得使人们的身份平等和建立民主政府。^①

但是，托克维尔又说，事实上我们没有选择。不管我们是否想要，我们都会采取平等制；而如果说平等制的社会结果不是太坏也不是太好的话，它所开启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却是重大的。托克维尔所关心的正是这种可能性。他紧接着指出，平等并不等同于自由。它可能导致一种自治的完美形式，也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以及与这种状态相随的另一种危险：暴政。在托克维尔的观念中，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有恺撒推翻罗马共和国之前的罗马的那些沉浸在面包和马戏中的暴民，以及在法国的恐怖统治下围在断头台下的民众，他们为拿破仑的政变铺设了基础。1830年法国发生的事件又重复了这一模式^②。问题是，为什么平等有时导致一种 53 结果，有时却导致另一种结果呢？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以及英国）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好政府的榜样；法国则是一个平等所产生的坏效应的例子。不过，他并不认为美国就是最完美的。他反对竞选拉票、钻营官职、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2, p.262. [此节采用了董果良先生的译文，见《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1页。——译者]

② 指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事件。1830年7月，国王查理十世宣布解散新议会，巴黎市民起义，占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同年，路易-菲利浦即位。——译者

各种庇护勾当，以及公共媒体上的各种个人攻击。但这是平等主义的自治不可避免的一些后果。除去这些后果，美国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其优越之处：政府结构、地理和历史机遇及其人民的文化。

政府结构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政治机构的一个最大优越之处在于它是地方分权制的。诸如市镇、县等地方政府所享有的在决定地方事务方面（如道路、慈善事业、学校、税收等）的自治程度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之相反，法国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巴黎的一个中央官僚机构来决定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托克维尔夸赞联邦制，这种制度给予中央政府控制货币流通、战争和外交事务及全国贸易等的权力，而将所有其他事务都交各州管理。他很正确地得出以下原则：中央政府应当对那些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事务有充分的控制权，但不应当干涉那些只牵涉到国家的部分地区的事务。

托克维尔相信，正是这种体制使美国人具有公共精神。他认为，平等的一个自然后果就是导致人们更个体化，更自私，忙于在商海中竞争而不关心更大社区内的事务。但是分权体制抵消了这个结果，因为它将个人利益与公共精神联结在一起。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办成某件事的话，他们不可能依靠一个政府代理人来帮他们办，而必须自己来促成这件事。因为合作是必需的，他们就需要鼓动一些追随者支持他们，进入地方政府，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目标。一个人如果出于自己利用的考虑想要修一条路或一道沟渠，他就必须提出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

也有利于其他人。这样，一个分权制的政府就使它的公民积极参与、更为勤勉、更为富足；相反，一个中央化的独裁政府则是死气沉沉的。

托克维尔也赞同通过内部的权力制衡来分割既定权威的做法。他赞同美国的总统制与州长制，它将行政权力从立法机构的直接影响中分离出来。托克维尔想到了1790年代法国议会发生的急剧转向的情形，因此认为直接控制立法机构（即政府的议会机构）是一种不稳定的形式。它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即大多数人试图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人身上。

托克维尔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美国法院拥有裁决立法机关制定 54
的法案之合法性的权力以及有为受侵犯的公民提供补偿的权力，这样，民主就成为了一项法律制度而不仅仅是政治家们的规则。托克维尔认为，虽然美国的法院有相当的权力，但使其本身的权力分离并有所限制是很重要的。他说，在法国，这种法院可能成为暴政的一种工具，因为那里政府对法院及对政府的其他代理机构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美国，法院是独立的，法官一旦就职，在其任职期间可独立行事，但法官的这种权力本身又是以起诉方与辩护律师的分离为前提的。（别忘了托克维尔自己就是一个专业律师，受雇于法国官僚制的法院。正是因为在他所不赞成的这个机构中工作不得志，他才想到去美国看一看。）他也认为陪审团制度对法官的权力起到了一个很有益的平衡作用，同时也可以教育公民参与法律的秩序规则。

这种平衡的结果是，政府在行动中不可能是过于强大或草率的，这样不管是情绪化的大多数，还是可能出现的暴君都不能轻

易得逞。托克维尔谨慎地指出，美国并不是一个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享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的国度。从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观点看来，不受限制的自由只是独裁的许可证。相反，他宣称，“那里，人们所承担的社会义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美国有着各种机构使团体的力量可以控制个人，托克维尔以赞同的态度引证了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一些法令，它要求市民都要去教堂，禁止酗酒，对各种越轨性行为施以严厉的惩罚。通过权力的分化与各种平衡，共同体的巨大权力被分解，受到限制，从而不可能发展成政治上的专制，这使政府对作为整体的国家所构成的危险减弱，同时又能对各种私人利益做出积极的反应。对于“自由”在美国意味着什么，托克维尔的观察在今天仍切中肯綮，因为在个人的权利与公共权力对于个人道德的控制这两方面，至今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美国的政治体制中的“自由”是使地方团体摆脱统一化的中央控制的自由，但这一体系在保护个人摆脱这些地方团体的专制方面，却无甚助益。

托克维尔也注意到了那些他认为其本身具有危险性的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只是为了抵消这一系统中的其他危险。托克维尔认为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为传播诽谤和极端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会有利于形成推翻政府的各种阴谋。至少在法国，情况确实如此。但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权力极度分散，所以不大可能被大众煽动轻易动摇或推翻，他相信，这些自由为此系统中的其他一些缺陷提供了必要的矫正。如果被选出来的政客们试图只顾自己的利益或搞腐败活动，那么新闻界就可以威胁对其曝光从而对其进行制约，而各政治党派的竞争会导致当政者的失职被公开

化，以便其他人能取而代之。

最后，托克维尔提到美国政教分离的益处。同样，他也是拿 55
法国做对比，在法国，由国家支持的教会使宗教成为一些重要争
论的核心，宗教陷入了为某一特定的政权统治做辩护的位置，从
而给政治争论又添了一份乱。政权的反对者们成为无宗教者，他
们宣称宗教已被带向了政治的对立面。而在美国，没有一个国家
教会，因而反而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国家和教会的力量。

地理和历史机遇

这些政治结构是美国稳定的自治政府的主要特征，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例如，美国是在北美洲这一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的大陆上发展起来的，有充足的可以拓展的土地，又有宽广的海洋将其与打成一团的欧洲阻隔开来。其后果就是，美国并不担心战争，所以也不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战争是最能促进集权化的因素。在战争期间，中央政府对整个国家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对各地方政府，而且也对公民本身。政府的整个设置就是为了给战争提供物质：人们被征募入伍，赋税提高，经济被管制。而美国避开了这一切，只是因为受到它的地理环境的保护，而不是它的军队的保护。与此相应，托克维尔对欧洲实行美国式分权制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因为那里存在着来自邻国的战争的危险，所以必须需要中央政府时刻对此做各种戒备。

另一个有利于美国的稳定民主的附带因素是财富上的基本平等。因此，人们之间不存在具有压倒性的巨大的地位差别，也

就没有发生革命性冲突的牢固基础。(托克维尔注意到一个例外,那就是奴隶的存在,他们的不平等境况潜伏着美国社会最具爆发性的因素。)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政府建立之前,美国所存在的这种平等是至关重要的。相反,在法国,为了争取平等,必须发动对贵族的战争,而革命又加速了中央集权化的进程。由于地方机构掌握在贵族手里,为了夺取贵族的权力,革命就必须取消地方权威;而在这样做时,它就破坏了自由的分权化根基。

美国的文化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民主还得益于它的人民所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条件。他们几乎都说同一种语言,基本上都有同样的基督教新教信仰,都受过相同水平的基本文化教育。在这些方面同样没有什么截然的差别,也就少有发生政治冲突的基础。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清教信仰。教堂教给人们纪律、道德秩序和对法律的信任。而且美国的新教教堂是由宗教群体控制的,因此为民主自治提供了一个榜样。总之,托克维尔倾向于认为美国得益于其各种特质,从而使平等被塑进了一种民主政府的稳定形式,从而避免了平等的一些内在的危险。

但在抽象的层次上,托克维尔则更为悲观。他感觉到,平等主义的社会是对自由的一种威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知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贵族制的废除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人能足够强大到抵制中央政府及其首脑(不管他是国王还是独裁者)的暴政。此外,各种条件的平等化倾向于消除各种独立的权力资源,而后者本可以制止不受约束的

权力。公民中的平等使他们强调一致化；如前文所述，没有人愿意违背公众意愿的力量特立独行。公众的自然倾向是要求法律及规定毫无例外地施用于每一个人；公众认为监视任何一件事都应该是被许可的，这样，国家就具有了一种潜在的对个体实行全面控制的倾向。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就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权力，人人都倚仗于唯一一种高于个体的东西——国家——来运作各种事务。国家成了个人之外唯一的理想；人们被要求向国家奉献出他们最大的忠诚。因此，一个平等的大众社会的个人主义是与国家的绝对权力并行的。在商业及其他纯个人事务性的领域，私人化的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而政治方面的关注则降低为只渴望稳定——一个能维持秩序的政府，以使每个人能安心筹划他们各自的事务。大众社会中的个人愿意给予集权化的国家以巨大的权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抵制它的自由。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有着独一无二的优越的政治结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可以消解平等的这些不良后果。但法国和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做不到。在欧洲大陆，政府都是相当集权化的，它们通过国家的官僚机构，不仅控制军队、税收和公共建设，还控制了慈善和教育、财政和工人的储蓄、生产规划和相当部分的公共性职业。随着每一次的革命与重建，这种集权化不断向前推进，不可逆转，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同时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利条件。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隔着很窄的边界相互对峙，都保持着他们的中央政府以维持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欧洲人的文化也不利于和平的民主制：依然存在着财富上的巨大的不平等、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信仰冲突，而且普遍缺乏任何宗

教虔诚。托克维尔预测，除了黑人的不平等条件有可能导致革命之外，美国以后不再会发生革命。而对于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他担心那里会一轮又一轮地发生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

《美国的民主》1835年出版后（后半部分于1840年出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各种观光者对美国的描述中，托克维尔的
57 这本书最为著名。它的成功部分是由于它说出了人们想听的话。因此，这本书在其制度被称赞的美国和英国极为流行，而在颇受微词的法国则流行程度最低。

这本书阐述了一个有关政治机制的有力理论。而其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于美化了美国的民主制，把它描述得比实际上曾经有过的和现在所是的状况要更完美。托克维尔从其贵族的视角出发，误把美国的中产阶级当成穷人，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穷人已确实很富足了，而且，不管怎样，他们统治着国家。事实上，美国并不存在着他所看到的那么普遍的平等，1830年代的美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也还是有穷人的，但他们一般都不为人所见，因为他们都住在城镇和乡村的偏远地带。

不过，这一瑕疵并不损害托克维尔的洞见，只不过为他的观点增加了一种新的维度。确实，它直接向我们提出了现代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困境：民主正在运行并得到了有力的扩展，但它并没有使所有人受益。就像在托克维尔的时代，中产阶级商人可以参与地方政治，而穷人一般无法参与。美国所有的是对权力讨价还价的民主，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得到了相当的好处；在一个国家中，只要中产阶级占了大多数，那么其民主制度往往易于忽略贫穷阶层。托克维尔的分析中也暗含了这层意思，

他注意到了民主只在白人的大多数人中运行，而将黑人奴隶排除在外。作为一位古典哲学家，托克维尔无疑会乐于认识到他的错误，并使他的分析在这一视角下仍然立得住。他也许会认为（显然就像今天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的民主总比根本没有民主好，他会认为在政治上将穷人排除在外是此制度的一个不良副产品，但也是人们为了获得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不愿意为了将平等扩展到穷人而破坏现有民主制中的权力平衡。用他的话说，这会是为平等而付出自由的代价。

托克维尔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往往被他的崇拜者和思想继承者所忽略。他对造成集权势力并从而削弱了自由之基础的战争问题表现出严峻的态度。对于 21 世纪的美国来说，现代交通和通讯设施已使其结束了地理上的阻隔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已经制造出了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军事基石。此外，托克维尔明智地指出了这样一种趋势：那些在一个商业为本的社会里地位相对低下的军官们，为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和获得提升的机会，会去寻求战争。另一个托克维尔没有提到的集权化现象也正在出现，即贸易体系扩展到国家乃至国际的范围，这导致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规划调节，尤其是在对抗如大萧条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时候。这种经济危机在使政府权力集中化方面与战争有同样的效果，而大公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个人主义，后者是托克维尔在美国图卷上看到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20 世纪中期的美国，托克维尔所认为的很多对支持民主制至关重要的分权化基础已经消失了。

58 托克维尔自身的职业生涯就显示出他对于欧洲政治机制的论述是何等正确。1839年，他被选为法国立法机构的一名代表，代表沃洛涅地区，这是他的家族城堡所在之地。他后来一直当选为代表，直到1851年退出政坛。在议会上，他发动了一场要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的斗争，他自己开始关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1848年，他在议院发表了一个演讲，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我相信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上。”这天是1月27日，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共产党宣言》的时候。2月26日，巴黎爆发了暴动，而另一场革命也正在启动。托克维尔被选入国民代表大会，后者是为了成立第二共和国而召开的；他是君主制拥护派的领导者。1849年，他被任命为新总统路易·拿破仑的政府的外交部长。

托克维尔在此职位上只待了五个月。他与总统发生了冲突，后者一直在准备发动政变（1851年政变），以推翻第二共和国而建立注定短命的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法国的模式已然成型：第三、第四、第五共和国接踵而来；1871年巴黎出现了时日不长的共产主义公社；然后是二战期间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法西斯统治；共产主义的抵抗组织在地下进行的二战；1958年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政变；1968年是学生发动的一场准革命运动。托克维尔的远见已然得到证实。

拿破仑政变后，托克维尔退出政府，开始研究法国这些灾难的起源。其结果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托克维尔在几个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成就。他并不以其他历史学家的论述为基础，而是去各省的市镇大厅查阅各种

档案，因为这些原始资料显示了地方政府的运作。他比较了法国的政治体制发展与英国、德国及其他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用其他一些事例来验证他的观点。此书在学识、科学思维和优美风格诸方面都堪称典范。它的结论至今仍具权威性。

托克维尔发现，并不像很多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革命破坏了法国的分权体制。相反，是法国国王自己破坏了它。在中世纪，托克维尔所属的阶级，即贵族阶级，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独立于国王的权力。贵族们联合起来创立了议会和独立的法院，以对抗国王的控制。这一体制存在于欧洲各国，甚至包括俄国和西班牙。后来国王们进行反击，终于摧毁了贵族的权力，建立了一个皇家的官僚体系，把法院合并为一个下属的机构。贵族们成了皇家的官员，他们的代表机制也降为没有任何实在意义了。

这一过程在俄国和东欧进行得最为彻底，而在英国最不彻底。实际上，在英国，法院和律师基本上还是完全独立的，在17世纪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中，议会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法国，这一斗争持续的时间最长。在那里，国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但贵族仍然掌握着很多权力，最后的结果是在18世纪末才见分晓的，当时，随着新的商业时代的到来，平等趋向加强，巴黎产生了大量集中人口，后来证明这是法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专制的国王与寄生的贵族阶层间进行平衡的法国政权的无能最终导致了1789年的政府财政危机。在这暂时性的政府僵局中，闸门被打开了，民众发动了进攻。因为在平衡官僚机构和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平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而那些虽然保留了以往一些特权，但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权

力和作用的贵族终于找到了发泄怒气的出口。最终，大革命的主要后果是加强了中央政府，并使之更有效率了，而这些在贵族当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大革命只是巩固了国王们一直致力于创建的结构。

从世界视角看，这一论述强化了美国所具有的讽刺意义。美国对于现代大众社会的不稳定性有着最稳固的抵抗，因为它的体制——尤其是它的分权化的法院及地方政府——是从英国历史上的早期阶段借鉴过来的。那些创建了美国社会的17世纪的殖民者们是从英国保守的小贵族阶层中分出来的，他们带过来了分权的封建控制制度。这样，美国就没有受到英国国王所成功进行的集权化的影响。美国根本不是一个政治新时代的缩影，而是继承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形式之一。

因此，美国并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可以满怀希望进行仿效的榜样，如果按照托克维尔的预测，第三世界将要经历革命，为了现代化而摧毁地方权威，从而为绝对的政府控制奠定基础。从欧洲的情况看，托克维尔的预测已经被证明完全正确：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国家，都表现出专制与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相互交替的现象。

到1815年，现代时期的主要轮廓基本呈现了出来。小个子下士拿破仑开进军队压制了政客们的各种争论，在法国恢复秩序，并开始了他的征服欧洲的宏图伟业。他兆示了另一个充满着全球野心的小个子的出现，这次是在莱茵河的另一岸——阿道夫·希特勒。

托克维尔在担任路易·拿破仑的外交部长时，他的私人秘书

是一个名叫亚瑟·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贵族。托克维尔去世后的一段时期，戈比诺以他关于高等种族与低等种族之冲突的历史的科学理论而闻名。历史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旧与新之间的讽刺性连接。

第四章

尼采的疯狂

60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实在是最奇特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智识探索也是最为狂野不羁的，因为他是 20 世纪知识爆炸的先驱，他的各种识见的爆发不仅砸碎了当时 19 世纪的各种信仰的外壳，而且最后也摧毁了他自己。

尼采的著述中贯穿着一种巨大的创造的快乐。他那充溢的活力流淌在他的 20 本著作中，这些书是他在 44 岁崩溃之前写的；每一页甚至是每一行，都充满着强度，这种强度当时一定使它的作者攥紧了他的笔，就如它们现在使它的读者无法释卷一样。“我的野心就是要在 10 句话内说完其他人要用一本书才说完的东西，”尼采宣称，“以及其他人用一本书也没说出的东西。”

尼采对各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现代精神分析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从现代诗歌文学到人类学、社会学、宗教、音乐、艺术和文化，以及反叛传统本身。有些影响，如法西斯运动早期他的思想的普及程度，似乎是可怕的，但那些纳粹分子的开路先锋对尼采思想的解释实际上与尼采的真正意思完全相反。尼采的另一些思想，尤其是有关社会学和人类自由的思想，至今还未得到很好的阐述。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要判断一个人智识的严肃性程度，只要看他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态度。至今只有韦伯和他的少数同代人在这一挑战前是合格的。这一挑战至今还摆在我们面前。

尼采的生平

表面上看，尼采的童年是不稳定的和被骄纵的。他的父亲是德国东部路德教的一个牧师，弗里德里希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一群令人敬慕的清教徒女性中长大的：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未出嫁的姨妈。在这种德国维多利亚式的氛围中，尼采受到严格的激励要勤奋工作。而且他也熏染上了一种很深的对性的抑制态度，这后来发展成一种对女性的仇视和恐惧，也使他发展出了对宗教性感伤如何支持了某种压抑性的情感支配的某种认识。 61

他的家庭比较富裕，小尼采被送到了一所精英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培养了很多有名的德国学者，后来他又去了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家人希望他以后进入政府部门，但他却被哲学中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会被称为历史语言学的问题）所吸引，这

个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正待开拓的新领域。尼采的聪明和活力给他的教授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1869年尼采25岁时，这些教授为他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争取到了一个古典语文学的教授职位。为此，他放弃了博士学位的正式申请。

这就是年轻的尼采，正春风得意地通往他前途远大的学者生涯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精力已经溢出了常规的边界。他的各种公开言论充满了激烈的变动。1866年，他热烈地支持普鲁士，因为普鲁士人的军事行动最终将经历了几个世纪分裂的德国铸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到了1869年，他放弃了他的德国公民身份而成为一名瑞士人。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尼采又成为了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他志愿做了一名医护勤务兵为普鲁士军队服务。几个月之后，尼采回到瑞士。他对德国及其战争充满了深深的失望。而且，在前线护理伤病员的时候，他染上了痢疾和白喉，回到瑞士时身体状况很差。

每到紧张时期便会出现某种疾病，这成了伴随尼采一生的一种模式。12岁他正当青春期时，视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岁他第一次在服役期间执行任务时就从马上掉下来受伤了，因此结束了他对辉煌军旅生涯的幻想。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有个人的或是职业方面的压力阻碍他顺利前行时，他总会退入到另一种很痛苦的疾病中去。

但是，在人生道路坦荡顺利之时，尼采是充满热情的。1868年，他与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会面了，后者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作曲家，他关于音乐音调和管弦乐色彩的革命性思想在整个欧洲公众中掀起了一场风暴。尼采在瑞士住得离瓦格纳

一家很近，他尽可能地经常去拜访他们。他爱上了瓦格纳美丽的妻子柯西玛。他成了瓦格纳运动的一个热情参与者，同时也是其核心信徒圈子中的一员，这一圈子的成员从大师本人那里获得灵感，并推动将其开创性影响带入到周围的社会中。

那时，瓦格纳运动并不只是一场音乐实践——它比1960年代以“披头士”和“滚石”乐队为先锋的运动意义更大。瓦格纳的音乐是对统治着19世纪文明的形式主义颓废的冲击。在他的伟大的神话歌剧中，瓦格纳摒弃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精神，而用德国中世纪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对于专门研究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学的经典哲学家尼采来说，这一主题正好契合于他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开始浮现出的一种革命的可能性。那时哲学家们开始发现，以往所认为的古希腊人是理性的哲学家、数学家和艺术家的印象只是表面的，在他们那些完美雕刻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和他们的神庙的有克制的对称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更为情感化、更原始的希腊：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狂欢仪式、奇特的牺牲与狂怒，总之，令人沉醉的音乐和舞蹈使人们超出常态而进入到一个魔幻和力量的世界。尼采在他第一本书《音乐精神中悲剧的诞生》(1872)中区分出了两种文化：日神文化(Apollonian)和酒神文化(Dionysian)。在前一种文化中，他看到了在基督教和现代欧洲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克制和理性的精神；在后一种文化中，他察觉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中通过瓦格纳和他的音乐得以重现。

尼采的书不大被他那些更为保守的同事所接受，因为他们对这一领域采取的是更为狭窄的、技术性的观念，他们不愿意去理

解那种冲击着尼采的新的精神之流。开始时，尼采进行了反击，他出版了更多的攻击保守思想家的作品，并进一步发扬了他对瓦格纳和诸如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这样的他所崇拜的英雄的热情。但是，到1876年，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不得不离开所任职的大学。到1879年，他完全辞掉了工作，只领到很低的一份退休金。之后他就辗转于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各地，在阿尔卑斯山的各个最美丽的风景点中徜徉，住在普通旅馆里，只要健康允许，就做长途的徒步。

他的写作在加速。他受着失眠、偏头痛、呕吐和消化不良等多种疾病的困扰，有时他会持续写作10个小时，直到眼睛刺痛。他依赖于各种麻醉剂：水合氯醛、巴比妥、鸦片和其他种种。他陷入了自身思想发展的螺旋中，尽力向前推进他的思想，其程度远远超出了迄今为止任何人所敢于想到的地步。他狂热的写作因为解脱了公职也因为他的孤独而获得自由，却像魔鬼一样抓紧了他；他的身体为此付出了代价。

尼采的发病情况仍然保持着他那种个人化的模式。1870年代后期，他开始与瓦格纳及其圈子决裂，后者是那时他主要的同盟军和朋友。瓦格纳后来搬到巴伐利亚的拜罗伊特，在那里，一位崇拜他的贵族为他庞大的交响乐团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剧院。在那种氛围中，瓦格纳自己的狂妄也达到了顶峰，他成了上流社会的偶像。这最终的成功影响了他的观点：他从早期的革命性主题转到基督教的感伤性的调和，他成为一场喧嚣的德国沙文主义和反犹（anti-Semitism）运动的核心。而尼采这一方则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走向他认为是一种全新的心理科学——一种艰苦但欢

悦的智慧，它挣脱了一切表面常规的束缚。这次决裂使尼采经历了最严重的一些病痛。但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大约在1883年瓦格纳去世时），这位哲学家的真正的声音开始出现了。

在这段时间，尼采的性生活也陷入危机。虽然他和女人们在⁶³一起时总是过于礼貌并觉得压抑，但在这段时间内他求过几次婚——都遭到了拒绝。1882年，他经介绍认识了罗·莎乐美（Lou Salomé），她那年21岁，是一位俄国将军的女儿，年轻、美丽、有才学、充满理想主义。他们的思想撞出了火花，他们从智力上的密切交流发展到了那种19世纪典型的修辞意味的（rhetorical）、理想主义式的恋人关系。尽管尼采对婚姻持否定态度（莎乐美也持同样态度），他还是向莎乐美求过两次婚，但都被拒绝了。后来他们曾计划与另一个学问上的亲密朋友一起搬到巴黎去，建立一个三角家庭。但尼采的母亲和妹妹听说了这个计划，便以报复的态度突然来到他身边。39岁的尼采在年迈母亲的道德训令前仍然会颤抖不已。这个计划后来夭折了。

第二年，尼采的健康情况开始好转。这种良好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在1888年末的彻底崩溃。这段时间里，他的创造力又急速飙升，这次的新方向是诗歌。他写了《查拉斯图如是说》，接着又写了一系列大胆的著作，抨击基督教，呼吁重估一切价值。毫无疑问，瓦格纳的死有助于减轻尼采的紧张感，他对婚姻期望的消逝也减缓了他的紧张感（虽然这本会加重他的紧张感的）。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以前总爱插手他的事务，现在嫁给了一个叫弗斯特的反犹派政客，搬到巴拉圭去了，弗斯特正在那儿建造一个乌托邦式的殖民地。场地清除干净了，尼采终于能自由地集中于他

自己的思想了。这一思想洪流早已沸腾，现在终于冲破一切藩篱。

人类学的诞生和非理性的发现

尼采的思想源自一个大的智识运动的一部分——现代人类学。它可以被描述成一个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的过程，它同时也打破了相信欧洲的理性和道德标准在全世界是普遍有效的这一观念。当然，从15世纪后期的航海发现开始，欧洲人已经意识到了别的社会的存在。但是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美洲和南太平洋岛屿上的那些部落是原始的，直到发生了一种学术转换，这种转换使它们成为一门新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推动这一转换的智识动力来自学术领域，尤其是来自研究希腊罗马经典和古代史的专家们。

这一领域在1860年代取得了很多进展。例如在英国，亨利·萨姆纳·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研究了古代法，他发现，罗马的法律契约背后，还存在着更多的各种古代法律形式，它们是以每个案件中所涉各人的地位为基础的。最早是看个人在某个法团共同体（corporate community）中的成员资格；而个体之间进行的更为精细、理性的磋商协议在历史上是更晚时候的事。同一时期，在德国，J. J. 巴霍芬（J. J. Bachofen）认为他发现了一个事实：在欧洲父系亲属制度之前还存在过一个更古老的母系世系和继承的制度。这就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有那么一个时期，社会是围绕着女性组织起来的，有以女性为中心的宗教和法律，完全不同于后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各种制度。在同一时期的法国，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他是爱米

尔·涂尔干的老师)证实了古希腊罗马的奥林匹斯众神信仰实际上是一些政治仪式。例如,围绕对雅典娜的崇拜这一仪式,各个氏族联合起来构成了雅典城。这一古老信仰之前的更早阶段的崇拜形式是对家神的崇拜,各家有各家的家神,这种信仰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那时每个家庭都居住在圈起来的居住点中,通过各自的家庭信仰联合起来,不效忠于家庭之外的任何事物。稍后一些时候,英国的古典主义学者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依照类似的脉络描述了奥林匹斯山上众神间的爱情与嫉妒的美丽故事后面隐藏着另一种宗教信仰,即向地下众神献祭,以期望通过巫术手段来获得丰产。

尼采属于这一系列发现的第一批人物。他在1860年代接受古典哲学的训练,这个时期正是上述观念在学术界破土而出之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致力于探讨古希腊信仰中的两种类型,他认为其中包含了音乐和文化的两种风格。一种是阿波罗和他的七弦竖琴所体现的音乐祭仪(是尼采发现了音乐最初是宗教性的而非一种消遣)。这种风格,即日神(阿波罗)风格是平静的、和谐的和平衡的。它代表着理性、完美平衡中体现的美丽,它是希腊理想的源泉,这种风格传至今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文明是蕴含在科学、数学、哲学和古典艺术之中的。日神风格体现的是一种克制,是位于两种极端之间的最珍贵的中间段。

另一种是酒神风格,它是由一群热烈狂欢的舞蹈者带进希腊来的,他们周游各地,吸收新的成员,他们愿意放弃正常的生活,为庆祝他们的狄奥尼索斯神(酒神)而歌唱并陷入癫狂状态。此神的形象并不是一个优美的人的造型,而是一个半羊半人的形

象，他掌管收成、葡萄酒以及各种沉醉的情感。与日神信仰的克制相反，这是一种追求极端的派别，它追求对基本生命能量的情感性宣泄。尼采觉察到这种酒神运动是希腊悲剧的基础。酒神的圣歌吟唱者演变成了合唱队，那些传说故事则渐渐变成由演员来表现了。悲剧的主题总是不可一世的骄傲的英雄们为命运的惩罚所毁灭，作为一种献给生命与死亡的永远变幻性的牺牲。

因此，尼采认为，悲剧这一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艺术是在日神式平衡限制中的酒神精神的体现。那时他发现，对于完整的人类文化来说，酒神和日神风格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平衡并不总能稳固地保持。因为尼采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已然是日神文化的延展。而酒神文化这一面则被一步步地埋葬了；古希腊人在某种平衡的程度上保持着它，但基督徒则压制了它。这在 19 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个时期，基督教被剥去了它的神秘性，只留下了一些基本的信念：相信理性控制、冷静地相信进步。尼采在酒神文化方面发现了越来越多创造性的、被压在地底的生命的力量，他开始对压制这些力量的各种统治势力发起猛烈攻击。

对基督教的攻击

和现代欧洲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尼采是个无神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认同是在反对教会教条、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形成的，那些教条自中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早在 17 世纪，思想自由人士与专断独裁者的对立就通过伽

利略的新科学象征性地表现了出来，教会谴责他的新科学并在木桩上烧死了它的一些支持者。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反抗教条的运动中稳固地站在了一起，他们准备在基督教的废墟上建立起理性的殿堂。

但是尼采走得更远。他看到，被推翻的只是原来教会的那些明显的政治及学术压制，但其更深的精神仍存留在 19 世纪的世俗理性主义和维多利亚主义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尼采宣称，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续以往的价值观念，即宣扬在情感上要自我控制，在道德上要为集体奉献，那么从基督教的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又有什么益处呢？他们只是用尘世中的进步信仰替换了天堂中的酬赏。尼采激烈地攻击世俗化主义者（secularizers），他们不再将耶稣当作神的儿子，而是将他描绘成一个好人，一个在道德、人性和利他主义方面的伟大导师。上帝已经死了，但没有人敢去探索这意味着什么，去询问它开启了怎样的可能性：

你们是否听说有一个疯子，他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跑到市场上，一个劲儿地呼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那里恰巧聚集着一群不信上帝的人，于是他招来一阵哄笑。其中一个问，上帝失踪了吗？另一个问，上帝像小孩迷路了吗？或者他躲起来了？他害怕我们？乘船走了？流亡了？那拨人就如此这般又笑又嚷，乱作一团。疯子跃入他们之中，瞪着两眼，死死盯着他们看。

他嚷道：“上帝哪儿去了？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是我们

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我们是怎么杀的呢？我们怎能把海水喝干呢？谁给我们海绵，把整个世界擦掉呢？我们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再怎么办呢？地球运动到哪里去呢？我们运动到哪里去呢？离开所有的阳光吗？我们会一直坠落下去吗？向后、向前、向旁侧、全方位地坠落吗？还存在一个上界和下界吗？我们是否会像穿过无穷的虚幻那样迷路了呢？那个空虚的空间是否会向我们哈气呢？现在是不是变冷了？是不是一直是黑夜，更多的黑夜？在白天是否必须点燃灯笼？我们还没有听到埋葬上帝的掘墓人的吵闹吗？我们难道没有闻到上帝的腐臭吗？上帝也会腐臭啊！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咱们把他杀死的！”^①

66 如果上帝业已死去，尼采声称，我们就不可能再生活在那遗留下来的硬壳中，那个硬壳的神力已经被剥去了。人类还只刚开始进行最艰巨的工作：脱离这整个信仰和控制的体系而生活。“这伟大的业绩对我们来说是否过于伟大了？”尼采问道，“为了与它相称，难道我们自己不该成为神吗？”

尼采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利他主义的训诫，这种原则几乎未经任何改变而由基督教带入了现代文明中。基督教教义宣扬谦卑，仿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对穷人施以慈悲；认为只有通过信念、苦难和对他人的关怀，人才能得救。这一理想集中体现在下列形象中：为了驱除魔鬼带来的性欲望而身负镣铐的僧

① From Walter Kaufmann, ed., *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9), p. 95.【此部分引文采用的是黄明嘉先生的译文，见《快乐的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209页。——译者】

侣、为麻风病人洗脚的圣徒，以及在圣诞节给穷人送食物、每星期天都做捐献的信徒。而如果现在的理想是做一个正直的公民，过着令人尊敬的生活，投身到责任与工作的折磨中，那么，这与以前的生活有何区别呢？如果利他主义训导人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投身于国家或民族、投身于自由主义改革或大众社会主义，那么这与以前又有什么区别呢？

尼采的论证并不只是否定性的。他运用他的哲学才能，指出语言的历史可以作为道德观变化的一个线索。在现代语言中，“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就是道德、体面、利他与自私、侵害、利己之间的对立。但在早期的希腊，这两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善”意味着优秀的人，贵族，即那些精力充沛、充满个人力量和幽雅风度并因此而生活优裕的人，他们在各种战争中取胜，并使自己地位提升。“恶”并不意味着道德上的邪恶。而是指那些处于低等地位的人——那些失败者、那些只关注一些低级琐细之事的人，以及那些缺乏生命力并因而到死都只能处于下层的人。如果这些状况都是命运注定了的话，那么显然，人们也只能听之任之、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已。

由此尼采得出了两个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显然发生过价值观的颠覆，底层奴隶的道德观替代了顶层的贵族的价值观。在实践的层面上，尼采则要亲自发动一场征战，来为创造力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我们将逐一讨论他的这两个论点。

意志的动力学

现在我们开始来关注尼采自身的理论定位。他的理论以某

种哲学体系为基本，分叉至一种特别现代的社会心理学和历史社会学。其基础是一种意志理论。尼采确信，人类的本质就是意志（will）。（事实上，他认为意志是所有生命和所有存在的本质——就像现代物理学家宣称所有事物最终都归于能量一样。）人类的真正本质并不像柏拉图、康德和其他很多西方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意识（consciousness）、逻辑（logic）或精神范畴（mental categories）。⁶⁷ 这些东西只是意志的派生物——是意志限制和反对它自身的各种模式。这种意志的自我约束并不一定是不好的；毕竟，所有伟大的思想、艺术和人类壮举都是意志被模塑成这些意识形式的产物。但是，它们之所以具有那种巨大的力量，正是因为它们表现了意志自身的各种转化，表现了自私的、自由自在的自我，它冲破羁縻，与世上的各种阻碍——其他的意志——抗争并回弹，并因此建立起一种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它在那些有创造力的文明中体现出来。

因此，人类意志在社会中的最初斗争，本质上是外在性的。在这些相互对立的利己主义竞争中，产生了层级社会。那些具有最大能量的人、那些与时代潮流合拍的人，就跃升到社会的顶端。是他们创造出了有创造力的作品、杰出的思想和各种英雄主义的行为。在他们自身不受束缚的自我中，他们就是“善”、就是“贵族”。那些能量较弱的人则在斗争中失败而成为别人的奴隶。按照那时的界定，他们就是低等的、是“恶”的。在时间的流程中，有的人会从高处跌落到低处（希腊悲剧的主题），也有的人从低处上升到高处（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上升为神）。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个体的意志或是犯了过于骄傲（*hubris*）的

错误，或是被激发出了一种超人的能量水平。因此，道德是简单但变动的。只要人们能够操纵它，从任何意义上说，他们就可以排除障碍，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这种英雄式的道德只在城邦时期盛行过，那时各个民主的小城邦之间战争不断。就在那一历史时期，一个不幸的颠覆发生了。随着罗马的征服的扩展，几乎每个人都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奴隶。奴隶阶级再没有了重新上升的希望，但这一阶级的数量极其庞大，以致他们可以影响当时的思想及语言潮流。在罗马帝国管辖的社会里，奴隶的境况开始接近于整个中等群体的水平。奴隶阶级被践踏的意志以某种阴险的方式重新抬头。他们愤恨于自己的被统治，渴求报复。他们并不想成为统治者或者是想获得自由，他们只想把那些统治者拉下来，拉到与他们同样的水平上。他们在道德标准方面进行了一次革命。

于是，成功的统治者和他们不受束缚的意志被界定为坏的、恶的。而善则指的是奴隶的美德——谦卑、自我放弃、服从、责任、依赖高于自身的事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主人的角度看，这些正是好奴隶应该具有的品质。这种奴隶意志的反叛的阴险之处在于，他们把自己的位置看得极为低下，他们接受强加给他们的任何不正当的要求，并且把它们变成一种美德标准——通过进攻性的扭曲，以真实意志的面目出现，其表达方式是将这些标准应用于所有人，包括主人。

这里包含着奴隶们的复仇，这就是基督教的大革命。在一个不再可能出现占主导地位的、有创造力的个体的社会中，基督教发展了起来，随后逐步扩展，成为整个世界的理想。虽然后来奴

隶被解放了，其他阶级接受了基督教，但为争取个人表达的古老斗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整个社会已经接受了奴隶的道德观。利他主义是这种道德观的基调，它是连接奴隶们的纽带，并使个体附属于群体。

- 6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和平等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即使是用它自身的标准来衡量。基督教社会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出现，经过中世纪，到了现代欧洲探险和殖民时期，其社会分层程度看来也与它之前的异教徒社会不分轩轻。良心和利他主义，作为被压制的强力意志的误入歧途的产物，只要一有机会，也就成了统治的工具。这个新的社会现在由教士、道德家和那些体面的人来统治了，他们尽力表现出他们的谦卑和克己。甚至那些贫病者的命运也并没有因为有组织化的慈善团体而得到多少改善，因为基督教社会需要一直有这么些人来作为被救助的对象。受苦受难者是中世纪基督教社区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因为正是通过他们，其他人获得的拯救才能得以确证。他们会得到施舍，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通过改变他们的环境或是激发他们自己的能量来彻底转变他们的困境。

尼采控诉了他那个时代的各种自由主义的和激进主义的运动，认为它们只是在别人的痛苦中延续了基督徒的这种利益。而现在，它披上了一层道德问题的伪装，而那些政客们可以借此攫取权力。

尼采的历史动力学也对应于个人心理层面。尼采指出，所谓道德感（conscience），是卑劣意志（devious will）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原初意志的压制，而这种卑劣意志通过不断诉诸服从于它的

群体而努力获取一种权力的外表。在这一过程中，不只是充满创造力的情感能量，还有追求真理的意志本身都被压制了。记忆声称，我做过！而意志说，我没做过！最后，记忆败下阵来。这里又一次证明了意志是胜过意识的，它使后者按照它的方式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为现代精神分析学开辟了一条路径，正如他关于意志的历史为理解西方基督教文明开辟了一条路径一样。

重估一切价值

由此，尼采得出结论，生命只有作为意志的明确的、不受阻碍的表达时才是有意义的。而其他一切都偏离了生命——这种偏离，即使在它自身的意义上说，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只有意志才能完成这样一种偏离，即使在它否认自身时，它也表达出了它对权力的意志。于是，利他主义的、自我否定的道德观在双重意义上要受到声讨：首先，它与创造性的生命相对立；其次，它颠覆了它自身的标准——因为它只是利用利他主义和道德心作为口号，想通过它来支配自我和他人。

尼采认识到，要做另一种选择会是很艰难的。它意味着要去接受一个充满冲突甚至暴力和残酷的世界。但是，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尤其是对那些对未来抱有某种乐观主义态度的人来说，只有它才能使我们摆脱那种无休无止的平庸和摧毁个体的大众组织的阴暗前景。这是通往个人健康和文化创造力的唯一通道。尼采标示出历史上一些伟大的时期——文艺复兴、古希腊，这些时期充斥着大量争斗、不加束缚的野心和讲究权术的（Machiavellian）个体。但正是通过这种倾轧争斗，及其相伴的极

端情感，生命才能达到它的最高峰。

尼采写了一系列的书，在这些书里打磨出了他的立场。这些书的标题一个比一个更鲜明地表明出他的观点：《快乐的科学》、《朝霞》、《超越善与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者》。在创造力爆发时期，他的疾病远离了他，他写出了他的诗体杰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此书是尼采本人预言的一个写照，借古波斯的一个贤人查拉斯图拉（琐罗斯亚德^①）的形象表现出来；此书也是尼采自己要创立一种新宗教的规划——如果“宗教”一词确实是指某种很个人主义的东西的话。其中，尼采构想出在上帝死后的未来，这个未来存在着一种更高等的生物——超人（superman）。这个词要从德文翻译过来很难；它的德文词是 *Übermensch*，字面意思是“人之上”（over-human），是高出人类之上的一种类型，它现在还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古希腊酒神式个体的复兴。同时它也是一种只有通过创造才能出现的形象——是从社会和心理压抑中解脱出来的个人，是各种斗争中的产物，这些斗争磨练出的创造力和能量的水平超出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任何事物。

超人怎样才能被创造出来呢？把我们自己从复仇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查拉斯图拉说，要从人到超人，我们就必须经过这座桥。尼采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从奴隶道德和心理压抑的遗产中获得历史性解放的目标，他还在表达一种意义深刻的哲学。他说，复仇情绪是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抗议，它不断纠缠于过去所发生的

① 琐罗斯亚德，古代波斯琐罗斯亚德教创始人。据说20岁时弃家隐修，后对波斯的多神教进行改革，创立了琐罗斯亚德教。——译者

事情，固执地希望修补已经过去的和不可能再修复事物。试图改变过去是一种极端的病状，但是在古希腊之后，它是一种渗透于西方社会的主题。

尼采自己提出了一种奇怪的学说来替代这种复仇情绪——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每一事物都注定要一次次地不断发生，他宣称。与酒神精神一样，永恒轮回也包含在早期希腊人的丰产祭仪的精神中，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庆祝作物与动物、生与死，以及胜利与失败的无穷无尽的循环。在这个充满外部冲突的世界中，个体只有通过用意志的力量控制整个循环才能实现自己的强力意志。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意志控制而使世界为己所有，不用压制任何东西，不用为任何事物复仇，而是持续地向未来推进，而这个未来注定是与过去相似的。这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学说，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尼采所说的古代的强力道德观、奴隶的反叛、上帝的死亡，以至超人到来的前景，似乎都与我们的历史常识相矛盾。在尼采的所有思想中，这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种。但是，从另一层面说，它仍包含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我们可以用 21 世纪初期的语言这样表述：永恒轮回是否是一种构架——在此构架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所描述的、注定要重复其自身的历史？或者说，这种历史，尤其是出现超人的最后阶段，是一种构架，而永恒轮回最终将在此架构中出现？

尼采的疯狂

1888 年是尼采状态最好的一年。他几乎全年都很健康。他 ⁷⁰ 写了五本书，是一生中创作最丰的一年，包括 2000 多条他的思想

陈述，结集为《偶像的黄昏》、《反基督者》，两本攻击他以前的偶像瓦格纳并将自己树立为瓦格纳的对立面的书，以及一本对他自己的作品之价值作尖锐讽刺性评论的书《看哪，这人》。最后这本书各章的标题分别是：“我为什么这么智慧”、“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我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为什么我就是命运”。

尼采逐渐成名。他第一次在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中间吸引了追随者。丹麦的文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克斯（Georg Brandes）开始讲授他的思想。尼采开始与著名的法国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海伯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和伟大的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进行交流。有了这些新的关系，尼采对他的老朋友们有了更多的要求，他希望他们能公开支持他，而不只是私下里这么做，而当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他便与他们断交。他以前写的信件，总是谦和有礼，并且在发表个人评论前会先致以歉意，而这时，他开始用一种妄自尊大的语调来写信了。

某种新的政治论调也开始进入他的写作中，尤其是一种强烈的反德意志精神的东西。他在知识圈里的追随者大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俄国、意大利、法国、瑞士和美国，而在德国，他仍然是或者不被人提及，或者只是受到苛刻的评论。尼采预言，欧洲各国将结成一个反对落后的、独裁的德国的联盟。到今年冬天，他完全沉浸于这个问题中。他不仅预言反德之变，还于1888年12月和1889年1月开始推动此事。他预言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时期，几次世界大战会将一种新的反道德主义的宗教引入20世纪。他自己则着手召集一个欧洲各方势力代表的集会，以废除

罗马教皇的权力并认真地开始战斗。

尼采开始在公众场合出现并迷人地微笑着，这与我们在他一些早期照片中所见到的严肃、沉郁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1889年1月，他住在意大利的都灵。一天他看见一个车夫在街上抽打一匹马，便跑去制止，在抱住马脖子时他崩溃了。之后一些天内的情况不大清楚。一个朋友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我在射杀所有反犹分子。狄奥尼索斯^①。”

从那时起一直到他1900年去世，尼采一直在他人的护理下生活。他没再写过任何东西，不管是书还是信件。他也再没谈论过他的思想。他交替处在两种状态下。在一种状态中，他安静、有礼貌，能进行令人愉快的谈话，就像几年以前人们在瑞士旅馆的会客厅里碰巧遇见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男人；在另一种状态中，他就变成了狄奥尼索斯，他幸福地微笑着、狂野地大笑着，唱着歌，陷入情感的狂喜状态。

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从巴拉圭回来，接替母亲照料他。她的丈夫弗斯特在其反犹殖民地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于1889年5月自杀了。伊丽莎白开始了一项更宏大的事业，将哥哥带回德国，并在魏玛这一以前著名的德国文化中心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神殿性质的建筑。她安排了尼采所完成作品的出版，包括那些最晚71期和最激烈的作品，她编辑了他的语录，将它们归到《权力意志》这个标题之下。在她的影响下，尼采的作品在德国开始流行，但其结果却是讽刺性的。这位德国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反对者和反犹主义的公开批评家却成了民族主义者的英雄。他对基督教的

① 狄奥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名。——译者

抨击成了反犹主义宣传的序曲；他关于权力和冲突之本质的洞见被歪曲成了政治工具，这完全偏离了尼采自己的哲学，却粉饰了德国的军国主义。尼采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只是由他妹妹看护着，交替地生活在他的安静状态和狄奥尼索斯式的爆发之间。

人们尝试过从各个方面来解释尼采的古怪举止和尤其是在他生命后期困扰着他的身体疾病。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他在学生时代或是在 1870 年法普战争时期感染上了梅毒，而他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于梅毒的破坏力在 20 年后的发作。但这种说法与很多重要的事实相抵触。在 1889 至 1900 年他去世的这段时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并不存在与梅毒相关的身体与精神上不断恶化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他在性方面的极端清教徒性格，他似乎也不可能在学生时代染上梅毒。举个例子，有一个记录，说尼采在青年时期有一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带到一家妓院，当看见妓女时，他惊呆了，后来他跑到房间里的一架钢琴前敲出一个和音，然后才回过神来，逃离开去。

显然，尼采的疯狂和折磨了他一生的那些生理病症一样，在根源上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梅毒的说法不过是对他的侮辱，那些人试图将尼采的思想作为一个有病头脑的产物而将其打发掉。而精神方面的疾病则更复杂，它反映出了尼采内心中真实的世界和自我的压力，他必须与之进行搏斗。当然，没有任何人像尼采那样在如此程度上将自己作为实验室和荒野地来穷尽探索。因为对紧张具有非同寻常的敏感，当他在探究他自己的伤痛，揭示造成他的恐惧和压抑、他的自我惩罚和强烈野心的力量时，他也会激怒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西方文明背后导致疾病的

各种压抑力量——宗教道德，以及隐藏其下的不断发展的无权者的怨恨，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强力意志的狡诈体现。

最终导致尼采 1889 年崩溃的紧张似乎与他毕生从事的智识工作阶段的结束有关。他已经揭示了社会的压迫势力，并且认识到必须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一种对西方文明的情感突破。但是他自己也需要一种突破，虽然他认为自身正在进行这种突破，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弱点仍然存在——长久积累起来的对他人看法的恐惧，这显然来自他自幼所受到的严格的日耳曼式的、宗教式的培养。尼采最终成名了，而这对他是一个新的威胁。不管怎么说，他的著作不仅是对体面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攻击，而且它们显然是迄今为止对基督教和所有宗教的最为猛烈和深入的攻击。几个世纪以前，人们会因远更温和的言论而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即使是在尼采的时代，教会的政治权力在中欧也才刚刚开始瓦解。

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精神与情感深处，还存在着一种个人性的危险，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上述的政治危险。他正在成名，而他的母亲终将会知道这些年他写了些什么、在思考些什么——这位路德教牧师的虔诚的寡妇，对她的独子仍然具有巨大的道德权威，她甚至可以在她儿子 39 岁的时候中断他的风流情事。也许正是这种盘旋在他的政治与智识兴奋之上的恐惧，将尼采推向了崩溃。

尼采现在所陷入的漩涡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他完全相宜。他的哲学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受折磨的、自我反思的意志的一种现象；为他人写作的责任和义务是这个挣扎着的道德压制之世界

的一部分。尼采摆脱了所有这一切，摆脱了多年的偏头痛、疼痛的双眼以及各种恼人的疾病。他转向内在幸福的最直接的源泉。在他自己的超个人主义的世界里，他是个成功者；他已成为狄奥尼索斯。

评 价

要对尼采的工作做一个结算式的概括现在还不可能。他的思想的各个支流已经在 20 世纪——尼采预言为属于自己的世纪——得到了广泛深远的传播，并且仍在继续传播。在社会学方面，尼采对马克斯·韦伯有直接的影响，使后者转而关注基督教工作伦理的情感规训如何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动力，以及关注使得奴隶道德施加于所有人之上的官僚机制的铁笼。弗洛伊德，尼采的同事和追随者，继承并进一步研究了尼采的精神分析学。事实上，在 20 世纪初期，尼采的思想已非常有名，以至于弗洛伊德要宣称他不想读尼采，因为他感觉到尼采的思想会侵蚀他自己的研究；但是弗洛伊德自己也意识到了尼采的气息已经渗透进来了，正是在这一影响下，无意识的驱动力现在也得以被研究。其他的深蕴心理学家（depth psychilagists）^①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明确地发展了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主题。在哲学方面，由于尼采拒绝一切不是从人们操劳的生活中的直接感受生发出来的、专门化的学院派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他因此推动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发生。在这种哲学中，意义并不是从外部被赋予的，而必须是不断从内部创造出来的。

① 深蕴心理学，研究无意识的心理学，如精神分析学。——译者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对尼采的政治利用，首先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和伊丽莎白·弗斯特-尼采所鼓励的反犹分子的利用，之后是纳粹的利用。法西斯主义溃败后，尼采在西方声名狼藉；尤其是英美知识分子发动了对他的大规模批判，认为他是希特勒暴行的根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德国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了攻击，认为它们在这点或那点上导致了纳粹主义。这样，思想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之一，即使是知识分子的那些最善意的观念。

最近以来，尼采的真正主题重新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像弗里兹·皮尔斯（Fritz Perls）这样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们突破他们的病人的理智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束缚，在他们身上强制制造出一种完全自我确认和公开诚实的状态，这种做法与尼采的思想互通声气。精神病学家 R. D. 莱恩（R. D. Laing）提出，我们被压制的创造力当中，是否有一种至关重要的要素，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它只能在疯狂状态下才能得以释放？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莱恩脑子里肯定想到了尼采这个例子。1960年代的迷幻革命（psychedelic revolution）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尼采的主题——它表现为一场要挣脱 20 世纪中期盛行于美国的民族军国主义和官僚制的职业控制的斗争，而追求一种此时此刻高潮体验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社会批判和社会论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慎重地面对尼采提出的问题。在一些精英职业中，利他主义的光环正在开始被撕毁，其方式与尼采所分析的正相契合。我们开始认识到，在医生们冠冕堂皇的公众服务的表面之下，掩盖着他们的权力利

益（和经济利益）。我们认识到，医学投资在使病人源源不断，为的是拿他们做科学实验，并向他们兜售药品，其导致的结果是这一制度并不关心永久性治愈，也不关心实现预防疾病。我们也逐渐透过教育体制所宣称的开明、服务型的华丽言辞看到教师们、管理者们和雇主们（也包括学生）的私利。也许，离我们最近的事情恐怕就是我们正在从性别歧视主义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这种统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各种浪漫的和家庭的习俗所延续着，它规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进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采本人对传统型妇女是持激烈反对的态度的，但是他打破了那种感伤的理想化和道德观表层，开始揭示隐藏于其下的统治机制。

在所有这些前沿阵地，尼采的思想仍给我们指引出一些通往解放的重要道路。尼采的一生本身就表明了这种突围如果半途而废会具有怎样的危险性。要揭示各种无意识驱动力，要攻击占统治地位的伪善，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胆怯，否则将后果严重。因为会有这样的危险，即我们可能成为我们努力要从中解放出来的压迫势力的俘虏，就像尼采在疯狂状态时成为了他以前一直咒骂的反犹太分子的俘虏一样。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是尼采第一个踏上了这条探索之路的，他探究社会和自我之中最肮脏、最隐蔽的部分。如果说，他最后成了他所揭示的东西的牺牲品，至少他首先有这个勇气去探索，而他所揭示的东西已成为路标，引导后来者继续前行。他的探索、他所遭遇的艰辛以及他最终的悲剧，使他跻身于社会发现者中最英勇者之列。

第五章

空想社会改良家、进化论者和种族主义者

至此，我们所述的历史主要是在讨论法国和德国的思想。我们 74
们现在来讨论第三个现代最伟大的智识文化——英语世界的有关思想。它没有像马克思或托克维尔这样卓越的个人思想家，除了一个例外——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但他根本不是一位真正的社会思想家。但是，英语世界确实为我们生产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关于社会是围绕市场组织起来的观念；人类随着生物进化而持续发展的观念。它也创造出了典型的英美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不管是其右翼版（自由放任政策）还是左翼版（福利国家）。它发展出了将科学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现代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方面有过教训，我们现在开始关注科学结论中所隐藏着着的潜在危险。正是由于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统计学的风行，导致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其发生

过程仍值得探究，因为生发种族主义的思想模式并没有随着那一学说而消失。

要从头说起，我们就必须先折回到 18 世纪。中世纪的基督教在全欧洲对思想实行垄断，在各个地方，拉丁文成为受过教育的思想者所使用的语言。只有到了 18 世纪，思想才开始冲破了宗教模式，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才开始真正表现出来（虽然，宗教改革通过打碎天主教会、建立各个国家教会而为此铺平了道路）。在法国，正如我们提到的，我们称之为的启蒙运动是在科学的名义下对宗教最激烈的反叛。巴黎沙龙里的哲人们用巧言妙语掩饰的革命原则来款待其听众。在英国，与宗教的决裂来得远为缓慢，其基调是一种温和的改革论，它从来就不是革命性的。与独立的、世俗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不同，英国的思想家们首先是作为苏格兰的大学教授身份出现的，他们在那里教授一门被称为道德哲学的神学分支课程。起初，这门课程讲述的是好基督徒在
75 各种特定场合应该如何行事以避免罪恶等实践性建议，但后来它逐渐世俗化，开始思索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它逐渐从道德决疑论（moral casuistry）转到了经济学。

弗格森和斯密的道德哲学

这一转向的推动者主要是两位爱丁堡教授：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32-1790）。弗格森以一种中世纪的观点作为起点，即认为社会的构成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国王是头颅，士兵是两臂，教会是心脏，工匠是胃，皇家官员是眼睛和耳朵，当然，农民是脚。（从这

个观念中，莎士比亚这个典型的中世纪思想家曾引申出许多精妙的比喻。)弗格森更为严肃地运用了这个模式。假如社会的确是由各个专门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想在它们中间需要有劳动的分工，并且要有一个交换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一个部分的服务可以通过另一个部分的服务得以偿付。假设有这种自然的交换，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社会劳动分工自身就可以进行其交换，而不需政府的干预。社会这个机体并不需要它的脑袋的持续管理。

亚当·斯密 1776 年在他的《国富论》中对此进行了推论。斯密阐述道，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供求原则，它以对整体有益的方式调节着交换。没有人会长期持续生产人们不需要的东西，因为那样他就得不到回报；而生产人们有很大需求因而显得缺乏的物品所获得的丰厚回报又会吸引其他的生产者，从而缓解了此物品的供应不足。没有必要去干预这个过程，干预的结果也肯定是不理想的，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人们劳动的结果，而人们在追求他们各自利益的过程中，都为整体的利益做出了贡献。这样，斯密直接创立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和新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社会改革：边沁、马尔萨斯和穆勒

自由主义哲学具有两方面的内容，它们有时合而为一，有时分裂成对立的立场。这两个方面分别是围绕着理性人的观念和市场的自然法则观念组织起来的。

一方面，把人视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即计算自

己的得失，并做出相应行动的理性的个人。我们已经见到，这种开明的自我利益对整个系统是有益处的，社会各部分被认为是围绕此原则而组织起来的。这种思想的领袖是律师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他创立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学派，它起初是一项法律改革的计划。英国的法律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充满了不平等以及各种奇怪的封建式的惩罚，如偷面包就要被绞死。边沁指出，以复仇和其他情绪作为法律的基础是很愚蠢的，他提议进行一系列法律改革，使法律建立在诱导人们趋善避恶的奖罚原则之基础上。在功利主义哲学看来，最好的行动就是用“快乐微积分”（hedonistic calculus）计算出来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就能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提供了一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将个人的自由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

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围绕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的思想组织起来的，这二者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的自然规律。在产生这一模式的道德哲学传统中，自然规律是被视为上帝（或自然）驱动事物的方式；是关于事物如何运作以及应该如何运作的规律。因此，依照供求原则的竞争的结果就是导致产出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正好与所需求的一致，并能按合理的价格进行分配。任何对贸易的限制，不管是商业垄断、政府限制还是工会影响，都是非自然的，因而是要反对的。

这些规律产生的结果有时候似乎是不幸的。例如，1798年，一个叫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乡村牧师出版了《人口论》一书，书中声称，贫穷是自然规则的一个结果。他论证

道，随着生产的增长，人口也在增长；但是人口是按几何比率增长的（例如 2 : 4 : 8 : 16 : 32 或者是按某种类似的加速曲线），但食物的生产是按照算术比率增长的（1 : 2 : 3 : 4 : 5 或者是其他的常数增量），虽然人们在努力开辟新的耕地，但这种可开垦的土地也会接近耗尽的极限。因此，人口将始终要超出食物供给，而那些不走运的人就得挨饿。马尔萨斯说，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作为整体的系统有益。马尔萨斯和斯密运用了劳动价值理论，因此他们也同样面临着马克思努力要解决的矛盾：如果市场保证了劳动价值的等量交换，那么利润从何而来？我们还记得，马克思的答案是劳动剥削；而马尔萨斯提出贫困人口的增长作为储备因素，因为它保证了存在着比可提供的工作更多数目的贫穷人口，这可使工资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样，这个系统的自然规律整体上仍是有益的，在任何情况下对它进行干预都将徒劳无功。试图救助那些乞丐，只会使他们生育更多，而这会使人口问题更加严重。马尔萨斯牧师甚至将这一规则视作上帝的道德报应的证据：贫穷是因为人类丧失对性的约束而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惩罚。

自由主义的这两翼越来越分化，但他们仍保留着许多共同点。他们都相信代议制政府，相信理性的个人控制自身的能力；他们相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公民权利，认为它们保证了真理将从观念的自由市场中产生；他们主张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主张政府应最小限度地干预个人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自由去侵犯他人的自由。（在何种程度上算是侵犯，围绕这个问题一直有很激烈的争论。）这里暗含着一种观念，即相信私人财产是一种个人的权利。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同意的对他

人进行干预的唯一一种方式就是教育（虽然这并不一定是指国家扶持的教育或者义务教育），教育会启发人们去了解他们怎样才能使其理性行为和道德行为对其自身和对社会最有益。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反对革命，而只相信渐进的改变和提高。

当然，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自由主义立场并不是唯一的立场，还有支持贵族权利和其他既定利益的保守派，以及工人中的更为激进的运动。但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自由主义开始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与此同时，它的两翼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厉害。不仅是马尔萨斯学说所说的严酷情况，而且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罪恶都开始日益显现出来。童工、工厂恶劣的环境、成群的贫民和乞讨者、肮脏的救济院和债务人监狱、周期性的失业危机——正是这些状况使马克思走向了激进主义——这种状况促使自由主义的一支开始付诸实践。它的功利主义一翼，因为相信理性行动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计划着要为更正这些病症而做些事情。他们加入了各种委员会，调查工厂的状况，推动各项立法，其中包括关于童工、免费学校（作为将儿童从市场中撤下来的一种方法）、工人保险、监狱改革、公共卫生和其他无数很有价值的事业。

为改革提供知识理论基础的是功利主义的领袖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穆勒 1848 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市场的“规律”所表明的只是在我们让市场不受任何控制而运行时事物运行的状况；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让它这样运行。穆勒有效地摧毁了道德哲学中所保留的假设，即认为“自然规律”表明的是事物是怎样以及它应该怎样。穆勒说，市场只是众多系统中的一种。它并不是上帝的唯一

法则，如果它不能带来幸福，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它或者试用另一种系统。

这就创立了一种首写字母为小写的“l”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使它成为一种改良的现代哲学，这种改良业已导向福利国家。原来的那种放任自由主义（其字母是大写的“L”，即 Liberalism）则被迫采取守势。在英国，自由主义者中的更为激进的一翼则走得更远，他们不仅支持立法改革，甚至支持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和后来的工党。社会主义中的温和改良主义就是由那些在费边社（Fabian Society）^①的自由主义者所鼓吹出来的，其成员包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自由主义不仅产生了政治方面的后果，它还开启了社会学中经验研究的传统。在工厂调查委员会之后，一些慈善人士进入到贫民窟和救济院里做调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其中包括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社会进化论：达尔文和斯宾塞

穆勒为改革派提供了知识上的重磅炸药。但是，正当这场战 78
斗将要取得胜利时，正在衰退的保守派获得了意外的支援。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

达尔文一举奠定了自然世界的秩序，就像两个世纪前牛顿在物理学中所做的一样。所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现在都可以看作由共同的祖先经由自然选择的伟大法则进化而来的。每代之间持续

① 费边社，1884年成立于英国，主张用缓慢渐进的改革方法实现社会主义。——译者

的微小变异导致了缓慢的变化，在既定的环境中，那些最适合生存和繁殖的物种延续了下来，而那些不很能适应的物种则被淘汰了。生物于是不断进化，直到它们适应了其稳定栖息地，其结果是形成了成体系的种类分支。

这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智识事件，其结果将使大写 L 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重新获得主导地位。达尔文的通过竞争推动进化和适者生存的模式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即认为应该听任社会进程自我发展。实际上，达尔文的体系与放任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还不仅限于这种亲和关系，因为达尔文是受到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动力学论述的启发后才构想出他的自然选择这个伟大的生物界的组织原理的。达尔文不仅为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支持，也同样为他们树立了敌人。教会的保守派自然认为进化论是与圣经中关于创世纪的记载相对立的，1871 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发展了一个进化论的推论，即认为人和动物，尤其是和类人猿，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使教会保守派的抗议呼声更加高涨。自由主义和进化论携手，又一次将那些最进步的思想家集中到它的事业中来。

最杰出的社会进化论者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与穆勒和达尔文一样，他也是个行为古怪、不爱交际的英国人，不过他不像达尔文，他很贫穷，必须工作以维持生计。他学的是科学，开始做了铁路工程师。他经常有一些机械发明，包括一种不太成功的飞行器。真正让他赚了钱的唯一一项发明是一种早期的纸夹子。30 岁时，斯宾塞意识到，可以通过在观念世界中搞些发明创造来挣更多的钱，不过他继续在他的家乡附近建

立了一些奇怪的节省劳力的装置。

斯宾塞后来以替流行杂志撰写科学和政治方面的文章为业，这些杂志大概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兴起，主要是为了迎合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读者。斯宾塞开始向这些读者兜售他的进化论和放任自由主义的混合物。^① 斯宾塞指出，进化论表明，我们受制于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我们的行为，不管如何目标明确，如果它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不能达到目的。斯宾塞认为，社会分层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这种对社会分层的进化论观点为放任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提供了支持。那些富裕的人是因为他们具有天赋而跻身于社会顶层，而那些贫穷者则是因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而沦落下层。因此，我们不应该进行社会改革，因为这些现象看上去都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例如，斯宾塞说，我们需要先测定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异，才能决定是否要给妇女以选举权。既然所有的生物都能从生理上适应他们的环境，就没有必要去教化那些殖民地的土著人或者是让罪犯和有精神缺陷的人生育出必定是有缺陷的孩子来，而且这种做法是残酷的。斯宾塞甚至怀疑普及教育的价值：他指出，智力上的教育并不能改变人的情感与行为。

于是，斯宾塞宣称，我们在作任何变革之前必须先了解社会科学。那么这种科学在哪里呢？斯宾塞自己着手来创建它。实际上，他所创建出来的并不只是社会学，而是一整套百科全书。

① 准确地说，斯宾塞并不是一个达尔文的追随者，但我们应该记住，进化论在当时是很风行的。1830—1833 年，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发表了他的地理进化理论，击败了教会的天谴说，并使这一观念广为流行。达尔文自己是在 1830 年代后期形成自己的观点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重要的科学家中私下传播。

1860-1896年间，斯宾塞发表了大批系列著述，总题为《综合哲学体系》。第一卷为《首要原理》；第二、三卷为《生物学原理》；第四、五卷为《心理学原理》；第六至八卷为《社会学原理》；最后以第九、十卷《伦理学原理》结束。他原计划还要写《天文学原理》和《地质学原理》，但在他去世前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两卷从逻辑上说本应该是列在前面的，但斯宾塞担心自己死前会完成不了全书的主要内容部分，所以就把这两项推后了。我们不要忘记，那是没有收音机和电视的时代，中产阶级的主要闲暇活动就是阅读。斯宾塞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是依靠这些读者来维持生活的，他预售他的作品，也在杂志上连载。《社会学原理》于1872年问世，刊登在英国的《当代评论》和美国的《大众科学月刊》上。

《社会学原理》各卷中充满了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的奇闻趣事——童婚、野蛮人的成年礼、原始部落的亲属制度结构，以及形形色色的这类叙述，不厌其详。这种东西正适合一个靠字数拿稿酬的作者，也适合晚上有很长时间消磨的读者。斯宾塞雇了三个教授为他的社会学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料，他将这些资料分别归于三个标题之下：“未开化的社会”、“（已经消亡的和正处于衰退中的）文明社会”和“（近代的和正处于兴盛时期的）文明社会”。由此我们得以获得尤其像南太平洋的探险者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和非洲的探险者利文斯通^①的有关信息。斯宾塞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理论。

从根本上说，斯宾塞的模式与孔德的类似，他读过后者的东

^① 利文斯通（Livingstone, 1813-1873），苏格兰传教士，深入非洲腹地从事传教和地理考察活动达30年，著有《南非考察和传教旅行》等书。——译者

西并很欣赏他。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斯宾塞对这一理论做了一些更新，他指出，变迁并不只是由于知识的进步，还由于进化选择的原理。他还强调，社会与有机体是有不同的，它是由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缺乏一个集中于某处的意识。他也反对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道德单元的保守观念，当然也反对后者要在一个“人道教的最高教主”之下重新组织世界的政治规划。相反，斯宾塞试图要说明的是，社会结构是如何发展到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操纵的最高阶段的，在这一阶段，每个人被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但同时又最好地服务于整体。⁸⁰

斯宾塞的体系用一个简单的基本原则解释了所有的进化——宇宙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由此使他的体系具有了一种智力上的优雅。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物质是由简单的微粒组成的均质群（homogeneous mass）开始的，后来随着各种微粒聚合起来成为一个复杂整体的各个异质的部分，物质就逐步组织化了。简而言之，事物是从简单的、无组织的状态发展到复杂的、组织化的状态的。斯宾塞是从胚胎学中汲取这一观念的：胚胎开始是由许多没有差别的细胞构成的，后来它们逐渐变成各个专门的但又相互作用的器官。斯宾塞从更抽象的角度阐述了这一原理，并将它用于太阳系、地球、生物种类，直至社会的进化上。进化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从低级的、早期的适应到高级、晚期的适应，这个长期的趋势也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趋势。

于是，斯宾塞按照进化的阶段将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排列成了一个级序。当小部落逐渐壮大，或者被其他部落征服，或与其他部落合并，社会就逐渐建立起来。规模的扩大带来

了结构上的差异化。在相对无结构的部落，首先有一种（a）应对外部环境的调节系统（regulative system），类似于有机体内的神经系统——这就是国家，它向别的社会进攻并抵御别的社会进攻；然后是（b）经济生产的维持系统（sustaining system），它为调节系统提供生存支持；最后是（c）交换和分配系统，它包括通讯和运输网络、商业及金融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部分又依次进行再划分。国家变得越来越复杂；国王必须与王家官僚体制分享权力，国王逐渐发现他已经完全要依靠他的大臣们了。随着市场机制自身就能协调各种生产，经济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斯宾塞将宗教看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古老阶段。他指出，对上帝的畏惧是基于对死者灵魂的畏惧，社会的发展会摆脱这种对于个人的控制，就像超越国家一样。这样，个人智力方面的能力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提高。人类变得更不情绪化而更理性化；观念越来越明确；传统知识（lore）被科学知识所取代；风俗被法律所取代。

斯宾塞将他所观察到的周围世界分成两种主要的社会类型。一种是军事社会，这些社会中的调节系统高于维持系统。合作是强迫性的，由国家强制实行；这种社会是专制的、好战的，并且宗教盛行。德国和法国就是这样的社会。另一种类型是工业社会，是和平的、共和体制的；合作是自愿的，是通过市场手段达成的。在这种社会中，国家是为其成员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斯宾塞举出的这类社会的一个典型是英国。不过，依照他的原则，他也指出，英国的帝国征服表明了一种从工业社会向军事社会的危险转向。

美国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思想的这两翼——社会改良和进化论——在英国兴起不久就传到了美国。斯宾塞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美国之行，那些富有的实业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以感激他在这个真正的强盗大亨时代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美国本土的放任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格拉汉·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 1840-1910）。他的基本观点可以从他与学生的对话中窥见一斑：

“教授，您认为任何政府都无益于工业发展吗？”

“是的，这些猪猡只会拱食，然后死掉。”

“是的，但是难道那些猪猡没有权利去拱食吗？”

“不存在什么权利。没有谁该着吃白食。”

“这么说，教授，您只相信一种体系，也就是契约—竞争体系？”

“这是唯一合理的经济体系。其他所有的都是谬误。”

“那么，假设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来抢走了您的职位。你不会觉得难过吗？”

“我欢迎所有其他教授来竞争。如果他得到了我的职位，责任在我。我的行当就是把这个科目教得最好，让任何人都没法夺走我的职位。”^①

① William Lyon Phelps, “When Yale Was Given to Sumnerology”, *Literary Digest International Book Review*, III (1925), 661.

萨姆纳的体系较诸斯宾塞的有所发展，他不像斯宾塞那样关注社会进化的总体形式，而是更多地关注特定的“民俗”（folkways）或惯例如何为适应特定的历史情境而不断进化。萨姆纳明智地看出，道德规范，即他称之为“民德”（mores）的东西，只不过是带有相当大的情感控制力的风俗（customs）而已。考虑到萨姆纳曾是个受过正式任命的牧师，他所采取的立场实在是激进的了，他一一细述各式各样的道德信仰和实践：奴隶制、酷刑、杀婴、食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公开裸体、圣妓制（sacred prostitution），目的是为了说明所有的标准都是与当时的各种风俗相关的。他宣称，“德范可以使任何事情都成为正当”，并指出，不存在任何永恒的真理（当然，除了自然选择原理本身）。萨姆纳从教堂的讲坛上退下来，为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上的布道中去，他将自然选择提升为基本的道德法则。事实上，萨姆纳为此也碰到了些麻烦。他曾与耶鲁大学校长有过一场著名的关于学术自由的论辩，后者是一位宗教信仰极其严格的人，他反对萨姆纳在他的学生中宣扬进化论。但进化论是潮流所向，因此萨姆纳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82 不过，如果说进化论在美国势头强劲的话，那么改良主义则风头更健。改良主义者只从进化论中取其所需而忽略其余。改良的精神在美国早有根源。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美国兴起过一阵创建乌托邦社区的风潮，如马萨诸塞州著名的布鲁克农场，它是受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一些超验论者的激励而兴办起来的。这些乌托邦社区有些是依照巴黎的预言家夏尔·傅立叶和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

当英国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们在 1856 年聚集起来成立英国社会科学协会的时候，美国人也准备效仿。1865 年，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亲自指导下，美国社会科学推进协会成立。

美国的这个协会是各类改革家的大杂烩，在社会科学的名目下谋求获得某种地位这一共同点将他们聚集到一起。这个协会成员构成的多样性还体现在它随后又分裂成各自不同的小团体：1870 年成立的美国监狱学会，1874 年成立的全国慈善和教化联合会，1884 年成立的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精神病患者保护协会和美国历史协会，1885 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协会。1905 年，从美国经济协会中又分化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学会。

这些人的智识兴趣主要在于能为他们的改革计划提供佐证和支持的任何思想。但到 1880 年代，一些学术性的派别开始形成，这就激发了一种对学术一致性的关注。接下来就是美国大学的大改革，这次改革是以 187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为开端的。美国的各大学开始增加研究生部，扩大招生人数，提供选修课程，从而增加了大量新的课程。各大学开始打破原来的古典课程制度，为各种新专业提供一席之地，这些专业五花八门，从现代文学到编制工艺无所不包。“社会问题”也开始进入大学课程。随后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都逐渐立足于学术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是 1892 年在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创立的。很多芝加哥的社会学家都与赫尔堂^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个社会工作的开创性机构，主要是帮助芝加哥贫民窟中

^① 赫尔堂 (Hull House)，1889 年由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创立，是一个贫民福利与教育中心。——译者。

的移民。赫尔堂的创始人简·亚当斯开始进行了描述社会学的研究，她制作了芝加哥南部的社会模式（social patterns）地图，这些地图激发了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发展起来的都市社会学研究。

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中没有出现什么特别伟大的人物，其中的佼佼者主要有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阿尔比恩·W. 斯莫尔（Albion W. Small）、富兰克林·H. 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爱德华·A. 罗斯（Edward A. Ross）和威廉·格拉汉·萨姆纳。不过他们都是严格遵守道德信条的人士。他们中很多人是牧师的孩子，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当教师之前自己就当过牧师。（不过这在注重宗教的美国大学并不稀罕。）其中只有沃德不是大学教授，他是美国地理调查委员会的一位古植物学家。他们最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他们主要的理论问题（萨姆纳除外，他宣扬放任自由主义）是：鉴于斯宾塞为放任自由主义提供了进化论的框架，那应该怎样为干预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他们的论证是这样展开的：首先，他们接受通过进化而渐进的基本观点。问题在于他们要证明人参与这个进化过程中是正当的。答案是：进化过程在它的高级阶段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过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来发生作用的。莱斯特·沃德将此称为“有计划的社会进步原则”。这样，国家就不是一种过时的阻碍进化的力量，而事实上是作为社会的代理人有意识地为自身发展做出规划。而社会学通过发现决定人类行为的规律而为这种发展发挥作用，从而使社会能为人类的改善进行理智的干预。

这些规律是什么呢？一些社会学家建议要通过调查来发现规律，但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可以通过理论分析找出这些规律。

对于着眼于个体层次而不是希望一举改变整个社会的美国人来说，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的观念并没有什么作用。关于社会是否类似于一个有机体这一问题有众多争论，最后得出的普遍性结论是：既然社会只由个人构成，社会学就必须提供关于个人如何行动的解释。于是社会学理论家开始致力于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被分别称为精神力量、社会力量、利益、本能或动机。他们的理论构成了这些要素的一个长清单，包括对食物、快乐、性、爱、社会归属的需求，以及各种其他的需求。而所有的社会机制，如家庭或国家，都被看作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的结果。

事实上，这些根本不是解释性理论。到 1920 年代，一位研究者数出了在社会学文献中所列出过的各种“本能”有 15789 种，他得出结论，这套解释模型是无效的。只赋予某种东西另外一个名称并没有解释它，只用“社会归属本能”来解释社会群体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它解释不了为什么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在特定的时候、以特定的形式产生。这些理论化的尝试只是使社会学背上了空洞无物的恶名。

不过社会学家们并不太为此烦恼，因为他们并不真想在一开始就建立一种真正的理论。他们并不真正对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感兴趣，他们只是想找到一个基本原理，以为他们改造个人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依据。他们在开始前就已经知道了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希望立刻着手加以解决。

都有哪些社会问题呢？我们别忘了，这些社会学家大多数是来自小城镇和农村的道德意识很强的盎格鲁 - 撒克逊清教徒。在

他们看来，工业城市的发展及其移民人口的增加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的城市居民不是那种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定期去教堂的中产阶级市民，相反，城市肮脏、拥挤，充斥着罪恶、酗酒、精神病、违法乱纪、离婚、不良行为、失业、贫困、激进主义和政治腐败。而社会学就是要描述这些城市状况并提出处理它们的方法。这种取向与 20 世纪初出现的进步运动很是契合（也碰巧与禁酒运动颇为契合，后一乡村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是对城市所做的最后一次攻击）。

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在于社会工作和教育，另一方面是立法。社会工作者们和教师们能够将移民工人训练成为体面的、整洁的和勤奋工作的美国市民，从而使他们提升自己，摆脱贫困以及与贫困相随的各种疾病。立法则可以根除造成这些现象的环境：要改革市政府的权力结构，把权力从腐败的移民官员手中收回来，交给品行端正的中产阶级手中；通过打破垄断、查处商业中的欺诈行为，鼓励健康的经济竞争；改革刑事处罚制度，不应该只是惩罚罪犯，还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有些像爱德华·A. 罗斯这样的激进的社会学家甚至支持工人成立行业协会的权利。为此，罗斯与斯坦福大学的女捐助人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夫人进行过一场著名的关于学术自由的斗争，后者是一位铁路投资方面的强盗大亨式巨头的遗孀。

早期社会学家的理论论述和调查研究都没有对学科知识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推进。他们预先就确定是城市的“恶劣环境”导致了这些不良后果；他们收集的事实只是为了表明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刺激人们对其采取措施，他们没有想到要去检验他们

的解释理论和他们采取的疗救措施的效果。

像英国的斯宾塞一样，萨姆纳也强烈地抨击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样做毫无益处。如果你不了解那些导致这些特定惯习行为的历史力量，那你的措施就不可能达到你所希望的结果。但萨姆纳自己也不是无可指摘的。他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过于笼统，他给出了大量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的例子，但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够解释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何种类型形式的理论。

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萨姆纳是对的。那些改革者们没有真正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因此他们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并出现了各种始料未及的后果。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教育和社会工作恢复个人的健康生活方式，以及通过立法使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参加竞争。实际上，他们的政治是幼稚的，他们的恢复方式是感情用事化的。他们过于关注个人层次，除了那些指引他们的高贵思想，他们理解不了政治的运作机制、权力之间的讨价还价以及政府机构的真正职能。他们从来没能消除政治腐败（只有某些城市成为例外，因为那些城市的人口变动很大，从而使中产阶级得以掌权）、遏止垄断和教化罪犯。从最终的结果看，现代的疗治型监狱并不比原来的刑罚型监狱好多少。它所起的主要作用只是不断地将新入狱者囊括进犯罪文化之中，有犯罪记录的人只能从事最低贱的工作而被排除在所有其他职业之外，监狱所起的作用似乎只能是这样。而社会工作也只是记录福利款项的发放而已。作为改良主义的希望基石的学校体系，已经扩展到能够吸纳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但这也产生了一些适得其反的后果：大众教育体系本希望给所有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但

85 只是提高了对就业的教育程度要求，因此高中毕业生现在能找到的工作大部分也就是原来没念高中的人从事的低级工作。随着庞大的官僚机制越来越多地侵入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那些原来存在于竞争性阶层系统的底部的反抗和疏离转移到了学校系统内。学校不但没能解决外部世界的社会问题，反而延续和产生了很多自身的问题。萨姆纳如果看到了这些，肯定会大摇其头，并吼出句“你们改变不了习俗”这类话来。

从回顾性的角度看，社会问题视角在其问题不复为问题之处是最有启示性意义的。举个例子，离婚已经不再属于被关注的问题范围之内了——这并不是因为不存在离婚现象了（这一现象甚至比以往还要多），而是因为我们不再将离婚视作一个问题了。由于摈弃了原来那种对婚姻的道德观念，我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对于当事人来说，离婚比不幸的婚姻要好。同样，我们也开始认识到，精神病并不单纯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而更多的是人们给其他一些人贴的标签，他们认为这些人没有达到社会规则及行为适当标准的要求；所以，“解决”的方法除了要改变个人，使其适应社会的要求外，还要改变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从长远的角度看，萨姆纳的“民德可以使任何事情都成为正当”的深刻的相对主义视角较之改良主义者的绝对的道德观视角要成熟得多。

在没有真正理解社会运行过程之前就急于要清除那些侵犯了某些人的价值观的社会条件，只会导致知识和实践方面的双重失败。在提出这一警告后，本章到此本可以收尾了，但是我们还要得出些更有警示性的结论。

科学的局限

19世纪后期最伟大的思想就是进化论思想：它认识到了人类与动物世界的连续性。这一认识为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在欧洲。如果人类只是动物的一种，顺此推论，那么人类也就能够被测量、被训练和被选择。意大利的恺撒·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提出了罪犯类型理论，随后兴起了一个科学犯罪学的学派。犯罪学家测量了罪犯的头盖骨容量和“正常人”的头盖骨容量，试图要说明遗传退化是犯罪的根源。他们宣称，解决的办法是进行强制性的节育。在英国，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与另一位绅士—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是表兄弟，这足以表明他高贵的血统）推动创立了现代统计学，以此来证明天才是出于家庭遗传的，相反，他也想证明乞丐、精神病以及其他残疾也是出于家庭遗传。在欧洲大陆，大量的统计学研究为的是要说明社会中那些更高等的人物应该上升到社会的顶端，而那些低等的人则应该沦落到社会的低层——高等与低等之分是由脑袋的大小、健康、身高、体重、精力和智力等方面的差异来体现的。戈比诺那时已经完成了他的科学性历史的写作，他将历史看作强大种族征服衰落种族的史；德国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社会进化的军事理论，他们论证说战争对社会进步大有好处。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这种类型的生物学主义在欧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模式（至少是最为流行的模式）。在美国，它反映在像萨姆纳和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这些人的著述中。它对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

之后，在这个时期，那些进步论者后来不再看好改革，而是开始认为，唯一能拯救美国体制的办法就是拒绝欧洲来的移民。1922年，这一观念付诸实施。罗斯这位最激进的社会学家是这一转向的典型代表。他从原来的支持工会转而开始著书论述“黄祸”（yellow peril），即从东方来的廉价劳工的危险，以及从南欧和东欧蜂拥而来的堕落贫民的危险。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种族主义汇聚成了一种日渐高涨的反犹主义，不只是在德国，而且还在法国、俄国和其他地方。而在一向与大陆时尚保持着某种距离的英国，则更关注低等的个人而非低等的种族。他们关注诸如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优生学协会所倡导的那些东西，一心想着怎样培养出最高贵的人类血统。

所有这些做法的荒谬之处何在呢？这部分是一个科学解释的问题。的确，某些个人天生在智力和其他能力上高于他人，某些社会也确实征服过其他社会，但是社会不能只在个人特性的层次上进行解释。社会机制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而与卷入其中的个人无关，而且，一个社会的军事力量主要取决于它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和它的组织形式。更为详尽的研究表明，种族之间并不存在着智力和其他能力方面的明显差别；虽然在个体层次上，这种差别无疑是存在的。但是高尔顿和他的同事对于个体遗传的研究并不能解释关于遗传后果的社会偏见。贫穷的人父母也贫穷，富有的人父母也富有，这至少部分应归因于在抚养、教育和职业机会等方面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劣势，更不用说财富方面的继承了。而且，健康状况、身高、体重等方面自然也与不同社会阶级的饮食有一定关系。

但是这些都只是科学方面的错误，如果科学的目标是对人类各种行为做出正确解释的话，那么随着以后对这些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就能更正这些错误。但是，如果构造理论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根本不是一个客观的范畴而只是出于某种价值观的判定，这就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如果穷人作为社会的负担是必须要消灭的事物，那么遗传退化理论就可以为这种做法提供正当的依据。而如果人们换一种价值观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从对所有人的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来看——那么即使遗传退化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去消灭某些人。我们不应该从穷人是否适应社会竞争的角度来评判他们，而应该努力使社会为他们提供更适合的条件。同样道理，赞成或反对种族低劣论的争论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当某些人想要建立起一种上层人占有所有特权的社會形式，而不是关注普遍人权时，它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此，对社会问题的科学处理往往成了掩盖道德缺陷的方式。客观的、科学的立场是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人，将他们看作有待分析的事物，从而观察其运行情况。要取得理论理解的进展，这种态度是必需的，而且事实上正是通过对人类的幼稚的理性主义模式的超越，我们才逐步认识到了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部分，现代社会思想才得以推进。但是科学的客观性并不能使我们摆脱道德选择。龙勃罗梭和亚瑟·戈比诺等人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纳粹统治的强烈憎恶使他们的思想名声扫地，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从科学角度对他们的理论的拒

绝。但是，潜藏着的这种观念并没有消失。高尔顿的优生学在现在的智商测验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活，这种测验决定着人们是否能通过教育官僚体制。现在存在着一种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将人只看作达到某些未来目标的工具；因为它了解了人类的某些弱点和脆弱性，它倾向于将人的生命视作没有人类价值的。中央情报局的技术策划者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中的同行，以他们的杀伤率、公关活动和战略性人口迁移等方式，成为龙勃罗梭和亚瑟·戈比诺的精神上的继承者。我们就要带着这一认识进入 20 世纪这个痛苦而复杂的时代了。

社会生物学的复兴

尽管 19 世纪的思想家们在这方面名声不佳，但生物社会学（biological sociology）在最近一些年内又卷土重来。它的主要实践者是生物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生物学家在社会学中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主管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是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这一新领域的开创者，他将其定义为“对所有社会行为之生物基础的系统性研究”。

对于先天本性与后天培育（nature/nurture）的问题，社会学传统上是更看重这个连续体序列中的后天培育（或者说学习）这一端的，不过威尔逊颠覆了这种倾向。在他写的“基因的道德”一章中，他强调要通过人口统计学的事实和遗传结构来理解社会行为的进化。威尔逊是一个基因决定论者。按照他的社会生物学假设，先天本性比后天培育对于人类社会有更重要的决定作用。

一位物理学家曾说过一句逻辑上的双关语：物理学家是由原子构成的。物理学家研究原子。因此物理学家是研究原子的原子方式。按照威尔逊的观点，有机体就是制造更多基因的基因方式，智人的有机社会结构更多地是受生物的影响而非社会化的影响。

依照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自然选择通过遗传设计好的，是由信号 - 反应这种成对关系构成的。⁸⁸ 交流是一条双行道，它并不只是发出信号或只是做出反应。他指出，人类与其他千万种动物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发音系统。他用发音系统作为一个测量标准来说明动物交流的局限。威尔逊并不像他的同时代人约翰·利里（John Lilly）那样认为可以有种际间的交流（interspecies communication），因为他认为人类的语言是一种最发达的系统。即使是蜜蜂的复杂的摆动舞也不能使其对信息的控制提升到一个新的交流水平，就像科学与其跨学科的衍生物一样。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这种新科学试图通过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有两种元信息传递（metacommunication）的模式，即威尔逊称之为“关于其他交流行动的意义交流”，一种是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另一种是娱乐邀请（play invitation）。他用统治与服从这一模式来作为一种启发式的机制，例如，恒河猴中担任首领的公猴一般步态敏捷、尾巴竖起、神态安定，而处于服从地位的公猴则表现出相反的一套身体信号，这就是地位信号的一个例子。作为娱乐邀请的例子，威尔逊分析了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存在的“我们一起快乐吧”的态度。威尔逊将群居昆虫

作为样本，观察到它们的高度组织化的交流系统不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交流，而只能是在群体之间交流。在我们人类中，大型社会单位交流的社会学例子就是各国家和各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流。

威尔逊是个人类沙文主义者（human chauvinist），他认为在社会进化阶序中，人类高于非人类的哺乳动物、高级群居昆虫和集群的无脊椎动物而处于第四阶段，即进化的顶点。集群的无脊椎动物包括像珊瑚虫和水母这样的游动孢子，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动物个体在功能上完全是附属性的，在生理上不能独立于群体。他将这种社会或者说生物群体称为有机体。一些更高等的群居昆虫，如蚂蚁、白蚁、某些种类的黄蜂和蜜蜂能辨别出群体中的等级，甚于辨别自己的巢中伴侣，这些群居昆虫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它们分出了专门采集食物的类种，它们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方式回到自己的群居巢地。在黄蜂社会中，蜂王与工蜂之间为生产后代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促发了冲突，蜂王们通过攻击那些试图产卵的女儿们而实行社会控制。

威尔逊注意到，像鱼、爬虫动物和两栖动物等冷血脊椎动物在双亲照料、保卫领土以及交配行为方式等社会组织方面与哺乳动物和鸟类类似。不过，在高等哺乳动物序列中的一个主要进化趋势是其雌性提供乳汁的能力。哺乳动物社会中普遍的核心单位是母亲 - 后代之间的联结以及后代对母亲的依赖期延长这一生物 - 社会事实。哺乳动物的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体系，作为其普遍性单位的雄雌关系有的是单配偶模式，有的则是多配偶模式。在人类之外的哺乳动物社会中（如有袋动物、食肉动物、

啮齿动物、灵长类动物、有蹄类动物), 最复杂的社会体系总是存在于那些成员最多的群体中。在人类以外的哺乳动物中, 人类所给予食肉动物中最高地位的是我们通常称之为“万兽之王”的狮子。一群狮子被称为狮群, 其核心是由几只成年母狮组成的, 它们相互间至少有着表亲姊妹的密切血缘关系, 保持着维持了几代的固定的活动领域。⁸⁹

威尔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他声称人类社会组织的高等复杂性是处在第四级顶端, 这在理论上与 H. 斯宾塞和 W. G. 萨姆纳有亲缘关系。因为人类成员在行为及成就方面的不平衡性, 人类社会与人类之外的动物相比, 其群体规模、基因交换比率、等级参数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差异性。威尔逊将人类社会结构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从牙买加古老的奴隶社会的野蛮习俗到现代社会的文明化的法律规范、社会习俗和各种惯例——的原因解释为缺乏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他认为, 正是由于这种“生态学的解放”(ecological release), 人类在过去的一万年中才能如此成功地控制环境, 从而使每种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再生产能力的文化都能在一定时间内得以持续。尽管威尔逊强调了人类的利他主义, 他却没能说明科学进化的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 即我们研制出的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加大了大规模破坏和种族大屠杀的危险。

很多人从其政治应用的角度认为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是反动的。其他很多社会生物学家在两性角色方面所做的保守论断也遭到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威尔逊和他的同事拉姆斯丹(Lumsden)都以生物学为基点来论述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

这样他们就与老式的种族主义走到一起了。有趣的是，威尔逊的进化论受到了另一种类型的生物学 / 社会学研究路径的挑战。海豚研究者约翰·C. 利里认为，我们的社会和科学一直以来都存在一种人类沙文主义的倾向，倾向于认为其他的动物种类在智力上低于我们，在群体关系上处于原始状态。利里把我们对于其他物种的这种人类沙文主义的观点称为“种际间剥夺”（interspecies deprivation），作为其结果，我们就得承受作为孤独的高等复杂种类的痛苦。利里研究符号互动模式，这使他直接归属于米德的阵营。海豚具有发达的大脑和意识这一生物 - 社会事实使人类可以去发掘这一在地球上生活了 2500 万年的生命形式的社会和文化。海豚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声音，这与人类主要通过视觉感知不同。海豚具有一套精密的声呐探测系统，能够通过一系列利里称之为“海豚语”的滴答声、口哨声和嗡嗡声来与其他海豚进行交流。

新近开始的、在双方都乐意的基础上进行的人豚交流的研究结果表明，海豚能对一些声音暗示和声调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显示出它们开始在理解一个由计算机生成的词汇库。虽然它们现在还没达到能与人类充分交流的程度，但是正在进行的这种符号互动形式的建立可以扩充人类集体意识的维度，使我们具有一种更广义上的“我们”感，并能创造出一个与地球上其他有智力的物种进行交流的环境。

90 不管其结果如何，相对于社会生物学的还原式遗传方法，这种研究显示另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的确具有生物学的维度，但我们将会发现，是生态因素而不是遗传因素是其关键所在。

达尔文的意义

19世纪后期最伟大的思想出自达尔文。如果说其思想造成的某些后果是令人恐惧的，这些后果也同样极具启发意义。达尔文从动物进化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观点为社会学树立了一个起点，而从这一起点出发，社会学可能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它给予了我们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从与我们直接相关的事物中分离开来，从这一起点去了解我们应该去解释的事物：一种聪明的、没什么毛发的猴子的行为，他能直立行走，能以各种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交流与合作。我们在下面要谈到的思想家们就是采用了这种思考方式，他们是伟大突破的创立者。库利（Cooley）和米德（Mead）将要探讨这种动物居留的社会世界的符号性质及其作用于人类意识的方式。弗洛伊德要探索人这种动物的各种本能和它们与各种社会压力互动和冲突的方式。韦伯要解开在这个人类的符号世界中为占据支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的各种复杂性。涂尔干要通过维持社会结构的仪式来把握隐藏着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当美国的社会思想家们在沾沾自喜地提炼他们测量社会问题的技术装备时，当欧洲人为一场血腥军事屠杀储备好了意识形态弹药时，一场智识革命从其核心震动了社会思想领域。

第六章

德雷福斯的帝国：爱弥尔·涂尔干

91 1898年，巴黎再次陷入骚乱。起因是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这是法国军队的一桩丑闻，后来升级为法国各对立派别借以相互攻击的著名的政治事件。德雷福斯是法国军队的一名犹太裔上尉，在一起试图掩盖某一间谍丑闻的过程中成为了牺牲品。^① 据在德国大使馆发现的秘密军事文件记录，真正的犯人应该是一个叫埃斯特哈齐的贵族浪荡子，但调查机构却武断地逮捕了德雷福斯，把这个不属于军队嫡系的人当作替罪羊。他身着全套礼服接受侮辱。军队列队于阅兵广场，军裤上的金线和红条带熠熠发光；德雷福斯以立正的姿势站立，他的长官从他的肩头撕下肩章，从他的胸前扯下勋章，将他的剑拦膝折断。之后，受尽屈

① 指1894年法国军队诬告法国总参谋部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充当德国间谍的案件。尽管缺乏证据，法庭仍判处德雷福斯终身苦役。围绕这一案件的斗争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在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于1899年获赦，1906年恢复名誉。——译者

辱的德雷福斯被送进了魔鬼岛的苦役营；而军队则挽回了名誉，重新投入到与莱茵河对岸的敌人的军备竞赛中。

但这一案件没能隐瞒多久。法国最著名的小说家爱弥尔·左拉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著名的公开信，信的劈头一句就是“我控诉！”左拉在信中指控政府是司法不公的蓄意共谋者。左拉本人被逮捕，以危害国家罪受到审判。这次审判震动了全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群众在法庭外进行抗争。左拉在法庭上响亮的演讲并没能对审判团——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沃伦委员会^①——产生影响；他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入狱。左拉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继续为此事奔走。这一丑闻已经不只限于法律程序的问题了。部长们被迫辞职，议会打成一团，学生们在大街上战斗。后来一位军官质疑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指出这种证据根本不存在，军方出于报复，对这名军官进行了几次审讯。但在新一轮审讯中，对军方极为不利的是，他们的指控证据被证明是伪造的。保守派这次做得过于出格了，他们的敌对者开始无情地对他们进行包抄。军方、天主教会、大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都在充满了报复情绪的左派的压力面前退却了，这一左派阵营里包括反对教权的公务员、教师、学生和工人。

这次胜利被证明是短暂的。获胜的自由主义者所推动的各项变革引发了一种反对的态势，而保守派们则最终从中获益；与德国的几次对峙使沙文主义在军队重新兴起；法国重新从尖锐的 92
社会冲突阶段回到惯常阶段。不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斗争会

^① 沃伦委员会是1963年美国为调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事件而特别成立的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当时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伦（Earl Warren）。——译者

一次次地重新爆发。

在 20 世纪头一个 10 年所经历过的这场斗争中，巴黎大学的学生处在核心位置。他们的一些教授成为德雷福斯案的号召力量。激进分子与保守分子之间的战斗经常在拉丁区的各街道激烈展开。学生中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有突击部队、情报员和通讯员，后者的职责是当保守派团伙试图要破坏受欢迎的共和派教授的演讲时，便骑着自行车向同伴们发出警告。这些教授中最赫赫有名的一位，也是法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社会学教授职位的受任者，是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巨人之一。

涂尔干的社会学的首要目标，就是去理解那些发生在他身边的诸种事件：当德雷福斯的肩章被撕下时阅兵场上的沉寂，左拉在受非法审判时对听众造成的冲击，以及在全法国爆发的、时常转变倾向的公众歇斯底里浪潮。涂尔干从社会本质的角度来洞察这些事件，他揭示出了 19 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所没有发现的东西：社会是一种仪式秩序，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节律基础上的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在科学与工业进步的顶端上，涂尔干突围进入了 20 世纪的智识领域，并进入到它最深刻的一个问题：理性的非理性基础。

涂尔干：社会中的劳动分工

涂尔干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动荡、暴力和堕落，至少像在法国所上演的那种。孔德和斯宾塞所预言的工业社会的持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预言并没有实现。但是，涂尔干也不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者认为现代工业的劳动分工是内在地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性的。他同样也不接受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回到以往的宗教和权威秩序中去的观点。涂尔干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理性主义教育机制中的一员，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他认同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后者是在损失惨重的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继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涂尔干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是科学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热情信仰者。他视捍卫现代劳动分工为己任，但又不盲目乐观。社会学的目标就是要解释如何使现代社会运作起来。

涂尔干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父亲是法国东部一个省的犹太拉比。涂尔干以他卓越的禀赋和勤奋通过了各种竞争考试，终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一精英学院。巴黎高师是一个培养教师和科学家的地方。它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进入到外省的学校，其中最优秀者能获得巴黎的为数不多的显要职位。涂尔干的博彩⁹³场在社会科学领域，他牌出得不错。1885年，他参观了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德国的实验室，后者创立了实验心理学，从而使心理学从原来思辨性的哲学领域中摆脱出来。但是法国的心理学则笼罩在一批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这样的保守心理学家的影响之下。涂尔干接受了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他们两人强调心理学层次之上的现象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可以创立出一门关于社会秩序的科学，捍卫共和社会和工业社会。唯一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推测性的，并且在思想上比较幼稚。涂尔

干着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就像冯特在心理学领域中所做的一样：把社会学从哲学中解脱出来，把它建立在经验科学的调查方法的基础上。这一路径是正确的，涂尔干的天才使其付诸实施。1902年，涂尔干从外省回到巴黎，在巴黎高师讲授他的新科学。社会学的现代时代开始了。

秃头、戴着眼镜、留着小撮胡须、总是一脸严肃的涂尔干以拉比式的虔诚投身到社会学中。他在高师的学生称他为“形而上学者”。他那逻辑性很强的头脑要完成一项为社会秩序找出一个科学基础的任务。他的基本假设来自孔德——社会的基础是一种道德秩序。他的第一本伟大著作《社会分工论》（1893）严谨地从多个角度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涂尔干给出了一个演绎论题。他声称，社会不能只通过理性的协议而存在，因为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是每个参与者都要互相相信对方能遵守协议。试想一下经济契约——这是涂尔干之前的斯宾塞、功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视为现代社会合作之基础的东西——我同意为你工作一个星期，前提是你要同意在这个星期结束时从你这个星期的收益中付给我报酬。但是注意：我们不仅是在同意劳动与报酬之间的交换，我们也同时都许诺会遵守这一约定。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第二种约定，它是隐含着的，但它相当重要。没有这种隐含的相互信任，任何具体的契约都无法达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真正理性的个人就不会按照契约行事。如果我相信了你，但你却没遵守契约，那么我就白给你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相信了我，而我没遵守契约，这样我就会拿了作为一个星期工作报酬的钱但只干很少活

儿甚至根本没干活儿。如果缺少相互信任，那么理性的个人永远不会遵守他的契约，也永远不会相信别人会遵守他们的契约。现代博弈论将其表述成下表中所示的情形。对两个参与者来说，理性的选择总会是进行欺骗，因为如果欺骗，那么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全赢（如果另一方遵守约定的话），至少他不会失去什么（如果两个人都在欺骗的话）。如果你遵守契约，但你又不能确定对方是否也会遵守，那么你就是在冒险，你可能会因为想获得某种公道的收益而丧失全部。

		B	
		遵守契约	欺骗
A	遵守契约	共同获益	B 全赢 A 全输
	欺骗	A 全赢 B 全输	均无所得，亦无所失

涂尔干认为，这证明必须先存在一种“前契约的团结”（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然后才能使契约生效。各种事实看上去证实了他的分析。在一个老板与工人互不信任的工厂，老板必须花费所有的精力来确保他的工人在给他干活，而工人们则想方设法地尽可能少干活多拿钱。纯粹的经济理性会将合作降低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直接控制的程度。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所有人都认同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可能达成极具成效的合作。

这就是涂尔干关于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之上，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的逻辑论证。这样，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让-雅克·卢梭及其他人的“社会契约”就

被证明为一个不可能的虚构；契约只可能产生于社会建立之后，而不是之前。

对此可以提出一种反对意见：人们是被迫遵守契约的。如果某人不付给我工钱，我可以控告他，政府会强迫他付钱。可以这样回击这个论点：政府对公民间私人契约的保护在历史上是很晚近的事，而在此之前的交换只能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而且，涂尔干论辩道，国家本身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人们已经相互联结在一起并就暴力的行使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国王之所以能进行统治，并不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他比其他所有人加在一起都强大，而是因为他领导了一群追随者。因此，对暴力的集中使用，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依赖于一种事先存在的团结。

那么，是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基本的团结呢？涂尔干认为，不是一种理智上的协议，而是某种共享的情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一种“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或者说“集体意识”，因为在法语里这一词包括这两种意思）：一种与其他人同属某一共同体的感觉，为此他会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按照共同体的要求行事。我们共同分享各种是非观，而这是与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分不开的，不管这个群体是人类、国家还是家庭。集体良知并不是指有一个群体精神笼罩在我们头顶，而毋宁说是我们具有一种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

这种良知从何而来？涂尔干认为它来自个人间的社会互动形式，尤其是我们现在称之为“仪式”的那些方式。简单地说，他提出了一个原理（从当时的群体心理学中汲取的），即当人们聚集到一起、将注意力集中到某种共同的对象上的时候，他们的

思想和情感在他们中间流转并得到了强化，直到最后它们变成了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脱离于每个人自身。当一个群体的成员看着国旗升起并齐唱国歌时，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事物上，并知道别人在同样如此，这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在见证一种比他们中的任何个人都更伟大的原则或力量——国家。这样，人们共同持有的观念就转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一个道德标准的世界。 95

如果道德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涂尔干就能够以其他方式来运用并检验他的这一理论。他从历史中去寻找证据，考察如果社会条件发生了改变，作为其结果的道德标准是否会发生改变。这一属于经验层次上的第二步论证，构成了《劳动分工论》的主体。

涂尔干将法律作为道德标准的指示器。法律并不是社会道德情感的精确的指示器，涂尔干说，因为它们可能滞后或超前于公众情感，但它们至少可以一般性地标示出人们的是非观。有两类法律：刑法和民事-行政法。刑法体现的是一种集体良知的强烈状态，因为它表明，一个人如果违反了社会的法，就会招致社会的愤怒，他就必须受到惩罚。回顾历史，涂尔干指出，这种集体良知肯定是极其强大的，因为它经常对一些违反禁忌的事规定了很极端的惩罚，即使这些违反行为并没有对人或财产造成什么损害。另一方面，民法和行政法则是社会良知的一种远为温和的表现，因为它所实施的是一些大不相同的处罚。刑法实施惩罚不考虑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而民法只要求触犯者补偿他们所犯的罪过：如果他们欠人钱，就该付清；如果他们拿了别人的财物，就该还回去。从另一方面说，刑法要求的是惩罚（retribution）；民

法要求的则是赔偿（restitution）。

然后，涂尔干展示了随着社会类型的不同，这两种法律各自所占比例的变化。在较小型的社会早期社会中，大部分法律都是惩罚性的，对几乎所有的触犯行为都采取拷打、毁损肢体和处死等惩罚方式。而在更大型的现代社会，法律更多是赔偿性质的。这不仅表现在法律书中民事 - 行政法所占的篇幅占了大部分，还表现在属于刑法处理之内的行为类型已大大削减了，而且其惩罚的严厉程度也降低了。

涂尔干发现，社会与其法律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与劳动分工的变化连在一起的。惩罚性法律主要存在于劳动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补偿性法律则主要存在于劳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前一种社会建立在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像《旧约》中的希伯来部落（涂尔干曾深入研究过这些部落）那样的部落社会或农民社会里，大多数人彼此没有什么差别。几乎每个人都是农民或者是武士。因此，这种社会里集体良知很强，因为人们从共同的经验中会产生出很多共同的观念。任何违反集体良知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酷惩罚；每一个体都和其他人一样，在集体实践之外再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个体是被强制性、机械性地整合起来的。

另一方面，涂尔干指出，具有较高劳动分化程度的社会则是
96 由“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结合起来的。人们的职业各不相同，那些工人、农民、商人、木匠、工程师及其他各种人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他们要通过一个复杂的经济市场相互交换服务。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彼此间的共同点也就大大

减少。但因为在市场交换中他们要不断地与他人进行交往，他们对对方的观点也有所了解；于是，一种新的、更为温和的集体良知形式就出现了。这在赔偿性法律中表现出来，这种法律规范市民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它所提供的社会控制只是为了维持复杂的社会运行，对于那些违反了只涉及小部分人的利益的私人契约的人，它并不将整个社会的集体愤怒加于其上。涂尔干之所以称其为有机团结，是因为其自身各部分是相互交换的，就像身体各个器官间的交换，这种交换为集体归属提供了基础。

历史证据支持了涂尔干关于必须存在前契约的团结的演绎论证。非理性的团结不仅在逻辑上要先行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它也是的确是首先出现的。涂尔干以前从他的老师菲斯泰尔·德·库朗热那里学到，类似古希腊和罗马那样的古代文明是在宗教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仪式在实际上规范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理性的经济契约是后来才出现的，在社会已然存在之后。在现代劳动分工建立起来后，集体良知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改换了形式。因此，社会是以一些小的群体为开端的，其秩序是通过一种强烈的、压制性的集体良知来维持的。随着社会逐渐发展，大量的人口开始对可获得的生活资源构成压力，个体开始分化。劳动分工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一些人与他们所交往的另一些人区别开来，但他们又通过更长线的经济与政治纽带而结合在一起。集体良知的根基削弱了，因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东西减少了。它的内容也逐渐变得更为抽象。它不再是维护某些特定的地方性习惯和禁忌，而是开始维护一些更为普遍和抽象的原则，如公平、公正、诚实等等。集体良知在权力削弱的同时

也更为强调原则；其基调少了些极端性而多了些人道性。这样，涂尔干就对孔德和托克维尔都注意到但没能解释的一个现象作出了一个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就是：人类同情心的范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

总而言之，涂尔干希望通过这一论证来证明现代社会是好的。一套复杂的劳动分工是内在地秩序化的，因为它包含着其自身的道德准则。传统宗教的衰退并不值得担忧，相反，代替它的现代道德是更为人道、更加宽容的。复杂的劳动分工创造出了个体主义，因为人们必须追求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但也不用为个体主义担忧，因为它并不意味着个人之间就不再有任何社会纽带。相反，个体主义是社会的产物，它体现出个人间是通过交换，而不是通过机械团结的强迫性一致，而相互联结起来的。

97 我们将会看到，在论证现代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一切基本上都是良性的这一点上，涂尔干并不完全成功。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因为他的研究不断地发现出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也可以被解释为意味着现代社会是自我毁灭性的。但是涂尔干还没有完成他主要的理论任务：论述有关团结的道德情感是如何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的。在他的逻辑和历史论证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经验证明，这一证明是建立在他对周围社会观察的基础上的。

集体良知是一个社会事实，涂尔干论述道。事实上，当你身处一群体中时，你可以切身体验到它。它是一种与外在于你自身的某种东西进行交流的感觉，它不依赖于那里的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但每个人都共同参与其中。“它是一种如此厚重的氛围，你甚至可以用刀来切割它。”什么东西能制造出这样一种感觉？在涂

尔干看来，法国仍在闷燃的政治传统中这种事例比比皆是：阅兵场上德雷福斯周围紧张的寂静、绞刑架下人群中复仇的兴奋。赋予这类群体场景以力量的是聚集起来的人们，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同一件事上，从而产生出具有感染力的情感。以这些集体良知存在的极端的和强有力的场合——其中，人们扮演着令人生畏的公众（Public）角色——为一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强度逐渐减弱的连续体：从足球赛和剧场观众的共享情感过渡到聚会和委员会会议，最后到很随意的交谈。

集体情感处于比较强烈的状态时我们是很容易觉察出来的，但一些更为微妙的场合则会被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不过涂尔干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种集体良知的状态清楚地显现出来：如果有某种违反规范的行为遭到了抵制，就说明存在着一种社会准则。当某人违反了有关礼貌、尊重的小规则之时，人们所感到的尴尬最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些规则之后的情感；而当某人在一个彬彬有礼的聚会场合说出猥亵之语时，此场合最明显不过地显示出社会惯例的不可逾越之界。当然，礼貌规则的合宜标准在不同时候、不同场合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在规范的力量强大之处，不管其具体内容是什么，集体良知的隐性秩序总是能很明确地被感知到。这在 19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繁文缛节中有最突出的表现。

越轨与社会团结

因此，涂尔干特别对越轨（deviance）行为感兴趣，因为正是在这种行为中，能最清楚地显现社会准则之正在运行。他认

为，犯罪及对其的惩罚是属于一个社会的核心特质的东西。如果某人犯下了一桩罪行——例如谋杀或强奸，会引起广泛的公众愤怒，其范围远远超过那些在此罪行中受到伤害或受到威胁的具体个人。人们对那些从个人角度来说与自身毫无关系的事件做出反应，从而显示出他们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之间的非理性的、与自我利益无涉的依附关系。下面这类情况可以显示出这是一种与个人利益无关的感情：公众会为一些纯粹是象征性的事件而愤怒，在这类事件中，根本没有任何人受到了损害——比如说，公众猥亵事件（一个现代的例子就是上演裸体戏剧或放映裸体电影）或象征性的政治行为，如左拉致法国总统的信。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被触犯的不是什么人的个人利益，而是集体良知本身。如果一种仪式秩序被损害了，就必须实施仪式惩罚以恢复其纯洁性。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众关注像法庭审判、执行死刑这样的惩罚仪式。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已经有各种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死刑对暴力犯罪没有多少震慑效果，还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死刑：因为这一惩罚形式执行的是一种仪式功能而非实践功能，因此，那些将自己与某种仪式秩序联结在一起的人要支持它。

涂尔干甚至走得更远，他论证说犯罪具有结合社会的功能。如果没有犯罪，就不会有各种惩罚的仪式，而没有这些周期性的、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再次确证他们之间的团结的仪式，社会就会逐渐分崩离析。当然，这一论证有些过于夸大。涂尔干自己后来也指出，社会不仅存在着消极性的仪式，也存在着积极性的仪式，后者也能创造出一种团结感。各种教堂仪式、爱国主义节日，甚至是像生日聚会这样的家庭宴庆都具有这样的功能。整个人

类学功能学派都是在涂尔干的这一基本洞见上发展起来的。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亚瑟·拉德克利夫-布朗（Arthur Radcliffe-Brown）、B. 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以及其他论者论述了诸如婚礼、葬礼、过渡仪式和礼物交换等是如何起到重新确认社会纽带的作用的，尤其是在群体丧失或新增了某个成员而扰乱了这些社会纽带的时候。在社会学领域，对涂尔干视角的最重要的运用是W. 劳埃德·沃纳（W. Lloyd Warner）和欧文·戈夫曼将其运用于分析现代美国社会的各种仪式。

涂尔干在他对越轨与团结的研究中走得更远。除了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观察，他还做了一项统计数据的研究，这种研究成为后来社会学科学研究的一种模式。这就是他的名著——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在此论题上，涂尔干并不完全是原创的。他吸收了自1830年代以来的一种传统，那时比利时的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Adolphe Quetelet）就指出，每年的生育、死亡、结婚、谋杀、自杀等一直是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率的，尽管其中每一个比率都是很多互不关联的个人行为的结果。奎特勒因此认为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个体的社会事实领域，并且提议建立一门他称之为“社会物理学”的科学来解释这些事实。但奎特勒只是一个统计学家，他除了提出一个倾向于按照既定方式行事的“平均人”概念外提不出其他的解释。这一研究路径正是为涂尔干预备的，因为它与各种越轨行为——尤其是自杀——相关，而对于这一问题，涂尔干是有一套社会学理论的。现在，他有机会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法来验证他的理论了。

《自杀论》是社会学领域内第一部真正优秀的大规模数据分析的作品。涂尔干在本书始终都贯彻了所有优秀研究都具有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如果你想知道某事之所以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去考察“它是在何种情境下发生的”，并将其与“在何种情境下它不发生”做比较。这与涂尔干的要观察到社会规范，就去寻找违背规范的事例这一原则类似。这两种原则背后都是通过对立进行理解的策略：通过正反对照和相互比较来展现解释。这也是托克维尔在比较法国和美国时所得出的洞见背后的原则，它也继续成为现代社会学几乎所有重大发展的基础。

以涂尔干的研究为例。他从当时流行的一个理论入手，这一理论把自杀归因于个人的精神机能障碍。这是他想要驳倒的一种解释，因为他正在进行一次学术竞争，他认识到在这场竞争中，心理学家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他想要证明，社会事实处于一个独立的、更为重要的解释层次。总之，涂尔干反对心理学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后者只是通过个体行为来看各种事件，而不深入研究影响个体的社会环境。他比较了欧洲高自杀率的地区和中等以及低自杀率的地区，指出在自杀率和精神病发生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从而驳斥了自杀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他用类似的方式检验了其他一些将自杀归因于种族、气候和地理的流行理论。涂尔干依次细致地考察了种族构成、平均气温等因素的变化，指出它们与自杀率的变化之间没有对应关系。

排除掉了这些作为对手的解释后，涂尔干接着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他发现，自杀率是依据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

例如，新教徒的自杀率比天主教徒要高，天主教徒的自杀率又比犹太人的高。涂尔干论证说，教义方面的不同不能解释这种差异。如果说天主教比新教更强调自杀是严重的罪行的话，可犹太教甚至没有特别禁止自杀，但犹太教徒的自杀率却最低。其实，这些宗教群体中自杀率的差异是由这些宗教提供给其成员的社会环境的不同造成的。犹太教徒是结合得最紧密的宗教群体，而新教徒群体间的结合最弱，天主教处于中间，后者是通过一系列仪式活动而将个体聚集在一起的。涂尔干论述道，一般说来，个人越是被紧密地结合进社会中，他就越不可能去自杀。

为了佐证这一解释，涂尔干进一步探讨了这些类别内部的其他变量。在每种宗教群体中，男人的自杀率占绝大比重，这是因为女人大量参与了日常的宗教活动，且更牢固地与家庭这个紧密的共同体结合在一起。在新教群体里，英国圣公会教徒的自杀率是最低的，因为它是新教各宗派中最强调仪式并与天主教最相似的一派。接着，涂尔干相当具有独创性地指出，在欧洲各地区，除了犹太人，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自杀率最高。这一点加强了他关于社会整合力的缺乏是导致自杀之原因的论述，因为教育程度是一个社会世俗化、个体化和非宗教化的标志；只有犹太人例外，因为对他们而言，对非神职人员的信徒进行教育是他们宗教传统的重要部分。

涂尔干从不同角度确证了他的这一普遍理论：个人生活的意义是社会赋予的；当个人被与社会隔断，他们就有可能自杀。不仅宗教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其他一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革命或其他重大社会危机发生的时期，自杀率就

会降低，因为在这种时期，所有人都被某种共同的情感团结了起来。还有证据表明，已婚者较未婚者自杀率要低；丧偶和离婚会导致自杀率的升高，但如果其在世的孩子较多，自杀率会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多，他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小；社会关系越少，他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就越大。从所有这些论述中产生出了涂尔干的一个核心概念：有关“失范”（*anomie*）状态或者说规范——为个人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指导和目标——的缺失状态之思想。涂尔干用这个概念概括了现代社会诸弊病的一个主要根源。

涂尔干的《自杀论》是一部经典之作，作为一种如何运用实证分析来证明一个普遍性理论的模式，它一直保持着生命力。不过它也存在各种缺陷。涂尔干所采用的数据并不完全可靠，也存在一些分析错误。而且，他并没有充分解释清楚自杀现象。不管怎么说，并不是每一个新教徒都会去自杀，即使他或她是未婚的、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经历。要对任何个体性的自杀事件进行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引入涂尔干试图排除的心理学方面的诸因素。不过涂尔干的兴趣并不在于对自杀提供一个穷尽无遗的解释，而是在于证明社会团结和社会失范对个人行为的重要影响。他对自杀本身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感兴趣于自杀所能告诉我们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知识。

不管它是否完全精确有效，《自杀论》在社会思想史中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不仅支持了涂尔干关于仪式互动对于社会团结之重要性的综合分析，而且还为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奠定了一种模式：通过各种变量来论述普遍性的理论论断，通过系统

地比较各种可能的因果条件来验证理论。就此，涂尔干将 19 世纪的思辨的方法转入到了 20 世纪的复杂精密的分析方法。

宗教与现实

对个人来说，这些成就已经是相当重大的贡献了，但是涂尔干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主办了法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社会学年鉴》，以这一杂志为中心，一批研究者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传统。在这批人中形成了现代人类学的一个主流派，他们构成了法国的涂尔干的主要追随者。涂尔干自己对关于原始部落的民族志报告越来越感兴趣，他与他的外甥马塞尔·莫斯合作，一起分析这些材料，后者承担过《自杀论》中的大量统计编辑工作。在他去世前几年的 1912 年，涂尔干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这也许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专著，书名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将由卡尔·马克思开创的对我们的现实 101 观的革命带向了一个新的层次。马克思论证说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现实观。涂尔干则走得更远，他证明甚至我们的各种最普遍的、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都具有社会相对性。时间、空间、因果关系、上帝、自我——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可以看作社会的产物。替代了原来的绝对主义式的“就在那里”的现实观，涂尔干向我们展示，自然世界只是人类的象征造物及其社会仪式的背景。当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欧文·戈夫曼及其他近期的社会学家对这一视角的应用之后，我们会认识到，并不只存在一种现实，而是有多种，它们的存在完全是由人类规定的。

涂尔干对我们观念的这一革命是通过以下分析来实现的。

他分析了有关澳洲土著部落及其他一些部落社会的资料，试图以此来理解宗教的基础。由于在这些人群中，宗教渗透于其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涂尔干因此也得以据此来解释一个社会的基本思维模式。

涂尔干以对宗教进行定义开始。所有宗教所共同具有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上帝或魂灵的观念，因为像佛教和儒教这样的宗教就没有这些东西；也不是某种与自然领域分离的超自然领域之观念，因为初民社会还没有发展出自然领域的观念，因此不可能做出这种区分。实际上，涂尔干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观念领域内发现宗教的核心。所有宗教都具有的唯一种东西就是一套“神圣事物”，它们被与所有其他事物划分开来，人们必须以仪式性的谨慎来对待它们。例如基督教的仪式物品就包括圣经、圣坛、念珠、圣水和圣餐中的面包和酒；而在涂尔干所分析的土著部落中，主要的神圣物品就是部落图腾。图腾是一种动物，例如狐狸、蛇、蛆或袋鼠，部落成员禁止杀害和食用它们，部落要周期性地举行仪式，其成员聚集起来向此神圣物致以敬意。

从实用性的角度看，很难理解这种对待图腾的方式，涂尔干说，但是从社会性的角度看，其意义就很明显了。图腾的功能就在于团结整个部落。如果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部落这一单位，因为正是拥有一个共同的图腾使部落成员得以相互认同。因此，图腾是亲属制度和社会成员资格的基础。只有在周期性的仪式上，整个部落才会聚集到一起，也只有在这些仪式上，部落成员才能创造和再创造出精神上的团结感，而涂尔干已经论述过，这

种团结感对维持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图腾创造了一种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因为禁止杀害图腾动物，也就禁止杀害以其命名自身的部落成员。实际上，图腾象征着社会及其对个体的道德要求。

依此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代宗教的功能主要在于维持一种道德上的共同体。例如，19世纪美国乡村中的教堂仪式每周一次将社区中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这恐怕也是整个社区定期聚集的唯一机会。教堂举行的各种仪式，从读圣经到集体唱圣歌和祈祷，其目的都在于创造一种道德秩序感。总体说来，涂尔干论证道，宗教的道德要求——金箴（Golden Rule）、十诫（Ten Commandment），以及对沉溺于肉体愉悦的种种限制——从根本上说是社会规则。它们调节人们相互间的举止方式、维持社会整体感、控制个人私利的泛滥，从而使社会成为可能。102

为什么人们会努力去实践这些道德准则，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它？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人们害怕诸如天堂、地狱或图腾的神圣力量等超自然的制裁，这些对宗教习俗的理性化解释变来变去，只有社会控制的力量长久不变。涂尔干提出，这是因为超自然的制裁象征着社会及其对个人的接受或拒斥。那些努力遵照这些道德规范生活并全心全意参与各种宗教仪式的人会获得一种强烈的一体感，感觉他们与构成这个社会的无以数计的世代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种感觉是“得到救赎”的表现。那些违反准则、不参加仪式的人将自己与这种归属感切断了，从而要忍受他们的自我中心化所带来的痛苦后果。就像神学家们所说的，隔绝于上帝是罪人自加于身的惩罚。涂尔干

会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会加上一条社会学的注释：上帝不过是社会的一个象征。

这样，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科学攻击宗教的回目就由涂尔干画上了句号。但是，宗教绝不只是迷信和谬误，涂尔干指出，如果它仅只如此的话，它怎么能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涂尔干使我们得以理解各种对超自然的信仰，他揭示了信仰的真正本质：它是由处于每个社会的核心的社会行动所生发的各种象征。上帝并不是信徒所想象的东西，相反，它被展示为真实之物：一个社会的集体良知。这个集体良知不断改变它的象征物，从神圣的图腾动物到更具有普遍性的众神，最后到那个遥远的基督教的上帝，连带着他那消失在往昔记忆中的超凡的天堂与地狱，这些都是我们在涂尔干的早期论述《社会分工论》中可以引申出来的：社会道德秩序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以前的神圣之物如图腾、圣坛和圣经只是被新的神圣物如国旗所替换，后者代表着对国家的崇拜。总之，涂尔干的理论指出，历史发展是趋向于越来越抽象和普遍化的集体良知的；上帝的各种具体象征物会逐渐消失，代之以人类兄弟情谊的普遍化的道德信仰。

这样，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就成功地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人类的基本宗教观念。而且涂尔干还表明，甚至我们思维的基本范畴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今天是星期五、现在是上午 11 点、
103 今年是 2008 年；这些都暗示着我是生活在一个其他大多数人共同认同的、看钟计时的后基督教文明的世界中。但这些时间单位的划分绝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把时间划分为一星

期 7 天或一天 24 小时；我们也同样可以将 10 天作为一个星期甚至根本就不用星期或小时这样的概念（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就的确如此）。我们之所以把时间分成各种单位，是因为在我们复杂的现代文明中，我们的行动需要与其他人进行协调，而不是因为星期或小时是构成自然的真正框架。由于我们一直按照这些时间单位行事，它们就成了我们意识的基本框架的一部分，是我们主观地将它们变成了绝对的现实。而社会以同样方式暗中构建了我们的世界观的基础。公元 1992 年这种时间直接将我们置身于基督教历史观的背景中，因为这种耶稣纪元使我们与作为公元 1 年的基督出生之年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人——他们的年历已经到了 4690 年——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宇宙中。

涂尔干表明，各种时间概念首先都是来自宗教仪式的进程安排。空间、因果关系、数量——所有这些抽象的观念都可以追溯到社会性的缘起及随后的社会性应用。空间是部族居住之地；此概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澳大利亚土著人在沙漠中的游荡，到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远航，但是正如空间旅行对我们的宇宙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所继续显示的，空间对我们来说有着一个基本的社会意义。我们的各种基本概念都是以类似的方式发源于社会母体，而我们所谓的客观知识最终就是指那些我们可以与他人进行可靠交流的东西。涂尔干揭穿了妨碍我们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它的另一种幻觉：我们把社会设定的现实意象错认作现实本身。只有认识到我们的观念的社会相对性，我们才能踏上理解自身之路。

这是涂尔干上演的一场辉煌的知识演示，真正是现代时期

中极非同寻常的一幕。但是，作为他论述开端的社会事件，即他试图疗救当代法国的社会冲突的努力，其效果又如何呢？在这方面，涂尔干就不是很成功了。他试图将社会学功能主义作为诊断社会弊病的科学基础：不要持任何特定的道德观来评论社会应该如何运行，而是要探知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状态，从而了解其“疾病”。他试图表明，现代劳动分工在本质上是健康和整合化的，如果它不是这样，那肯定是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境。因此，涂尔干确信，罢工、政治冲突和劳工的暴力行为等都是劳动的“反常”分化形式。但他从来没能提出一种明确的解决方案。按照他的理论，问题肯定出在个人没有充分整合进社会共同体的道德秩序中去，在他著名的《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提出，可以通过将个人组织进各种职业协会中来解决团结感缺乏的问题。

这种解决方案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类职业团体之间就不会再发生冲突。涂尔干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分层的存在以及政治冲突的现实；涂尔干过于关注社会团结的基础，以至于他的社会意象中排除了所有非整合性的特征。如果涂尔干能沿着托克维尔所指引的方向，即关注政治组织如何能激化或限制冲突，那么他在政治性解决方案的研究方面会更为成功些。

总而言之，涂尔干关于现代工业社会通常是完美整合的这一乐观主义论断是靠不住的。他自己的理论就能驳倒它。如果人类是一种情感型动物，他们的目标感来源于他们与其他人共同举行的仪式，那么在我们的高度官僚制化的社会中，渐增的对情感

的压抑和仪式的消除就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适。而这正是韦伯和弗洛伊德所得出的更为悲观的结论。尽管涂尔干不愿得出这种结论，但他关于仪式性社会纽带的松散导致失范性自杀的论断支持了一种偏悲观的解释。

第七章

马克斯·韦伯：世界的除魅

105 除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的影响力都无法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相比。他的各种观点广泛流传，首先是在德国，然后在整个学术界。他的术语“卡里斯玛型领袖”已被广泛使用，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对诸如合法性、官僚制、理性化、理解（*verstehen*）、理想型（*ideal types*）、价值无涉的科学、三维分层取向和新教伦理及其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等概念略知一二。但韦伯的普通社会学和他的世界史观仍鲜为人知，它们隐藏在各种孤立的选读本和普及本之中。当韦伯的世界观中越来越多有力的东西被揭示出来时，他不断带给我们惊奇。韦伯自己该为这种状况负一定责任。他的著作卷帙繁多且多未完稿，而且一点也不简洁；即使是想对这些著作做一浅近的了解，其各种观念运用之繁复也会使人望而却步。近年来，随着对他的社

社会学所进行的更为全面的发现和发展，韦伯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作为德国社会学术界伟大时代的最具号召力的人物，在他去世后 80 多年后，韦伯依然是耸立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一座巅峰。

与其他很多伟大的社会学家一样，韦伯（发音为“Vay-ber”）也是处于各种关系联结的中心，这样他通过不断受到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的冲击，而能逐步摆脱各种幻象。韦伯 1864 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德国实业家家庭中，在柏林长大，他父亲是那里的一位法官和成功的政治家。由于有与俾斯麦帝国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熟识的背景，韦伯从小就成为了一个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他父亲在国会中与民族自由主义者（National Liberals）站在一起，代表着大制造商的利益，处于右派的容克贵族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工联主义者）之间。自由主义者在这时的德国未逢其时（事实上，除了在 1848 年短命的革命期间，他们很少能在德国大行其道）。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军队坚决反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者则遵循着卡尔·马克思的观点鼓吹革命。自由主义者别无所靠，只能转而依靠国家官僚体制，随着他们的民族主义逐渐上升为他们唯一的政治资源，他们的理想也消耗殆尽。很早的时候，韦伯就嘲笑过左派和右派的各种不切实际的主张，但他又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容忍中间立场。尽管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但他清楚德国正在坚定地铸下大错：走向一场将毁灭它的战争。他的社会学证实了他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忧虑，而他也逐渐将自己视为 20 世纪的耶利米^①，预言着毁灭。

① 耶利米，《圣经》中人物，公元前 7 世纪至前 6 世纪时希伯来先知，悲观的预言者。——译者

他起初也从事与他父亲同样的职业，在海德堡和柏林学习法律。但他对政治的悲观态度和他那无法抵抗的运用其独立智力的冲动将他带入学术生涯。19世纪的德国各大学在全世界卓越出众，尤其是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在这个领域，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Friedrich von Savigny）将历史学从一种搜集古物的编年史转化为一门科学，其准则是“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叙述。各位博士教授先生以德国式的彻底精神不仅在传统的军事史和政治史方面，而且在经济史、法律史、文化史以及考古学、人种学和语言学等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同样，德国的哲学从黑格尔时代起就带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气息。韦伯在几乎所有这些领域里训练自己，结果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或许超过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人。

在一个专门化日益增长的时代，韦伯的忧虑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个人主义者的忧虑。不过，韦伯就意味着非同一般。韦伯高大、结实、留着黑黑的络腮胡子、郁郁寡欢，他总是给见面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同事将他视为一位超拔的智识者。在韦伯的博士考试结束之时，当时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站起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像“受到高度评价的马克斯·韦伯”那样有资格继任他的事业。而韦伯所处的知识界圈子甚至超越了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范围。在他父亲家中，他就曾见到了柏林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他自己在海德堡的家汇集了所有领域的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和音乐家。他的圈子里有诸如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未来的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费尔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还有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罗伯特·米歇尔斯 (Robert Michels)——如果没有韦伯出面为他说情, 他就得不到一个大学职位。韦伯很了解在地下流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懂很多门外语, 游历广泛, 结识了包括德国历史学家、英国进化论者和法国实证主义者在内的众多人士。他是唯一一位对 19 世纪的思潮融会贯通的人物, 在他所处的中心位置上, 他锻造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的观点, 认为它既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种对有意义的人类创造物的研究。他的两种孪生方法——理解和理想型就是由于他身处当时学术交汇中心的地位而提出来的。只用解释自然世界的机械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事实是不够的, 而必须用理解 (即德语中的 *verstehen*) 的方法, 即将自己设想为处在那些在其环境中行动的男人女人人们的体验中。而理想型, 我们在下文中会了解到, 是从我们对这个无限复杂和变动的世界的理解中进行科学概括的工具。

社会学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 (*sympathetically*) 理解周围的人——当然, 也包括那些死了好几个世纪的人——他们必须敏锐地感觉到什么是最根本的东西。在这方面上, 韦伯同样处于两种强烈的对立力量的中心。他的家庭表面上是那种体面的德国资产阶级家庭, 但他的父亲和母亲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某种精神之战。他的父亲严厉、自以为是、专横, 一直与他那关心他人、克己虔诚的母亲发生冲突。在这两个极端中, 韦伯觉察出了那种严格的清教徒伦理——对此的发现是他最著名的贡献——的残迹。当然, 韦伯自己就是这种伦理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极其勤奋地工作、毫无瑕疵的诚实专注、严肃、有条不紊, 被内心一种强烈的力量

所驱使，这些造成了他多年来的失眠以及在 56 岁时便英年早逝。

上述的家庭冲突终于产生了恶果。1897 年，韦伯 33 岁，刚开始他在海德堡的经济学教授生涯，在探望父母亲时他被卷入了一场争吵中。彬彬有礼的贵族外表下压抑了多年的痛苦终于爆发，韦伯愤怒地威胁说如果他父亲不改变对他母亲的态度，他就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之后不久，他得到消息：父亲中风而死。

抑郁状态随之而来。以前那个出色的甚至是充满超凡魅力的讲演者不复存在，韦伯发现自己已经不再能够讲课了。当他努力要讲课时，他的手臂和背就开始麻痹。他发现自己说话很困难，要进行严肃的思考更不可能。他休假了一段时间，后来彻底辞去了教职。他一直在旅行，但他只是待在旅馆的房间里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盯着自己的手指甲。他在一个收容精神病人的机构中住了几个星期。这一经历在他内心中打开了新的一面。“这一疾病是有其补偿作用的。它向我重新开启了生活中人性的一面，”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只冰冷的手放开了我。多年来，我的病态倾向表现为疯狂地进行科学研究，我把工作当成了某种护身法宝……”

他开始缓慢地恢复，1904 年，他重新回来工作。由于应邀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讲演，他去了趟美国。美国人的崇高理想和资本主义的腐败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回到德国后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此，他的创作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他去世，他都没能重返讲台。他损失了 7 年，但之后 16 年的工作至今无人超越。

在他的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开头几章中，相互交叉的各种定义迷宫使韦伯的社会学面目不清。对于社会运行这类复杂的

主题来说，清晰明确的概念是必需的。而从其实际运用入手来理解概念是把握概念的最简便方式。韦伯给自己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历史上的最伟大的进展：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¹⁰⁸ 他必须将他的视野从经济学推进到法律、政治和宗教方面；探求亲属制度和社会分层、官僚制和战争之间的相互关联，直至所有的机制都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他的解释之网则从当下延伸到了地球上人类生活之始。在探索经济发展问题时，韦伯创立了一种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史的社会学的学科。他对普通社会学理论的贡献包括他在努力把握社会的重要进程中发展出的各种模型，这些模型没有粗暴地简单化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韦伯极其蔑视进化论和循环论的理论，后者总是一味地将事实简单化以使之适应于一些预先设定的发展原则。韦伯在模糊、不确切的概括和世界文明众多的独特形式之间走钢丝，他走向了一种关于人类社会行为和人类所创立的制度的综合理论。我们首先来讨论韦伯的普通社会学，然后再讨论他的世界史观。

韦伯的社会学：分层、组织和政治

分层：阶级、权力和地位

韦伯的社会学以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为中心：分层 (stratification)、组织与政治。三者中，分层提供了其核心的社会理论，其他二者都与之相关，而且在其中可以发现推动社会的力量。韦伯是一个彻底的唯名论者，在他看来，在真实的物质环境中的真实的人是社会中所有存在和发生之事物的主体和推动者。固然，文

化伦理（譬如新教伦理）、法律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组织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发展规律，但它们从来不会由自身发展起来，它们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和行动而发展起来的。

韦伯很可能会以马克思的那句口号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韦伯不能接受把“社会”比作有机体这种具体化的抽象，也不接受德国文化理论家们所说的 *Weltgeist*（世界精神）。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社会，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群群的男人和女人。而且，这些群体相互之间差别迥然，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中。认为上层阶级的伦理哲学反映了中层阶级的店主和农业生产者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不能用婆罗门教义来概括印度，也不能用黑格尔的思想来概括德国。如果我们要理解社会和文化，我们就必须从实际存在着的各分立群体间的差别着手，而不是从基于单一视角得出的一些简单概括着手。对于韦伯来说，分层将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不同人群连接起来，同时它包含着一种无形的秩序，在其作用下，千百万个体的行动叠加起来所产生的结果是这些个体既难以预料到也无法控制的。

是什么样的秩序将人们与其他那些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连接在一起？韦伯找出了三种这样的秩序：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个人在工厂出卖他的劳动力（而只有存在着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工厂才能存在），他花费工资的方式则影响着商品的价格；他纳税，战死于遥远的战场，只是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们的权力争夺；他的家人走在送葬的队列中，很久以来，这类葬礼就由各种等级的牧师组成，这种仪式在一次次重复时变化

很小。这每一种秩序都影响着人类的行为，而人们就在这些秩序构成的环境中生活，这一环境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与之发生关联的人。但每个人所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个金融家的儿子与一个农夫的儿子的生活机遇是不一样的；一个普通市民的世界观与一个政党领袖的世界观是不同的；一个勤勉的家庭主妇不会出入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我们将社会秩序看作是某种个人之间按照其相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而分层为不同群体，我们就能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它。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各种人群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韦伯时代以来的许多研究都表明，正是在这种面对面的群体中，人们得以获得其认同、价值和世界观。因此，社会的差异性是由它的一些主要机制——商业、国家、军队、教堂、学校——制造出来的。同时，不同群体中的成员又通过他们在这些体制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而相互连接了起来。

韦伯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是什么将社会团结在一起这类概括性的问题。他所看到的是，在历史的扫荡之下，社会时分时合，从一套体制转换到另一套体制。历史表明，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有的只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和变迁：国家兴起又分裂，贸易与金融扩张而后再萎缩，宗教与艺术逐渐从一种主题转向对立的主题。在这些变迁之下保持不变的，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基础，是由共同的感情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人群：家庭（families）、家族（households）、亲属（kinspeople）、教会及教派成员、朋友和社区。因此，韦伯分层观的核心就是群体形成理论，它是一套假设，论述是什么条件使人们聚集起来形成各种稳固的群体。这些条件存在于人们与各种制度性秩序——这些秩序将各

群体连接成一个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中。

韦伯将某些特定的动机视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基础：对食物及物质舒适的需要、对死亡的恐惧及对生理痛苦的躲避、对性满足的渴求、对在某一社会及道德群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及地位的期望，以及对获得一种有意义的世界观的期望。韦伯并不想去探究这些动机的心理动力学，也不试图去说明个人在诸种动机上的差异性；从上述方面来看，他的理论应该补充进弗洛伊德和米德在这方面的洞见以及涂尔干及其追随者的关于群体团结的社会理论。韦伯将上述动机看作既定的东西，因为他发现它们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这些动机在他的理论中表现为人们相互影响对方行为的三种主要作用力：提供经济利益、施加暴力威胁，以及诉诸情感与信仰。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化领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其基础上分别形成了阶级、政党（“权力集团”也许是个更合适的词）和身份群体（status groups）等群体。

110 韦伯的核心假设是：在经济舞台上、政治斗争中及文化领域内具有共同的地位和利益的人们倾向于共同行动并相互团结在一起，而将所有其他人排除在他们平等的团体之外。在经济市场上，阶级的形成是由于经历着类似的工作条件的人们相互聚集到了一起。在这一点上，韦伯继承了马克思的发现：农民、工人、熟练工匠、乡村地主、工厂主、商人和股票投机商均生活在相互迥异的社会环境中。物质环境对人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它将工厂的劳作者集中在城市的廉价公寓中，而通过在各产业间的相互拜访使乡绅们相互联结。经济不仅影响人们如何生活、在哪一群体中生活，也影响着他们怎样看待世界以及会怎样行动。经济地

位使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工人们要求获得更高的报酬、成立工会、支持社会主义党，因为这对他们有利；农民们想要减少他们对领主的义务和向国王上交的税款；工厂主反对成立工会、反对社会主义；金融家则关注黄金的价格和当前的贷款利润率。因此，人们是受其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行动的，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则使具有相似经济地位的个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与那些与其处于对立地位的人分隔开。某个特定的社会中存在多少个这样对立的集团，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的激烈程度，取决于这一社会的经济体系的性质，以及其经济分层与政治、文化分层之间的关系。韦伯把马克思的基本模型结合进了他的分层理论中，但他只是将经济因素作为三种决定因素中的一种。

韦伯将政治也视为与经济领域一样是充满斗争的领域。毕竟，历史最明显地表现为对军事征服、采邑对抗、宫廷阴谋与政变、农民暴动和城市起义的记录；而和平时期的活动则主要是政客们职业生涯的起起伏伏、官方权威的转换，以及在选举和议院游说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游戏。因此，正如个人之间可以按照经济利益进行分层一样，他们也可以按照其政治利益进行分层。下层政府官员、军官、独立的封建骑士、现代政党政治家以及地方官员各自聚集成不同的集团。强制权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很多人都致力于为自己获取尽可能多的权力，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加于自身的权力尽可能地少。我们下面将看到，政治可以被分析为一种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威，而尽量避免屈从于他人权威的持续斗争。政治利益集团有可能与经济利益集团相重叠——封建骑士也许就代表着土地拥有者阶级；政治家也许代表

着工厂主或工人阶级。但是权力是一块应单独划切出来的馅饼，它能够形成自己的阵列。一个特定社会中政治分层的类别和政治集团的形成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

至此，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韦伯将社会看作各种力量之间
111 复杂的、不断变动的相互作用。政治分层受经济联盟的影响，反之亦然；而这二者又与文化分层发生互动。韦伯不得不发明出一种能一以贯之地讨论这个世界的策略，因为这个世界的万物如此变动不居，我们还来不及给它们贴上标签，而我们贴上的标签也总是将正在发生的事物简单化了。出于这一目的，他设想出了“理想型”（ideal type）这一概念，以此他可以从现实中抽象出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很少能，或者根本就不能自己单独存在。例如，如果我们在思维上将分层分解为各种组成要素——有关阶级、权力集团和身份群体的理想型，我们就可以发现分层的动力学。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考虑政治力量运行的情况下，来揭示经济阶层形成的动力学。完成这一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将政治斗争的因素和文化对于地位形成的影响考虑进来。最后，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认识都运用到对任一由此三个过程的互动而形成的社会的全部分层的分析中。这一技术类似于化学家的做法，后者要了解某种化合物的性质时，先是分析出其构成元素，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称作“多元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的对调查数据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现了同样的总体策略。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尤其微妙。如前文所述，各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对其价值观和信仰有相当的影响。在经济学领

域，韦伯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韦伯也作了相应的政治学分析。我们可以说，这是对文化的经济决定因素和政治决定因素的分析。不过，文化与分层发生关联还有第三种方式，这是韦伯自己的发明。如果文化只是作为经济、政治地位的一个结果，那么就不能说文化对于分层具有重要作用。人们或许是根据其收入和权力进行分层的，这样他们所得到的服从和必须给予的服从，以及他们与那些不屑于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和那些他们不屑与之打交道的人（地位比他们低的人）之间的界限划分，都只是基于金钱和权力，而与他们文化中的任何东西无关。但韦伯不这样认为：在由阶级和权力导致的分层之外，在文化的领域中还可能存在着相当多的等级。从历史上看，这些文化等级中最重要的就是基于宗教的等级。每种宗教中都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分层：至少存在着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在地位上的区别。不论他们之间的财富和权力有何区别，信教者认为自己比那些不信教者更有德行、更为悟道，这种文化分层与经济阶级和权力集团一样，倾向于内部团结而排斥群体外成员。绝大多数宗教中的分层远远超出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分层。还存在着各种等级：从教皇、古鲁^①、高级教士往下，有次级的仪式助理、虔诚的礼拜者，单纯的正式成员，再到意志摇摆不定的罪人。当然，这种分层依据并不必然是排他性的；教会总是有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而教士也会与相应的有钱或有势的教外人士有着各种社会联系。

文化分层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与大多数人实际上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之方式密切相关。我们感觉到我们与某些人

① 古鲁，指印度教、锡克教的宗教教师或领袖。——译者

- 112 而不是其他人联系在一起，往往并不是我们将这些人视作我们经济或政治上的盟友，而是因为我们喜欢并尊重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如果分析一下这种喜欢的情感，我们会发现这里往往包含着文化的分层。那些可敬的按时去教堂的人通常会喜欢与他们类似的人，而不会是那些经常光顾酒吧和赌场的酗酒者，而那些正在以优雅的礼节与客人讨论艺术的女主人不会喜欢后院野餐烤肉设备。

正是在这里，韦伯的哲学背景在他的社会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其关于方法论的介绍性文章中，韦伯强调社会学的确切主题是有意义的人类行动。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撑开伞，这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如果这只是他们对外界刺激（下雨）的反映的话。相反，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被人们理解为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人们或者将它视为通往社会成功的途径，或者看作对贵族身份的一种贬低，或者看作对死后能得到救赎的一种确证。休闲同样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领域：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展示和消费的高贵方式；有的人是因为受了苦行主义的影响而将其作为躲避这个外部世界的方式；而有些人则是要以此与邻居攀比，显示自己的优越性。还存在许许多多这样的意义选择，这些选择构成了文化的分层领域。它们在韦伯的社会整体模型中相当重要，以至于他不断地强调生活的这一主观性方面。对于韦伯来说，社会学分析必须经常将理解——一种对人们的主观性意义的移情式理解——纳入进来。不管我们是在面对我们的当代人，还是在面对古人，我们都必须努力将我们的感情和理解力置于与他们相同的位置上。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理解分层所涉及的种种斗争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因此，文化分层是所有分层形式中最复杂、最微妙的一种。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明确区分的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相对较少，但是文化等级的多样性和分叉性则可以被无穷无尽地重新界定，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确，文化分层可以将身份界限划分得如此之细，以至于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事实上每个群体或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身份。文化分层不仅可以以宗教为基础划分，还可以以其他一些标准来划分，如基于一些世俗化了的宗教理想，例如诚实、勤奋工作、抱负和自我控制（韦伯的新教伦理），或者基于在科学、文学、音乐和艺术上的成就或理解力，或者基于对装饰、服饰的良好品味，甚至可以基于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有的文化分层会在社会中得到正式确认，就像在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印度种姓制度中那样，这些仪式行为使“高级”教派中的成员避开了与曾经属于“低级”教派的成员的密切接触。欧洲的贵族等级则以他们种种讲究的礼节和爵位称号，展现了一种非宗教基础上的类似取向。

正如绝大多数人所体验到的，文化等级是这个世界的实质，但是其意义在于它是如何与其他社会秩序——经济、政治，及其相应的分层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第一，文化分层可以作为经济和政治分层的基础。新英格113兰各殖民地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教会的领袖也是政治上的权威，只有那些在宗教群体中有相当地位的人——他们只是少数——才能参与社区的治理。此外，宗教的上层阶级也把持着商业、农业

和渔业，因此也就成为经济方面的上层阶级。到18世纪，宗教、政治与经济等级开始分化，但是即使到今天，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还倾向于根据人们在信仰意义上的“可敬性”——从本质上说，也就是根据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那些残留着的新教伦理规范——来判断其地位。

其次，经济和政治分层有转化为文化分层的趋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其地位如何，金钱与权力的冰冷现实毕竟过于招摇了。社会有一种普遍的需要，要让人感觉到那些上层人物是配得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的；因此那些逐渐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就试图用文化尊贵性来包装自己。古代那些战胜的部族召来祭司以认可他们的征服，正如查理曼大帝通过战争建立起了一个王国后要让教皇给他加冕一样。到后来，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怎样获得权力的；而贵族们则宣称他们不是靠强力，而是凭借他们世袭的权利和美德来统治的，这种美德体现在他们的高贵行为准则及他们对艺术的赞助中。这种转换也发生在19世纪的强盗式金融资本家与现在的上层社会之间。

经济、政治和文化商品可以相互交易；韦伯认为，在社会稳定时期，这三类等级划分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有钱者希望能有权、有教养；有权者利用他们的影响获得财富且浸濡于高雅文化；文化精英们则试图利用他们的声望获取财富和权力。但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变迁和竞争会阶段性地颠覆原来的阶级、权力集团和身份群体的构成，我们发现，这三种等级一次次地在强化、崩溃和重组。历史就是一场持续的战斗，不只是在骑士和官员之间、官僚们与政治家之间、地主与金融家之间、工厂

主与工联主义者之间、教士与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之间，而且每个社会阶层与所有其他阶层间都存在斗争。这些分层过程不仅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而且，如韦伯所认识到的，它们启动了历史的引擎，这点我们马上会了解到。

组织：世袭制和官僚制

在考察了世界上各种社会形式后，韦伯指出人们巩固相互间关系有两种普遍方式：或者是建立强固的个人纽带，或者是建立一些普遍性的规则。当然，这两种都属于理想型。现实往往是这二者的综合，尽管传统社会的组织多倾向于个人性这一极，而现代组织则接近于抽象规则这一级。韦伯常把前一类型的组织称为家长制的（*patriarchal*）或世袭制的（*patrimonial*），而把后一类型称为官僚制（*bureaucratic*）。从广义上说，这一区分承接了韦伯的年长同事费迪南德·滕尼斯在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之间所做的区分。¹¹⁴

个体化的组织通常是从家户开始的。我们发现，这方面的例子有古代中国和亚述王朝的地主、雅典和罗马的市民，以及中世纪欧洲的男爵，他们像对待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那样经营自己的产业和行使自己的政治职能。不管是在监督农事、远行从商、打仗，还是为上级领主收集税款，儿子和兄弟是他们最可信赖的助手。仆人和奴隶就像是家庭的一部分，他们也有同样的忠诚和嫉妒的感情，效忠于同样的家族热忱。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官方财政与家庭财产之间没有界线。国王所征的税款既用于军队的开支，也用于他的酒窖；他下面的各领主们在将所征得的税

款交上去之前，要先抽取他们自己的花费和收益部分。通过主人（masters）与属从（followers）之间的链条连接，这类形式的组织可以扩展到数量巨大的人群。在世袭制中，国王将他的代理官员派去管理王国中那些偏远的地区；而后者又任命他所信任的随从到各个地区去或派他们执行其他使命；这样依次派遣直至最低级的官员，他们的任务是强迫农民交出他们的产品。前现代的贸易公司和工厂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

这种个体化的组织形式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既缺乏效率，又难以控制。实际上不存在自上而下的沟通途径，从上层发出的命令即使最终能够传达到基层，到达时也已经颇类谣言了。各项任务怎样完成几乎完全决定于所涉及的个人的能力和主动性。在这种条件下，这类组织的行事就倾向于依靠传统——做某件事时依照上次的做法以及依照人们所能记得的做法去做，因为没有其他的指示标准，做任何可能导致某苛刻上级的批评之事都是不安全的。而同时，这类组织又在不断地脱离开其创立者的控制。历史上这种情形一再出现：某个领主征服了大片领地，他将 he 最信任的从属派往各地去劫掠财物，后者又派出他们的从属。等征服者死后，有时是在其死前，中央权威就开始削弱。各地搜刮来的税收和财货只有小部分能够到达国王的手里。逐渐地，那些更有势力的领主们开始完全独立。有时，这一过程会持续到控制权分裂至最低的级别（如中世纪的德国所发生的那样）；有时会达成一种封建式的折中，在各个级别间分配权力，从而使这一过程在中途被遏止；有时此过程会由于另一次征服而逆转。

这些政治上的不利因素为发展另一种主要的类型组织——官僚制——提供了动力。国王和领主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要遏制住权力的削弱，不仅可以依靠仆从之间的相互监视（这容易使组织变成偷偷摸摸、结党营私的群体），还可以通过确立一些普遍的规则。在后一情况下，治理行为不再倚赖于属从们的判断力，制定规则者可以通过挑选、训练和核查出一些唯规则是从的人，从而控制遥远之地的政务。每个官员不再拥有对一个区域的全面权力，而是被限定在某类专门化的工作中；这样就使权力分 115 化，可以从上层进行控制。如果说各种权力滥用是源自私人财产与国王的财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划定一条严格的界线。各项任务不再是由当地的贵族断断续续地来执行，取而代之掌握各项事务的是被招录的官员们，他们以此为全职职业，领取专门的工资。

韦伯发现，在久远的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就存在着此类组织的某些因素，但其最重要的发展则只发生在欧洲，即在君主专制体制在官僚制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终结了中世纪封建主义时代之时。最早的庞大的官僚制（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之后）是 17 世纪和 18 世纪在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发展起来的，到 19 世纪，这一形式被广泛地仿效，不仅被各个政府，而且被各种工业企业，后者需要一种有效的形式来控制庞大而复杂的劳动分工。自此，官僚制化（bureaucratization）扩散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形式中——其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韦伯将其视为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潮流之一。

既然官僚制有如此的优势，为何成熟的官僚制却发展甚晚？

韦伯指出了其发展所需的一些特定的社会及物质条件。对于一个要贯彻各种专门化的规定并记录下其各种活动的组织来说，书写的发展以及一大批文字官员是必需的；要支付官员们工资，而不是用土地和劫掠物来支付的话，货币经济就是必需的；如果国王要了解边远领地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交通和通讯（道路、可通航的河流与运河，以及信差系统）的改善是必要的。物质条件的改变有助于中央管理的加强。火器的出现使原来自我装备的骑士变得过时，而有助于庞大的、官僚制化的步兵军队的兴起。同样，工业机器的发明使官僚制的工厂取代了分散的手工艺制作。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官僚制形式本身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这种形式，那么可能永远不会有对那些现代工业革新的需求，这些革新也就永远不可能被发明出来。

但是，官僚制并不理想。那些为了控制游离的骑士而创立出官僚制的国王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这套新体制正在脱离他们的控制。官僚制一旦建立起来，它就能在没有统治者的情况下自动执行各项规则，甚至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新的规则。事实上，不久统治者就成为官僚制正常运行的一个障碍，世袭君主们的权力逐步弱化，直至在革命中被推翻或退化为名义上的领袖。官僚制也并不是效率的典范。大臣与实业家们对官僚制的控制并不比国王多多少。韦伯在周遭的世界中发现了以“文牍主义”（red tape）和“帕金森定律”^①而为人所知的种种现象：官员

① 帕金森定律，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C. N. 帕金森提出的一个讽刺性公式：官僚经常按固定比率增加；消耗于内部扯皮的时间越多，人员增加越多；收入多，开支也加大。——译者

们将规则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将其视为达成目的途径；在规则和章程组成的迷宫中，很难找到能负责做出决定的人；各种组织的发展趋势是消极放任、盲目扩展、将自身的生存视为最高的价值所在。后来的一些社会学家——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彼得·布劳（Peter Brau）和米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在其研究中对很多这类主题进行了探讨。

作为一个始终关心政治的人，韦伯甚至在被认为是中性化的 116 官僚制中也发现了组织性政治（organizational politics）。正如在论述他的分层理论时我们已经提及的，韦伯揭示了个人的观点和利益是如何从其所处的地位发展而来的，韦伯也揭示了规则、章程是如何被运用于人类一直在进行的谋取权威和自治的行动中。对于后来美国社会学家视为“正式组织”中存在的“非正式组织”，韦伯则将其看作争取控制的斗争中内在的辩证组成部分。不管怎样，组织的个人化形式和官僚制形式都是理想类型，而现实往往是一种综合体。正如韦伯派学者冈瑟·罗思（Guenther Roth）指出的，聪明的管理者运用两种控制策略——结合了个人忠诚和官僚制的不偏不倚的一种混合体，派出一些具有扩散性权力的特使去完成被规则与章程所阻碍的事情。富兰克林·D. 罗斯福和约翰·F. 肯尼迪是这种综合策略技艺的大师。这两种方式都有其缺陷，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必须不懈地在其间玩法，才能真正进行领导。

政治：传统合法性、卡里斯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

政治就是围绕谁将控制国家这个社会中的镇压装置的冲突。将国家称作镇压装置只是意味着，最终诉诸暴力是所有国家所共

同具有的一种性质；而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必然在大多数时间内对其大多数国民进行镇压。民主制国家形态中，权力分化于各相互竞争的党派和独立的司法权中，因此事实上，这类国家相对来说较少具有压迫性。这或许只是一种理想，韦伯也许会同意黑格尔的论断：“历史是一块砧板，人类的幸福、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美德都成了它的牺牲品。”

政治由三部分组成：争夺权力的各个群体，作为谋求和行使权力方式的各种组织，以及将权威合法化的各种观念和理想。我们已经讨论过前两种：相互竞争的各群体存在于社会分层中，它可以是经济阶级、当前的权力集团，或者是身份群体——每类群体都力图操纵国家以扩大自己的利益。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关注经济政策、国家保护或财产控制的运动；关心自身的权力或致力于扩展某个组织（不管它是政党，还是福利机构、军队、政治势力或司法制度）的权力的运动；以及那些为某些特定的文化争取国家批准的正式地位的运动（那些关心或反对学校祈祷、堕胎、禁酒、电影的性暴露场景，以及致幻药之类事物的运动）。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了各种各样存在过的政治组织并提及了它们的一些前提和发展动力。

但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合法性的动力机制。韦伯指出，人具有物质和权力方面的利益，但他们也是通过观念和理想来看待世界的。¹¹⁷个人会像为了金钱和权力一样，为了世界观而去奋斗和献身。韦伯的观点与那种天真地将国家看作是一个精神统一体的保守观点的差异在于，韦伯认识到，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理想是不同的。按照韦伯的说法，人们既追求物质利益，又追求观念利

益，而他们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正如韦伯认识到的，社会不可能只凭暴力而得到整合。当然，一支军队可以控制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但是，在军队中，将军并不必然是最强壮的人，他甚至可以不随身带枪。那么，为什么其他人不敢违抗他呢？因为如果有一个人违抗他，而其他他人服从他的话，那么这个单个的违抗者就会被枪决。为什么所有的人不一起来违抗他呢？这是因为，如果他们要共同行动，他们就必须具有某种形式的组织，而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领导这个组织？他的权威要如何巩固？对于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谁来看守那些看守者”，韦伯的回答是，倘若其合法性得到普遍相信，组织是可以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将军的命令被遵从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服从他，而这种期待是建立在认为将军具有合法化的权威这一信念上的。

韦伯深谙历史及当前局势，这足以使他认识到，规则并不总是被遵守，某领袖或某种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消长不定的。相应地，他所感兴趣的是合法性的动力学。韦伯从历史视角提出了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第一，权威可以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一个国王之所以能够有统治权，或者是因为他的家族一直有统治权（他是这样说的），或者因为他是神所选中的，或者因为他是部族会议通过传统的仪式性方式选出来的。第二，权威可以建立在个人的卡里斯玛（charisma）上：“法书上如是说……可是我告诉你们”——预言家、英雄和那些杰出人物总是这般宣告，他们以自己的先知先觉而废除传统。第三，权威可以是法理性的（rational-legal）：由法律提供选举出合法总统和各级官员的程序，官僚制规章授予警察机关和签证官以权力。所有这些合法性形式都有其相

对应的组织形式。传统型统治者多存在于世袭制和父系家长制的组织中；卡里斯玛型领袖通常有一批个人的信徒作为随从及一大批未被组织化的跟随者；而法理型官员则存在于官僚制中。

每一种合法性的形式都既有长处又有缺陷。传统型的领导者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传统认定他们就是国王或首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当然，这不包括其他王国和部落中的敌人）。但韦伯进一步指出，政治斗争从来就不会完全缺席，尽管它有时候是处于地下状态。传统型统治者通常也会受到同样一套传统的限制，他们的幕僚、贵族和教士通过解释传统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并反对统治者的权力，在这方面，他们可通常是不遗余力的。如果他们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就必须不断地尽力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来解释传统。不过，这也存在着危险；如果他们过于扩张其权力，超越了传统的界限，他们将丧失其传统合法性。古代历史中（现代也一样）充斥着这样的事件：国王变成暴君，而这暴君终被某个候在君侧的贵族所推翻并取而代之。

118 对于有雄心的传统型君主来说，一个可能就是他将传统权威与个人卡里斯玛结合起来。但是这也存在着困难和危险。首先，一个人要成为卡里斯玛型的人物，他必须具有某些超常的个人品质。可以肯定，这类品质可以通过表演技巧和社交虚构出来，但是，卡里斯玛型领袖所进入的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舞台，他或她的表演必须达到其角色的要求，否则就会湮没无闻，而这种命运是专门为曾经是卡里斯玛型人物预备着的。每一次非常事件——饥荒、暴动、侵略或特殊的预兆——都要求有相应的奇迹出现。如果一个卡里斯玛型领袖没有能达到他的声望所要求的程度，他或

她会很快地失去合法性，让位于某个对立的卡里斯玛型人物，或者让位于一个“我告诉过你们会这样”的传统型领袖。合法性之潮流有时是以惊人的速度涨落的，如现代史上的各种政变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最后，权威可以是法理型的。但是，理性化是另一头危险的野兽。一旦这一力量被释放出来，任何个体都变得无足轻重。欧洲的君主们本想通过建立起一个完全合法的国家来巩固自己的传统权威，但最后他们发现，在一个法理型的法则系统里，没有国王的合法性。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的后代们为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权力付出了代价。理性化试图根除随意性，为每一社会行动提供一种清晰而充分的理由。以他们所掌握的法理性统治标准看，不仅是国王，而且包括政党领袖、首相、独裁者和作为个人的官僚们自身都是不合格的。每一种公开宣称其原则的统治——不管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还是美国宪法、人权宣言——都要经过其人民的判断。当然，实际的统治会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他们当初公开宣称的理想，因为他们已经掌握着强大的组织及物质资源，包括通讯方面的优势，而这些可以限定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大部分现实。但是，理想也能为汇集潜在的对立者创造出某个聚焦点（就像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作家或者是美国的反种族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运动），并在政权的权威结构由于遭遇挫败、经济危机或掌权者内讧而削弱时，在其内部构成某种微弱的联系。相较而言，传统型统治者则不用花什么力气去证明他或她的行为的正当性。因此，合法性的法理原则即使是在没有实现之处（也就是说，几乎在所有地方），仍为政治争论设立了一个基本

的情境。

韦伯的历史理论：世界的理性化

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就是被称为“现代化”的明确现象，这一过程将一个农民、地主和教士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由组织、机器和运动组成的嗡嗡作响的蜂房。韦伯在新工业经济中发现了这一变化的核心。他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解释也因此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解释，而韦伯对其根源的追索引导他去描述世界历史的社会性轮廓。

119 韦伯是从分析现代经济体系着手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预期性。如果你不能确定有一个稳定的商品市场，那么你就不能去制造大量的商品；而如果你不能持续地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你就不可能从现代机器和劳动的专门化分工中获利。另外，如果没有稳定的、可雇佣的劳动力供应可以依赖，如果在需要资本时不能在公正合理的条件下借到钱，那就不可能开办工厂。总而言之，现代工业倚赖于大型而稳定的市场、一批由经济动力推动的可靠劳动力和一个可靠的金融体系。韦伯发现，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这些前提条件是缺失的，这一系列的先决条件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始具备，现代经济才可能出现。

例如，市场过去一直主要是地方性的——农民生产出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再将剩余的东西拿到附近的市镇上进行交换或者卖掉它们。有诸多因素限制着更大市场的发展，其中三个重要的因素是：（1）运送有价值的货物的危险性，在连绵的战争与征服的时代里，强盗与贵族是同样危险的，公民秩序只存在于各市镇

内部，有时只存在于家庭内部；（2）大规模交易所需要的货币及信贷系统的普遍缺失；以及（3）对陌生人——从其他地方、其他信仰地、其他村落来的人——的不信任，这使交易成为一种狡诈的讨价还价，而商人则经常与海盗无异。

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如果没有能随着产品需求的变化而转换工作、并被所提供的相应工资吸引到最高利润领域内的工人，那么工业就不可能有效运行并在竞争中发展。（我们看到，韦伯的经济学属于经典英国传统。）但传统社会中的工人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自由的经济行动者。农民经常是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工厂工人通常是家庭成员、家族中的仆人或奴隶，被束缚在这一企业中，而不管他们是勤奋工作还是消极怠工，这都是企业一直要支付的费用。行会垄断者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供应。要在工厂系统中将产业劳力集中起来，首先必须打破这些各式各样的障碍。

最后，现代金融同样是近世才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大的王国与帝国中才具有普遍的货币系统。即使是这样，要建立起一个可靠的信贷系统仍存在种种障碍。更为复杂的信贷形式——例如股票市场——要得以产生，普遍的书写能力是必要的。只要借款不被偿付或偿付失败的风险仍然巨大的话，货币只能以极高昂的利息借出——在还没有法庭和警察来保护契约、从事任何产业都有很大风险的时代就是这样。来自国家自身的风险丝毫不少：税收反复无常，几与抢劫无异；如果一个银行家借给了国王一笔钱，他得不到任何保证能拿回那笔钱。因此，在15、16世纪，随着西班牙国王的破产，一些大型的德国银行——包括著名的奥格斯堡

120 的富格尔银行——纷纷倒闭。在这种状况下，商人的生涯是不稳定的。如果他碰巧成功了，积累了大笔财富，他不会进行再投资以扩大他的业务，而是想方设法给自己置下地产，并买个贵族头衔，由此彻底脱离商业领域。

韦伯的任务就是通过回溯历史，找出这每一个障碍是在什么地方、怎样削弱的，即确定出某个时空点，在这个点上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工业化起飞得以开始。整个过程是从遥远的古代部落社会开始的，这些社会有些是农业性的，有些是由游牧者和狩猎者构成的。宗教在他们的社会结构和世界观中占据着很关键的地位。人们几乎完全是与他们的亲属在一起生活、工作，而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是通过一套普遍的、囊括了生活所有方面的仪式而结合在一起的。神与精灵无所不在——他们在天空中、在树上，守卫着家里的火炉和门户，使家长 - 祭司 - 首领的权威合法化。与涂尔干一样，韦伯认识到了宗教在原始社会中的整合力量。

变化主要是通过政治斗争引发的。狩猎部落征服了农业部落，由此产生出有两个阶级的社会：农民和战士 - 贵族。征服的区域越来越广，各帝国兴衰更迭；开始有了国王；贵族阶层中产生了更复杂的分化；皇家管理机构（原始的官僚制）开始形成。我们熟悉的钟摆式的世界政治史开始了：过度扩张的世袭制统治分裂为封建制的统治，然后又会被一个新的征服者重新统一起来。在这些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社会里，财富开始集中。以皇家朝廷为中心，各种劳动分工开始发展起来，譬如工匠、仆人、抄写员和商人，专门化的分工是为了满足朝廷的各种品味。祭司们发展出了一套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等级体系，他们将各种战神和自

然神合并为新的综合体和万神殿。

在很多这样的大型社会（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周边的独立的城市和小国家（特别是在希腊和以色列），在公元前 6 至 4 世纪时，在宗教领域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韦伯这方面论述的重要阐释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这一变革称为“哲学突破”，开始出现伟大的世界性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佛教、希腊伦理哲学、一神论的犹太教及其后来的分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每一种宗教中，人类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系的本质发生了改变。这一转变包括将关于自然世界的观念与关于精神世界的观念分离开来。不再是神和精灵们时常干预我们处身其中的世界（就像在希腊神话中的那样），而是存在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天堂与地狱，另一个现实领地，一个理想原则的世界。

这一转变的后果是深远的。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在神和精灵的掌控之下，它就不具有可预见性。人们只能试图通过仪式、供奉牺牲来安抚那些看不见的统治者，或者试图通过魔法来控制他们。但是一旦神灵世界作为另一个分离开的领域，那么人们就可能以一种更为稳定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和社会。

首先，将各种精灵附体的实体移除后，世界开始接受理性解释。科学调查与解释之门敞开了。这一新建立起来的理性主义同样渗入了社会领域。人们可以在某些稳定而普遍的原则的基础上总结出各种规律，而不再是在各种被神圣化了的古怪传统前俯首帖耳。各种政治与社会设置也要经受理性的批判——尽管这一晚期的运用是直到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才真正开始的。

其次，宗教本身可以向新的方向发展。原始宗教只是描述了日常世界的被认可的（即使是不可见的）一面。人们取悦众神只是为了能杀死敌人或者让作物成长，人们不关心如何为善或是否能去天堂。（我们想想《奥德赛》中的英雄们或者《旧约》的起始部分。）而这一哲学突破开启了两种可能性：（1）精神领域现在可以成为人们摆脱世界的折磨苦难而逃往的地方。如果一个正直的人——一个遵循所有的仪式，并完成他或她的职责的人——在此世却遭遇不幸，从根本上说，这与此人无关。事实上，物质世界现在被看作一种危险的诱惑，因为一个真正圣洁的人唯一关心的是获得拯救。（2）善与恶的观念可以脱离现实世界的成败观念。对于原始社会的人来说，罪恶就意味着不幸，一个人只要富裕、健康、有权势，他就是有良好的道德心。这次哲学突破则将一种新的伦理职责加于人类。他们在对待人类同类时，开始关注正义与非正义，道德心能完成其自身的奖赏或惩罚。

这些新的可能性，尤其是第二种，是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潜在力量。关于善恶的新观念以及美好世界的概念，为改变现有世界使其达到这些理想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这里，我们从古代中看到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的基础，而后者在2000年之后的工业化起步中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这一哲学突破对于宗教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它们都是普世主义的（universalistic）。早期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家庭、一个部落或一个族群的成员之间。而世界性的宗教是在帝国内和帝国周围产生出来的，它带着无穷的征服野心，不拒绝任何人。的确，更早期的宗教是宽容的，它们设想的世界是有很多人的多元世界，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守护神。但是在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中只有一个神或精神实体；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幻象的、低级的。这一转变是很重要的，因为宗教标志着社会团结的边界。在原始的和传统的社会，人们是与那些同属一个宗教共同体的人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能够也必须信任那些崇拜同一个家族神或部落神的人。而那些陌生人——信仰其他神的人——则是异族人，是不可以相信的人。这一观念的一个后果就是对高利贷——为了利息借钱给同一信仰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广泛禁止。而在此群体之外，人们可以尽可能地以残酷无情的方式与异邦人讨价还价，因为对他们是不用担负什么伦理义务的。因此，将一种宗教普世化可以迅速扩大共同体的范围，而在共同体内则得以依照规则进行和平的社会交换。

这一哲学突破在很多方面开启了工业化之门：为作为和平 122 商业活动基础的道德共同体奠定了基础；使法律体系理性化；激发人们重新制定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以回应将社会转换为更趋近理想状态的要求。但这些效用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世界宗教都为社会的转型开启了正确的道路。

韦伯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一主题的。他通过细致的研究，在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所组成的复杂织锦中只抽出了一根线——宗教信仰在激发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商人发展资本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韦伯指出，现代资本家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对经济获利的动机；在世界历史上，这种获利观念在其他地方都有，但却没有导致大规模生

产经济。相反，依照规则的循序渐进态度对于大规模的营利体系意义重大：不断积累起小笔的积蓄和利润，逐渐扩展成长期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最后积累到无比巨大的利润，而这是那些做一锤子买卖的贪婪商人永远也无法获得的。韦伯认为这种循序渐进的“理性化的”态度首先是在另一个领域中出现的，即宗教改革不久后，那些最激进的新教徒的宗教观念。这些人多数是加尔文的信徒，他们主要分布在商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如荷兰、法国、德国，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他们不相信能够通过祈祷、施舍和宗教仪式而获得拯救，他们相信上帝是一种全能的、公正无情的力量，他已经选定了什么人将获得拯救，什么人将永远受罚。韦伯声称，这种命定观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是使其信徒处于一种极大的压力中。我是否已获得拯救？任何特别的宗教行为对此都无济于事；牧师与僧侣并不比其他人高明多少（而且还可能更糟，因为他们可能不做诚实的工作）；这些激进的新教徒于是排除了僧侣们，尽量将这些人视为与俗人无异。那么，一个人所能够做的，就是工作——勤奋地、循序渐进地、不汲汲于利益但一直奋力前进，直到达致成功。通过成功，他们才感觉到自己适应了上帝的预定安排，感觉到他们是被上帝选中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激进新教徒的宗教信仰就帮助产生出了成功的资本家所必需的态度，并由此促进了工业革命。

这一被称为“韦伯命题”的理论自其1904年首次面世以来，一直引发着正反两方面的争论。不幸的是，这一命题太过出名，以致很多学者在试图反驳（或支持）它时，却不了解他后来对其他世界宗教的研究，以及他的普通社会学，在这些研究中，他把

宗教观念与组织形式、身份群体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看。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被狭隘地理解为是在论证观念决定了社会变迁。也许它如此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明确地反对马克思的观点，提出宗教是物质状况的原因而不是相反。这一姿态经由帕森斯而特别在美国得到发展，后者 1930 年翻译了《新教伦理与 123 资本主义精神》，而韦伯的其他主要著作的翻译则在数年以后。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对韦伯的真正贡献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韦伯对激进新教徒信仰的研究只是其对近代西方宗教史的一个初始分析；之后，他对各大宗教及其社会效应进行了宏大的、世界性的比较研究。韦伯完成了《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和《古代犹太教》；他还没来得及开始其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就去世了。他的普遍性结论是，只有发生某种特定的突破——希腊哲学中的伦理和科学理性主义与源于犹太教的尊奉律法之观念和正在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义（activism）结合，共同组装出了基督教——才能为社会机制的理性化和使世界在经济、政治上发生现代性的剧变提供动力。而他发现，儒教、婆罗门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以某种方式与世袭分层制交织在一起，从而加剧而不是削弱了其社会的不可预期的、非理性的那些方面。

在欧洲，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基督教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真正理性化的官僚制组织——的兴起以及它带着罗马帝国的遗迹不断获得巩固，它自身就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被合法地理性化的。在稳固与分裂之间来回摇摆的古老政治钟摆还继续在摆动，但已经接近它在历史上单调循环的尾声了。到 16 世纪，国王们开始建立了官僚制度——神父们是他们最初的官僚——而

这将逐步摧毁分化的、相互冲突的封建体系，建立起一套具有预期性的法律体系和可信的货币体系，使和平和秩序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并使正常的税收政策得以实行。商业扩展开来了，机械发明有了需求并被发明出来，手工业工厂发展起来了。西欧已到了工业化的边沿，阻碍它发展的因素只剩下两项：政府试图建立垄断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封建体制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

这些最后的障碍在英国被摧毁——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西欧国家中，封建贵族在与国王的斗争中是最获成功的，而且皇室的专制主义也是最没有发展起来的。17世纪的内战之后，小贵族阶级控制了国家的官僚体制，并利用它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农民与土地脱离开来，由此为纺织业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他们制定了一项经济政策，取消对竞争的限制。这场战争是由激进的新教徒发起的，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新教徒认为工作、诚实及遵守规则是上帝的戒律，他们也更强烈地受到关于天堂与地狱的理想世界图景的驱动。他们何以在这个历史上最有利的时候出现现在还不太清楚，但他们所承继的传统是很清楚的：他们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的精神，进而实现了对古代思想的宗教性突破中所包含着的改变世界的潜力。

124 一旦工业革命全速运行起来，其进展是不可预料的。新的社会阶级出现了，政治从作为军队贵族和朝廷小集团的专有领域转变为群众运动和官僚体制操作的对象。科学、教育、大众传播都获得了释放，一次次地改变了社会分层和工业的性质。英国在财富和世界霸权方面直线上升。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不管如何害怕现代化对于他们赖以依靠的旧秩序将产生的毁灭性后果，为了保

持军事方面不致落后，不得不仿效英国；否则他们将面临沦为那些已现代化国家的殖民地的危险。

站在智力的制高点上，韦伯看到了几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全景图。他将此过程称为“*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世界的除魅，历史发展的主潮流。理性化一步步坚定地把不确定的、神秘的和诗意的东西击退。人们曾一度透过面纱——仪式和典礼、女神和吐火龙、日常生活中无数可怕的意外——来理解世界；现在，每天开通的火车就可以把游客带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①的城堡中。甚至敬畏上帝的新教徒企业家也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雇用的官僚。现代体制一旦建立，它就开始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了。但新教伦理并没有消亡，它只是被世俗化了。其精神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每一种体制中，存在于被严格控制的人们的人格中，他们在一个充满规则、成绩考核和政府安全的世界中工作。在美国，文化之战中出现的分裂现象——一边是深深根植于新教伦理的白人中产阶级，一边是黑人，他们的文化不属于新教伦理的范畴，其结果是他们总是处于社会的低层——正表明韦伯的社会学击中了要害。没有谁像韦伯那样清楚地认识到“死去的宗教信仰的鬼魂”仍萦绕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的。

从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看，韦伯首先也最主要是一个政治人。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活跃于柏林的法院和政府机构。他对经济的兴趣开始是由改革派委派给他的工作而激发起来的，此项工作是研究东普鲁士的劳动力迁移问题和股票市场的操作

① 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地区，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经常被描述为神秘事物发生之地。——译者

问题。他开始时持与他父亲一样的忠诚于帝制的上层阶级立场，但随着他越来越了解下层阶级的困苦，他逐渐转向同情左派。尽管如此，他对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不抱幻想。他将社会主义乌托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用它来统一其追随者；他同意他的朋友罗伯特·米歇尔斯关于政党政治中“寡头制铁律”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看到现代经济——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的官僚制特征。韦伯在1905年俄国革命夭折期间开始关注俄国，为了能直接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事件，他开始学习俄语。他的分析非同寻常地预见到了俄国的苏维埃时期。他预言，如果俄国在一场重大的欧洲大战中失败，而且革命的左派掌握了权力，那么俄国将经历一场整个世界还未有先例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官僚制化。联系到韦伯关于在官僚制下的生活质量的观点，他的预言不管怎么说都不是乐观的。“官员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在行进途中，”他写道。

德国的境况也没有显示出更美好的前景。当韦伯观察到德国不恰当的外交政策使其丧失了盟友、孤立了自己，同时又在发动军备竞赛和发起日益喧嚣的民族主义的自吹自擂活动，他对传统的民族主义日益心生幻灭。他将此归结为德国的政治结构：无能的国会没有能力控制不负责任的国家官僚体制；军队里充斥着只顾自己利益、傲慢自大的过去时代的贵族；愚蠢的世袭君主所推行的政策使整个国家陷入到其所造成的后果中。1890年代，韦伯参与了创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党的活动，但后来当其显然没有成功的希望时，他退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多年来的紧张得以释放，韦伯觉得轻松了。在战争开始时，他充满热情。“不管怎么说，”他声称，“这是一场伟大而杰出的战争。”作为一个 50 岁的预备役军官，他应召服役，成为海德堡地区军队医院的指挥官。一年后他退役，之后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尽可能使用他所能施加的政治影响以结束战争。在最初的热情消退后，韦伯很快认识到，德国的军界和政界领导层没有能力实施使德国获胜的政策，战争的拖延只会导致德国——确切地说，是欧洲——的权力的崩溃，世界的霸权地位将转移至美国。1918 年，他对皇帝的最后一点忠诚消失殆尽，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倡议战后德国应制定一部民主宪法。

旧式统治的衰落似乎从韦伯肩头卸下了一副个人的担子。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他担任了德国的代表——期间，他写到，这么些年来他头一次晚上睡得很好。他甚至克服了不能教学的障碍，接受了慕尼黑的一个教职，他在那里对众多的学生、知识分子和社会显要做演讲。政治机会突然来临，韦伯成为了一个新成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党派的领袖。尽管他是个极端现实主义者，他仍看到了一线希望。政党可能会成为腐败的寡头集团，但只有通过国会上的自由竞争，有能力控制顽固的国家官僚体制并为国家制定明智政策的领袖才能得以产生。

但时不待人。1919 年韦伯患上肺炎，于第二年 56 岁时去世。他的政党崩溃了；德意志共和国遭受了第一次经济和政治危机，类似的危机它今后将经历多次。负责尽职的领导层没有产生，不负责任的头脑们则已聚集在了慕尼黑的露天啤酒馆。韦伯在他著

名的晚期系列演讲中曾告诉他的学生，政治是一项危险且有道德负重的职业。理想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一样，都会陷入于他们行动时远未预料的结果之网中。只有理想是不够的，它必须配之以
126 坚韧的现实主义、同情式的想象和百折不挠的责任感。以下这段话可以说是为他在知识领域的成就，同时也是为他在政治领域的失意写的碑铭：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模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并不必然可得，除非他能执著地追求那些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到这点，而且他不仅应是领袖，还应是英雄——在这个词最为朴素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有一颗坚韧的心，以便能勇敢地承受即使是全部希望的破灭。现在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毫不气馁；尽管面对这种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①

①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128.【此段引文的翻译参照了冯克利先生的译文，见《学术与政治》第1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译者】

第八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非理性的征服者

当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摩拉维亚的 127
弗莱堡出生时，20 世纪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还没有爆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要在 3 年后才出版，而爱因斯坦的出生则是 23 年之后的事。这时的西方文明还没有受到震动。欧洲还在享受着一种并不安稳的和平，而美国正处在内战的边缘。

在现代时期，弗洛伊德已经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传奇性人物。他是作为心理分析的创始人被铭记于世的，这是一种理解人类动机的方法和治愈人的精神的技术。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将自己表现为一个科学家，但是他给启蒙运动以来在知识界占支配地位的理性科学大厦爆破出了个口子。那个时代的社会哲学家，包括孟德斯鸠（Montesquieu）、狄德罗、达兰贝尔（d'Alembert）、卢梭、孔多塞和杜尔哥，都完全赞成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社会是由

理性的动物构成的这一断言。这些哲学家都认为，自由的、理性的人类正从数世纪以来的蒙昧、恐惧和迷信中浮升出来，进入一个理性的、科学的和具有无限发展的光明的新曙光时期，而这种观念正是社会学的奠基者们试图运用于实践中的。人类，这一社会的推动力量，将由理性知识引导，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想象努力去改造世界，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

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在于他系统地发掘出了普遍存在但隐藏着的人类无意识的内容。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他探索了精神的深度，揭示出了人类本性中非理性的一面。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存在着的一个矛盾：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和理性的个人，他的发现却要宣告理性时代的终结。18世纪哲人们的启蒙之梦在弗洛伊德这个启蒙运动之子的手中终结。西方人不再确定并幼稚地相信理性能解决群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弗洛伊德揭示出，个人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是受诸如“性本能”和“被压抑的愿望”之类情感力量驱动的。

128 尽管无意识并不是由弗洛伊德发现的，但他是第一个给这一原来是空洞的形式添进内容的人。自从1859年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无意识的哲学》出版以来，无意识的观念就一直在德国知识界中酝酿。但形而上学者冯·哈特曼并没有声称要探求无意识的起源，相反，他只是通过抽象的推论过程来证明无意识的存在，他发现“意愿”（will）和“智力”（intellect）[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本我”（id）和“自我”（ego）]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在西方思想史上，这一观念也不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它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远的时代。关于人类无意识

的观念在早于弗洛伊德 2000 多年前的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就埋下伏笔了。

早期生活及工作

在孩童时代，弗洛伊德是他在维也纳家庭关注的中心。他母亲对他极其钟爱，甚至只是因为十岁的西格蒙德抱怨说钢琴声打搅了他的学习，就中断了他妹妹的钢琴课。弗洛伊德是个小神童，他八岁时开始读莎士比亚，后来迷上了梯也尔（Thiers）的《执政府和帝国史》。他在青少年时代是个英雄崇拜者，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将军。他对拿破仑的传奇史极其着迷，在自己的玩具木头战士的背上贴上写着这位皇帝的各大元帅名字的小标签。

弗洛伊德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从高中毕业。在斯帕尔高级中学（Sperl Gymnasium）的八年学习中的后六年里，他一直是班级第一名，而且享有在班级中几乎没有被提问过的特别地位。他的职业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作为维也纳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他可选择的职业有工业管理、商业、法律和医学。他的智力倾向排除了前两种，他考虑是否选修法学。虽然他没有觉得医学对他有直接的吸引力，但他对直接关注人的所思所想比对自然事物有更强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一直推动着他。这是个犹豫不决的时期。一方面，他受一位校友（此人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政治家）的影响，后者建议他学法律；另一方面，他又被当时备受关注的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所吸引，这一理论有望在理解世界方面引发出非同寻常的进展。

最终使弗洛伊德决定进入医学领域的是他听了一场戏剧朗

诵会，朗诵的是歌德的一篇关于自然的散文。那位大师对自然的浪漫描绘为弗洛伊德年轻的理想主义确定了方向：歌德将自然描绘为一位慷慨的母亲，她赋予她心爱的孩子们以探索她的秘密的特权。弗洛伊德逐渐相信，力量的秘诀在于理解而不在于强力。在 19 世纪后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吹拂下，他开始质疑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人类与其自身的关系。

带着父亲的祝福和财政支持，1873 年秋天，弗洛伊德开始了他作为维也纳大学医学学生的职业生涯。他每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25 小时以上，包括听课和在实验室工作，他涉及的领域很广泛，有解剖学、化学、植物学、显微镜学、矿物学、物理学、光谱分析、生物学、历史学、亚里士多德派的逻辑学、生理学和动物学。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天才由此不仅养成了勤奋工作和自律的习惯，还获得了坚实的科学知识背景。在此学术成功时期，弗洛伊德也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智力天分的能力和局限。他也认识到了摩菲斯特^①那句格言的真意：“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

1876 年，弗洛伊德首次获得了一笔基金用来研究鳗鱼的性腺结构，他由此在恩斯特·布鲁克（Ernst Brücke）的生理学实验室中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家。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布鲁克既是他学问上的导师，也是他行动的楷模。他是科学研究者的榜样——坚定、自我克制、遵守规则。这位带着普鲁士口音的严峻的德国新教徒教授代表着弗洛伊德以往熟悉的维也纳的“马虎的思想家”

① 欧洲中世纪浮士德传说中的主要恶魔。下一句他所说的话出自歌德的长诗《浮士德》。——译者

(*schlamperai*) 的对立面。

布鲁克的生理学研究是属于医学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赫尔姆霍茨学派 (Helmholtz school) 科学运动的一部分, 他的教学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学派的创立者们 (他们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 朝气蓬勃地立下誓言, 要坚守以下原则:

在有机体内, 没有什么别的力量比普遍的物理 - 化学力量更为活跃。如果某些情形当时还不能用这些力量进行解释, 那么我们或者可以通过物理 - 数学的方法来发现其行动的特殊方式和形式, 或者假定在事物中内在地存在着某些在地位上等同于化学 - 物理力量的新的力量, 它们均可化约为吸引力和排斥力。^①

到 1870 年, 这一思潮在德国心理学家和医学教师中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它激发了各地的研究。

赫尔姆霍茨关于世界的 19 世纪中期式的机械观念, 即将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化约为吸引力和排斥力, 被布鲁克吸收到他的《生理学讲演录》(1874) 中。学生弗洛伊德被他老师关于物理生理学的论述迷住了。布鲁克将生理学定义为关于有机体的科学。他区分了有机体 (organisms) 和机械 (machines); 认为后者只是运动着的死的物质实体, 而前者拥有吸收同化的能力。但是, 二者都被认为是物理世界现象。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有机体和机

① Ernest Jones,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edited and abridged by Lionel Trilling and Steven Marcu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3), p. 29. 转载已获得纽约基本书籍有限公司 (1961) 许可。

械都同样是由原子体系构成，受各种力量的驱动。在科学中，真正的起因经由“力”（forces）这个词而被抽象化。布鲁克声称，130 科学家们对这些起因了解得越少，他们就越需要区分众多的力：机械力、电力、磁力、光力、热力等等。而知识的进步可以把这各式各样的力化约为两种——吸引与排斥。布鲁克将这一推理扩展到人类有机体。他将这一 19 世纪的人类意象结合进他的两卷本论述中，其中主要论述的是生物有机体内的物理力量的相互作用。弗洛伊德 1926 年关于心理分析的动力特征的描述表明他深受这一观念的内容及精神的影响，他将心理分析的动力描述为相互促进又相互抑制、相互结合又相互妥协的力量。我们将要看到，他关于人类的意象带有很深的机械观的印记，这是他在学生时代在布鲁克的研究中所受到的影响。

借助于精确持久的记忆，弗洛伊德在 1881 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他最后的医学考试。这一年，他对西奥多·梅内特（Theodor Meynert）关于精神病学的演讲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因为后者不是采取实验室方法来研究医学的。尽管在职业选择方面弗洛伊德一直希望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但他缺乏要获得医学博士所需要的稳定的财政状况，因此他接受了布鲁克的建议放弃了这一雄心。他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在那里，他获得了在外科、内科、皮肤病学和精神病学方面三年的经验。

1886 年他与玛莎·贝内斯（Martha Bernays）结婚，婚前一年，29 岁的弗洛伊德开始追求得到专业方面的承认，以便他能建立一个私人诊所并开始组建家庭。他发现可卡因可作为局部麻醉剂临床使用，他希望这一发现能使他获得初期的声誉。他把自

己当作天竺鼠进行实验，发现可卡因可产生愉悦感和持续的欣快感；它提升了他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进行高强度脑力劳动的能力。虽然可卡因有助于他控制自己意识的内容和意识的流动，但他过于关注这一麻醉药的魔力效果而不是其医学特性，这使他的发现缺乏可信度。一位年轻的同行卡尔·柯勒（Carl Koller）因开创性地在敏感的眼睛表面使用可卡因而获得声望，而弗洛伊德还有待证明自己的价值。

梦的解析

在弗洛伊德之前，精神病学领域相对来说还是片处女地。¹³¹法国的伟大科学家让·夏尔科（Jean Charcot）和他的学生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通过他们对催眠状态和歇斯底里^①的研究而在这个领域建立起了一块独立的阵地。夏尔科——弗洛伊德1885年至1886年曾跟随他学习——与雅内的关系类似于圣西门与孔德的关系。圣西门和夏尔科是灵感型的思想家，而他们的弟子，孔德和雅内，则是将其思想系统化的人。是雅内深入研究了歇斯底里的精神过程，他根据19世纪末盛行于法国心理学界的遗传理论，认为这一病症是神经系统退化的一种形式，它表现为一种天生的“虚弱”。在弗洛伊德对精神病学的开创性研究之后，精神疾病的各种形式（包括歇斯底里）逐渐被认为主要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尽管机体器官的因素可能与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人们对遗传在精神疾病中所发挥的幕后作用仍不甚明了，即使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研究之后。

① 歇斯底里可简略地定义为精神焦虑的体验和/或没有明显生理原因的身体疼痛。

1900年，随着《梦的解析》的出版，弗洛伊德开始由默默无闻而崭露头角。他已经在维也纳从事了10年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1897年，他开始进行一项艰难的自我分析，这使他对病人的抵制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并为他的心理分析体系奠定了基础。他的革命性科学工作首次以一种广泛的、系统的方式检验了以往未被怀疑过的一种观念，即认为梦的基本动因就是愿望的实现。这个非理性的征服者开始在一个未被探索的土地上掘矿了。

他对这块隐秘大陆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发现了人们既渴望又憎恶的“肮脏的小秘密”。尽管这对于低层阶级的人来说并不新奇，但对于当时的中产阶级及上层阶级，包括他们中间博学的科学家和学者来说，这样一幅关于他们自身的图画则让他们大为震惊。在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客厅里，即使只提及弗洛伊德的名字也会被认为是极为无礼和下流的。上流社会仍延续着19世纪欧洲智识界领袖们的观念，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最高峰。19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中的社会进化思潮，包括孔德、弗雷泽（Frazer）、摩尔根（Morgan）、泰勒（Tylor）和斯宾塞的著作，都认为现代欧洲在文明上优越于那些他们称之为野蛮的或是原始的人群。这些现代的欧洲人，安全地待在他们的客厅里，谈论着被他们模式化了的土著原始人，在他们眼里，后者是一群全身涂着图画的野蛮人、敲着鼓的食人族、性关系杂乱的乱交者。由于19世纪有一种将维多利亚式的绝对道德转换成遗传类别的趋向，欧洲人逐渐相信他们在种族上优越于非洲黑人这一神话。后者被认为是次人类的（subhuman）、反常的和性滥交的。而弗洛伊德通过他对上流社会夫人们的个案研究和对梦的分析搅碎

了欧洲的这一神话，他的研究表明，在“正常”与“病态”之间的道德屏障几乎是不存在的，性的潜在作用远比任何人所愿意承认的要更为巨大。

压 抑

弗洛伊德在这一领域的最伟大的发现是发现了压抑现象。¹³² 精神分析的整个结构就是建立在人类中存在的压抑的基础之上。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那些散乱的思绪、梦、随口滑出的只字片语、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和各种日常过失都具有当事人并不知晓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能表达出某种意图或目标）。这些就是他称之为“无意识观念”的东西。那些接受心理分析的个人之所以进行抵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无意识观念会威胁到他们已确立的自我感。个体对他或她实际存在的观念和愿望的拒绝就是压抑。压抑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些事物处于意识之外，其结果就是个体拒绝承认他或她的本性中实际存在的东西。

在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中，弗洛伊德将精神装置划分为三个部分。他将无意识比作前厅，它包纳着各式各样的兴奋、欲望、念头、驱动力和本能。这些因素都争拥着想要获准进入第二个更小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的是意识。有个看门人或者说“审查员”站在这两间房间中间，也就是前意识（preconscious）的客厅中。这个看门人仔细地检查那些要求进入的各种念头和兴奋感，那些在门槛边被打发回去的念头和感觉就被压抑了。弗洛伊德在大量的临床个案中发现，压抑总是出现在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意愿和欲望之处。而且他发现，这种冲突发生的场合几乎毫无例外地与性有关。

弗洛伊德讲述了一个女孩的例子，她为她姐姐的去世而深感宽慰。由于她没有从意识层面认识到自己对已故姐姐的嫉妒——后者的丈夫现在可以娶她了——这女孩变得歇斯底里。她压抑了自己的这一想法：“现在他是自由的了，可以娶我了。”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她得以回忆起这一想法，并重新产生出了她在姐姐去世时所体验到的强烈的兴奋感。在一次情感爆发中，她的意识突然认识到了被无意识压抑了的那些东西。通过重新体验过去所经历的创伤，她治愈了自己。

接下来是弗洛伊德最尖锐的洞见：那些拥有最高尚理想的人往往会是最极端地压抑了强烈的攻击欲望和性欲望的人。这个建立在对其病人的观察之基础上的经验性概括暗示出，理想是建立在压抑的基础上的，其活力取自那些被压抑的情感本身。总之，新教伦理中那些信奉拘谨、诚实、勤奋工作以及服从权威的人们的能量张力源自交织于他们自身之中的爱与恨。弗洛伊德后来引用了伍德罗·威尔逊^①的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作为这种性格类型的例子。

他的第三个发现直接从压抑理论推导而来，就是认为儿童有性生活。儿童是有性意识的生物这一似乎很明显的观念如此激怒了他的同时代人，他遭到了他们的放逐。但弗洛伊德坚持他根据经验得出的这一结论。在对梦和神经官能症状进行分析时，他发现它们都包含一个内核，即表现出对早期童年经历的回归。因为

133 设定了无意识的存在，接下来的结论就是，儿童是逐渐在学会压

^① 威尔逊 (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 美国第 28 任总统, 民主党人, 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 获 1919 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抑其情感的。一方面，他们是天真和未受压抑的，他们的无意识和意识还没有分开。那时他们还能自由地满足他们玩弄自己的口腔、生殖器和粪便的愿望。只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儿童逐渐内化了其父母关于洁净、得体和秩序等的观念价值后，儿童才学会如何举止“得当”，学会如何使自己适应社会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解释体系

在其职业生涯中，弗洛伊德创立了几个解释体系：（1）初始过程和次级过程（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理论；（2）性发展阶段理论；（3）里比多（libido）理论；（4）人类精神机制的三位一体理论；以及（5）性爱本能对立于死亡本能的理论。虽然每一理论都不能脱离其他理论而独立自足存在，但为了分析的目的我们可以分别对其进行讨论。弗洛伊德的思想之锦是由许多丝线织成的，为了拆解开这个整体，我们最好是按照从早期到后期的体系顺序来进行论述。

初始过程和次级过程

弗洛伊德最早的体系以压抑行为本身为起点，他用“初始过程”和“次级过程”来解释压抑，前者通过各种愿望、象征和幻想表达出来，而作为我们的社会化了的意识的次级过程则审查和控制着前一过程。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用来或指涉思维的方式，或指涉控制能量的方式。弗洛伊德认为，人类通过经历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从由无意识系统和变动无常的本我（id）本能所统治的初始过程转换到了由意识系统和自我要求所控制的次级过程，从

而超越了其动物性。尽管初始过程持续到了成年阶段，但已成熟的自我能够通过否定满足感、限制愉悦、努力去达到理性目标以及远离非理性的情感等方式来控制孩子气的本我。弗洛伊德把这种精神上的动态转换描述为从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换。人类超越了只寻求本能满足的阶段，发展出了理性的能力并学会了检验现实；他们开始做出各种区分：好与坏、真与假、有用和无用，而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人类于是从寻求快乐的婴儿转变成了处于社会体系——这一体系要求他们以各自的经济角色行事——中的有意识、有思想的主体。当然，他们也还可以自由地拥有一种幻想性的生活，但他们最终必须将心智服从于现实的原则（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服从社会的准则，并按照其价值观生活）。他们也许会做奇奇怪怪的梦，有各种怪异的想法，产生一些非理性的愿望、一些强烈的渴望或者是不道德的幻想，但他们不能让这些想象跑得太远，也绝不能让它们排斥外部的现实世界。举个例子来说，詹姆斯·瑟伯^①所钟爱的一个笔下人物沃尔特·米蒂幻想自己是一个著名的脑外科医生，正在对一个百万富翁的银行家实施一场关键的手术，而这个银行家是罗斯福的亲密朋友，要不是停车场的服务员冲他大声叫嚷让他停车，他可就要撞上一辆别克车了。

134

性发展的各阶段

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一个人的最初五年的经历对他

①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美国幽默作家、漫画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幻想小说《十三座种》以及《瑟伯画册》等。——译者

将来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就是在这一阶段，铸就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塔尔科特·帕森斯后来将此解释为儿童在此阶段通过认同于父母的价值观而获得了一种超我（superego）或曰道德心。因为父母是社会的文化代理人，儿童将从他们那里学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果文化价值观是成功取向的，如美国的情形，那么孩子就会被鼓励通过个人努力去获致那些值得获得的目标与成就，诸如地位、权力和威望。获取各种商品——从肥皂到地位——的愿望就这样在个体幼年时期由社会植入了他们的观念之中。

通过观察各种病人和他们的各种神经官能症，弗洛伊德提出了性心理发展的五个相互重叠的阶段模型：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和生殖期。在最早一个阶段，婴儿通过吮吸母亲的乳头而获得满足。口唇的敏感区域最先在获取性愉悦中发挥作用。在此口唇阶段，或者说同类相食（cannibalistic）阶段，不具备道德感的婴儿还不能将获取食物与性行为区分开来。吮吸的目的在于将客体（母亲的乳头）与其自身结合起来；它还生活在初始过程中，寻求直接的满足，还没有发展出次级过程，而在后一过程中它将把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并区别开主体与客体。婴儿就是世界，它与环境融为一体。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婴儿开始有咬的动作，它进入了口唇-虐待期。它开始客观化地看待事物，将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虽然它还不知道那些事物的名称，但它已能确定诸如乳房、乳头、毯子、嘎嘎作响的玩具这些物体的位置。它面对着它的第一个明确的“他者”——母亲。它开始磨练它刚长出的牙齿，通过抓握物体，将它们塞进嘴里咀嚼的方

式来探索世界。它是用咬还是吸的方式来进行是不确定的、随机的。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最初的不确定性，就是爱与恨这两种极端感情的原型。

在里比多形成的肛门阶段，儿童将注意力集中在肛门上，将其作为获得满足感的来源。儿童开始对自己的粪便着迷，以玩弄它们为乐。粪便被视为它自身的扩展，而不含有任何好或坏的含意；它只是中性的废物。儿童通过母亲给他换尿布的行为，逐渐认识到粪便是不好的东西。不管是多么慈爱的母亲，这一日常琐事都是件相当不令人愉快的工作。而不能自立的婴儿对面部表情和触觉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差别也具有很高的情感上的敏感度，它看到并感受到了在做这项日常工作时母亲的嫌恶态度。这一婴儿的早期记忆痕迹和心灵上的烙印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粪便成为了否定性的，在孩子的意识中，它与臭的、脏的、“坏的我”联系在一起，而洁净的“好的我”则因为没把衣服弄脏而获得父母的微笑和口头夸赞。如厕训练是个体文明化的开端。社会与压抑的种子通过教导孩子进行自我（也就是排便）控制而播种下来。

在性心理发展的性器阶段，个体发现生殖器的性敏感地区是获得愉悦感的来源。男性的阴茎和女性的阴蒂成为获得性快感的最重要的器官。弗洛伊德了解到，孩童时期最初的性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目标性的，或者说是“自体性的”（autoerotic）。而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就是性器阶段，因为在此阶段开始出现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正是在此阶段，性驱动力的对象开始稳定地指向一个外在的事物。弗洛伊德追溯到了

希腊俄狄浦斯王的神话，在那里发现了他的临床诊断的原型，弗洛伊德将其理论化为男性渴望得到其母亲而仇恨其父亲。（而对于女孩来说，他认为这一过程是相反的。）男孩解决这一冲突的方式是压抑他想杀死父亲的愿望，并将自己等同于他，将父亲作为个人的自我理想。从此，这个内化了的父亲（或者说超我）在每当他想干什么违禁之事时就使他产生负罪感，以此作为惩罚。外在的惩罚者开始在孩子的自我意识内部扎下根来。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5至12岁的潜伏期，性的兴趣被掩盖了起来，在性发展的成熟阶段或成年阶段的青春期重新出现。在性器阶段至青春期期间，儿童从他最初的社会环境即它的家庭和学校中，学习如何将性的感觉导入为社会可接受的行为。

尽管弗洛伊德假定俄狄浦斯情结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但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文化观察者的民族志工作证明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概念的确为研究人类的学者在理解个人从束缚状态到自由状态的进展方面提供了某种启示。只要个体仍然以一种感情依赖的方式依恋于父母，那么个人的独立就还没有实现。由于在满足感上存在各种冲突，弗洛伊德将他的包罗万象的神经官能症理论建立在对俄狄浦斯阶段或前俄狄浦斯的某一阶段的聚焦之上。此外，一些个人在成年时期受到的创伤可能导致暂时性的、对早期满足模式的神经性压抑。

里比多理论

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的意象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机械论偏见。对于弗洛伊德以及他同时代的其他中产阶级思想家来说，人首先

是被视为孤立的和自足的。他们在这个他们所不了解的世界中是孤单的，他们发现自己像霍布斯（Hobbes）所想象的原子式的个体，被处于同样困境的其他人包围着。19世纪的城市中的个人已被从土地、炉灶和共同体的中世纪背景中连根拔起，是日用品的需求驱使他们来到市场，在市场上他们与其他需要他们所卖东西的个体和卖给他们需要的东西的个体相遇。社会的黏合就存在于这种互利的交换中。在亚当·斯密所说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们在广阔的生活股票交易大厅里，为获取物质利益而不择手段。我们将会看到，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是用心理学术语，而不是经济学术语，表达了同样的观念。

法国的贵族文学家拉梅特里（La Mettrie）在1748年令人信服地指出，人是一种复杂的机器。虽然弗洛伊德也许从来没有读过拉梅特里，他却的确延续了这一主题。弗洛伊德的机械化的人是受里比多（基本的性能量）的驱使的，并受到将紧张感减弱到最低限度之需要的调节。人们通过释放和减弱身体组织的紧张感和避开痛苦而获得愉悦感。安乐状态的指示标志就是处于狂喜与压抑之间的温和状态。男人和他们呆板的新娘之所以相互挑中对方，只是为了相互满足他们的里比多需求。但他们在根本上还是相互疏离的，就如市场上的买主与卖主一般。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但他们仍处于对立的两个磁极上，永远不可能超越他们的孤立状态。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天性从本质上说是侵犯性的和反社会的，人之所以成为社会性的动物只是因为需要满足贪婪的里比多需求。

里比多被认为具有特定的数量，且依照客观规律，在此意义上，里比多这一概念本质上是披上了心理学外衣的19世纪的经济观念。人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去花费它，但它一旦用尽就不能恢复。弗洛伊德以同样的方式将爱情看作一种财产或资本。爱情被视为一种贵重的商品，应精明地对其进行投资，而不能只是对每一个陌生的路人零碎分撒。于是，在精神分析的精英圈子之外，弗洛伊德对无私之爱的可能性不抱希望；他嘲笑“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的戒律是荒谬的。

自我、本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的成熟体系是以精神地图的三元素概念的面貌出现的。自我（ego，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本我（id，情感的或本能的动物）和超我（superego，认同于社会理想）被描述为人精神中动态地相互联系着的区域或“精神方位”。这三个概念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诊断类别，而不是可以分别观察到的实体，也不是大脑中实际存在的某部分；相反，它们是相互作用的精神原则，通常是以混合形式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原始的本我驱动力会投注在（或者说“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对象上，如母亲、父亲或自身。精神机制的无意识系统将这些对象投注结合起来，成为个人正在形成中的性格结构的基石。

自我是一种精神运行的结构或组织，通过它，人保持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它体现着理性的观点，限制着非理性之本我的无节制的激情和冲动的欲望。自我既抽取本我的能量，又作为本我的代理人。那些层出不穷、写给单身男女看的“行为技巧”之

类——怎样最巧妙有效地找到配偶或诱惑异性——的书就体现了这一点。

超我是作为自我的一项功能出现的。它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担任仲裁，甚至惩罚自我。超我是一个内在的法官，它运行于人类的各项事务中，代表着社会的道德要求并强化各种权威的理念。

这个三重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弗洛伊德的论文《群体心理学及对自我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社会团结和社会分裂之基础提出了一个解释。弗洛伊德将勒庞的论文《乌合之众》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致力于探索普遍被文明化了的个人如何愿意将他或她的自我服从于群体的盲目和毁灭性的趋向（也就是成为群体中没有个性的个人）。因为弗洛伊德的基本前提是社会聚合是建立在性组织（sexual organization）的基础上的，他接下来的结论就是，里比多纽带，而不是利益群体，是黏合群体的力量。

除性之外，将社会结合起来的因素是关于认同的动态精神机制，通过以一个共同的物体来替代他们各自的自我理想，许许多多分散的个人结合在了一起。弗洛伊德将统治者解释为一种父亲的意象，此意象回应了人们希望被带领的愿望。这样，最初那个迫害性的父亲就成了“文化上的超我”，或者说是孔德所称的“人类的大我”，他是极权式独裁者的化身，人们赋予他最高的世俗权力。正如韦伯提醒我们的那样，卡里斯玛型的领袖不是依靠合法性或传统性的资源，他们的控制权威来源于公众认为他们拥有超凡的、独特的和神秘的品质。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查理曼大帝、成吉思汗、伊凡大帝、拿破仑、列宁和希特勒是政治上卡

里斯玛型人格的代表。路易十四，这位 17 世纪君权神授的法国国王的一句名言概括了这种世俗管理权力的神圣性——“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由此，专制主义的政治领袖就使他或她自己替代成了臣民的父母，而臣民则乐意服从其统治，甚至崇拜此统治者。

性爱本能对死亡本能

弗洛伊德的解释体系的登峰造极处在于他试图以推测性的方式、用生与死（life-and-death）的概念来理解个体与历史。从文化史看，厄洛斯（Eros，性爱）与亚加倍（Agape，普世之爱）是区分开来的；前者使人回想起希腊人关于人类激情之爱的理想，人们藉此以超越个体的孤立感，而后者是一种利他之爱的概念，人们藉此认为我们大家都属于一个整体。弗洛伊德将这两种爱归在一起，作为萨纳托斯（Thanatos，死亡本能）的对立面，后者在希腊神话中是死亡的化身或面具，它是自杀、战争、瘟疫和饥荒的预言者。就像一个个的椭圆循环一样，弗洛伊德称之为“天神们”的情感本能在文明与个人的兴衰中周期性地重现。 138

变性（transsexuality）在性社会学中是个新近出现的性别范畴；尽管弗洛伊德对同性恋采取的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并持宽容态度，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维也纳，他还没有遇到变性的病人。因此他的理论中也就没有提到这类情况。

在个体生活中，厄洛斯代表了性本能。更确切地说，它指的是那些被划分在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范畴内的人类性行为的各种模式。主流社会价值观认为异性恋的目标是生育，而

同性恋则被视为恋母情结投向了相反的性别，而双性恋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形态学（psychomorphology）中几乎没有位置，只在他说明儿童早期阶段会出现种种反常现象这一特征时才被提及。不过，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一个最具革命性的推论就是推测人类普遍存在着双性恋倾向。为了解释各种神经官能症和性欲倒错，弗洛伊德借用了他的同事威廉·弗雷斯（Wilhelm Fleiss）的体质性双性恋（constitutional bisexuality）的概念。弗雷斯认为这一状态是以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性为基础的，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有体现。尽管弗洛伊德站在心理学的观点上反对机体论说，但他承认双性恋理论在解释人类行为的很多特征方面的有效性。卡尔·荣格（Carl Jung）这位弗洛伊德的杰出而又固执的弟子重新探讨了女人的男性因素（male-in-female）和男人的女性因素（female-in-male）这一主题，但他是用人类意识的原型而不是用生物性的固有状态或心理本质来解释这类现象。不管是哪种个体行为模式，双性恋的理论既彰显了普世之爱，也彰显了性欲之爱，它表明人类即能够表达温柔之情，也同样会表现出攻击性的情感。

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中盘踞着死亡本能和性本能。弗洛伊德利用了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将有生命的物质划分为有朽的（或者说“肉体的”）和不朽的（或者说“微生物原生质的”）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划分法，区分出作用于实体的两种力量。性本能始终努力要更新生命，而死亡本能则要将生命导向死亡。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假设，依据“精神生活，或者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神经生活的主导趋

势”，“解脱（nirvana）原则是一种试图减轻或稳定或转移由于各种刺激而产生的内心紧张感的一种努力”。人类生活中的这一倾向在快乐原则中部分表达出来，它试图通过满足各种欲望来减弱这种紧张感。而且，弗洛伊德以解脱原则作为死亡本能存在的依据。他假定生命就是一个努力要回到最初它所脱离的事物的原初状态的过程。因此，“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

在超个体或历史的层面上，在文化衰退、内战、国际对抗的时期，死亡本能有明显的表现。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就被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概括为“全面战争的世纪”。当然，历史就是充满着战争、瘟疫、饥荒、革命、文明的碎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黑格尔曾经指出，“我们从历史中所能学到的就是我们从历史中将一无所获”。今天与昨天的根本差异在于，随着核武器技术和种种生化战争复杂技术的发展，人类这一物种被置于它自己的权力控制之下，而这种权力将会彻底毁灭人类自身。弗洛伊德对人类事务持一种悲观态度。他看到了在人类群体与个体之中存在的死亡意向。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绝望，在《文明及其不满》的结尾段落，他要激发出另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即生命的力量——厄洛斯（性爱），来对抗它永恒的对立力量——萨纳托斯（死亡）。139

后期职业生涯

晚年时期，弗洛伊德开始转向一种前代哲学家的角色，对战争与和平、现代世俗化的历史转向，以及人类在生物界中的位置之类事务发表种种评论。在1932年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长信中，

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他希望，反对战争的“文化态度”与对未来战争的恐惧心态的结合，可以使战争这一过时的机制最终被废弃。

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现代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文明是否是建立在压抑的基础上？如果是的话，那么人类普遍存在的各种神经官能症是否就是文明的代价？与马克思不同，后者将历史视为对集体的压制，而弗洛伊德将其视为对个体的压制。弗洛伊德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性人”（*homo sexualis*）的人类意象，替换掉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意象。前者非理性的冲动必须被纳入生产力的轨道，文明才可能得以继续。社会使性升华为去获取成功的努力。

作为一个启蒙运动的拥趸，弗洛伊德对任何与他的著名格言“哪里存在自我，哪里就必定存在本我”相左的观念都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尽管他也认识到要克服本我所付出的痛苦、所需要的种种代价，他仍然坚守他的理性立场，而将宗教视为不具备艺术与科学素质之人的安慰。在《一种幻象的未来》中，他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将宗教解析为那些无助的个体之超我的投射，后者将自身等同于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父王（*father-king*）。与无神论者伏尔泰一样，弗洛伊德也希望摆脱掉各种幻象而致力于耕种理性之园。

弗洛伊德的遗言

弗洛伊德一直住在他钟爱的维也纳，直到那里的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随着希特勒的权势在德国逐渐上升，犹太人的

处境日益恶化。心理分析在德国遭到“清算”，弗洛伊德的书以及其他一些心理分析的书于1933年在柏林被焚毁，犹太人被禁止在任何科学委员会中任职。纳粹控制了德国心理分析学会，将其改名为国际精神分析普通医学学会，要求所有成员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一些官方的纳粹精神分析学家会见了学会的代表，告知他们心理分析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将犹太人排除在学会之外。在威胁与重压之下，这种夷平的过程不断推进，各科学分支都“国家化”了，处于集中控制之下，被调适为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纳粹科学用雅利安种族至上主义学说代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40

1938年3月，纳粹侵入奥地利，维也纳的街道上布满了轰鸣的坦克和一车车呼喊着的“希特勒万岁”的“临时”爱国者。弗洛伊德出人意外地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他的传记作者兼朋友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终于说服他离开，他为弗洛伊德从奥地利移民英国办理了各种复杂的外交手续。当然，纳粹也从中榨取了不少油水。他们查封了弗洛伊德的银行账户，要求征收逃亡税，否则他们就威胁要没收他的藏书和他所收藏的艺术品。在这段烦乱的时期里，弗洛伊德每天花一小时写作他的《摩西与一神教》，这项工作就像一个“不安息的魔鬼”一样折磨着他。

待在伦敦的短暂时期里，他继续从事着精神分析，保持着各种通信联系，继续写作《摩西与一神教》，接待来访的显贵要人。他的来访者中有作家H. G. 威尔斯（H. G. Wells）、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和犹太复国运动领导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皇

家学会的三位秘书请他们在他们的宪章书（Charter Book）上签名，牛顿和达尔文都曾在此书上签过名。尽管弗洛伊德正在忍受颞部癌的痛苦（这一病症正在一步步夺走他的生命），但他以一种高贵的风度接受了这些荣誉，并保持着他的幽默感，直至生命的终点。一次在收听收音机广播时，一位朋友问弗洛伊德是否相信广播里说的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弗洛伊德回答道：“不管怎么说，对于我来说，它是最后一场战争。”

弗洛伊德的遗嘱就是《摩西与一神教》。在这篇准直觉式的、小说式的随笔中，他阐述了他关于一神教的普遍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关注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作为父亲和立法者形象的摩西。塔尔色斯的扫罗（Saul），这位通常被称为圣保罗的背叛了的拉比在二世纪早期的罗马组织起了基督教，后者是建立在原罪及通过献祭式死亡获得救赎之基础上的。扫罗的启示表明，人类的痛苦是因为他们谋杀了作为父亲的上帝，而他作为使徒保罗的使命就是要宣扬那个献祭的牺牲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他以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出现。弗洛伊德论证到，发源于古犹太教的基督教之成为一种“儿子宗教”（Son religion），是替代被杀死的最初父亲的结果。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不仅扩展了他在《图腾与禁忌》和《一种幻象的未来》中的论点，还以隐晦的方式对即将来临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做出了反应。他在书的结尾以嘲讽的语气说到摩西：“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接受了这一新的教义。那些拒绝接受这一教义的人仍被称为犹太人。”

141 《摩西与一神教》这一带有相当程度的猜测性的著作除了对弗洛伊德个人具有某种意义之外，还在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启示意

义。其方法论的基点是将心理分析的过程投射到世界历史的平面上。一个人群的历史被解读为一个个人的历史，其目的是要揭示出文化秘密，或者说集体的“被压抑的内容”，不管后者是一种宗教仪式，还是一个国家、一种信仰，或者一种文明。沿着这条思路考察下去，与弗洛伊德对领袖的关注相一致，我们会发现，领袖现象是集体超我的具体体现。沿着这一途径思考，我们就能更大程度上发挥米尔斯（Mills）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个人经历与社会和历史的交织点上来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九章

发现不可见世界：齐美尔、库利和米德

齐美尔

142 大约在爱弥尔·涂尔干在法国为社会学确立一个独特的科学身份的同时，在德国也在进行着相似的努力。这位涂尔干的德国同道就是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他的职业与涂尔干惊人地相似——但也惊人地不同。因为涂尔干获得了成功，而齐美尔则没有。齐美尔所阐述的社会观与涂尔干的类似，即认为社会属于独立于可观察到的个体的分析层次，具有自己的规律，需要有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它们。齐美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确地指出，因为只有个体在物理意义上是真实的，因此，社会学的对象必须是关于各种符号和互动形式的不可见世界（invisible world）。他由此避免了内在于涂尔干的“集体道德感”中的某些可能产生的神秘化。但涂尔干后来成为了法国最著名的

思想家之一，而齐美尔则在德国为一个教授职位等了足足有 29 年。终其一生，齐美尔都是一个圈外人，而他的研究既展示出了这一身份的独特力量，也显示出了其弱点。

齐美尔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修养的犹太家庭，事实上，他的研究回荡着音乐、艺术和客厅交谈的气息。在学习了哲学后，1885 年他成为了柏林大学的一名无薪教师（*privatdozent*），直到 1914 年——他去世前第四年——才获得了他一直孜孜以求的正教授的擢升。他之被排斥是受到了各种力量的综合影响。他是一个处于反犹太主义上升时期中的犹太人，一个德意志帝国中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叫作社会学的学科的倡导者，而这门学科又是与孔德和斯宾塞的非德国式的政见联系在一起的。齐美尔越来越退回到艺术领域和社交界中，他的社会学成为他各种洞见的汇集——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就像一个过路人瞥见并捕捉到了某些特征，但他永远也不能穿透到这座大厦的核心。就像他的一篇最著名的文章的标题^①一样，齐美尔是一个看见了其他被束缚在那些熟悉惯例中所看不见东西的人，一个保守着他所知道的秘密的人，因为他没有人可说。

齐美尔的社会学的正式背景是德国哲学的传统——康德、黑格尔、狄尔泰、冯特，这一传统显示了人们是如何透过自己的知觉形式之面纱来看这个世界，以及这些形式是如何通过包含在语言、艺术典范、神话和法律体系中的人类历史而得以代代相传的。因此，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不可见世界。这些规律可以在文化之流——语言、技术、社会体制、艺术——中找

① 指齐美尔 1905 年写的一篇文章：《陌生人》。——译者

到，这些文化在时间的流程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并体现在人们之间互动的各种形式和模式中，而这会对个体性的行动产生影响。但人类也是些活生生的个体。塑造他们的文化和限制他们的互动是使他们之成为人的东西，但人也是某种外在于并相异于它们的事物。因此，人类之戏剧就是一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斗争——它在本质上是一场悲剧，因为这两种力量通常必然同时存在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身上。

齐美尔对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生存层面的敏感使他具有了一种具有震撼力的洞见，这一洞见直到最近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构成一个社会的相对永久的遗产的社会机制——国家、家庭、经济和阶级结构——只是男人和女人们在街上、商店、办公室和聚会上所进行的日常互动的扩展。因此，通过研究更为短暂性的交往情境的正式结构，我们就能理解我们的不可见社会的本质。

“当我们谈到‘社会’时，我们意识中的互动被固定化为某些可定义的、稳定的结构，如国家和家庭、行会和教堂，以及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和组织，”齐美尔写道。

但除此之外，还存在不可计数的更不明显的关系形式和互动类型。如果单个来看，它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因为在现实中，它们嵌入于广泛的、似乎是正式的社会形式中，它们自身就生产出了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如果没有不可计数的小的合成行为的散布性影响，社会就会分裂成许许多多缺乏连续性的系统。社会形成的过程（sociation）就是持续地进行、停止、再进行。即使其外部的运动能量没

有强大到形成适当的组织，但它们将个人连接在了一起。人们相互注视、相互妒忌；人们互通信件、共同进餐；在切实的利益之外，他们愉快或不愉快地相互攻击；对他行为的感念使人们结成了密切的联合；人们在街上相互问候；人们为了他人而打扮自己——所有这些关系，从一人延伸到另一人，暂时的或永久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造成的后果或是暂时性的或是严重的（这里只是随意选取了几种特点），所有这些都不断地将人们联结在一起。这些就是社会原子之间的互动。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的刚性与弹性，所有的色彩和连续性，它们是如此醒目但又是如此神秘。^①

在一篇随笔中，齐美尔谈到一个人，他的职业就是穿着全套礼服坐在家，准备着有迷信的女主人打来电话，说她的宴席上只有13个人^②。齐美尔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类似“宴会上的第14位客人”的候补角色。他始终是一个圈外人，即使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有关短暂交往情境的领域中，他也没有脱去他作为社会学家的疏离姿态。他在这方面甚至比他后来的化身欧文·戈夫曼（我们将在第十四章遇见他）更有过之，他既在内部又在外部，既不是完全的参与者又不是完全的观察者；他的著作充满了各种洞见，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建立一个坚实的体系。

① Geor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Kurt H. Wolff, ed., Published in 1950 by The Free Press Division of the Macmillan Company. 引用已获许可。

② 在西方，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因此，如果出席宴席的人数为13人的话，迷信的主人往往会再邀请一两个客人以打破这一不吉之数。——译者

将社交从想当然的领域抽离出来并将其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行分析，齐美尔是这样做的第一人。他指出，社交是世界之中的一个小世界，有着自己的专有规则。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允许实务性的、严重的事物侵入。外部世界的种种事务只是作为由头为谈话提供一个起点，谈话内容是由谈话来统领的，而非相反。在那些富有技巧的谈话家的把握下，政治、商业、艺术、流言、天气等都成为谈话的媒介，为了谈话本身而继续下去，就像是原材料按照这些处理即逝符号的艺术家的正式要求被形塑一样。因此，社交成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外部”现实世界变成一个幻境，只为其参与者的愉悦而存在。

依照同一思路，齐美尔对调情游戏也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分析（这暗示着他肯定对此有所体验——就如他对婚外情和爱情秘密具有的渊博知识标示出他在这方面的体验一样）。最优雅的调情形式是将性作为原材料，利用它织出一幅愉悦与幻想之锦，织出一个象征性的世界，它将简单的身体激情转换为关于爱的微妙世界。通过这种概述，齐美尔将我们带入到处于最辉煌时代的欧洲沙龙社会的腹心地。

但齐美尔始终没有向前推进到建立一个关于社交的因果分析的社会学理论，也没有对他关于人类的符号表演的观点进行进一步追索，以构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模式。他没能从他的观点中总结出一个隐含的结论，这一引申结论在最近才被阐发出来，即个人从这些交往中——不仅是在彬彬有礼的上流资产阶级的客厅里，还在社会的各个阶级中——创造出了他们的世界观，而且，正是这些共享的幻觉世界将某些个人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与其

他人区分开。齐美尔的最终结论是美学式的而非社会学式的。他如是总结他关于社交的讨论：彬彬有礼的谈话与一幕壮观的海景具有同样的功能，都提供愉悦，将生活中的各种混乱转变为一幅从远处看到的令人愉快的景观。冲突与失败的悲剧、个人相对于社会的悲剧，在社交中和在真实生活中一样是存在的，只不过在社交中它们是作为游戏的材料存在的，因此也就不再是危险的和不可控制的。谈话家在他的符号世界里张扬胜利。

齐美尔社会学所涉及的范围远比客厅要广，包括了权力、货币和历史变迁等严肃领域。和通常情况一样，他通过从各不相同的情境中抽象出其形式的特质，这些材料在齐美尔眼里就产生出了各种洞见。他对群体规模效应的分析是很经典的，他论证说，一个大到已不适合其成员共同交谈的群体与一个较小的群体相比，具有不同的结构。 145

他在比较二人群体和三人群体时，这一论点被更鲜明地提示出来。二人群体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短暂性，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决定离开，它就会解体；这使每一个参与者对另一人都具有特别的控制权。而三人组合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基本的独立性，因为如果一个人退出，这个群体还会存在。对于群体来说，个人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在这里还可能开启新的构成形式，因为很可能两个人联合起来来反对第三个人，或者一个人挑动其他两个人相互对立。简言之，整个组织化社会领域及其权力关系通过参与者的数量及其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几何式转换而展开。由此，齐美尔阐发了梭罗（Thoreau）的名言：“我家里有三把椅子：独坐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

齐美尔还有其他洞见，其中一些是很卓越的，例如他关于组织冲突结构的观点、对秘密社团中社会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现代社会中各个不同的群体是如何赋予个体以各自特别的一套社会关系纽带，由此生产出了现代个人主义。但齐美尔一直没有真正充分阐发这些观点，从而创立一个全面的社会学理论。与涂尔干不同，他并不试图通过经验证据来检验各种因果命题，而只是展示掠过人类风景的一种形式哲学。实际上，齐美尔，这位孤独的圈外人，是憎恨社会的。他写道，群体中的人是由最低程度的共同点来统领的，而更高形式的知识和道德往往是个人的产物。这种个人倾向与齐美尔自己关于个人如何成为社会的产物的论点是相矛盾的，这就使他不能够继续推进以获得某种突破，而涂尔干则由于认识到人们的道德和观念的根源在于群体及其仪式而实现了这一突破。

但是，如果说齐美尔这个德国知识界的局外人没有能够从他那那些前沿性的洞见中创立出一门真正的社会学，那么，有其他人将这么去做。在 1870 年代和 1880 年代，美国按照德国模式对大学进行了改革，美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小型神学院时期的麻木。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带着齐美尔身上所具有的同样的德国哲学精神，深受着新实验心理学的经验方法的影响，将要在齐美尔失败之处获得成功。在库利和米德那里，社会符号构成的不可见世界和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将被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当力量的理论。

库利的生平与工作

查尔斯·霍顿·库利 (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

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第四个。他的父亲是从西纽约移民过来的，拥有一个很高贵的职业——密歇根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查尔斯博览群书，是个好自省、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的男孩。他16岁上了大学，不过健康状况迫使他花了146七年时间才从密歇根大学毕业。1894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前他学过机械工程学，在州际贸易委员会工作过，并出国旅行过。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运输的理论，将一个铁路问题的社会经济学的解决方案与区域人口统计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著作成为“人类生态学”领域的基准之作，这一领域后来由芝加哥大学的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 McKenzie）、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这一代人加以发展，并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库利的早期灵感来自爱默生^①、歌德和达尔文。从赫伯特·斯宾塞那里，库利获得了进化论知识的一个基本轮廓，尽管库利后来批评了斯宾塞的主观性和对“文化”的忽视。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激发了他希望在密歇根大学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大学科目进行教授的愿望。库利还是一个崇拜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小学术圈子中的一员，后者的人格及其在1893年和1894年所做的政治经济学讲座对库利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杜威批评和超越了斯宾塞，指出社会是一个在比后者所设想的更为深刻意义上的有机体。杜威将语言作为

①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绝对自由和社会改革，著有《论自然》等。——译者

社会的“感觉中枢”的分析促发了库利的一种思想的萌芽，即将书面语言作为一种最为卓越的社会传播媒介来进行解释。

在准备论文时，库利开始对“心灵机制”（psychic mechanism）产生了兴趣；他尤其关注穿越时空的语言的传播和记录模式。他研究了这些过程的历史及当代的形式，发展出了一种关于交流的观念，与他关于社会的有机观念相对应。在他的讲座和研究中，他始终将他的讨论与诸如冲突、生存和适应这些重要的社会过程方面联系起来。库利成为了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从而超越了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他逐渐意识到，如果他不能理解意识的过程——社会是通过这一过程而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一—那么他永远也不能真正看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他观察了他的孩子们的心理-社会发展过程，将其作为一种组织和扩展他的理论洞见的一条途径。在教学工作开始后，他阅读了沃尔特·白芝浩^①、威廉·詹姆斯^②、加布里埃尔·塔尔德^③和马克·鲍德温^④，并准备写作他的第一本书——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库利喜欢过一种沉思式的生活，终生执教于中西部的母校。他拒绝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职位，不过在1918年，他颇为勉强地同意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席。

① 白芝浩（Walter Bagehot, 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和评论家，曾主编《经济学家》杂志，著有《英国宪法》、《物理学与政治》等。——译者

② 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译者

③ 塔尔德（Gabriel Tarde, 1843-1904），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犯罪学家。代表作有《刑法哲学》、《比较犯罪论》。——译者

④ 鲍德温（Mark Baldwin, 1861-1934），美国哲学家和理论心理学家，用达尔文进化论研究心理学，强调理论对心理学的重要性，著有《心理学手册》、《发生逻辑学》等。——译者

库利的体系

库利的社会学思想包含了诸种相互关联的维度：（1）他的路径是有机论的；（2）他的观点是进化论的；（3）他对前景的展望是道德式的和进步式的；以及（4）他的理想是民主的。

库利的有机论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的互惠关系之理论假设¹⁴⁷的基础上的。在第一本著作中，他系统地揭穿了所谓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后者的前提是认为社会是一种心理整体，而个人是其中一种特定的表达。既然完全孤立的个体是个神话，那被视为与单个成员相分离的社会也就是一种幻象。对于库利来说，“社会”和“个体”分别是同样东西的集合方面和个体方面，而不是两种在经验上相互分离的现象。因此，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有机体，它由互有区别的成员组成，每个成员都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举例来说，一所大学是由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每个身份群体在这一组织结构中都要扮演特定的角色。这一思路是正在形成的功能主义体系的先驱。

库利的进化论观念渗透于他的体系之中；不过它不同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也不同于19世纪那些重要的人类学家的观点，后者强调发展的个体方面而不是集体方面。库利更关注个体之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进化（不断发展的有机体是如何获得一种关于“我”的意识），而不是大型的历史发展序列或文化进化阶段。他的观点鼓励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相信生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人类意志是其中的一个构成因素。每个个体完全不是社会的消极因素，而都在共同整体的工作中担任着他或她的独特工作。库利将每个个体看作一个“生命的新鲜组织”，承续着

遗传与社会历史而来。他设想每一个生命历史都包含着一条溪流和一条道路：他将这条溪流设定为遗传，是通过生殖细胞延续下来的；他把这条道路理解为“沟通或社会传播”，包括语言、互动和教育。这条道路——当代社会学家会称之为“文化”——相对于那条溪流而言，是一种后期的发展。

库利的道德观体现在他将理性等同于公正判断。库利所说的理性并不只是形式推理的产物，而是指作为个人社会生活结果的、更为深刻的良知理性，包括个人与他人的互动以及与自己的想象中的对话。库利在他的一篇有关伦理的论文《良心的社会性方面》中，通过将社会置于意识之中，解释了忏悔的道德本质在于个人向一个更高、更理想化的人物展露自身，通过后者的优势地位，个人得以获得一种来自外界的自我观。因此，库利的道德观是理性的、社会性的和进步的。他并不像一些民族中心主义的进化论者一样，认为 20 世纪的文化是文明发展的顶点，他相信有必要让人们拥有受过道德教育的更高尚、更生动的人格形象。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理解感受范围应该超过他的掌握范围。他辨识出了三种在实践中带有普遍性的正义观念：忠实于群体，善待群体成员，信守部落风俗习惯。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斯·韦伯将世界的理性化理解为一个持续的去魅过程（例如，最近对月球的去神秘化），库利则强调在一个根据民主原则有效组织起来的公正的（也就是理性的）社会中个人发展的可能性。

148 他的民主观念体现在一种心智扩展之意识（mind-enlarging conscious）的哲学中。库利发现西方文明中民主单位的最早形式出现在前罗马的日耳曼人部落当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家庭、氏族

和村落这些社会单位中。由于当时没有诸如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和计算机这类间接的沟通媒介，人们必须聚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从而体验到不断提升的社会兴奋感，而这又导向意识的更高层次。古代的人们将宴会、游戏、公共集会和典礼看作集体狂欢的场合和表达公众意见的机会。现代社会的美国人通过电视这种大众媒体来庆祝宇航员的太空飞行；罗马人在竞技场里将基督徒喂狮子；古代人则围着营火载歌载舞地庆祝节日。摇滚音乐会以及爵士乐音乐会、福音音乐会和乡村音乐会都是返回到原初的聚会状态的当代例子，不过加上了由当代的技术和文化发展所提供的更好的声音效果所造成的震撼。库利声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精神是自发的”，但它必须使构成一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身上的创造力得以解放，才能产生大规模的精神效应。他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具有发展出“更高和更自由的意识”之潜能的时代，并将民主理解为扩展意识的一般阶段。

库利将体制看作公众意识的明确的产物，这种公众意识是组织的结果，也是围绕着风俗、象征、信仰和持续的情感等形式而产生的思想结晶。他将诸如语言、家庭、工业、教育、信仰和法律这些体制视为对人类本性的需要不断做出的反应。他将其视为公众意识的“认知系统”（apperceptive systems），它们相互之间不可分离，如果脱离开相互之间的联系则皆成虚幻。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注意到了其中的功能主义影子；不过，不管怎样，库利并没有犯将社会系统物化的错误，也没有错误地去寻找系统的需要而不是创造系统的人的需要。因为社会是精神性的，体制是个人的一种精神习惯，因为其公共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个体并不只是社会秩序的消极结果，他或她也是促成社会秩序的有效因素。

镜像自我与初级群体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提出了他的社会自我理论。他借鉴了威廉·冯特，尤其是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将“我”（I）放在日常思想和谈话中来讨论其意义。这个“我”是经验性的自我，可以通过观察来检验；它既不是笛卡儿式的预设，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库利观察到，这个最初的概念很少指向身体，而最多地是指向“我的感觉”或“镜像自我”（looking-glass self）。他将自我视为一种感觉状态，它或多或少与我们的经验所生发出的各种观念一致。较早出现的“我的”这种观念指向个人对各种各样的物体和人的占有感。他举了个作为
149 一种反射性自我感觉状态的满足感的例子：当一个人完成了某件令人高兴的事或得到了某件合意的东西时，他会带着一种温暖的感情想到的“我的、我的、我的”。通过建立自我的社会性，即将自我与其他人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库利扩展了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定义，将心理学作为研究意识状态的一门学科。社会自我是从沟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观念，而意识将其视为自身的财富。

正是由这种推理脉络而诞生出了镜像自我的概念。要把握这个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观念，我们应该记住库利的一句格言：“人们对彼此的想象是坚固的社会事实。”镜像自我具有三重维度：第一，我们是通过他人的目光来想象自己的面貌和形象的；第二，我们想象出对这一面貌的某些评价；最后，我们体验到某

种诸如骄傲或耻辱的自我感觉。换句话说，“我是按照我认为你怎样想我的方式来感觉自身的。”例如，当有一位博学者在场时，我们羞于表现出无知，或者，我们因为被一个名人认出而感到高兴。这种现象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社会场景中，甚至出现在比羞辱或快乐更为微妙的层次上。与他人的日常交往中的所有微小的表情和手势构成了社会的日常结构。库利的社会学的这一方面已经在欧文·戈夫曼的社会思想中得到了发展，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遇到他。

库利的社会心理学的初级理论认为，我们就是我们彼此间对对方所持的想象，而社会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想象的个体都是其组成部分。他断言这些想象是坚固的社会事实。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将他们的自我形象投射到社会上，这些自我形象，如詹姆斯所说，基本上采取的是自我否定或自我肯定的模式。由后一模式产生出了娱乐界（或者说“娱乐产业”）的明星。明星系统体现了一种关于社会自我的分层——从“超级巨星”到不很有名者——这是相对于非明星而言的，他们包括那些观众、听众、追星族或公众。

那句古老的格言——明星不是造就的而是生就的——或许是对的；但一个明星的社会自我的提升既是由于此演员自身的魅力，同时也是其能干的经纪人利用其良好的商业联系和业内关系加以辅助的结果。我们时代中英雄的衰退导致了大众社会中的名人现象——一个有或没有天才的、被包装出来的人格——的涌现。名人的形象通过媒体（尤其是电视、电影、广播、报纸和杂志）上的广告宣传被兜售给大众。

好莱坞明星形象是一种经济商品，它与其他可上市的、包装好的人格形象商品进行竞争。美国的敏锐的观察者指出，我们，以及其他很多高科技国家中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人格崇拜的时代。电影是属于 20 世纪的，油画属于 19 世纪，诸如阿尔·乔森（Al Jolson）、莫里斯·切瓦利厄（Maurice Chevalier）、吉米·杜兰特（Jimmy Durante）、贝特·戴维斯（Bette Davis）、约翰·韦恩（John Wayne）、杰克·本尼（Jack Benny）、朱迪·加兰（Judy Garland）、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马林·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鲍勃·霍普（Bob Hope）、丹尼·凯（Danny Kaye）、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等人的传奇占据着时空，在我们的想象中熠熠生辉。

150 当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娱乐媒体而取代了电影时，明星体系的市场就从剧院这类公共场所转移到家庭这一私密性的场合。因为做广告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不变的因素，明星体系以一种修正了的形式持续下去。但是，意识——那些明星们就存在于其中——在库利学派的架构中仍是社会的核心。好莱坞一直是梦想工厂和浪漫美国的中心。随着重心日益向电视偏转，“电视节目指南”成为这一文明的日志记录。目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沟通进化的新时期，同时也是从一种定义“现实”的双重电子资源（电影和广播）转向另一种双重电子资源（电视和计算机）的过程。

在《社会组织》（1909）一书中，库利介绍了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这一概念。这种结合体是以面对面的亲密交往，

温暖的情感以及合作为特征的。这类群体在个体形成其社会性，以及形成包括爱、自由和公正等基本理想方面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初级群体是社会的温床。初级关系会造成一种“我们”感，这种情感使自我对此群体的生活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具有社会学普遍意义的这类结合体的例子包括儿童的游戏群体、家庭、邻里和老人委员会（council of elders）。初级群体的基本经验就是形成与其他成员的社会一体感。在当代社会，各种初级群体一直以城市或乡村中的社区（commune）的形式存在，人们为了生存的目的开始结合在一起，并多多少少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同时他们也开始重新体验到家庭生活的丧失或飘摇不定。对于库利来说，自治的、民主的乡村社区是一种最高的社会形式。他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人建立了君主制和共和制，但市镇似乎直接出自上帝之手。”

与初级群体相对，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则是非个人化的、契约式的、正式的和理性的。其成员间的关系是冷漠的而非温暖的。行业协会、公司官僚制以及民族国家是这类群体的经典例子。但我们不能把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看作两种相互排斥的类别。例如，初级群体可能在次级性的官僚体系内部出现，以董事会、学术派别、知己圈子以及各种意趣相投的结合体的形式出现。

对库利的批评

库利的方法论是一种“同情式反省”（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他所说的这种方法是指这样一种过程，即社会科学家将他或她自己置身于与各式各样的人物的交往中，力图去想象世界对

于他们显现出怎样的面貌，然后尽可能切实地收集和描述出他们特定的情感状态。通过这种方法，库利试图去理解各种人——穷人和富人、罪犯和孩子、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白痴和理想主义者——的内心生活。他不将人类本性的任何一种状态排除在外，他的同情研究涉及的范围极其深广。他将他自己的本性视
151 为对整体的一个反射棱镜，通过检查他对其他人的自我呈现的反应，努力要穿透社会那层看不见的面纱。

因为库利的方法论与马克斯·韦伯的“理解”和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逻辑意义”（logico-meaningful）的方法类似，因此也可以根据类似的理由对其进行批评。科学方法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它的陈述必须是在各个主体间可以被证实的；否则其结果的可靠性就不可能。确实，西方社会学的一个科学困境一直就是非常难在统一的方法和过程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库利主要是依据他个人的观察能力，通过他特定的视点而提出他关于社会的想象性构建之洞见，因此，客观的社会科学家无法在经验上对他的结论进行检验。米德本人就指责库利将社会置于意识当中，而不是置于心理经验所由产生的社会世界当中。不管怎样，库利开创了将自我置于意识中而非置于行为中的先河，从而在精神上卸下实证主义的包袱。对于他来说，方法论上的精确远不如理解的宽广重要。

库利是个乐观的实践者，他的小城镇社会学中充满了中西部的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清教徒的自由主义观念和态度。库利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其家庭以及安阿伯的脱离于外界的学术圈中生活，他不愿意闯入周围社会的潮流。这种隐蔽式生活的最大优

势是使他有机会冷静深入地思考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在密歇根大学巩固正在扩展中的社会学系的地位。这种生活的主要劣势则在于它使库利不能与过着各色各样生活的人进行直接的、频繁的接触。他从个人退化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它具有穿透力的分析更多是推测性的而非经验性的。他那令人激动的扶手椅上的社会学萦绕着某种对现实理想化的韵调，却暗含着对艰苦的数据收集工作的鄙弃。

与弗洛伊德不同，库利相对来说没有触及无意识的愿望和动机的世界。库利接受歌德的观念，即认为个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既拒绝生理决定论也拒绝心理决定论。库利的自我理论的一个潜在主题就是成长隐喻（metaphor of growth）。他相信个体中存在着还未被利用的潜力，或者是杜威称之为“人类趋向完美的无限可能性”的东西。库利的社会学是偏狭态度和普遍观念的一种理性混合。偏狭的态度是对孤立主义的美国的反映，这个国家还没有被一场世界大战卷入国际社会；而其普遍性观念则指向美国文明中最基本的基督教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那种要“使世界安全地民主化”的民族动力。

米德的生平与工作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kert Mead, 1863-1931）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德利，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在哈佛大学师从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和威廉·詹姆斯学习。他游历广泛，并在国外（主要是德国）的大学中学习过。1893年他获得了 152 芝加哥大学新设立的一个哲学教席，在那里，他与约翰·杜威成

为了同事和私人朋友。米德在那里从事教学，直至他 1931 年去世。他对好几代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的口头讲授；他在世时所发表的东西主要是散见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期刊中的文章、笔记和批评性研究。

所有与米德有私交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个特别的、高傲的和冷淡的人。他是个知道如何吸引和激发学生兴趣的教授。他具有一种很适合于阐述观念的个人风格，他采用一种螺旋式的推理方式，回到他已经讲述过的东西，然后在更高的理解层次上对其进行综合。每次的推理过程都会得出一个新的观点，并将先前的各条推理线路编织进一个更大、更全面的思想网络。他的同事和学生都承认，对于他来说，谈话是更为得心应手的方式，而写作则是要逊色得多的第二选择。尽管学术界有着“不发表就灭亡”的压力，没有出版过一本书的米德还是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和朋友们所收集的他的讲课笔记得以出版，共四卷，分别为《现在的哲学》（1932）、《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19 世纪的思想运动》（1936），以及《行动的哲学》（1938）。与格奥尔格·齐美尔相似，他也是一个由哲学家转成的社会科学家，为了在社会学理论史中对米德的社会哲学进行更清楚地阐述，先来考察一下他的哲学观点是大有裨益的。

米德的体系

米德的社会思想是关系性的、进化论的和实用主义的。阅读米德的著作会使人们对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称之为“事物的相互关联性”留下很深的印象。作为一位科学哲学家，米德了

解以往各种观念体系所导致的 19 世纪的机械论和原子论的偏见。充斥于上个世纪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脑中的主要是这一观念，即认为物质是由静止的、固体的、自足的微粒构成的。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地是集中在结构而非原子的行动上。随着近来自然科学中相对主义理论的出现，人们开始通过“本征状态”（eigen states）或者是“稳定性模式”来理解原子。这种关注点的转换为解释各种物理现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参考框架；这一转向与米德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是平行的，后者消解了 19 世纪大部分社会学中关于人类的、潜在的原子主义形象。

像孔德、马克思、斯宾塞甚至包括涂尔干这些社会学家基本上都是以一种决定论的态度来理解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行动的中心几乎完全存在于社会或经济体系当中，由此，“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就完全控制了人类的行为。个人被描述为在更大的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个独立的分子。米德的关系论（relationism）就包含着在进行着的社会过程中将自我与社会进行理论上的结合，这样，个体既不孤立于他或她的同伴，也不完全由任何抽象体系所决定。 153

米德的理论成就是通过观察人类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并对其进行归纳的方法而达致的。在米德看来，社会构成了一个经验性的现实，我们则在其中的各种群体中进行互动。这一现实是进化的产物，可以根据对情境的不同定义而分为许多种社会现实模式。米德区分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进化观念和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念；按照前者的观点，进化是现存的植物或动物种类（species）[这是个拉丁语词，相当于希腊语中的“形态”（form）一词]的

发展，与环境无关。相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所提出的理论则不从这个角度关注某一特定物种的发展，而是关注各种不同物种形态是如何在环境的压力下做出反应，从而得以发展和存活下来。那些存活下来了物种形态就是最能适应变化着的生活环境的物种。在这一后-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背后是一种生命过程的理念，它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或物种），这些形式随着空间和时间而起起落落。人类这一形式是一种相对晚近的进化发展。

正是在德国浪漫理想主义者那里，以黑格尔为顶点，这样一种哲学才得到阐发，这种哲学在我们自身作为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的反思性经验的意义上，与人类生命形式相关联。根据这一传统，自我不是一个存在于真空中的静止的个体；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作为与其他自我互动的结果出现的。我们越是在持续的社会过程中意识到自身，就越会提高我们的“种意识”。换句话说，我们就越能够理解作为生命和社会过程之结果的人类形式。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米德是詹姆斯和杜威的继承人。米德认为现代的研究科学，包括其数学的和实验的方法，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产物，同时也是一种新出现的进化工具，人类可以用它来从智识上控制他们的社会体制。他与杜威在以下这一观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应用于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是通向进步的关键。米德将实用主义学说解释为三个阶段和两个主要来源。前者包括以下假设：（1）如果一个假设被检验为有效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2）求知的过程存在于人类的行为当中；（3）知识就是一个获取必要的“科学装备”（包括观念、概念、

分析单位、理论模型、范式、方程式等)以在一个民主国家完成社会重建之有益事业的过程。他认为实用主义的来源包括(1)行为主义心理学,它使社会科学家能够根据人类的行为来理解智力,和(2)研究过程或科学方法,它能自我修正,并通过考察其如何运行来检验一个假设。

米德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现代历史的中心点;它通过赋予人民改变和修正宪法——国家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的权利而将革命的原则塑进了社会体制中。于是,米德头脑里想到的基本科学问题就是,在一个迅速变化并且似乎是混乱的世界中,我们是怎样成为自我的。如何保持秩序同时又适应变化,这是米德一直在追索的问题。

社会自我

人都有一个自我,这是米德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假定。这不是某种神秘的咒符,而是可观察到的经验实践,即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对自己所做的各种指示。米德将这些“自我指示”(self-indications)定义为任何我们意识到的东西,如电话铃声、朋友的谈论、一首歌的歌词、认出一个熟悉的身影等。辨识出这些自我指示的存在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1)一个客体(物质的、抽象的或社会的)可以被从其背景中抽离出来而对其施加影响;以及(2)人类自我指示这一事实使个人的行动可以被构建而不只是被释放出来。

米德区分了刺激物(stimulus)和客体(object)。前者不具有作用于个体的内在特质。相反,客体的意义则是由个体所赋予

的。人们对刺激（例如突然的针刺）做出反应，但他们是针对客体而行动（例如，决心在打针时不害怕）。个体并不是被一个事先存在着的压制他们的客体世界所围绕，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构造出了他们的客体环境。从无以计数的诸如穿衣做饭这类乏味的日常活动，到诸如确定职业或配偶这类重大的生活决策，个体在制作客体的自我标记，给它们指派意义，判定它们对于达致不同目标的效用，然后在这些判断的基础上决定去做什么。米德将这一解释性的或者说自我对话式的过程看作在符号基础上的行动。

通过深入研究人类交流的符号过程，米德进一步发展了杜威关于语言是社会的感觉中枢的观点。他区分了姿态（gesture）与符号，他关于姿态的概念来自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和达尔文的心理学经典著作《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米德用“姿态”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社会行动，它作为一种刺激，刺激同一行动中其他形式的反应。他举了狗打架作为“姿态谈话”的一个例子，那些狗相互咆哮、龇着牙，去咬对方的肋部，它们是在一种非符号化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之间的互动的。在这种情形下，它们谁也不会停下来去探究其他狗的攻击行为的动机。一只狗对另一只狗的龇牙报之以咆哮，这并不是基于对它对于后者这一姿态的意义的理解。头一只狗并不是对第二只狗的姿态的意义做出反应，因为
155 对于它来说，那个姿态并没有显示出具有敌对意味。其适应性行为（即接着而来的打斗）是由情境的特征所唤起的，而没有任何意义解释的中介过程。

人类不是对姿态而是对姿态的意义做出反应；因此，人类的

语言或者说交流是符号互动式的。以棒球赛中上场“击球”的情境为例。投球手从投球区土墩处向下专注地注视接球手发出的信号以决定投出何种类型的球，而击球手则和第三垒的跑垒指挥员一起关注着队员席中经理传递过来的击球指令。例如，接球手会伸出两个手指头表示一个曲线球，第三垒的跑垒指挥员会用一个摸耳朵和轻触帽子的动作来下达一个触击的指令。这样，在投球之前，整个情境已经被事先安排好的符号系统结构性地设定了，对于参与者来说，这些符号具有共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能激发出同样的反应）。投球手有机会要求再投一次球，而击球手会假设他要投一个曲线球，这就意味着这些选手们并不只是像狗对姿态所做的反应那样；他们在象征性地解释各种符号的意义，然后据此来组织他们的行动以策略性地应对他们所面对的情境。如果对于发出方和接受方来说，某一姿态能激发出相同的态度，那么它就是一个具有意义的符号。当某种身体姿态或声音姿态（言语）达到这一阶段，它就成为了我们所称之为的“语言”。

在行进中的社会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进行富有意义的（也就是象征性的）互动之所以可能，最重要的是角色承担机制。当人们成为他们自身的对象，并开始学会以各种方式对待自己时，他们也在学着通过构建其他人的行为来设定后者的角色。他们学会了将自身想象性地投射到其他人的指涉框架（frame of reference）上，并学会设想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这些都反映出一种同情式（sympathetic）的理解。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假释委员会的官员对犯人目前对法律的态度做出道德的和同情式的判断，并试图根据这一判断来确定此犯人是否适合假释。自我在沟

通过程中又绕回到自身，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反身性的；而自我又是在与其他人的日常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它是社会性的。社会性自我是个人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情境定义的产物。此外，社会性自我是社会内部一个新出现的过程，米德将这一过程解释为个人行动取向通过角色承担在人类群体中的结合。

社会性自我既不是像笛卡儿的理智“我”那样的静止的、有智力的单子，也不是像弗洛伊德的执行管理职能的“自我”那样的防卫结构，相反，它是个人与他人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交流过程。米德从“主我”（I）和“宾我”（me）的角度来描述社会性自我的内容。自我是二元性而非一元性的，这一观念由詹姆斯提出并由库利加以发展，但米德最完整地表述了这一观念。米德认识到，在人们将他或她的行动传递给其他人的过程中，社会行动本身是阶段性的。在为行动做准备时，个人会考虑到他人在完全以刺激为基础的反应场合中可能做出的反应。而且，在与其他人相关联的社会行动中，组织行动的自我是由各种已调节好的、自发的阶段组成的。米德将前者视为“宾我”，后者视为“主我”。

“宾我”代表群体成员所认定的群体的整套态度。它是自我的传统的、习惯的和常规的方面，并且总是存在。只要我们还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自我共同体内承担他人的角色，这个“宾我”就决定着我们的自我意识。举个例子，唱诗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他或她要唱乐曲的哪部分，而最终达到的和谐声音是男高音、女高音和低音部合作的结果。“主我”则代表个体对其他人的组织化

态度所做出的反应。某个时刻的“主我”是在下个时刻的“宾我”中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主我”意识到了社会性的“宾我”。换句话说，“现在”或米德称之为“当前”（the present）的是“主我”的领域，而“宾我”则是由过去的各种态度组织而成的。米德的“主我”解释了新奇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与各种社会情境相关的社会变迁，这些都成为促成创造性自我产生的因素。米德所阐述的“主我”在社会学意义上与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物理学中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类似。米德的论述通过将机遇或自由意志的因素引入人类事务而打破了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大厦。

米德从“主我”概念中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变迁的原创性理论。他认识到作为社会惯例的各种机制对于维持和保护社会秩序是必要的。社会控制最终是落实在自我控制实践这一基点上的，由此个人在内心里觉得自己有义务尊重共同体内其他人的权利。当一些具有伟大的思想和道德性格的人出现，并造成更为广阔的社会发生改变时，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就凸显出来。天才的行为和普通人的行为一样，是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的，所不同的是，他对群体被组织化的态度的反应是独特和独创的。例如，爱因斯坦过着一种相对简单的生活，但他对物理学的话语世界的反应是独特和独创的，结果，他的理论综合改变了整个社会。诸如耶稣、佛陀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世界性导师，他们的个人关系代表了那些暗含在他们各自的共同体体制中的一种新兴的秩序，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生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按照特定的公共道德来说，他们是脱离正轨的，但是他们对理性、友善、真实和兄

弟之爱这类大型共同体的核心原则做了完整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是道德的遵循者。可以说，他们是更高等的生命的展示者，作为宗教领袖或卡里斯玛型领袖，他们被公众赋予了精神上的权威，从精神层面的立场扩展到了社会领域，并因而能够造成重大的社会变革。

一般化的他人

米德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一般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在自我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一般化的他人代表着个人最终能根据整个共同体的态度来将他或她自己与之相联的阶段。这一真正的社会自我产生的早期阶段包括预演（preplay）阶段、演习（play）阶段和游戏（game）阶段。在自我产生的最早阶段，孩子的咿呀学语是他还没有能力将自身对象化的反映，通过这一阶段他才能达致自身。米德反对塔尔德（Tarde）的直接模仿理论，因为它解释不了个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学习将自身客体化的，而这是内在于人类自我进化中的一个过程。

在社会化的演习阶段，孩子是以分割的和随意的方式来设定角色的。他们以一种准戏剧式的方式来扮演母亲、父亲、医生、电视明星或宇航员。在此期间，孩子过着一种充满幻想的生活，他们开始以一种不成熟的方式来承担各种角色，设想出各种模糊的人格，这些人格是作为他们所身处的麦克卢汉所说的环境——一个自米德的时代以降已大大电子化了的的大众传播的环境——的产物。后来这些在广播、电视和计算机中成长起来的美国年轻一

代，越来越多地从娱乐媒介（包括连环漫画册、电影和唱片）而不是从文字阅读或个人交往中来获取他们的象征世界或角色模式。在此形成阶段，意识开始发展，孩子通过内在地设想他内心的英雄们的态度而激发出自己的想象。

在游戏阶段，孩子不再设想某个特定人物看待自己的态度；他不再扮演各种孤立的角色。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必须预先设想游戏所涉及的其他所有人的态度，需要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是如何相互关联起来的。孩子面对的是正在进行着的他人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组织化了的，并且具有程序规则。根据其行动来理解群体是基本的一步。孩子不是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会游戏规则的，而是通过设想在游戏的情境中他人会如何行动，根据他人的行动步骤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并建立自己的行动步骤。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解释框架，学习包含着在某一情境中的角色扮演，而社会性自我就是在这些进行着的群体过程中产生的。

根据米德的图式，自我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一般化的他人。这个概念类似于涂尔干的集体良知的观念和弗洛伊德的文化超我的概念。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人意识到他或她已经了解了规则，并由此超越了规则遵循行为。由于人类有能力使自己的意识客体化，使自我指示过程客体化，他们因而能够承担抽象的角色，这种角色代表着一系列的具体角色。例如，一个组织的主席，就他或她要考虑到构成整个等级地位系统的各个特定角色这一意义上说，他或她所担任的是一种抽象的角色。其他这类复杂角色的例子还包括和平谈判者、政治大使、劳工仲裁、足球教练、联合国代表，以及总统的“特派员”。担任这每一种角色的

个人除了要了解相关的社会行动者的组织忠诚之外，还必须意识到那张看不见的、非正式的个人关系之网。

158 米德将一般化的他人等同于组织化的共同体或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给予个人以自我统一（self-unity）感。一般化的他人使角色担任扩展到不断扩大的社会循环当中，从库利的初级群体到诸如工会、大学、公司、政党和民族-国家这类次级结合体。整个共同体，从小群体到大型的官僚机构，之所以能够表达出某种观念，只是因为它能作为一般化的他人的观念在每个个体的意识中得以表达。当我们这个漂浮在宇宙中的地球的大小因为交通和通讯的技术进步而收缩时，一种全球意识开始在全世界人的意识中浮现出来。对于米德和那些遵循他的思想轨迹的人来说，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出现就是试图使一种全球性的一般化的他人得以体制化，以通过调节和相互理解，而不是战争，来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一般化的他人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观念，它对经验社会研究的论述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由此引申出来的概念“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核心分析工具之一。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和艾丽斯·S. 罗西（Alice S. Rossi）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队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不满状态时，根据“社会性参照框架”（social frame of reference）来解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在他关于个人遵从群体判断的经验性研究中运用了各种相关概念。对一般化的他人这一概念更深入的运用还有赖于未来几代

社会心理学家的探索。

对米德的批评与评价

米德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不能解释权力和分层现象。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发展出一门社会心理学，其中整体（社会）是先于部分（个人）的，在描述生物性个体在社会过程中获得自我的复杂过程中，米德往往忽略人们在政治、经济和地位等级体系中相互控制和操纵的方式。他探讨问题的方式是散漫式的，而不是严格的结构式的，他的图式不能分析社会阶级及其变动。虽然他的哲学是相对非政治化的，但它又的确反映出一种潜在的、通过个人变化而获得自我提高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米德思想中一个还未被完全认识的激进因素就是他关于个人变化造成的社会后果的理论。

米德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概念很难在研究中被操作化。在这个以精细的指标、矩阵和统计显著性实验作为检验严格研究的标准的时代，像“主我”、“宾我”以及“一般化的他人”这类观念过于含糊，很难被量化。由于米德的话语体系既不适合于社会学的数据计量（data-accounting）的方法，也不适合于理论命题的演演，因此他的社会心理学被有些人认为对社会研究没有用处。

但这一争论也可以倒过来说。米德的关系视角隐含着一种 159
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这一批评被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这位米德在芝加哥大学早期的学生以极简洁的方式表述了出来。布鲁默认为，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它是基于对人类的非现实意象而运作的。人并不只是一个中介，各种信

仰、价值观、规范和角色通过他的行动表现出来；人是行动着的能动者，他在构建其行动时会根据行动所处的情境而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要忠实地反映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就必须认识到人是一个行动着的有机体，他会组织自己的行动，他们不是一种受各种据说是作用于他们的力量之驱使而行动的中立实体。

在布鲁默看来，当代社会学的趋势就是要将社会学家从对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和经验的亲密熟悉感中抽离出来。部分由于此原因，社会学家们对他们要致力于研究的世界持一种幼稚的态度，只接受一些抽象的理论框架，或者是对一些简短的调查问题的回答，认为这样做就已足够充分地接触了经验现实。米德派学者由此转而批判了那些贬损他们的实证主义者。我们在第十四章中将会看到，社会现象学的发展开启了弥合这两种视角之间的鸿沟的可能性，并有可能产生出对于主体经验的更为精细的分析，以此作为一种更注重保持距离感的研究方法的基础。

最后，还有人可能会批评米德将过程（process）等同于进步（progress）的观念过于幼稚了。米德强调意识和理性，而很少关注无意识与非理性。的确，对米德而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一种虚构的怪物，因为人们不能向自身显示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们不能意识到的东西。米德去世后所发生的惨烈的大屠杀使他的乐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破灭了。但不管怎样，人们应该记住，米德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学家，与涂尔干类似，他最终的职业目标是要努力阐明一种他所说的“道德方法”。在他的一本名为《伦理学论丛》的文集中，米德将人类描述为理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是

社会性的存在。通过对康德和功利主义者的分析，米德达致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我们所能提出的唯一一条伦理规则就是，个人应该理性地对待在一个特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价值观。米德的这一观点与那条“金箴”有一比，即“以希望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他的道德方法是要将个人与社会相互结合和相互关联的利益考虑进来。

第十章

发现日常世界：托马斯、帕克和芝加哥学派

160 1918年标志着美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一个新的城市化的美国开始占有决定性的统治地位；而且，在这一年，威廉·I. 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出版。这部5卷本、2, 244页的书在多重意义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代表着美国研究者在将普通社会学理论与广泛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这一努力方向上首次赢得瞩目的重大成就。

这种取向的研究在最初几十年间有一个明确的大本营，这就是芝加哥大学。那些“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从大学的中世纪石头墙和风景如画的庭院里出来，去调查周围的城市贫民窟。这所大学在20世纪前半期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只有哈佛能与

之匹敌；其享有盛名的成就包括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原子裂变和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的著名的教育改革。

追求卓越超群，这是芝加哥大学自 1892 年用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数百万巨资建立伊始就一直致力的目标。它最初的教员队伍中包括众多美国顶尖的思想家，他们是精干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从各竞争机构中挖过来的。芝加哥大学在创建伊始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由阿尔比恩·W. 斯莫尔（Albion W. Small）主持，他是从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的院长任上直接过来的。

托马斯的生平及著作

威廉·I. 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 1863-1947）是社会学系的首批硕士生之一。他那时已经 30 多岁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取得了英语博士学位，在奥柏林学院担任过教授职位，在德国学过哲学和人种学。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头一年里就获得了教职。尽管托马斯是一个南方乡村牧师的儿子，但他后来成了一个老于世故、讲究衣食品位的都市人。他以衣着时髦和能吸引女人而闻名，¹⁶¹并藉此最终说服了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捐资 5 万美元用于种族关系的研究。这在当时（1908 年）是一笔大数目，而且确实是美国社会研究历史上的头一项高额基金。

有了这笔钱，托马斯开始着手研究芝加哥的波兰移民。他起初也打算研究其他的族群和种族，但成熟的经验感引导着他限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波兰人是当时芝加哥最大的移民少数族群，

他们自身就提出了一个足够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芝加哥报纸充斥着对“波兰式犯罪”——即在通常比较温和和顺从的人们中无预兆的暴力爆发——的警告之后。托马斯完全受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见第五章）的影响，对简单的进化论理论和种族主义理论持批评态度。他并不认为自动的现代化或者是由遗传决定的失败就是这些迁移来的波兰农民的命运，而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当时正在发生的是怎样一种情况。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托马斯利用了社会心理学的最新进展，尤其是詹姆斯和米德的动态观点。托马斯认为，必须从内部，就像人们实际经历的那样，来观察社会生活。只有在个人能够解释社会结构，并且能够感觉到它对立於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意图而向他们施压时，社会结构才可能作用于个人。他后来用一句话——以“托马斯定理”而闻名——阐述了象征互动方法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人们将某些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就会产生真实的结果。”

依照这种方法论，托马斯学习了波兰语，阅读当地的移民新闻，在波兰人聚居区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他在方法论上最为著名的创新是他利用了波兰移民写给他们还在国内的亲戚的信件。托马斯是因为很偶然的机遇而采用这一方法的。有一天他在聚居区中走着的时候，一大捆垃圾从一个窗口扔了出来，他赶紧跳过去一旁避开。在这一堆垃圾中，他看到了一包信件。由于他懂波兰语，他就浏览了一下这些信件，发现其中充满了“从内部”对移民生活的生动描述。接着，托马斯在波兰人的新闻媒体上刊登广告，征集信件，并将它们作为他主要的文字资料。

1913年，在去波兰的一次旅行中，托马斯遇见了年轻的波兰哲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他们一起讨论了托马斯的研究。第二年，德国人入侵波兰，兹纳涅茨基逃亡到美国。他没有跟托马斯打招呼，也没有受到后者的邀请就突然身无分文地出现在托马斯在芝加哥的家中。托马斯接纳了他，并使他成为了自己的研究合作者，尤其是在补充波兰农民的生活背景方面。

1918年首次出版的这一著作立即引起了反响，至少是在社会学内部。它确立了在大范围内做系统调查这一方法高于各种推测的和肤浅的方法之优势地位。它最终将理论问题降至它们本来所属的层面——面对真实的世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犯罪是由于缺乏能使个人整合入更大社会中的中介机制而导致的后果。因此，一个有影响力的波兰语新闻界、天主教堂的各波兰教区和其他移民文化机构，完全不会与美国社会的结构形成对立和造成威胁。相反，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论证道，正是这些机构使波兰人的社区自身能够团结起来，并因此成为他们逐步融入整个社会的先决条件。由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避免了那种幼稚的立场——谴责移民或要求他们迅速美国化，而是在细致观察各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复杂的分析。他们的著作也并不是无可指摘，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的忽略，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对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经历也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包括对今天的黑人少数民族群体。

但是，就在托马斯达到事业巅峰的时刻，他的职业生涯受到了一次突然的重创。1918年初，他在一家旅馆的房间被联邦调查局拘捕，当时他正和一位军官的妻子格兰杰太太待在一起，后

者的丈夫正在法国执行任务。法院没有受理对他的指控（违反了曼恩法案^①以及在登记旅馆时使用假名字），但这件事成了一件巨大的公共丑闻。这次拘捕似乎是有政治动机的，因为当时托马斯的妻子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领导的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她因而成为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眼中钉。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论坛》和一些方面的人士所代表的不利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迅即解聘了托马斯。在教职工中没有什么抗议之声：因为杰出，托马斯树敌不少。

托马斯之后的职业就是旅行和写作，他从卡纳基公司、社会科学调查委员会和各式各样的女继承人那里获得资助。如果不计他浮华的生活方式，他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现代时期寻求研究基金的第一位社会学家。兹纳涅茨基则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理论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其思想的奠基人被流放之时，芝加哥学派在1920年却以社会学的一次全盛运动的态势面世。它的新领袖恰巧是托马斯一手提携起来的——罗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 1864-1944）。

帕克与芝加哥学派

帕克也同样具有一种非学院化的、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他也同样来自一个虔诚的乡村家庭。他在密歇根大学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学习哲学，后来在哈佛大学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修哲学，在这期间，他做了12年的报纸记者，

^① 曼恩法案（Mann Act），1910年6月美国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在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译者

从纽约、底特律转战到丹佛、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与其他很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遇见了齐美尔，并于1904年在海德堡获得了博士学位。帕克后来成为刚果改革协会的秘书，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揭露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统治的野蛮状况。

之后，美国的种族状况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成了黑人领袖布克·T. 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代笔人和顾问。事实上，帕克被认为是华盛顿领导的运动中的“幕后实权人物”。不管怎样，我们似乎可以确定地说，他们两人都认为变化是通过163 渐进的、同化的和自立向上的过程达到的。就是在华盛顿的阿拉巴马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威廉·托马斯1914年发现了帕克，他把帕克带到了芝加哥。1918年托马斯从前台退出后，帕克接替了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位置。这位前新闻记者给予了这个学派所需要的推动力。帕克宣称，芝加哥这个正在成长的城市是当前的重大事件，他让他的学生到他们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如纳尔斯·安德森（Nels Anderson）的《流浪者》（1923）、弗雷德里克·M. 思拉舍（Frederick M. Thrasher）的《犯罪团伙》（1927）、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的《聚居区》（1928）以及哈维·W. 佐尔博（Harvey W. Zorbaugh）的《黄金海岸与贫民窟》（1929）。

帕克自己则与他的同事欧内斯特·W. 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和罗德里克·D. 麦肯齐（Roderick D. McKenzie）一起，采用一种源自动物生态学的视角，描绘了这个城市的全景图。尽

管他们的城市模型深受芝加哥位于密歇根湖岸边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影响，但此模型给出了一种精彩的、以一套同心圆形式呈现出来的城市图像：在城市中心，很富裕者与很贫穷者比邻而居（当然其生活境况则有天壤之别），中心周围则是贫民窟，再向边缘扩展到郊区时，居住者的状况则逐步上升。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新移民的进入，那些最有钱的人搬到最边缘的郊区去住。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则空出来，稍里圈的富裕者则搬进去，而更里圈的人又搬入后者所腾空的地方。这样，当我们到达城市中心时，那里就成为了最穷困之地，新到来的移民群体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生活的。

这种生态性的继替模型后来又以各种方式在理论上得以精细化。193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将自杀率、精神病发病率、犯罪率以及其他越轨行为的发生率标示在这类生态学城市地图上，他们发现，这些越轨行为集中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地区。这些地区被称为“无组织的”地区，也被认为是越轨行为的滋生之地。另一个变体就是帕克著名的“种族关系圈”，后者与他的生态学模型既有着实质性的联系，也具有某种隐喻式的联系。帕克声称，所有群体都在为获得可利用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领土资源，而斗争。不同群体间在经过最初的接触后便开始发生冲突。冲突阶段之后是适应阶段，在此阶段，各群体之间的界线被明确标示出来，而且各方都承认这一界线（也就是说，是分离阶段）。最后是同化阶段，下属群体接受了上属群体的方式，最终消失于其中。

这些理论模型激发了相当多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它们最终也没有被证实。我们已经发现，关于越轨行为的生态学观点存

在着许多缺陷：它忽略了以下事实，即有些人是在已经成为越轨者之后再搬进某一区域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那个区域才导致他们行为越轨的；它也忽视了某些偏见，即居住在富裕区域的人往往回避谈论犯罪及其他越轨现象；在统计推论方面存在着“生态学谬误”（涂尔干也经常犯这种错误），即假定某一区域的居民的一些特征的平均值可以看作每个个体特征的可靠证据。（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发现，平均教育水平最低的区域自杀率最高，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任何结论，因为那些自杀的人也许是这一区域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与此类似，帕克的种族关系圈最终也被证明纯粹是猜测性的——就其中那个关键的同化阶段而言。像美国黑人这样的群体的经历表明，同化也许只是发生在语言和政治方面，而在经济关系或私人关系方面则没有发生同化。而且，也不存在从冲突向适应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事情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像196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但这一理论却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总体来说，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缺陷看来是它理论上的薄弱，这使它最终衰落下来。后来它就降为只关注统计方法和描述，不做理论分析。帕克的生态学模式只是一种描述城市的方法，缺乏任何实质性的或预测性的力量。他的种族关系理论中幼稚的乐观主义在今天看来已很明显。帕克的理论所缺乏的——也是先前托马斯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所缺乏的——是关于分层、权力和政治的明确观念。而对后者的探索路径是在芝加哥学派的花岗岩围墙之外发展起来的。

社会阶级的发现

很奇怪，第一个使美国社会学界注意到社会分层这一主题的人居然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位年轻的神学家。这就是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他和他的妻子海伦·梅里尔·林德（Helen Merrill Lynd）一道正准备出发去非洲进行传教工作时，得到了一个宗教基金会的一笔资金，让他们研究美国的宗教行为。林德夫妇选择了印第安纳州的曼西（Muncie），中西部一个繁荣的工业镇。由于受到人类学对原始部落研究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在那里居住下来，通过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到当地生活中进行观察，并对当地的信息提供者进行访谈。林德夫妇很快就发现，白领阶层（中产阶级）与体力劳动者（底层阶级）之间的差距是决定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马克思的基本的社会学观念在 80 年之后开始得到经验上的证实。他们对曼西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中镇》（1929）一书中——以及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对其做的后续研究（《转变中的中镇》，1937）很快就得到了承认。罗伯特·林德于 1931 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他的推动下建立了第二个重要的经验研究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林德成了社会学界自由主义左派立场的代言人；他的儿子，历史学家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成为了 1960 年代反战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就在林德在曼西进行研究的同时，人类学家 W. 劳埃德·沃纳（W. Lloyd Warner）刚结束了他在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的研究（后来以《一种黑人文明》为名出版），正准备将其方法运用
165 于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土著。他选择了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

(Newburyport) 这个古老安静的城镇，这个镇子在他自 1941 年开始陆续发表的各篇研究报告中被称为“扬基城”(Yankee City)。作为反击性的回应，新英格兰的约翰·P·马昆德(John P. Marquand)写了一本小说《无法回头》，讽刺一位跑去研究一个东部海岸城镇的人类学家。不过，在这次交锋中，最后还是沃纳占了上风。沃纳的研究受到了各种批评，最突出的是批评他过于强调人群中假设的严格的地位等级，但沃纳对纽伯里波特的宗教仪式和爱国仪式的分析[见《生者与死者》(1959)]是对涂尔干关于现代社会的观点的一个出色运用。只有能保持疏离态度的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才能完成这种研究。

沃纳后来还对一个中西部的城镇、全国商界领袖和美国大规模组织的趋势等做了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越来越强调调查和统计。这套方法在整个社会学界日益普及。在社会学主要杂志上发表的统计报告方面的论文从 1915 至 1924 年间的 10% 的比例上升到 1955 至 1964 年间的 60%。这一趋势体现了社会学家们自觉地向“科学化”所做的努力。促使这一变化的努力对这一学科既有益又有害。芝加哥社会学家威廉·F·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在他 1929 年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致辞中宣称，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它排除了那种纯粹的社会改良空想家。对奥格本来说，这也是他的一种个人声明，他的职业生涯是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开始的，后来他逐渐转向强调对人口发展趋势及科技发展趋势做不带感情偏见的定量研究。

问卷调查成为当时研究的定规。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1936 年开始在总统大选前进行选前民意调查，1940 年，

哥伦比亚调查小组开始第一次正式研究影响人们投票的各种因素。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调查研究成为研究的主导模式，被应用于所有领域，从政治态度到宗教信仰、学业成绩、社会流动以及性行为，在收集可靠资料以及发展分析方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 1960 年，所有的主要大学都有了自己的嗡嗡运行着的计算机中心，以它为中心，聚集着成批的研究者、程序员、访谈者、编码者和统计员。调查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事业，社会学家必须学会擅长于如何从基金会或者是政府代理机构获得资金来偿付其费用。

积极方面，社会学开始有了坚实知识之基础。在这种事实搜集过程中，以前的种族行为理论成为首批被淘汰者，因为社会学家们证明，是社会环境在影响着社会成就和社会越轨。到 1930 年代，研究证明，黑人和白人的智力水平是一样的。同样，研究也证明，贫穷的社会环境会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智商测试成绩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一研究趋势对理论的影响则是否定性的——它摧毁了生物进化论模式。这种资料搜集工作倾向于确证某些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和韦伯论述社会行为分层之重要性的一般社会学立场，但
166 这种理论关联在很长时间内被美国社会学家所忽视。研究者们是在完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发现社会阶级能最好地预测各类行为，从政治选择到宗教信仰，到婚姻与抚育孩子的方式、媒体参与、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类型的越轨行为。不过，社会阶级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其他的分层维度（韦伯所说的文化地位的区别、教育和宗教）对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证实。

不过，确切地说，美国社会学并不急于要阐发这些理论。相反，在理论构建方面，它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滞后倾向。而收集数据的方法则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学家们学会了如何获得关于人口的可靠样本，怎样提问以不干扰对方的回答，当结果并不是完全随机时，怎样通过运用适当的统计检验来对其加以显示。一些优秀的调查研究者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多元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考虑到了行为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这一事实，通过控制每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从而评估出每一种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说来，这一方法倾向于越来越关注其自身的技术问题而忽视了利用其数据来建立普遍性的解释理论。不仅是技术本身成为目的，而且那些调查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崇拜数字，以至于他们将“经验的”看作只是一些有意义的数字。作为一种必需的条件，这使研究被局限在被严格结构化了的小小区间内，而忽略了事物真正发生于其中的大多数行为和斗争。

类似的局限性也体现在 1940 年代发展起来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这一运动的奠基人是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列文（Kurt Lewin）。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列文从 1930 年代起就流亡美国。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诸如以下的问题做出了独到的阐述，如群体是怎样使个人在感知和信仰方面达成一致的，以及群体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虽然这类研究对某些特定主题进行了长期的、积累性的实验，但它们很少关涉社会学的重大理论。实验社会心理学处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界处，而且更多地是从（个体）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并相应地依照行为学派的观点，强调方法论上的纯粹性而排除其他。不管怎样，对小群体的实验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对社会学理论具有潜在的重大贡献。

组织社会学

一个还没提及的、在另一个现代研究领域中可能脱颖而出的环节是组织的领域，它已在社会学中具有战略地位。组织研究在
167 1930年代真正起步，其标志是哈佛商学院的两项研究。工业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从1927年开始在芝加哥的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对工人的生产力进行了一项长期的实验。研究者们开始采用的是工业管理学的方法，将工人看作机器的一部分，是可由效率专家操纵的；他们最初的实验是改变工厂里的照明以观测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但是，不管他们开灯还是关灯，生产效率似乎一直在提高。梅奥的同事突然想到，工人是对他们正在被研究这一状况做出反应：这些研究者不是只把他们当作机器上的齿轮，而是对作为个体的他们感兴趣，而工人们喜欢这种被关注的感觉。为了验证这一被称为“霍桑效应”的事实，梅奥小组在这个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更进一步的实验，着重观察工人个人的反应。其结果没有得到完全精确的解释，梅奥小组似乎过于强调了他们的新理论：管理必须关注“人际关系”（这就潜在地忽略了工人工资这一经济因素，而这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不管怎么说，霍桑研究使组织研究脱离纯粹以技术为出发点的工程师和“管理科学家”之手，并明确地将重点放在工人的“非正式群体”的动力学上。

1938年，切斯特·I. 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的《管理的功能》的出版对上述工作进行了补充。巴纳德是新泽西贝尔电

话公司的前总裁，后来在哈佛商学院任教。（碰巧西方电气公司是贝尔公司电话装置的制造商。看来这是一个很具有研究取向的公司。贝尔电话公司在新泽西的实验室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界最前沿的非学院非政府的研究中心。）巴纳德从他自身的经历出发论证说，组织图表中的权威等级界限是一种虚构。他声称，一个公司的总裁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傀儡；其下属是真正使这个组织运作的人，而总裁只是创造出良好的氛围以使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巴纳德对高层和中层的组织政治的敏锐观察正好符合了霍桑研究，后一研究表明，工人们之间相互遵守着一种非正式的规范，这样每个人都不至于工作得太卖力而使其他人在管理者眼里出丑。这样，组织突然就被转换成了活生生的东西，而不再是抽象的表格和迟钝的机器。

193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对组织的研究。大部分最杰出的研究出自芝加哥；帕克的学生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指导进行了众多“从内部”对各种职业的研究，包括对企业家、看门人、警察以及对物理学家、律师和科学家的研究。到1960年代，组织研究领域在广泛的主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并在以下方面已达到相当程度的认识：例如人们如何在组织中进行斗争以取得或规避控制、组织的目标和生产物是如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在组织领域发展出了一种真正的解释理论，尽管它还远不完善。这不仅是社会 168 学家的成果，而且是工商管理 and 政治科学研究者的成果，同时也是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的成果。

较之其他研究领域，组织研究领域也许更能将社会学各重

大理论结合起来并予以发展，尤其是从韦伯以下再经米歇尔斯（Michels）和曼海姆（Mannheim）所发展的这一脉（见第十三章）。当然，并不是这个领域的所有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种联系。对于整体社会学研究而言，经验研究对于理论建设的作用更多是潜在性的而非实际性的。

尽管这样，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一些导向性问题的提出，研究要持续地向前推进也是不可能的。美国社会学是以 19 世纪的进化论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为起点的。1920 年代的研究浪潮摧毁了大多数原有的观念，但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整体说来并没有去寻求新的理论来替代它所否定的那些理论。其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那些原来的社会问题类型之类的论题继续在指导着研究，而它们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意义。

例如，数十年来推动社会学研究的，是诸如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否在下降，以及自边疆开发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开放的）以来，美国社会是否变得越来越刚性或“封闭”这类问题。经过了 30 年的思考、争论和研究之后，在 1950 年代后期，对于这类问题终于有可能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美国的社会流动总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至少在 20 世纪是如此。（其流动性本来就不是很大。）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社会学家们克服了在精确测量和比较流动率时必然要遇到的种种技术困难。但很少有人试图去问以下普遍性的理论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量？这类问题需要一种更宽阔的视野，近几十年来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及相应理论取向的重新兴起，可能会逐渐弥补上述缺陷。但这一历程正好说明了我们的高度技术化的研究是

如何依赖于我们先前对各种社会事务的、或许是已经被忘却的讨论。尽管河水已干，那古老的河床仍继续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在经历了本书先前所描述的伟大的智识革命之后依然存在。20世纪社会学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社会学分裂为“高级传统”（high tradition）和“低级传统”（low tradition）。后者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其主要特征就是，最受关注的论题都归结为有关方法论的争论，尽管以下事实已经很是明显，即社会学知识的推进依赖于将通过各种方法得到的数据围绕构建一个综合的解释理论而结合起来。不过，这种分裂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由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和米德所代表的智识革命的冲击波的发散是相当缓慢的，但到20世纪，其影响已逐渐渗透进了社会学的各个领地。以下各章将要论述这一进展的不同支流。

第十一章

非洲裔美国社会学的兴起： 杜波伊斯、弗雷泽、德雷克和凯顿

从大巴灵顿到哈佛和柏林

169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伊斯 (Du Bois) 1868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的大巴灵顿，这时南北战争结束了三年，(奴隶)解放宣言发布了五年。他的家族血统中主要是非洲血统，还掺和着一些丹麦血统和法国血统。杜波依斯的祖父汤姆·伯格哈特 (Tom Burghardt) 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参加过战斗，他的服役使他和他的家庭在 1780 年《权利和自由法案》——这一法案宣布马萨诸塞州的所有奴隶都获得自由——颁布前就摆脱了奴隶身份。杜波伊斯的童年是在典型的现在所谓的单亲家庭中度过的，他承认在他的青年时期，在游手好闲的父亲离开家庭之后，母亲的坚强和养育对他影响颇大。

杜波伊斯的位于伯克希尔山谷中的家乡小镇的观念、风气渗

透着讲究礼节的新英格兰社会的习俗和伦理，这位早熟的学者开始并没有感受到种族偏见的侮辱，直到他逐渐意识到一些有名望的大巴灵顿人士看不顺眼他的棕色皮肤。杜波伊斯 15 岁时担任了纽约《环球》杂志的地方通讯记者，他利用他的地位发表短篇演讲，指导黑人们如何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以改善黑人的状况。他的毕业演讲——此演讲是关于反奴隶制作家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之生平的——体现了他这种日益觉醒的种族意识。

杜波伊斯获得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的奖学金。尽管菲斯克大学的教员中只有一个不是白人，但杜波伊斯在那里却比在北部的家乡更能摆脱 19 世纪末期南方那种截然分离开各种族之帷幕的阴影。通过暑假期间在乡村学校——这个学校的小木屋是在内战前建的，铺着肮脏的地板——教书，他发现了南方农村黑人文化的结构。在他担任《菲斯克先驱报》（*Fisk Herald*）总编辑时，他对种族问题具有了更为敏锐的理解，他已准备好要以和平但直接的方式来反抗“种族障碍”（color bar）。

1888 年，杜波伊斯作为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受到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①的学说的影响，尤其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1895 年，他以题为《对从非洲输往美国的奴隶贸易的压制：1638-1870 年》的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弗农·洛金斯（Vernon Loggins）这位文学评论家以及《黑人作家》的作

① 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1872 年移居美国，曾在哈佛大学任教。——译者

者评价这篇论文是“1900年之前出自美国黑人的最伟大的知识成就”。杜波伊斯称赞了北方地区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但他也指责了这一地区并没有为受过教育的非洲裔黑人提供经济上的各种机会。他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风格论证道，南方的白人寡头政治集团在剥削工人，因此这些工人必须参与政治，从而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杜波伊斯接着去了柏林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①和马克斯·韦伯等人学习社会学、历史和经济学。他从这段经历中吸收到了关于社会研究的科学的方法论，包括对韦伯的理解方法的推论。杜波伊斯保持着与这位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的联系，他的小说和社会学著述体现出一种对人们的主观理解的移情式理解。韦伯曾请杜波伊斯为他所编辑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写一篇论述“美国的黑人问题”的文章。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创立

回到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时，杜波伊斯经历一场文化冲击，他发现菲斯克、霍华德和汉普顿的黑人学院都不招聘教师，他后来终于在俄亥俄州的威尔伯福斯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但是，这个学院的政治及教会等级——这是由非洲人美以美圣公会教堂所控制的——阻碍了杜波伊斯为非洲裔美国人的自由而进行的社会科学计划。这个学院正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中，他在那里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此计划的同道者。

^① 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学派代表人物，曾主编《普鲁士年鉴》。——译者

宾夕法尼亚大学 1896 年聘用杜波伊斯这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黑人为助教，负责指导一个对费城第七区贫民窟的研究项目。杜波伊斯利用这个机会来研究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黑人的生活。他与新婚妻子搬进了邻近的一所公寓，利用参与观察、多元统计分析和绘制人口统计地图等社会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杜波伊斯相信，社会学的方法，包括理解方法，对解决种族问题大有帮助，他用各种不同的调查问卷对 5000 多个人进行了访谈。作为研究结果的《费城的黑人》一书是美国社会学第一部重要的经验研究著作。尽管杜波伊斯对某些黑人社会的行为模式，如犯罪和卖淫，持批评态度，但他避开了当时社会理论方面流行的基因论观念，他将黑人社群中的这些社会问题归结为环境因素以及奴隶制度的道德堕落，而不是黑人自身的种族劣等。杜波伊斯的同事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说过，“就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人类学证据而言，对这些证据的不带偏见的推断不支持种族劣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阻碍了黑人种族中的成员参与现代文明。”^①

1897 年，杜波伊斯开始主持亚特兰大大学的社会学工作。他制定了一个 10 年的研究计划（1896-1905），研究黑人社会的制度性层面，包括死亡率、商业、教育、艺术、环境、宗教和犯罪。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计划实施一个对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百年研究项目，计入以下各种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生物因素，以家庭、群体和阶级为背景的社会化因素，伦理与行为方

^① Franz Boa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230.

式的文化模式，以及法律与政府因素。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亚特兰大研究（1897-1910）影响深远，这一研究发表了 2172 页对于各种问题的深入分析。

涂尔干和韦伯为西方的工业民主社会的社会学奠定了基础，杜波伊斯则在 20 世纪的头 40 年里，致力于为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奠定基础。在 1900 年在伦敦召开的泛非洲大会（Pan-African Congress）上——这次会议是由特立尼达出生的英国律师 H. 西尔维斯特·威廉斯（H. Sylvester Williams）组织的——杜波伊斯在他的致辞“致全世界各民族”中宣告：

“20 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这个问题所关涉的是，主要体现在肤色和头发特征上的种族之间的差异，会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剥夺世界上超过半数的人口最大限度地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和权利的基础。”^①

理论影响

较之世纪末普遍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韦伯和马克思对杜波伊斯的思想和政治发展具有更为重大的影响。杜波伊斯了解自由主义进化论者斯宾塞的理论中所隐含的“适者生存”的观念，¹⁷² 但是他从詹姆斯那里学到的实用主义的指导模式和哲学对他的目标更为有用。杜波伊斯的工作体现出韦伯对分层政治的强调以及对社会经济史的系统、持续、穷尽性研究的要求。他著述中的马克思主义潜流在他思考非洲奴隶贸易问题时浮出了水面。奴

①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Signet, 1903/1982), p. 54.

隶贸易者所干的在经济上获利但伦理上不道德的勾当贬低了人性，而种族歧视的欧洲白人殖民资产阶级也一样，他们剥削底层阶级工人或黑人无产者，而杜波伊斯相信这些受剥削者注定会推翻这种等级和歧视的束缚。

非洲裔美国人领导权的社会演化

杜波伊斯承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7-1895）为第一位全国性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是一位废奴主义领袖、讲演家和作家，他于1838年通过赎买自由而摆脱了奴隶制，接着于1847至1860年创办并编辑了一份废奴主义的报纸《北方之星》（*North Star*）。他与“地下铁道”^①共同战斗，当过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顾问，会见过约翰·布朗（John Brown），后者是一位具有清教徒血统、过着严格的生活方式、遵守基督教价值标准的废奴主义者。杜波伊斯在他写的传记《约翰·布朗》（1909）的序言中写道：“约翰·布朗不仅为黑人工作，他还与黑人一道工作；他们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伴侣，理解他们的缺点和美德，能感受到——很少有美国白人能感受到——他们的丧失的痛苦。”^②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1895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道格拉斯去世，一位新的领袖布克·T. 华盛顿开始崭露头角。他在1895年的“亚特兰种族和解声明”的演讲中提出一种教授工商业技能的学校教育计划，并提出对南部进行政治怀柔，直到非洲裔美国人能够通过成为真正的劳动力而具有头等阶级的公民身份。华盛顿是一个

① 地下铁道（Underground Railroad），指美国南北战争前，帮助南部的黑人逃往北部或加拿大的地下交通网。——译者

② W. E. B. Du Bois, *John Brow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09/1987), p. x.

伟大的演讲家和一位卡里斯玛型的领袖，他是作为一千万黑人的代言人出现的。在他的《黑人的灵魂》中的《论布克·T. 华盛顿及其他》一文中，杜波伊斯既赞扬也批评了这位新领导人。他说：

在多年痛苦的抱怨之后，一位黑人提出了这样一项计划，这震惊了整个国家；它震惊了南部并赢得了他们的喝彩，它也引起了北部的兴趣并获得了他们的赞誉；在含混不清的低声抗议声之后，即使它并没有改变黑人自身，但它使黑人自身沉默了。^①

华盛顿在北方工业家的财政支持下创立了阿拉巴马塔斯基吉学院，其中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捐赠尤其突出，他捐赠了60万美元。塔斯基吉学院教授黑人青年学习诸如木工、裁缝、印刷、女装裁制、床垫制作、管道技术、洗熨以及家务服务等各项技能。这对种族阶级结构基本不构成战斗性的威胁。在当时的保守氛围中，塔斯基吉学院以美国最著名的培训学校之一而闻名，其院长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位塔斯基吉学院院长的辉煌时代是在1899至1905年。他获得了达特茅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成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和威廉·H. 塔夫脱（William H. Taft）总统的顾问。塔斯基吉学院获得了管理黑人事务的“白宫”的坏名声。

杜波伊斯开始与华盛顿发生冲突，因为杜波伊斯坚持强调大学教育、选举权和保持政治及公民权利方面自主性的重要性。虽

^①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p. 170.

然他们两人都是很投入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但杜波伊斯认为对“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的高等教育可以使他们获得现代文化知识，从而引导非洲裔美国人进步到一种更高的文明。杜波伊斯的“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的概念是在他的《黑人问题》（1982）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必须要有受过训练的少数人来为大众的进步提供服务和领导。

杜波伊斯的兴趣超越了经验社会科学而进入到政治领域；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称他为“先知鼓吹者”，而埃利奥特·鲁德威克（Elliot Rudwick）将他写的杜波伊斯传记取名为《W. E. B. 杜波伊斯：黑人抗争运动之声》（1982）。杜波伊斯发动了1905年的尼亚加拉运动（Niagra Movement）^①，并担任其常务秘书长。他将此运动的创立功绩归功于提出此建议的F. L. 麦吉（F. L. McGhee）、设计了其组织方式的C. C. 本特莱（C. C. Bentley）以及充实巩固了运动纲领的W. M. 特罗特（W. M. Trotter）。杜波伊斯起草了成员纲领和进攻计划。这一群体是由“有天赋的十分之一”中的成员组成的，他们被委派来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以下权利：言论与批评的自由、自由和不受津贴控制的新闻报道权、选举权、废除基于种族与肤色的等级界限、将人类皆兄弟作为现今阶段的实践信条、不由某一阶级或种族垄断的高质量的培训、劳动的尊严，以及“在明智和果敢的领导下实现这些理想的共同努力”。^②

① 非洲裔美国人著名领袖的组织。1905年夏天，这些领袖在尼亚加拉瀑布首次聚会。——译者

② Philip S. Foner, *W. E. B. Du Bois Speaks: Speeches and Addresses, 1890-1918* (New York: Pathfinder, 1988), p. 146.

杜波伊斯强调必须要抗议而不是顺从社会不公正。这一立场是他与 BTW（人们对布克·T. 华盛顿的称呼）冲突的核心。杜波伊斯这位亚特兰大的圣者，要求他的信徒采取激进行动来反抗对非洲裔美国人政治权利的剥夺。他的计划包括敦促黑人进行明智而有效的投票，推动公民权利，组织商业合作，提高黑人对大学教育的兴趣，保留原有就业途径并开拓新的就业途径，传播关于医疗卫生法律条文的信息，推动黑人历史研究，促使白人工会和黑人工会结盟以取得相互理解，提高诚实的、不受津贴控制的期刊和报纸的发行，以及运用各种文明手段打击犯罪。杜波伊斯说，“确切地说，就是要尽力用我们的言行来做到这些以提高我们种族的效率，使我们能够享受我们种族成熟的快乐、权利和我们正当职责的履行。”^①

174 作为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全国性组织，尼亚加拉运动持续了五年，它以进攻性的姿态要求无条件地获得所有美国人所享有的同样的公民权利。华盛顿则一直试图破坏这一运动。不管怎么说，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尼亚加拉运动获得了这样的赞誉，它“提升了精神上的不满状态，对怯懦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并有更强的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②。尼亚加拉运动填补了美国黑人理事会（Afro-American Council）中实际存在着的领导权之间的裂隙，成为全国有色人种发展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先驱。在杜波伊斯的领导下，尼亚加拉运动为更年轻的人们铺设了可以继

① Philip S. Foner, *W. E. B. Du Bois Speaks: Speeches and Addresses, 1890-1918*, p. 148.

② 同上书，第 116 页。

续前行的道路。

布克·T. 华盛顿 21 年的统治在 1915 年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下一个出现在黑人社会舞台上的强有力的领袖是马库斯·加维 (Marcus Garvey)。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加维将他的“全体黑人进步联合会”(UNIA) 的总部设在纽约的哈莱姆区^①，并在美国其他几个城市和其他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加维是牙买加人，一个专业印刷工，他是一个比华盛顿更具个人魅力的领袖。加维具有表演天才和活跃的个性，他利用这些在美国黑人中间创立了第一个群众运动。他的梦想是建立起黑人的工业和商业，最终解放非洲。尽管杜波伊斯赞同 UNIA 关于要培育黑人种族自豪感和社区组织的目标，但他批评加维缺乏对使命的敏锐把握，以及他将美国视为只是白色人种的不动产，而黑人不应该在美国社会内部中争取社会平等的态度。

NAACP 与《危机》

杜波伊斯是 1909 年成立的联合各种族的全国有色人种发展联合会 (NAACP) 的创始人之一，他被管理委员会任命为出版与研究部长及联合会宣传机关报《危机》的主编。1909 至 1934 年间的主编经历使杜波伊斯有机会得以实践他对于受过教育的黑人大众的社会学想象，以及呈现各时期的非洲裔美国人社群的各种黑人角色模式。尽管杜波伊斯与 NAACP 的财务总监 O. V. 维拉德 (O. V. Villard) 有冲突，他个人的离群态度和智识精英主义也受

① 哈莱姆为美国最大的黑人聚居区。——译者

到其他一些人的批评，但他仍然坚持他的文化多元主义。由于杜波伊斯强调正在形成的黑人民族主义和建立更广泛的基础以实现他的多种族社会的愿望，他被认为是激进的。在1910年于伦敦举行的世界种族大会上，杜波伊斯提出了一个连接各种族的桥梁——“人类兄弟之情”。在加维出现之前，随着关于平等权利学说的民主宣传潮流的兴起，《危机》及其颇有争议的主编的声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点。冈纳·默达尔观察到：“受来自杜波伊斯群体的批评以及环境变化的影响，他（加维）逐渐趋向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以谨慎但明确的语句结合并表述了黑人的抗争。”^①

175 杜波伊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

杜波伊斯在他的经验研究著作《费城的黑人》（1899）以及后来的著述中，将环境因素置于比遗传因素更重要的地位上。在19世纪末的科学界的一种普遍倾向是强调自然（nature）超过养育（nurture），但杜波伊斯拒绝任何认为白人比黑人具有本质上和遗传上的种族优越性的观念。在关于“黑人的环境”一章中，他描述了黑人的四级分层系统：小康者、工人、穷人和罪犯。这一模型为他在之前“黑人的家庭”一章中对阶级的经济分析增加了一条道德的维度。杜波伊斯的分层研究预示了以后美国社会学中E. 富兰克林·弗雷泽、W. 劳埃德·沃纳和C. 赖特·米尔斯的研究。《费城的黑人》中的经验研究方法论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包括第七区和整个城市的地图、表格、曲线图、人口统计

^①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 1944).

曲线和统计数据，最后一项是受到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和弗朗西斯·高尔顿在英国进行的研究的启发。这项建立在对5000个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是由杜波伊斯独立完成的。

杜波伊斯的经典著作《黑人的灵魂》（1903）是一本特别的、由多篇诗体散文结成的集子，这些文章强调了社会学的预言力量，它将种族冲突视为危害各种族并威胁黑人社群自治的现象。杜波伊斯将20世纪的主要问题确定为种族界限的问题。而且他还走得更远，在对社会学变量的历史解释中还注入了一种进化论的乐观主义调子：

正是要通过20世纪所有杰出人士的努力，在将来的种族竞争中，适者生存意味着真、善、美的胜利；我们也许能够为未来保存住所有真正美好、高贵和坚强的文明，而不再为贪婪、粗野和残忍喝彩。^①

作为政界元老的杜波伊斯

在他的后期生涯中，杜波伊斯成为了一个全球旅行者，在世界各地倡导泛-非洲主义和世界和平。他强调，奴隶制背景、权利剥夺、黑人隔离法^②以及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构成了否定性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使非洲裔美国人不能形成一种全国性的高自我评价的意识模式。杜波伊斯既为马丁·路德·金博

①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p. 188.

② 黑人隔离立法（Jim Crow legislation），泛指1876至1965年间在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施行的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译者

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的取消种族隔离之“梦想”奠定了基础, 也为马尔科姆·X 及其他人的黑人自豪感政治奠定了基础。下列各种组织, 包括种族平等委员会 (CORE)、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SNCC)、城市同盟、NAACP, 以及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的黑豹党, 都以某种方式受到杜波伊斯的政治激进主义和社会思想的影响。

- 176 杜波伊斯利用他 1934-1944 年任亚特兰大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之便, 通过向个人、基金会和政府请求财政支持, 发展了黑人学院和研究生院的社会研究。1943 年的亚特兰大大学会议是由第一个通过赠地法案建立的黑人学院召开的协调合作式社会研究的会议。杜波伊斯是大会委员会的主席, 这次大会还获得了像霍华德·奥德姆 (Howard Odum)、爱德华·路透 (Edward Reuter)、E. 富兰克林·弗雷泽 (E. Franklin Frazier)、查尔斯·约翰逊 (Charles Johnson)、唐纳德·扬 (Donald Young) 和其他一些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的支持。编撰一部关于黑人的百科全书的计划是由杜波伊斯在 1909 年提出来的, 但这一计划直到 1930 年才获得了资金支持。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E. 帕克和 W. E. B. 杜波伊斯是编委会最初的合作者。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盖伊·B. 约翰逊 (Guy B. Johnson) 在 1930 年代后期接替了帕克这方面的工作。

杜波伊斯通过宪法的第 13 至 15 修正案积极为黑人争取公民权利, 并通过创立泛非洲运动 (Pan-African Movement) 为黑人争取人权, 泛非洲运动在 1900 至 1945 年期间召开过五次大会, 它强调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而不是以欧洲国家的殖民利益为目

的的非洲。

1960年代被黑人们称为“父亲”（Old Man）的杜波伊斯在90多岁前往非洲时，他被看作黑人种族的象征性领袖。加纳总统克瓦姆·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任命他负责一个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编辑秘书处，这个秘书处负责编撰一部非洲百科全书。这一工程是由加纳科学院资助的，杜波伊斯则协调了各方面的力量。这位“父亲”在拜访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后，对美国失去信心，成为加纳的一名公民。这位创立了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骄傲而多产的亚特兰大圣者，批评他的前属国背叛了美国革命的公正精神。当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华盛顿特区发动争取工作的游行，与之呼应，杜波伊斯在阿克拉领导了一场示威活动。杜波伊斯于1963年8月27日去世，享年95岁，这位黑人预言家在他所扎根的土地中魂归故里。

社会阶级调查

杜波伊斯始终处在美国社会学的边缘。直到1930年代和1940年代，人们才开始更多地关注一些黑人社会学家，特别是那些在社会学机构的中心，即在芝加哥受过训练并被芝加哥各同行所推举的社会学家。因此，E. 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 1894-1962），这位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学位、受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E. 伯吉斯的影响的社会学家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席。他的学位论文《芝加哥的黑人家庭》于1932年出版，在社会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黑人底层阶级家庭结构是否是黑人社会进步之障碍的争论。

1940年代，出自芝加哥大学的黑人社会学家圣克莱尔·德雷克（St. Clair Drake, 1911-1990）和霍勒斯·凯顿（Horace Cayton, 1903-1970）写出了《黑人都市》，一项关于黑人社区内阶级分层的著名研究。

177 弗雷泽在《黑人资产阶级》（1957）一书中对社会阶级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区分出了三类群体。他所分出的黑人精英、黑人资产阶级和黑人大众三种类别是从他在《美国的黑人家庭》（1939）中对阶级结构的早期展现中引发出来的，在这本书中，他将黑人阶级结构分为古老家族、棕肤色中产阶级和黑人无产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城市化的速度和黑人人口从南部迁向北部的速度。1900年，通过布克·T. 华盛顿领导的全国黑人商业联合会（National Negro Business League），新兴的黑人中产阶级建立起了其集体意识，从而标志着这一阶级登上了美国的舞台。一小部分古老家族构成了上层阶级，他们通过所拥有的上等文化和更高的道德规范将自己与黑人无产阶级区分开来。这些古老家族一部分是由在南北战争前已经买得自由的奴隶构成的，他们夸耀自己的祖先是黑白混血人种，并势利地认为源自白人贵族的浅肤色及家庭背景要高于更深肤色的黑人无产阶级。

弗雷泽在本书中对“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The World of Make-Believe）的划分扩展到他对黑人社会的制度结构的所有批判性分析中，包括教育、政治、新闻和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黑人教育主要由北方的慈善机构提供财政资助，黑人学院则在塔斯基吉学院、亚特兰大大学、迪拉德大学和霍华德大学中有所加强。作为对白人传教士式的基督教教育的反抗象征，黑

人学院选出了黑人管理者，而第二代的教师和学生则由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输入而被转化了。黑人教师更关心他们的工作给他们提供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而不是他们的白人同事的著作、谈话、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和族际主义（interracialism）。完成黑人中产阶级教育是进行更高阶段学习的主要目标，对教师和学生而言都是如此。

弗雷泽对新兴的黑人中产阶级的批判方法受到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概念的影响。弗雷泽注意到了黑人中间存在着的炫耀性消费，其目的是为了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竞争，其方式则是通过展示各种地位象征——包括大学学历、各种大学联谊会在娱乐上的花销——和黑人资产阶级在昂贵的房屋、优质的家具和家庭用具、奢华的汽车以及名贵衣物上的奢侈花费来体现。弗雷泽声称，由于他们在世俗化的都市丛林中缺乏指引性的哲学，“这些黑人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被称为黑人‘上层社会’的那部分人，通常就成为了迷信天赐良机的人。”^① 弗雷泽对黑人中产阶级沉迷于赌博、“数字”（19世纪中期在美国城市中出现的非法博彩）、赛马赌博和扑克牌的指责，听上去像一个老派牧师。

弗雷泽论证说，黑人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之前，是建立在害怕丧失地位和自卑感的基础上的。在更广泛的美国社会中没有地位这一事实成为黑人中产阶级内部为抵消低等的自我评价和白人们的蔑视而愈演愈烈的地位斗争中的关键因素。他举了黑人医生的情况作为这种害怕地位丧失的例子，黑人医生往往不能去参加学术

① E. Franklin Frazer, *Black Bourgeoisie*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 210.

会议，因为他们没有昂贵的汽车，他们维持家庭的费用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弗雷泽批评黑人职业是一个“社会神话”，它脱离了黑人资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是白领打工的现实，脱离了从各种兄弟会、教育以及公民组织的领导层中产生的政治权力。在政党政治中，黑人资产阶级信奉黑人废奴主义者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话，他说：“共和党是一艘船，其他一切都是茫茫大海。”^① 布克·T·华盛顿，这位马克思·韦伯的同时代人、反对隔离黑人习俗的同化主义者，发动了一场“通过职业进行拯救”的改革运动，但除了少数几个成功事例和黑人报纸的支持外，黑人在职业上所获得的成就相对来说是不明显的。在黑人共同体内部，政客们则试图将黑人大众的要求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挂起钩来，而这又为地方性政治机器所利用。在全国范围内，政治上的倾斜总在发生微小的变化。1932年黑人对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率是25%，到1936年大萧条时期，由于民主党对贫穷的黑人大众所提供的经济救济，罗斯福的黑人支持率上升到50%，黑人资产阶级死死抓住他们关于财富和权力的幻觉以摆脱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所受到的挫折。

弗雷泽对“黑人资产阶级”的研究描述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况，而到1950年代，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弗雷泽假定那些受过中产阶级教育、具有中产阶级经济水平和职业地位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一假设或许会受到批评。在《黑人资产阶级与黑人权力》一文中，约瑟夫·斯科特指出，“我们从参与观察中已确切知道，很大一部分在社会-经济上处于

^① E. Franklin Frazier, *Black Bourgeoisie*, p. 107.

中层地位的黑人并不抱有弗雷泽所描述的那些观念上和行为上的价值观。”^①很多黑人资产阶级的孩子在1960年代的黑人学生运动中成为了倡导黑人权力的积极分子和领袖，哈里·爱德华（Harry Edwards）在其《黑人学生》（1970）中分析了这场社会反叛运动。

黑人都市的社会分层

圣克莱尔·德雷克和霍勒斯·凯顿的社会研究名著《黑人都市：一个北部城市黑人生活的研究》初版于1945年，这本书在方法和分析上，在它种族关系和都市社会学研究的突破上，都吻合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黑人都市》并不只是一个统计调查和公众民意测验，相反，它是由意志坚定的学者所指导进行的深入的社会学调查；这些学者相信，以科学的、精细的方式对社会事实的展现本身可以导致对黑人聚居区境况的政治改革。这项研究的主题是芝加哥黑人社区的群体生活。此研究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的工程项目管理部提供财政资助，这一系统分析是由一些在罗伯特·E. 帕克的传统影响下的社会学家和一些社会人类学家共同完成的，后者则与W. 劳埃德·沃纳一道从事过他的美国社区系列研究。一方面，此书的作者运用了地图、表格、曲线图和统计等定量研究技术，另一方面，此项研究亦深受诸如理解、对社区成员进行广泛访谈以及参与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影响，后者是社会人类学家的方法。

W. 劳埃德·沃纳 1920年代后期在澳大利亚的摩金（Murgin）

① Joseph Scott, *The Black Scholar*, vol. 4, no.4 (January 1973), p.12.

部落中做过人类学田野研究，写成《一种黑色文明》（1937）一书。他转而将他的田野方法应用到对美国社区的研究中。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扬基城”系列研究，这一研究揭示了一个新英格兰城市中社会阶级的等级，这些等级一层层相互叠加，就像图腾柱上的图腾象征一样。沃纳接着又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合作小组研究其他美国社区：中西部的城镇、最南部一个种族分化的社区，以及德雷克和凯顿关于芝加哥“布龙兹维尔”（Bronzeville）的研究。在《黑人都市》的“关于方法论”一章中，沃纳区分了社会阶级和种族等级，而后者在南方比在芝加哥更为普遍，他预言下一代的任务就是要摧毁美国的种族主义。

《黑人都市》中的阶级结构是建立在一种价值体系之上的，德雷克和凯顿将这一体系概述为社区与个人生活中所关涉的五种主导性关注：（1）维持生计，（2）过得愉快，（3）尊奉上帝，（4）获得成功，（5）提升种族地位。^①黑人都市和“布龙兹维尔”的公民的这些主要价值观构成了社区的社会习俗和伦理观念，他们将时间与金钱花费在这些方面。在繁荣的1920年代的“兴旺时期”（Fat Years）及纽约哈姆莱区复兴时期，黑人男人的就业率超过了75%，女人的就业率达将近50%，这还不包括那些仆役工作和重体力工作，这些工作的收入要低于白人的收入。在后来的大萧条时期，黑人聚居区处境艰难，但公共事业振兴署（WPA）提供的报酬、社会工作人员的服务以及公共卫生措施的

^① Clair Drake and Horace R.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p.385.

加强部分缓解了这种艰难境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黑人开始有机会获得军工产业的岗位和金钱。尽管遭受着贫穷、疾病和白人种族主义者制度性的歧视，但布龙兹维尔的黑人民众仍然在体育活动、看电影、饭店歌舞表演、歌舞厅和玩牌聚会中享受着生活。

在非洲裔美国人社会中，教堂与家庭一直是其核心机制，在奴隶制瓦解了黑人的亲属制度体系之后，教堂在祈祷、组织化和社交方面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尽管在布龙兹维尔，人们普遍追求世俗化的趣味，但其加入教会的人数比率仍是很高的；1938年，在芝加哥有475座黑人教堂：45%为浸礼会教堂、10%为属灵唯灵派（Spiritual and Spiritualistic），9%为非洲卫理公会教。在布龙兹维尔，去教堂参加礼拜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一项标准，而众多人群在共同“赞美上帝”时可以获得一种心醉神迷的愉悦；而且，在诸如施洗礼、婚礼和葬礼这类公共典礼和仪式中，教堂起到了很重要的宗教组织作用。美国生活和黑人都市中总括一切的社会价值观就是获得成功或者说出人头地。在布龙兹维尔下层阶级聚居区，黑人的向上社会流动被他们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受到限制的工作类别以及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所阻碍。这种种族歧视不仅仅是个人的嫌恶、轻视、侮辱、偏见及敌视行为，而是——如乔·R·费金和克莱瑞斯·布克·费金所定义的——“对次级的种族群体成员进行区别性和否定性对待的制度性行为。”^①但

① Joe R. Feagin and Clairece Booker Feagi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New York: Prentice-Hall, 2003), p.503.

不管怎么说，芝加哥的布龙兹维尔已经适应了——如果说还没有完全同化的话——美国的成功价值观，而且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正获得了成功，那这种成就就会转化为收入。黑人都市的准则就是期望人们以他们的天分、政治权力和智力赚钱。

处于黑人都市的社会结构最顶端的是那些作为“种族英雄”和“种族领袖”的黑人，他们唤起了黑人的“种族意识”，唤起他们作为黑人的种族自豪感和社会团结。黑人社会阶级一度是建立在家庭背景的基础上的，追溯自己是哪个种植园主的家仆的后代或者是追溯血统中的白人血统；现在其阶级则建立在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基础上。黑社会或者说“秘密组织”（the “shadies”）是下层阶级中最大的群体；其非法行当的亚文化向上通过中低阶级、中层阶级渗透到上层阶级，大多数政客都给予“讹诈绅士”及其妻子以相当的社会尊重。尽管如此，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仅强调要提升种族的优越性，还强调“文雅”、“文化”和社交礼仪的重要性。布龙兹维尔的名人录中囊括的是最富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家庭以及在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物。社区中有名望的职业包括著名的医生和律师、牙医、牧师、大学教师、黑人报纸的主编、重要的政治家，偶尔也包括“玻利希彩票”赢家。布龙兹维尔的上层阶级强调中规中矩的家庭生活，以家庭为中心的取向提供了一种稳定性。男女两性的排外的俱乐部成员制度提供了一种上层社会的社会仪式。另外，一些运动名人也是德雷克和凯顿所称之为“种族英雄”的实例，这其中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美国英雄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斯（Joe Louis）和在美国棒

球联合总会棒球赛中勇于打破肤色界限的杰基·鲁滨逊（Jackie Robinson）。

布龙兹维尔的黑人下层阶级则浸染着由种族歧视造成的各种社会疾病与精神疾病，诸如酗酒、失业、卖淫、争斗和犯罪。非法生育的社会模式正在形成。在 1928 至 1933 年之间，芝加哥有 2000 名——也就是说 25000 名黑人婴儿中的 8%——黑人私生儿。邻里关系的衰退、抛弃家庭行为、离婚以及绝望情绪造成了在本已受压迫的低层级中犯罪率和青少年犯罪的上升。在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黑人的“民族圣歌”是“宝贝，除了爱，我给不了 181 你任何东西”，这可以看作那个时代的一个标记。德雷克和凯顿是通过与布龙兹维尔理发店中的饶舌鬼们交谈而获得这些富有启发意义的信息的。

也有一些下层阶级的人成功地向上流动进入到布龙兹维尔的中产阶级中。以实现美国梦为目标，中产阶级很看重“良好的关系网”、好出身，以及婚姻和家庭。以前的仆役奴隶和小佃农的后代很看重不动产，将其视为受人尊敬和稳定性的地位象征。在大移民（1914—1918）和大萧条之间的时期，不少黑人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其中一些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的人在大萧条开始后就将他们的积蓄转换为不动产。

中产阶级在布龙兹维尔人口中占三分之一，他们重视去教堂，重视孩子的教育以使他们能有更好的生活，重视社会俱乐部的成员身份，他们将 these 看作其生活的主要价值和目标。公示宣传在中产阶级的社会俱乐部的环境里是很受重视的，像“友善十二”、“个性八”、“月光翻斗车”和“布龙兹维尔德布斯”这些

俱乐部都有作为通讯员的职员，专门负责俱乐部会议通知和向当地新闻机构提供有关俱乐部每年度的时装表演会、舞会和特别事件的报道。父母们则全力关注整个教育训练过程，同时将勤奋工作和自尊才能成功这一套说教灌输给下一代。

上层和中层阶级在谈到“推进种族”时，他们通常是指要创造出各种条件，去除掉布龙兹维尔下层阶级中的那些混乱因素，鼓励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布龙兹维尔的推进种族的首要方式一是取得“反映种族信用”的个人成就，另一是组织各种目标在于提升整个群体之地位的社会行动。黑人已经适应和内化了平等与进步的乐观主义信条，并坚持要求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中能有平等的机会展示他们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群体的才能，在这个意义上说，黑人已经完全美国化了。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这位伟大的美国抗争小说《土著之子》（*Native Son*）的作者和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以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罗伯特·E. 帕克及其同事为领导——的支持者，在他为《黑人都市》写的文采斐然的前言中写道：“当前美国人的思想胶着于要试图使目前的现实成为唯一的和正确的现实，它完全忽视了那些千百万被剥削的工人和不满的少数民族人们的热情与渴望的现实；它完全忘记了曾推动欧洲人起来屠杀封建之龙的力量；它也完全忘记了人类热切的情感法则，这种情感会起来反抗压迫当局。”^①更令人悲观的是，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名著《看不见的人》中的那个

① Richard Wright, “Introduction”, in Drake and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p. xxiii.

没有名字的中产阶级男主人公，在对自己作为一个美国的黑人而产生焦虑、愤怒、迷惑和怨恨中挣扎。他不是被看作现实境况中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体，看作他自己，而是由于他的肤色标签被看作一个无形人。埃里森的主人公在表述作为无形人的生存的巨大痛苦时说，“你需要向自己证明你是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中，证明你是所有这些声音和痛苦中的一部分，这是痛苦的；你冲拳出去，你诅咒发誓要让他们承认你，可是，唉，总是无济于事。”^①

对种族关系的未来展望

德雷克和凯顿做过一个预见性的评论：“不管是诈骗者还是牧师，不管是保守分子还是共产主义分子，不管是无知者还是专家——只要他是个积极进取、敢于发声并毫不妥协的种族人（Race Man），他就是所有人的英雄。”^②自德雷克和凯顿的著作之后，又经过了两代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一批“有天赋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新成员崭露头角。像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哈里·爱德华兹（Harry Edwards）、特洛伊·达斯特（Troy Duster）、康奈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和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这些先锋的黑人社会学家，他们致力于推进黑人种族的，更重要的是，推动全人类所有种族的族群及文化多样性。康奈尔·韦斯特在《种族事务》中将他的社会学想象发

^① Ralph Ellison, *The Invisible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2), p.4.

^② Drake and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p.395.

挥到了极致，他在谈到种族前进时说：“要成为一个严肃的黑人领袖，就必须成为一个超越种族的预言者，他要批评现有的权力（包括那些有黑人参与的权力机制），他要提出道德复兴和政治起义的观念，以为那些遭受由社会造成的悲惨命运的人们进行基础性的社会变革。”^①

^① Cornel West, *Race Matter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 p. 46.

第十二章

社会系统的构建：帕累托和帕森斯

“现在谁还读斯宾塞？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认识到他给世界带来了怎样巨大的震动……他是一个奇怪而又很不令人满意的上帝——他称之为进化原理——的亲密知己。他的上帝背叛了他。我们已经进化到超越斯宾塞的阶段。”布林顿 (Brinton) 教授的这一结论可以视为一个验尸官的结论：“死因：自杀或谋杀”。我们必须同意这一结论。斯宾塞死了。但谁杀死了他，又是怎样杀死的？这就是问题所在。^①

塔尔科特·帕森斯 (1902-1979) 1937 年进入社会学领域，那时他的角色是作为一个侦探，来探究如日中天的自由主义的理

①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 Vol. 1, p. 3. Published in 1968 by The Free Press Division of The Macmillan Company (original edition 1937). 引用已获许可。

性主义体系是否死亡。斯宾塞是带着 19 世纪的乐观主义死去的。他是最后一位宏大体系的建立者，要解释一切事物——人们为什么行动，体制为什么存在，历史为什么沿着特定的方向推进。塔尔科特·帕森斯是 20 世纪唯一一位在满足复杂化的新标准的同时试图要做同样的事情并获得一定成功的人。他的侦探任务是去找出体系之所以看上去不再可能的原因；他的目标不在于只是认识到这一事实，而是要克服新出现的障碍。

帕森斯是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 19 世纪的理性主义之衰微以及涂尔干、韦伯和弗洛伊德的伟大突破的人。他的体系是试图综合这些突破的一种努力。他只是部分成功了。可以确定地说，他的立场更多地来自涂尔干而不是韦伯，而他完全忽略了米德的成就及他那一支的传统。

帕森斯也体现出美国社会学中高级传统和低级传统的分裂。很多社会学家仍执着于 19 世纪改革者所关注的那些事务——个人流动性、越轨、社会解体及其恢复——只是用更带行动主义色彩的术语来加以表述，并且在进行经验研究时只是将其松散地与一些解释性理论联系起来。帕森斯则代表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脱
184 离了具体经验研究的普遍理论时代，这一分裂目前还处于缓慢的接合过程中。帕森斯本人就局限在盎格鲁 - 美国人的传统中，努力想恢复其宏大理论，其方式主要是对弗洛伊德进行相当行动主义式的阐释，对政治持幼稚的爱国主义态度，以及精心创立出很多抽象概念。不过这些我们后文再谈。

我们先来讨论一位在气质上完全不同于乐观主义的帕森斯的人物——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他或许是现代最为愤世嫉俗的社会思想家。帕累托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攻击面，正是从他那里，帕森斯引发出他关于如何建立一个体系的复杂思考，在一个所有真正的现代主义者都认为这已不可能的时代。

帕累托的生平及著作

帕累托的一生中，在欧洲发生的种种事件已使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实证主义信念失去信心，它已经不可能继续活跃于 20 世纪了，而帕累托的一生是与这些事件协调同步的。他生在巴黎，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意大利的加里波第的英雄时代中长大。他学习了科学和工程学，1871 年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几乎与意大利建立新的联合君主立宪制同时。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他也是个热情的、理想主义的民主主义者。他起初就职于一家铁路公司，后来在工业化繁荣发展的北部担任铁矿主管。34 岁时他得到了一笔遗产，这使他能退休下来而将身心投入到研究与写作中。他的研究领域是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科学——经济学。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将个体看作做出理性决定的人，并由此来构想个体行动的结果；人们在契约交换活动中根据各自的利益行事，这种活动创造出了国家财富，并且，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对公共利益进行分配。不久，帕累托就作为一位伟大的严格主义者（*rigorist*）脱颖而出，他将一种精致复杂的数学方法引入了经济学。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概念“帕累托最优”仍标志着他在此领域中的地位。他的成就使他在 1892 年获得了洛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职位，那年他 44 岁。

但意大利的民主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原来的敌人并没有认输；在南部，贵族仍使农民陷于困顿，地位近似于农奴；牧师们仍在劝说那些信仰者安于他们的命运，警告那些不信神的改革者。而且出现了新的敌人：工联主义者、社会主义鼓动者开始在都灵和米兰的工厂里抵制 16 小时工作日，13 小时工作日及后来的 11 小时工作日制度。在拥挤的贫民窟中产生出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宣称财产是偷窃来的赃物，而议会民主不过是个骗局。1900 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炸死了君主立宪的国王亨伯特（Humbert）。国会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僵局，政客们则竭尽所能地为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谋取政府职位。贫穷困苦不仅是工人的命运，同时也成了拿不到薪水的中低层阶级的命运。一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年轻教师身上集中体现了这种艰难时运。

185 在将近 50 岁的时候，帕累托退休回到他在洛桑湖边的别墅里进行思考。他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人们称他为“西利格尼的隐士”。在进入 20 世纪后不久，他以一部著述重新出世，但这部书不是经济学方面的。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科学背叛了他，他现在需要的是社会学。他第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书是攻击社会主义的。在欧洲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后，西利格尼那边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1915 年，帕累托已是一位 67 岁的老人，这年他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五卷本的《普通社会学纲要》，此书以其英文名《意识与社会》而闻名。

帕累托的体系

帕累托的体系可以总结如下：

1. 社会具有很强的稳固性。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有什么事件——革命、战争、饥荒、自然灾害——颠覆了旧有的秩序，作为反应，它们会激起保守的运动以恢复秩序。在罗伯斯庇尔之后就有热月政变和拿破仑；在 1848 年之后就有拿破仑二世；在暗杀之后，国家又退回到以法律和秩序治国的政党手中。绝大多数的变化只是表面的；新的政府——不管是共和的、君主制的、波拿巴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变换了统治的意识形态，而深层的东西仍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在运行。用这位经济学家的正规术语来说，社会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一个方向的变化会由一个相反方向的变化来进行补偿。对于自由主义的革命与进步信仰，帕累托回应以一种苦涩的智慧：“万变终不变”。
2. 经济学家将人视为在各种选择中做出理性决策的个人，他们寻找最正确的途径以最大化其利益而尽量避免损失。关于此标准，我们必须认识到，绝大多数的行动并不是符合逻辑的。很多人们给出的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的理由经不起检验。他们是先做，然后再为他们的行为找出正当的理由。每个人内心的审判官根据自己同伙的权力和利益而做出决定，然后为其决定披上振振有词的合法化术语的外衣。而且，人们总是会很轻易地相信那些虚假的理由。要使人们接受奴隶制，所需要的只是给予它一个自由的名目。很多行为甚至不能用理性的标准来评价，就像农民要在牧师前下跪，它们是礼仪规定。除了

科学家、股票经纪人和少数其他人，大多数人在多数时候是非逻辑性的。因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重要科学的地位必然要被取代。

- 186
3.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们对其行为所给出的理由，可以发现在整个历史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帕累托将这些主题标示为“剩余物”（residues），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是人类的一些基本本能。有两种主要的剩余物，一种是组合的本能（发明力或创造性），一种是群体延续或者说集体延续的本能（保守的或者说安全的需要）。在人类的信念中也存在着各种可变的因素，帕累托将这些称为“派生物”（derivatives），它包括诸如基督教、民主和社会主义这类意识形态。
 4. 根据帕累托的假设，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是“情感”。情感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因为它们是一些生物性的力量或本能，可能是随着人类种族的基因流而推移的。人们只能从情感的表现，即剩余物和派生物中来推断它们。这种推论是件冒险的事，但要想掌握人类的全景就必须这样做。科学就是通过不断接近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假设一个在运转中的力量模型，用各种证据来检验它，修正模型中与证据的不合之处，再用更多的证据来检验它，这样不断进行下去。这也许就是帕累托为什么要用五卷的篇幅来阐述他的系统的原因。而且，他的生物学假设对应于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解释的科学潮流，这种风尚将个人的成败、犯罪和精神疾病都归结为种族或家

庭遗传。斯宾塞的进化论演化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物决定论。

5. 不是每个人的情感混合成分都是相同的。大多数人的最强烈的情感是保守的和社會性的情感。这是个可以从进化论立场推导出的观点；如果群体维持的强烈本能不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延续下去。这一因素解释了社会的稳定性。
6. 不管怎么说，有一些人较之其他人更为聪明、有力和更为个人主义。与自然界中一样，社会中也存在着为争取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持续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那些狡诈的人通过运用强力或者是通过迎合那些迟钝、保守的人的情感而胜出。所以总是存在着一个精英集团，革命改变的只是领导者。不过统治权的变化还是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模式。那些被帕累托称之为狐狸的狡诈之人会升到权力的顶峰。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人聚集在权力顶部，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充满原创性、充满理性、敏捷思考和新思想的氛围。但因为社会秩序主要是建立在保守本能和对安全感的需求上，所以这些狐狸是在逐渐摧毁奠定他们地位的基石。社会被逐渐抛入混乱中——战争、革命、议会斗争——于是一种反作用力开始出现。狮子们，即那些诉诸大众的保守本能的强硬人物开始接管权力。但逐渐地，狐狸们又开始掌权，利用他们的狡诈对抗狮子们的愚蠢，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帕累托所论述的政治，和他体系中的其他论述一样，无

不体现出这种动态平衡的原则。

对帕累托的批评

帕累托的理论很容易受到批评。它不能解释社会中发生的很多可观察到的变化。也许是总存在着一个精英集团，但为什么它有时候壮大，有时候又人数甚少？为什么它有时候在封建体系
187 中组织起来，有时候在世袭帝国中组织起来，有时又在群众性的政党民主制中组织起来？我们也许总是达不到平等，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财富集中程度上的差异？帕累托的研究方法颇为芜杂，其中主要包括对各经典作家（普卢塔克、西塞罗、修昔底德和其他人）所说的和各式各样的报纸文章中登载的人们对其行为方式之解释的分析和归类。生物学的解释犯了以感解惑（*obscurum per obscurius*）的错误，即用一些人们更为不懂的事物来解释人们不了解的事物。结果导致其解释不能被检验。如果有人问帕累托为什么斯巴达人比雅典人更容易受其领袖的管制，他会回答说那是因为斯巴达人具有更多的群体维持的情感。公正地说，如果帕累托所设想的那些情感具有可以独立被证实的特征——像遗传学理论中的基因后来在细胞里被发现了——的话，那么帕累托的方法就是成功的。但他的那些情感缺乏这种特征，而涂尔干的推理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个体的这些特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也不可能对社会进行充分的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种批评来对帕累托盖棺定论的话，那我们就抹杀了他的成就，而且或许是在以非他本意的事情来指责他。在他所致力的那个普遍性层面上，帕累托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

的。人们确实具有各种情感，而不只是受实际利益的驱动。经济人和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是错误的导向。对理性社会交换的偏离并不能只归因于对全部市场状况信息的缺乏，更多的教育和更好的信息交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偏离。个人经常会以非经验的、纯粹是象征性的方式行事，对于这些行为，理性行为的标准完全无济于事。而且，理性主义者关于社会的意象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是由各种非理性的情感，而不是由深思熟虑的社会契约而结合起来的。在这最后一点上，帕累托的理论和涂尔干关于前契约式团结的论述会合了。

帕森斯很重视帕累托思想中的这些因素，以及他关于持续渐进过程这种逻辑精密化和他的社会概念，帕累托将社会视为处于动态平衡中的相互作用的各部分组成的抽象系统。（这一关于社会的概念本身在持续渐进方法下被证明为假设性的。）帕森斯略去了帕累托论述中更为愤世嫉俗的方面，略去了他对政治中的强力、欺骗和斗争的强调，而以社会系统内一种新的进步式进化模式取代了帕累托保守的悲观主义。而在这点上，帕累托比帕森斯更具洞察力。在多数时候，大部分的政治生活正与他的普遍性描述相符。那些不能（和不想）看穿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察者则只是依其社会归属的利益取向而行动，而帕累托将这种社会归属感看作一种普遍的动机。1922年，也就是帕累托的著作出版七年之后，墨索里尼在罗马开始掌权。法西斯主义，这种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想象不到的新事物在现实中证实了涂尔干、韦伯、弗洛伊德和帕累托已在理论中证明了的道理：关于人类的幼稚的实证主义理论对于现实是不够的。

帕森斯的生平与著述

188 从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沉郁的帕累托转到 1930 年代哈佛大学安静的大厅里，这可是一大跳跃。但我们论述的主题还保持着某些微弱的连续性，因为在这里，塔尔科特·帕森斯正在发动一场学术政治上最伟大的政变之一。这位年轻的经济学讲师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受教于伟大的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理论还未影响到英语世界之时，他已对其颇有了解。他接着在海德堡攻读博士学位，主攻韦伯的经济史，并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介绍给美国公众。回到哈佛后，他很快就进入了在 1930 年新成立的社会学系。

作为美国学术的大本营，哈佛花了 30 年以考察此学科是否真正具有价值。当此事最后获得确证后，学校开始研究要选择一位这一领域最杰出者来作为这个新成立的系的领导者。这个人被确定为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索罗金是俄国人，曾给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1917 年俄国临时政府的领袖）当过秘书，他曾被布尔什维克判为死刑，后来逃亡国外。和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他脑袋里也装满了各种伟大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不可能在 19 世纪出现的。他出版了一本著名的论述社会流动的书，排列了当时的所有统计数据来说明他的一个理论，即人们将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归于遗传因素。之后他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四卷本的《社会与文化动力学》，详细引注了《大英百科全书》的资料，提出一种世界历史的循环论，他假设世界历史是由唯灵论到唯物论，然后再重新轮转回来的趋向所主导的。和许多循环理论一样，他的理论更多地依赖于罗马帝

国的衰落这一单一个案，体现出对非西方历史的陌生。

几年之后，帕森斯取代索罗金成为哈佛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通过策略性地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联盟，以及获得哈佛大学教员的广泛支持（帕森斯一直是世界基督教联合运动的领导者），帕森斯将社会学系转换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社会关系系，他自己作为系主任。索罗金发现自己再次被流放，这次是流放到一个研究利他行为的研究机构中。不过这次政变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事件。帕森斯将新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带入美国的一所著名大学，而今后数十年内的重要理论家都将在这所大学接受训练。几乎在同时，芝加哥大学的统治地位瓦解了，其标志是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美国社会学杂志》被新的、更具有理论取向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正式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所替代。

时代也有利于社会学在取向上的全面转变，这不只是帕森斯个人的智识和政治才华的问题。原有的进化理论和社会解体理论已经蜕化为生物学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触犯了萧条时期正在觉醒的社会良心。帕累托的狮子与狐狸和涂尔干的失范可以部分解释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及其在美国的休伊·朗^①和库格林神父^② 189

-
- ① 休伊·朗（Huey Long, 1893-1935），1928-1931年担任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在任期间实施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打破大公司的势力，并以“共享财富”计划闻名，后担任过参议员。他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支持者认为他的改革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水平，反对者认为他实行独裁，破坏权力制衡制度。——译者
- ② 库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 1891-1979），天主教神父，1930年代因广播布道而在当时的美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934年，他组织了“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鼓吹银行和信贷、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国有化。后来他则进行反犹、反共、反工会、反罗斯福的宣传。有人说他代表了天主教的法西斯一翼。——译者

那里引起的小规模回应。与此同时，新输入的社会学理论对正流行于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反应，尤其是韦伯，他在经济社会学核心处提供了一种与之相对立的理论。帕森斯最为成功的是，在自由主义似乎要在大洋两岸崩溃之时，提供了一种复兴的自由主义社会学。

帕森斯的理论发生过一些变化。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试图对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进行综合，本章开端引用的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文字。到1940年代，他对弗洛伊德兴趣逐增，而对韦伯则兴趣减弱。他这段时期的研究成就体现为他的重要的体系化著作《社会系统》(1951)。与此同时，帕森斯还在领导着一场跨学科的运动，旨在为所有社会科学（也许甚至是所有的科学）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基础。这一规划在他的《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一书中体现出来。到1950年代，帕森斯开始以模仿斯宾塞的百科全书式体系的方式（回想一下，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囊括了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所有方面）明确地超越自身：他试图要理解一切事物的努力推动他创立了一个极其抽象的分类体系，它无法构成一个可操作的解释理论的分类体系。到1960年代，帕森斯明显地再次降低了他的视野。他开始复兴作为他出发点的韦伯的历史社会学，并提出关于政治运动的新理论。至此，我们明确标示出了帕森斯的学术高速公路的几段历程，但这之后，他继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惊奇，直至他1979年去世。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

帕森斯的著述总是很复杂、抽象和难读。C. 怀特·米尔斯，

这位帕森斯抽象理论的尖刻反对者，指出如果帕森斯的著作被转换为直白的英语的话，那它不会有任何影响。他接着将帕森斯的四段文字用他自己的语言转换为一段很简洁的文字。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从帕森斯的著述中提炼出一种综合的理论，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并在某些时候具有相当力量的理论。

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

社会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所有的机制（政治、经济、家庭、文化等）都是相互影响的。存在着种种因果链条、善恶循环；历史是一张没有裂缝的网。19世纪的思想家是幼稚的，他们总想分离出一个最基本的因素：遗传、环境或是经济。帕森斯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正是这种相互关联提供了一种解决路径：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一模式类似于经济学的系统，在后一系统中，很多个体独立行动，但在不属任何人控制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这些行动形成一些可以预测的结果（比如说，价格的上涨和下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探求在所有社会中引导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规律。因此，帕森斯给他那本重要著作取名为《社会系统》。

功能主义

与涂尔干类似，帕森斯也相信，社会结构的动因存在于它与其他结构的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诸如个体这样的更小单元中。社会的各部分（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都是作为其他机制的功能，它们之间进行着功能交换，相互支持。举例来说，学校训

练公民和工人，作为回报，它受到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教会支持家庭道德观，而家庭则成为教会成员关系的堡垒，等等。其基本思想越过经济学回溯到了古老的生物学类比（亚当·斯密将其更新以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在这种类比中，社会被看作一个大型的身体，国王是脑袋，士兵是手臂，牧师和顾问是眼睛和耳朵，诸如此类。

帕森斯试图区分出一个社会的生存所必须要实现的一些基本功能。有了这些工具，就有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分析所有的社会，即使它们的机制各不相同。举例来说，我们说的政治，帕森斯将其称之为“目标达成”功能，通过此功能，某个群体为集体行动做出决策。战争是这种共同体行动的最明显的例子，对货币体系进行管制是另一个例子。（这看来是一种很狭窄的政治观念，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对其的批评。）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有可以称为国家的这种东西，如原始部落就可以只是以一个庞大的亲属关系网络而组织起来。用帕森斯的概念来说，我们应该探求集体行动的功能，而不是去寻求类似现代国家这样的事物，我们发现，在原始部落中，亲属体系起到了国家的功能，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只是家庭在发挥着这样的功能。

帕森斯喜欢对不同的差异项进行交叉分类，然后达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他的基本功能（一共四种，帕森斯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以四件套的形式出来的）体系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呈现。其每一项都被划归为属于手段或目的，以及属于外部或内部。对这些要素进行交叉分类，我们就得到了下面这个表格。

	手段	目的
外部	A (适应)	G (目标达成)
内部	L (潜在维持模式)	I (整合)

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还是帕森斯的分类中最简单的 191 一种）为什么帕森斯有深奥难懂的名声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由起首字母拼成的 A-G-I-L（或者是 L-I-G-A）模式可以被用作一种方便的记忆装置。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满足所有这四项功能：维持基本的文化模式（在大型的社会里，由教育和家庭社会化来完成此项功能），使社会成员整合进和谐的行为体系中（由宗教和法律体系完成此项功能），达成共同体的目标（由政治来实现），以及适应环境（由经济来实现）。实现这些功能的必要性是任何社会组织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因而也是其首要的决定因素。

功能主义的方法也可以用来解释个别的机制。例如，威廉·J·古德（William J. Goode）在他的论文《爱情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中就对美国社会中的浪漫爱情做了功能主义的分析。古德首先指出各社会在对待浪漫的爱慕之情的态度上有天壤之别：有些社会，像现代美国社会，将爱情视为好的事情（确切地说，是一种被要求的规范，因为结婚的理由被认为不应该是出于除爱情之外的其他因素）；其他的一些社会，如传统中国社会，就将爱情看作一种愚蠢的迷恋，它妨碍了家庭之间通过孩子的婚姻而结成协作纽带这种正式事务；还有一些社会，如日本，既不将爱情视为特别值得渴求的东西，也不将其视为特别嫌恶的事物。古德接着指出，这种爱情规范的不同是与不同的亲属制度体系联系在一起

的：中国的亲属体系是与父系家长制家庭经济 and 父系世袭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扩展式亲属关系体系，这与美国相互分离的核心家庭形成对照，而后者实际上只承担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功能。因此，在中国爱情不受赞赏，因为它会造成系统功能的紊乱，而在美国，爱情则成为一种必要，因为除了感情没有其他纽带能使家庭这一单位结合起来，以使其承担抚育家庭的责任。

当然，功能主义的解释并不是万能的，指出某些事物是必需的并不能解释它们存在的原因。还存在着各种历史因素——中世纪行吟诗人所制造出的浪漫理想以及基督教教会和婚礼仪式中所强调的永恒的理想——和社会心理因素，即个体如何调配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尽管古德的功能分析没有解答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原因和方式，但他的分析将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背景中来讨论。

社会整合

有机体类比提出了一个平衡的模式，其中各种因素似乎都是相互匹配的：就像帕累托所注意到的，社会在经历战争和灾难之后又重新恢复，人们被激发起来对越轨行为加以惩罚，诸如此类。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以往的 19 世纪理论家们的社会契约观念——认为个人出于自身利益理性地决定要遵守规则——已经被涂尔干的批评所推翻。其他理论——索罗金、斯宾格勒甚至是马克思的理论——都根本没有正视这个问题，而只是假设社会是

192 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站在 20 世纪中期思想前沿的帕森斯无法避开这个他称之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问题。这要回溯到 17 世纪托马斯·霍布斯的论断：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类的自然

的（也就是说逻辑的）状态并不是社会和谐，而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帕森斯的解决方式是吸收涂尔干的集体良知概念，即所有正在运行的社会都具有的非理性的团结感。帕森斯给它另取了一个名称叫“价值系统”，这是受人类学家关于一个社会中代代相传的文化价值之论述的启发。但是，如何解释价值系统（或集体良知）对个人的强制力？帕森斯在这里抛弃了涂尔干的群众心理学而代之以弗洛伊德。集体意识可以存在于个人良知当中，也就是说，存在于超我之中。于是，弗洛伊德的社会化观念——孩子认同于实施惩罚的父母并将父母的要求内化——就成为社会对个人施加影响的基础。这样，帕森斯就将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联系了起来，从而完成了他的体系的核心部分。这一关于社会秩序的古老问题最终就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得以解决了。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推论出各社会之所以各不相同，是因为它们在抚育孩子时教给了孩子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帕森斯将这些价值观分类为他所说的几种“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或者说是人们与他人交往时被预期会选择的几种基本倾向。举例来说，人们会或依据对方的行动〔后致性（achievement）〕或依据其身份〔先赋性（ascription）〕来判断对方。美国社会很强调后致性，而中世纪社会则更关注一个人是否生为贵族、农民、基督徒或是犹太人。另一项基本的选择区分是：是根据像法律那样的抽象而普遍的规则〔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来对待他人，还是根据像友谊这样的个人关系〔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来对待他人。根据各社会对不同价值观的组合，可以对各社会进行分

类。依此观点，帕森斯认为美国总体上是一个后致性取向的、普遍主义的国家；中华帝国是后致性取向的、特殊主义的国家；德国是先赋性取向的、普遍主义的国家；而拉丁美洲则是先赋性取向的、特殊主义的。如下表所示：

	后致性	先赋性
普遍主义	美国	德国
特殊主义	中国	拉丁美洲

社会变迁

社会系统或通过“分化”（differentiation）或通过“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而发生变迁。这分别意味着劳动分工程度提高，各结构在功能上也日趋专门化；或者劳动分工程度降低，而结构则承担更多的功能。在经济学中，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观念：¹⁹³ 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是劳动分工程度很低的系统的一部分，而具备了分化的食品生产者、衣物制造商和铁路建造等因素的现代经济则具有高度的社会分工。将这一观念推及整个社会结构，并将家庭、教堂等其他机制的功能考虑进来，我们就能将各社会排列在一个从未分化社会到高度分化社会这一连续体上的相应位置。在这个光谱的最低端是原始部落，在这些部落中，亲属制度系统是唯一的社會结构，它独自完成所有的功能。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如现代美国这样的由高度分化的各社会组织构成的一套复杂系统。

在社会学领域，我们发现这一思想由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帕森斯发展得日渐复杂化。随着劳动分工的提高，社会的效

率和生产力也提高了，正如批量生产的工厂比旧式的手工作坊的成本更小、产量更高。帕森斯追随涂尔干指出，文化系统是随着社会结构而变化的，当社会日益复杂和分化，文化也得以“提升”——更抽象、更普遍化。帕森斯对于原始信仰中的特殊化、地方性和自然神发展到普遍性的世界宗教，再到现代的、信仰交叉和伦理性社会的趋势（第六章描述过）即做如是解。但分化也会产生问题，特别是各专门部分的劳动分工程度越高，整合整个系统的压力就越大。在经济学上，这就意味着工业方面的劳动分工必须通过新的货币和信用体系来进行整合。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分化所造成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方式如政府支持的教育、福利、老年保险等来解决。

是什么促使社会发生变化，从一种分化层次发展到另一种分化层次？科学发展是一个原因，经济发展是另一个因素。新的科技发明，像蒸汽机、汽油动力汽车、收音机等发明，改变了人们生产、搬运和运输商品及沟通的方式，由此引发了人类组织的变迁，这些组织的分支遍布于相互联结的社会结构网络之中。经济上的发展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纳入到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体系之中，使各方面的专门化得以提高，并产生出新的代理机构来协调各种事物。变迁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前一次变迁未完成各部分的整合。因此，如帕森斯派的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所指出的，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对原有的家庭体系造成张力，因为工厂的工人再也不能将他们的孩子留在身边帮他们干活，政府通过设立学校和禁止童工而逐渐接管了对孩子们的责任。于是，与之相适应，家庭就逐渐转换了功能，成为现代的核心家庭形式。

这些都是短期的变化，只要科学发现和经济变化的过程开始后就会发生。对于长期的变迁，帕森斯则采用了韦伯的历史理论（在第七章中已有阐述）。他与韦伯的主要区别是他略去了政治斗争，在韦伯那里，政治斗争是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帕森斯则主要关
194 注宗教信仰的变化。由于帕森斯认为社会是由其基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所以价值观变化是社会变迁的首要动力，而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古代的伟大预言者，圣保罗、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就是确立新价值观的关键人物。但是，从长远看，文化传统比单个领袖更为重要，后者只是发展了原本内在于传统中的某些潜力。

帕森斯的宗教社会学

帕森斯的学生还能记起他讲授宗教社会学的情景，满满一屋子的听众中有天主教修女、穿着藏红色袍子的佛教僧人、留着胡须的拉比和穿着里维斯牌牛仔裤和斜纹夹克衫的哈佛大学本科生。帕森斯将世界文化史描述为这样一个序列：从远古的万物有灵论信仰到希伯来预言者和他们的有报复心的全能上帝所体现出的“工具性行动主义”（instrumental activism）；然后经过早期基督教以及中世纪力图使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努力，再到马丁·路德对僧侣制度的废弃——这提升了基督教的职责，使人人都成为僧侣；再到加尔文坚持尘世与天堂王国具有同样的正义性，这一观念由那些在马萨诸塞港下船定居的加尔文教徒带到了新世界，而正是这些人奠定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基督教伦理逐渐世俗化为一种获取成功的取向，它包容各种信仰，并引发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变迁；最后，我们看到，文化史

上的代代相传，最终传到了我们眼前的这个加尔文派传教士的儿子，同时是悠久的传教士传统的继承者（他的名字体现出了这一点^①）身上，他使我们痴迷地关注这一到达顶点的体系，在这里，文化史最终达到了完全的自我理解。在这一序列展示中，斯宾塞变得无足轻重，而历史上一些预言式的巨人，如黑格尔、但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则突显出来。

确切地说，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学体系是对从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转向现代世俗思想的更复杂的要求的一种适应。与很多当代社会科学家不同，帕森斯相信自由意志——如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阐述的，这是一种关于社会中的人类的意志论概念。在这里，他与实证主义决裂了，后者不屈不挠地努力要把人类置于物理科学的决定论法则之下。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秩序和行为的可预测性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必需的，就像基督教学既认为人是自由的，又坚持上帝决定一切一样。

帕森斯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解释这一宗教悖论：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他们是在其他同样是自由的个体在场时进行选择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和谐一致地行动，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教导他们什么事物是值得去追求的以及追求这些事物时应遵守的规则。人们并不是非要遵守其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但他们发现遵守规范，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他人都是最好的方式。

各种已形成的规范中通常必须包含一些酬赏，这样人们相互之间就可以因为做了必需之事而获得酬赏。像以亚当·斯密理论

① 帕森斯的英文拼写为 Parsons，而 parson 在英文中为“教士、牧师”之意。——译者

为基础的功利主义者那样，帕森斯也将世界视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而结合起来的。在这一系统中，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着各种交换。交换物有时是经济性的——工作以获取报酬、用钱买商品——但帕森斯加上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维度，使交换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的事件，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事件。人们不仅交换商品，还交换联系和感情——赞同与反对、归属感以及社会团结感。所以，那些遵守规范的人所收获的是归属感和受人尊重感；而那些不遵守规范的人所得到的惩罚就是被人类社会所孤立。帕森斯将古老的道德教诲融入到他的社会学中了：为善者能得福，作恶者遭报应——即脱离于上帝（或社会）。

这样，社会的功能性强制力就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人们可以不按照那些要求行事，但这样的话，惩罚会立即接踵而至，他们身边的世界就会崩溃。超实证主义者涂尔干通过论述神不过是社会道德秩序的一种象征性体现而以科学的名义揭穿了宗教。帕森斯这位美国的世俗化神学家则转向论述的另一面，声称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秩序。不管人们作为个人是如何反抗社会秩序的要求，但他们都基本了解这些要求；有些人会偷窃、欺骗、撒谎和打斗，但没有人会想要一个人都如此作为的世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上帝最终是要比魔鬼强大的，魔鬼对此也有自知之明。尽管强力和暴力最终也是这个秩序所需要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①一样，帕森斯认为要

① “宗教大法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著名章节，书中的一个人物谈到假想的基督与大法官的一场对话。大法官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必须以上帝的名义进行专制统治。——译者

强化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权力是必需的。权力的执行者——国王、将军和政治家——可能会获取极大的私利，但如果没有他们，社会就会瓦解为任何人都不希望的一片混乱。因此，一些人就被选出来以执行上帝的意志，不管他们自身是否意识到这点。

帕森斯不仅在他的体系中结合进了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观念，还将 19 世纪乐观主义的适应观和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结合了进来。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变得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更强大，而且变得更为正义。当价值体系从先赋性转向后致性，从特殊主义转向普遍主义，人类也就更具有人道主义。酷刑、公开死刑、对精神病患者的残忍做法以及烧死女巫等行为都将逐渐在更为现代的社会中消失。普遍化的兄弟情谊将会广泛传播——从人人只相信自己的亲属的社会到国家认同感的产生，而（乐观地说）这种认同感现在超越了国家的界线而达致全人类。政治也越来越具有参与性和正义性。在排列进化的各阶段——所有的社会要达到更高分化的（由此更为现代和更强大）都必须经历这些阶段——的清单时，帕森斯相当民族中心主义地将民主作为所有真正的现代社会体系要经历的必需阶段。不管有些人是否愿意接受民主，它是获得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政治领域及其他领域，帕森斯的上帝在整个历史中越来越明确地显示出来。

帕森斯的贡献

帕森斯的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在他的政治态度上最明显地 196
显露出其弱点。帕森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转型现象，它是由理性经济和与传统断裂的科学文化同旧的家庭、社区和政治世

界进行斗争时的产物。帕森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涂尔干所忧虑的过度理性的社会将会摧毁社会团结这一问题，他也没有考虑过韦伯的警告，后者认为现代官僚组织抹杀了负责任的社会领袖的权力，从而将使我们堕入一个充斥着官僚体制漂浮物的世界。像早期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一样，帕森斯对政治持一种过于绅士化的态度，对各种权力斗争视而不见，而在这种斗争中，各派别的利益根本不同于整体系统的利益。由于帕森斯只关注社会的功能性方面，他无力解释更广泛领域中的各种现象。与他的前辈一样，帕森斯过于关注处于顶点的事物，以致不能充分理解下面的世俗世界中所发生的事。

帕森斯方法中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过度抽象化。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良知指的是各种真实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感受，而不是一个看不见的飘浮在空中的巨大气球，它就正好覆盖在美国或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边界上，上面标着“价值体系”。以同样的方式，帕森斯将社会系统这一很一般性的观念具体化了，将它等同于国家，而没有注意到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相互之间相对没有关联的群体，它们之间互不往来或相互冲突。现实中是有某些方面符合他的社会系统比喻，但帕森斯的错误在于他由此跳跃到认定其所有方面都是如此。社会有时候会在一场战争之后团结起来，但在相当多的时候，它们会分裂成新的社会；动态平衡这一基本假设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变量，而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普遍过程。由涂尔干的洞见出发向前发展的途径不应该是使其更为抽象，而是要去考察在诸如茶会、外交招待会或精神病医院的走廊等场合各个群体是如何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集体良知

的。我们将要在第十四章中谈到，欧文·戈夫曼在从事着后面这类工作。

帕森斯对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倡导了高层理论（high theoretical）传统，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在那个时期，很多社会科学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是需要提出的。他对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的伟大洞见进行了重要的综合，并在他正在构建的宏大模式中展示了韦伯所处的位置。即使功能主义解释还远不足以解释人类冲突之现实，以及解释一种机制所发挥的功能与它之所以存在之间的关联，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关注到了社会结构的多重相互联系。最后，帕森斯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献给 21 世纪的：他将我们关于自由意志和人类意识的知识作为事实保存下来，留待我们的理论发展到足以解释这些神秘事物的时候。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阴影：米歇尔斯、曼海姆和米尔斯

197 1930年代的这十年间形成了自1790年代法国革命以来的对流行世界观的最大冲击。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发生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掌权。这是一场独裁的、反现代、反科学、反理性和反民主的运动，它否定了人们所认为的在这200年来正在逐渐形成的一切理想。更有甚者，法西斯主义并不只是少数倒行逆施的贵族所发动的一场阴谋，而是确确实实地有数百万狂热追随者参与的普遍性的大众运动，而且它是在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爆发的。

1917年的俄国革命导致共产主义者掌权，这已经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信仰的骄傲给予了一击，但它远不如法西斯主义的成功这一打击严重。不管怎么说，至少，西方思想中的一支一直在预言会有像俄国革命这样的一场革命，但不管怎样，它会作为一

种在落后国家中进行的现代化努力而被吸收。无论如何，俄国革命是可以被吸收入现有的思想模式中的——但法西斯主义却不能！在它发生之前，甚至没有人能够想象它可能发生。它既然已经发生，就必须得到解释，此后，这一要求一直成为我们的关注重心。对它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并不都是正确的，但 40 年来，我们一直在希特勒的阴影下思考。

当然，法西斯主义并非无本之木。自 19 世纪下半期以来，反犹太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浪潮一直在不断涌现。1922 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一个先前的社会主义领袖，在与他的黑衫队进军罗马后，在意大利掌权，为日后经济与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埋下伏笔。而 1923 年，希特勒从流产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开始了他缓慢爬向权力顶峰的路程。在希特勒 1933 年被任命为总理之前，法西斯主义在缓慢地、完全公开地积蓄着力量。理性的人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倾听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并对其做出反应，但大多数人最终发现它与他们原本的设想如此冲突，从而忽略了它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者在 1929 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后，更是试图将法西斯主义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但为什么这种垂死挣扎与马克思似乎已做出的预言如此不同？而且这一事件似乎并不只是某种经济事件——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成功地恢复了德国的经济繁荣——它是更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社会本性中的某种东西，是这种东西使人们对危机（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做出非理性的反应。马克思主义是 19 世纪的理性主义预设中的一部分，而这些预设看来已不再有效了。

另一方面，俄国苏维埃乌托邦实验运行得很糟糕。斯大林和托洛斯基（Trotsky）之间的权力斗争到1930年代转化为一种恐怖统治，世界目睹了那些原来的革命领袖以叛国罪被审讯和处决的惊悚剧目，最后，被流放的托洛斯基在他的墨西哥的别墅中被杀，暗杀者的铁镐劈进了他的脑袋。斯大林的独裁基本抹杀掉了左派的乐观主义，希特勒的独裁则震惊了整个世界。科学和工业在继续向前推进，发明出了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原子弹，但原来的那些希望已没有了。世界突然失去了意义，作为个体的现代人发现他们在由他们所创造出的各种物质中迷失了方向，就像弗朗兹·卡夫卡^①小说中的人物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经预示了人类理性的这种幻灭。这是一场所有人在最开始的爱国热情发作之后，都认为毫无意义的战争：由一个外交上的小事件所引发，而一旦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启动，就无法停止，它以数百万生命的代价在西线的战壕里拖延着，最后以未解决任何事情而结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作为现代文学特征的幻灭感成为思考者的普遍特征，它通过达达派、T. S. 艾略特（T. S. Eliot）、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其他“迷惘的一代”传播开来。

这种幻灭感在左派那里显得更加尖锐，因为社会主义者曾明确地希望能阻止这类战争。他们声称，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在军队里送死的都是工人；因此，要一个国家的工人为了他们老板的利益去杀死他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是荒谬的。

^①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作品多表现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与异化，著有小说《变形记》、《城堡》等。——译者

人们指望在德国与法国的工人阶级中已发展到具有相当大的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能维持和平。但是当1914年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在萨拉热窝被暗杀而战争正式开始时，社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当时流行的沙文主义模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投票支持为军队提供紧急战争基金，从而明确支持了当时德国皇帝的战争政策。

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

至少有一个人对这种毫无原则的转向并不感到吃惊。他就是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尽管有马克斯·韦伯的推荐，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还是未能在德国的大学体制中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米歇尔斯广泛参 199
与了各种政党活动，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者们并没有真正按照他们的理想去做。虽然社会民主党鼓吹民主，但其自身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在各种大会和国会大厦大厅中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演讲只是为了激发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支持，而政党的领导人只是建立了一个官僚制的工会和政党机器以为他们自己提供一些清闲高俸的职位。

米歇尔斯在1911年出版的《政治党派》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析。他声称，政党寡头制（party oligarchy）是相当普遍的；如果在一个宣称是民主的组织中并不存在着内在的民主，那么那些没有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政党中当然就更不会有民主了。这一原则被称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这是对群众性组织功能的最伟大的概括之一，后来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规律。

寡头铁律是这样运作的：首先，在一个组织中总是只有很少数一些人是实际的决策制定者，即使其权威是以大多数成员的名义正式授予的。其原因纯粹是功能性的，每一个参加过公开会议甚至是大型的系列会议的人都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想发言的话（尤其是当一个以民主方式管理的新组织刚成立的时候，成员们会在最初的热情的鼓动下这样做），那么实际上什么事也干不成。讨论会漫无期地延续下去，而甚至不能涉及所有必须讨论的问题，直到最后，大多数成员离开或者保持沉默而让少数人来提出他们的计划。不用多久，这个群体就会赋予少数成员以制定和执行各项计划的权力，而大多数成员的权力只限于对提出的计划进行选择 and 表示赞同。

其次，米歇尔斯说，那些被授予了这种权力的领导人会趋向于比那些选出他们的其他成员拥有更多的权力。一旦掌权（不管是被选举出来的职位还是纯然是一种非正式的领导角色），他们一般会在那个位置上待很长的时间，因而相对来说，他们不大会受到来自下面的影响。新的领导者开始掌权主要是通过选举或由原来的领导者从上层指派的途径，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从下层升上来。这部分是由组织的功能决定的，部分是由权力资源在组织中的分配方式决定的。

相对于普通成员来说，领导者是一个相当小的群体，但其优势在于他们的组织化更强。组织中的成员只是在偶尔的会议和选举中才全部（如果可能的话）聚齐，但领导者们之间则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这些领导者会构成一个联合的、幕后的非正式群体，因此他们之间可以更方便地制订计划、运行项目、通过私下个人

之间的谈判救平不同意见，这在公开会议的既定章程下来进行这些操作要更为便利。但是因为领导者是通过彼此间的密切联系来运作各项事务的，其运作处于普通成员的视野之外，因此他们会趋向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他们是“内部人”，对怎样操作事情、怎样达成协议、怎样形成策略等有自己的一套老于世故的观念。他们知道各种诀窍，知道新的领导者必须被引入到他们这个操作圈子，因此新领导人必须从上层中选拔出来，而不是从下层中推举出来。

再次，领导者会逐渐形成与普通成员不一样的价值观。在这 200 里，米歇尔斯应用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原则，即人的观念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政党领导人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不同于普通政党成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参与组织的经历是不同的。对于普通成员来说，组织是他或她所归属的、并时不时参与其活动的某种东西，但并不总是他或她生活的中心。普通成员希望他们的组织为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奋斗，但他们所希望的也仅此而已。

而领导者所处的地位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组织通常是一个全职的工作，或者至少是他或她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尤其当这个组织足够庞大和有权力，可以付给其官员薪水的时候。这些官员因他们的职位而获得金钱、权力和声望，并经常有机会进入到其他更高的精英圈子中。工会领袖保持着与公司官员的联系，社会主义的代表在议会中和其他掌权者坐在一起。这并不奇怪，米歇尔斯说，这些领导已被微妙地腐化了。他们越来越不关心普通成员的利益和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关心他们自己如何保住职位。领导者会趋向保守，他们只希望保存其组织，而不

希望危险的冒险行为对它造成危害，即使组织的理想要求这样。

但领导者的腐化难道不会使他们与追随者发生冲突吗？即使在某些时候出现了这种情况，米歇尔斯说，领导者在这种斗争中也是占优势的。除非其成员对某些事极为不满——有时即使这样也不能——他们一般不会发动成员们撤换掉领导者。因为组织中的权力属于那些控制着行政资源的人，而这些资源掌握在领导者的手里。而这些领导者比一般成员具有更好的组织。他们有更好的信息渠道，因为他们对组织内外的最新动态有持续的了解，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在他们内部之间通常也是相互保密的——来攻击他们的对手不了解情况、不现实。他们控制着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散发通讯、召开会议、制定日程、写作正式报告。他们有全职的时间投入到组织的各种事物和组织政治中来，而他们的对手则往往是兼职的业余者；领导者还有财政支持、有作为助手的职员、有各种关系以及各种操作诀窍。

最后，已然存在的领导层就获得了合法性，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是组织的代表，而他们的反对者则被指称为“小派系”和“分裂者”，后者只代表他们自己，并且是通过制造内部纠纷而帮助组织的敌人的人。统一的领导层可以拥有超出与其成员数目比例相应的权力，因为他们掌握着组织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资源。米歇尔斯所提供的是某种关于阶级冲突和一个阶级如何运用种种手段而占上风的微观马克思主义，只不过他的分析背景是单一的组织而不是整个社会。但是，米歇尔斯对今后的历史会颠覆这种权力资源分配不抱希望。只要还存在着大型的组织，就必然会是这种结果。“谈论组织”，米歇尔斯声称，“就是在谈论寡头政治。”

米歇尔斯的分析是相当敏锐的。后来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各种类型的正式的民主制成员组织中，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政党、商业联合会、俱乐部、议会、慈善团体、家长教师协会，以及从美国医学学会到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所有专业协会，都存在着权力从成员手中转移到那些控制着行政机制的领导者手中的现象。当然，寡头制铁律并不是说普通成员们就没有任何控制组织的权力。宣称这类绝对结论的理论通常是错误的，因为现实总是更为复杂和更具变化性。如果对米歇尔斯的理论进行恰当的理解，那么它所阐述的是，各成员在组织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形塑了他们的利益，并且为他们在与其他人争夺组织控制权的斗争中提供特定的组织武器。它并没有说领导者总是完全腐败的或者说他们总是可以随心所欲。

美国的政党历史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一直很深地受到政党头目和职业政客——从安德鲁·杰克逊的政党分肥制（spoils system）到近期的总统竞选——的影响。米歇尔斯所描述的组织控制技术在几乎所有政治竞选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当然，时不时地会有些改革措施，偶尔也会有一些更关注大众要求的政治家上台，久居要职的政党头目有时候也会被替换掉。因此，米歇尔斯的理论并不是在阐述某些绝对化的事物，而是关于各种变体的理论，他只是描述了各种变体中最典型的一种结果。后来的研究表明，组织寡头制的危险尽管一直存在，但它随着组织的类型和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寡头制性质最强的组织形式是那些成员数量多且分散的组织，它们具有受领导者控制的大规模的、中心化的行政管理机器。

寡头制程度小的组织是那些其成员经常性地参与组织活动并且必须依靠成员的支持与其他协会竞争的组织。米歇尔斯对实现真正民主是持悲观态度的，但我们看到，至少还存在着克服寡头制的某些可能性。

米歇尔斯的理论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应用成果丰硕。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在他为帮助阿巴拉契亚的贫穷农民而对罗斯福新政中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项目所做的经典研究表明，在政府机构也同样存在着这种过程。这种官僚体制当然不同于政党，因为它并不声称自己是受其成员控制的，而是由作为政府首脑的选举出来的官员来掌控。但是这两类组织中都存在着类似的过程。在组织运行的过程中，官僚制的成员逐渐具有了各自的利益和观念，这使他们游离开了立法者最初创立这一体制而设立的职务目标。与政党官员一样，行政官员也越来越关心其组织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要去实现某些理想。举例来说，TVA不久就倾向于保护南部有权势的富裕农民，而忽视了贫苦农民和公众整体。塞尔兹尼克说，组织理想中的自由主义音调还存在，但只不过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的外壳而已，类似于米歇尔斯提到的德国政党领导人的激进演讲。

从整体上看，是组织在控制其成员，而非相反。官僚体制和政党一样，都依照自我保护和自我扩展的原则行动，而不关心更大的社会的利益以及组织自身所宣称的目标。这些理想只是漂浮在表面，遮蔽着我们的视线，使我们不容易看到下面的组织现实。我们认为社会世界是理性的和有目的的，但这种表象是有欺骗性的，事情并不能真正被任何个人所控制。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立场证实了米歇尔斯的这种悲观观点。他后来在意大利的一所大学里任教。德国学术系统无论如何也不接纳他。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开始兴起时，米歇尔斯是采取支持态度的。对于他来说，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公开拒绝至少是一种诚实的表现，而且他确信，如果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产生出强硬的领导者。

曼海姆的社会相对主义理论

米歇尔斯就此从学术视野中消失了，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没有消失。另一位德国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充分阐发了这些问题。曼海姆受过社会学和哲学的训练，1920年代后期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学校附近是德国第一所社会学研究所。其资金是由一位百万富翁制造商捐赠的，他是法兰克福大学一名学生的父亲。看来他似乎不太清楚他所资助的机构在干些什么，因为法兰克福研究所成为了一个融合韦伯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思想复兴的熔炉。围绕着这一学院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物，他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被纳粹驱逐出德国后，在美国的社会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著。这一学派的人物包括《权威人格》研究中的灵魂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佼佼者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文学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分析进行再阐述的魏特夫（Karl Wittfogel）、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20世纪中期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预言家赫伯

特·马尔库斯。在这一氛围中出现的曼海姆，是其中最为保守也最具名声的人物。

曼海姆最早是以 1929 年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确立其地位的。他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的，试图在现代社会中为自由主义价值观找到一席之地。这些价值包括相信理性和民主是人类福利、自由和文化的最好保障。但这些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曼海姆
203 直接面临一种挑战：不再有任何事情是真正可信的了。任何价值观都不是确定的，任何真理都不是确切的。

目前的现实是：人们已经揭穿了他们原来的种种假设——首先是宗教的教条主义，而后是世俗的人文主义——而认识到各种观念的社会相对性。这种相对主义并不是曼海姆自己发明的。1920 年代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阐述者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 (Max Scheler)，但其根源可溯及尼采、马克思和黑格尔，最终可追根溯源到启蒙时代将一切假设置于科学理性检验之下的主张。在解释曼海姆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步认识到，不存在独立的“真理”、“价值”这类东西，有的只是某些人的观念。而且，那些持有这些观念的人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世界，他们都处于各种特定的位置上，而这些位置影响着他们的观念。曼海姆说，如果我们认识到绝大多数个人根本就不会自己创立出新观念，而是重复他们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追踪其社会地位对其观念的影响。任何社会时代的基本观念都是出自一小部分思想家精英群体。如果我们考察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我们就可以发现决定其思想的因素。

例如，在中世纪欧洲，教士和僧侣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他们

统一在天主教教会之下，后者对全欧洲施行普遍的精神统治。与之对应，他们的观念采取的是一种神学与哲学的普遍性体系的形式，它宣称要使整个世界还原为秩序，并教条式地断言这就是真理。这种观念在比如说托马斯·阿奎那（Aquinas Thomas）的《神学大全》中有所表现。当教会开始丧失其对知识分子生计的专断控制之后，这一绝对虔信的时代就崩溃了。这种变化首先是由教会的种种改革和分裂开始的，接着是工业革命，后者产生出了一批新的、有读写能力的中产阶级听众。知识分子们可以靠在开放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书和文章以谋生。这反过来意味着存在着各种观念的竞争，这就逐渐引向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存在着无数关于世界之观点。观念的自由市场产生出了相对主义哲学。

那么，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吗？如何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知识体系，其知识已被实验所证实，并为持有不同时空观的很多代人的批判性思考所不断提炼？的确，曼海姆几乎没有关注到科学知识，但这是因为他认为它与他的主要关注点无关。他所感兴趣的是关于社会，尤其是关于政治的思想，正是对这类思想来说，社会相对论是尤其重要的。

政治信仰总是将我们对现存事物的分析与我们的是非价值观结合起来。像“民主”和“自由”这样的概念就具有这种双重属性；它们不仅声称事物是如何运行的——这是自然科学的目标——而且还声明它们应该如何运行。因此，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这一问题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所能解决的——至少不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但这却正是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传统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运用理性，而不是依靠教条或暴力，来寻 204

求处理人类事务的正确方式。我们将会看到，曼海姆并不想放弃18世纪思想家的这一希望，但他的理性告诉自己，必须首先面对相对主义的问题，而后才有可能谈论任何有关实现这一希望的问题。

曼海姆认为，政治思想分为五个主要的阵营：官僚制保守主义、传统（历史）保守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官僚制保守主义。这是行政官员们的立场。其首要原则可表述为“别破坏现状。”它声称除了事务操作方式的技术性问题之外，不存在其他什么问题，它不会费神去提出诸如什么是应该做的和为什么应该做这类问题。它只是希望维持现存的运行方式。曼海姆说，官僚们试图将所有的政治问题简化为管理问题。这种态度存在于各地的管理者和技术专家之中；它处理价值问题的方式就是否定价值问题的存在，当然，它也包含着保持官僚机器运转这一价值观，并以此构造出了官僚们的意识形态。

传统保守主义。这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富有的地主和地位稳固的神职人员的观点。与官僚主义意识形态相反，它宣称，历史并不受规划和决策所控制。这些保守主义者青睐于自然主义式的隐喻：社会就像一棵正在成长着的树或者说是一条流动着的河流，在几百年间不断发展，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对时间的自然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持这种尊重传统之论调的是那些在由过去逐步发展到现在的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正是那些端坐在最高枝头上的人在赞美他们假定的那种和谐发展。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种哲学宣称人类有能力推理、规划和

决定他们的命运。它指出保守主义论述中的一个缺陷：传统观念宣称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东西并没有使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从中受益；因此，最好的治理形式就是所有人，或者他们的代表，集中起来决定公共事务。真理并不只存在于教条和传统中，而是个人通过理性推理可以达到的某些东西。

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走得更远一步，它认为人类不仅在知识观念方面不一致，而且具有实际的利益冲突。政治治理，即使是民主式的治理，并不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展开论辩以确定出所有人的最佳利益的社会；它所维护的法律和某种经济制度所有权是使某些个人得益而束缚其他个人的。简要地说，社会主义思想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要把人们的视线从他们的物质境况上转移开来的意识形态，同时，物质优势决定了谁能够参与有关治理的论争。真理只能由工人这一革命阶级来揭示，只有他们能够摆脱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因为他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东西。 205

法西斯主义。当社会主义的观念开始逐渐为人所了解之后，最终法西斯主义出现了。自由主义民主被揭去了面具而被指认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很快社会主义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人们不久就发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并不是超越性的，它所代表的不过是另一个阶级的利益，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历史的论述也被揭示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观念。法西斯主义，曼海姆说，就是在这种彻底的相对主义背景下出现的。其逻辑是：如果你不可能正确，那么你至少可以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对获得政治真理之可能性的嘲讽引向了机会主义和对权力本身的崇拜。法西斯主义是

一种失意的、边缘化的政客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它的追随者主要是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希望回到教条式的确定世界中的人；在混乱时期，总会有一部分人愿意牺牲一切以换得受到保证的法律和秩序。

如果以上每一种立场都是由相应的社会群体——官僚、贵族、中产阶级企业家、工人和机会主义理论家——的社会利益所决定的，那么哪种立场是正确的呢？我们如何能够在它们之中做出选择呢？曼海姆给出了两个答案。他指出，首先，这些哲学主要是由知识分子阐发的，之后他们把这些观念兜售给那些最有利于他们的阶级。知识分子自身是一个混杂的群体，其成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级。这就使得知识分子的立场成为一种独特的立场，不依附于任何社会阶级，也因此潜在地会依附于任一阶级。举例来说，马克思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却把自己与工人阵营联系在一起。因此，“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就是超越任何特定的阶级利益。如果说他们能够将自己依附于任一阶级，那么他们也能够不依附于任一阶级而对以上各种意识形态中的洞见加以综合。由于知识分子所处的特殊立场，他们能够阐发出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

但是这一立场是什么呢？曼海姆的第二个答案是从对价值观的历史审视中引发出的。没有什么价值观是绝对的。在某个时期被人信仰的价值观在另一时期则不被相信，而且，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对生活的见解。任何一个群体如果试图通过宣称自己的价值观普遍有效而将其强加于别的群体，这就不仅是在犯一个知识上的错误，而且是在实施一种强制行为。困境就在于，

我们总是在做出各种行为选择，因而我们不能没有价值观，不管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但是，曼海姆说，至少人们有可能做到意识到这一点，而放弃那些与时代不符的信仰。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与中世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它把世界秩序说成由上帝决定的，其中贵族控制并保护着他们的农奴，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也像上帝对待他的世界一样）。在现代，只有当地主试图通过援引这一观点来压低农场工人的工资时，它才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尽管他现在是在市场经济中运作，主要关注的是利润。

因此，曼海姆的评判标准就是，观念应该与历史发展相适应。²⁰⁶ 我们不可能掌握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对与错，但我们至少可以要求这些观念在其产生的时代中能够在行动上付诸实现。不过曼海姆提出了一个部分的例外，即他称之为“乌托邦”的那些政治观念，他认为这些观念是为新的社会阶段所做的准备。因此，卢梭式的自由理想虽然是一种 18 世纪的乌托邦，但它预示了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它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曼海姆列出的五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除了一种外，我们会发现其余的构成了一个历史序列。这一例外就是官僚制保守主义。从官僚制在 17 世纪开始发展一直到现在，它所采取的都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反政治的姿态：时代在变，行动的理由也在变，但官僚制则一直向前推进。其他四种意识形态则可排列成一种历史发展序列：首先是传统保守主义，它在前现代的贵族及教士社会中占支配地位。这一意识形态受到了上升的实业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挑战，相应地，后者

在工业革命的形成期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前进中的工业主义生产出了工人阶级和他们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后，由于以往的意识形态不能正确地表达出现代世界的本质，现代社会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其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但是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至少从曼海姆的立场上来说是如此。毋宁说它是一种关于混乱和挫败的意识形态，它只是去拥抱这一危机，而不是指出解决危机之路。目前所缺乏的仍然是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治学，而曼海姆自己就试图提供这样一种政治学。这就是他下一本书《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35）的目标。

曼海姆的现代社会政治学

曼海姆是从一个人们逐渐熟悉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开始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19世纪，实业家的经济自由是很重要的，那时候，他们为争取将市场从传统的各种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建立现代工业社会而斗争。但是现在，自由市场体系已经获得最后胜利，工业主义成为一种正在运行的系统，它必须受到控制以避免它对我们造成毁灭。由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控制而实施的计划经济是必需的，以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及其他灾难。

同样，曼海姆说，我们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也一直奉行放任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资产阶级时期的代表性意识形态，个体实业家的榜样以及他或她的私有财产影响着人们将自己设想为独立和自立的个体，能够塑造自己的命运，除了向社会要求走自己

的路的自由，他们对社会别无所求。但是，当现代社会中的人类 207
互动制造出了似乎无法协调的冲突（例如，阶级冲突，不管是
以工会形式还是以革命形式），个人主义哲学则提供不了解决之道。
我们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直到人们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后者许
诺要通过彻底的暴力恢复秩序。但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解决根本的
问题，它只是通过极权主义的压制而把问题掩盖起来。就像在经
济领域中必须应用某类凯恩斯主义的策略一样，曼海姆宣称，我
们只有在社会领域引进计划才能享受到现代社会的好处。

曼海姆发现，现代社会的社会及政治灾难，与经济问题不同，
是由两种主要趋势造成的：基本的民主化原则和日益增长的相互
依赖原则。

将越来越多的民众纳入到政治生活中，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逆
转的潮流。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 1830 年代就已注意到了这
一趋势，到曼海姆的时代，这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今
天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在第三世界的新国家中将会发生一样。
但是，曼海姆说，在政治参与意义上的基本民主化并不能自动地
导向个人自由的增长和政治生活的提高。这种增长和提高的印象
是在 19 世纪早期民主化的最初阶段中形成的，那时工业革命使
受过良好教育和商业训练的中产阶级进入了政治领域。当他们
赢得选票并掌握各种职位，他们就把他们特有的理性主义带了进
来。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他们改善了原来的传统主
义，并形成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认为现在公共事务可以通过
知识和人道来解决。

但在工业化后期，其他的民众被动员进入到政治领域，这反

转了早期的成果。城市化、交通和大众媒体使更低层的阶级（小商人、工人和农民）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他们也赢得了选举权。但其结果是将政治辩论降低到民众煽动的层次：诉诸情绪而非理性，讨好那些希望简便快捷地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诉诸从智识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民主的早期阶段提升了关于自由和理性的观念，而大众政治的后期阶段则为潜在的独裁开辟了道路。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各个部分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一个国家经济，而不是一系列地方经济，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民政府、遍布全国的交通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中心化了的大众媒体，所有这些都使很大数量的人群在功能上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中一个部分所发生的危机和冲突不再是孤立的，而会迅速地影响到系统的其他领域。由于越来越相互依赖，我们也变得越来越易受冲击。人类受种种发生在遥远之地的金融事件、政治决策和文化时尚的影响，他们被那些他们既看不到也不能控制的事情所困。

208 由于各种事物越来越相互依赖，社会中的权力基础也越来越集中。经济由一小部分势力广泛的公司和调节货币、信用和商业的中央政府代理人所控制。由于社会逐渐依赖于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交换系统的协调功能，那些能够调控这一功能的组织就必然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有权力。于是我们的生活就受那些在大型官僚体制所做决定的影响，而这些官僚体制反过来又受他们的技术专家和管理者的控制，只有他们能理解整个系统的复杂性。于是，在大多数人类获得了民主的形式标志的同时，这一状况却使真正的权力落在了很少一部分人手中。

随着现代武器的出现，同样的权力转移也发生在军事领域。在更早的时期，曼海姆说，纯粹的数量就具有相当的分量，一个士兵就相当于一杆枪。但这种力量等式在现代的坦克、飞机和炸弹面前就消失了，后者使得能集中控制军事组织的个人比由武装起来的很大数量的个人更有力量。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权力必然越来越集中，因此也增加了独裁的可能。

从以上讨论，人们可能会认为，无论如何，集中化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社会各部分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以提供必要的协调，防止灾难的发生。但是，曼海姆说，不，将出现的大规模的组织，它们威胁个体的自由，却不能带来明智的社会政治方向。事实上，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首要问题，而大众民主和体制上的相互依赖只是其背景。官僚化组织提供了理性的控制，曼海姆说，但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理性。

一方面，存在着实质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即“在特定情境中对各事件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智识上的洞见的思想行为。”实质理性的模式就是一个人进行现实的思考和计算，以使他或她的行动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功能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即“这样一个事实：一系列行动以一种为达到一个先前设定的目标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这一系列行动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一个功能性的位置和角色。”这里曼海姆所说的是工业或行政组织，而不是指单个人。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个体的理性包括他或她对其所有行动的理解，而组织的理性的内容则包含着把它的多数成员简化为一部机器中的齿轮。于是，实质理性只存在于位于组织顶端的个人身上，而那些下属则

成为功能理性的，他们被要求不加反思地服从命令。

因此，这两种理性是不同的事物。当然，当组织的成员或组织外部的人员置身事外并对其进行批评，或者提出富有竞争性的操作计划，从而扰乱了组织的运行时，实质理性可以破坏功能理性。曼海姆说，这两种原则的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
209 与德国外交官及政治领袖的争论中有所表现。后者很快就认识到德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因为它孤立、对立於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因此，唯一的（实质）理性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平谈判。但是，军队是一个以高效率组织起来的官僚体制，它的成员已被训练成只考虑如何完成战争行动。他们体现了曼海姆所说的官僚制保守主义，它拒绝任何政治问题，而只是要“完成工作”。在这两种形式的理性的交锋中，军队的功能理性得胜了。德国不再试图谈判，结果最终遭到军事上的摧毁。当然，同样的模式一次次在重演，最近的一次就是在美国军界，他们试图将核武器竞赛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来讨论，完全脱离开它的道德及政治含义。

曼海姆的理论可归结为这样一个基本论题。现代工业社会必然会由强有力的、集权化的官僚体制构成的，它是由其精英操作的。唯一的问题是：这些精英是有才智的、人道主义的精英还是短视的、非理性的精英？曼海姆是通过韦伯和米歇尔斯的理论透镜来看待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后二者的理论认为被假设为理性的组织是在盲目地漂浮，遵从其内部功能的指令，而不管其后果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影响。商业公司、政府官僚体制、政党、军队、政治，都遵从它们自身的自我扩张模式，而无视它们可能要将我们带入的灾难。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权力极度集中

的现代时期，它被一些盲目的、不负责任的精英们所控制，他们用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掩盖他们的非理性。其结果，曼海姆说，必然导致危机——经济萧条、无意义的战争、国内的幻灭感，以及恐慌。在这里，开启了两种另外的可能性：一种是法西斯分子掌权，与之相伴的是他们对不惜任何代价获得的秩序的非理性的赞颂，而这将最终导致巨大的压迫和毁灭；另一种可能，也是曼海姆所希望的，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回归到一群新的精英群体的控制之下，后者受过社会科学的训练，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有计划的社会。

曼海姆没有清楚地阐明这样一个计划会是怎样的，只是假定它会考虑到下列情况：社会各部分的相互依赖，组织的各种结果（组织自身的成员不能意识到的），个体的情感如何被导向进攻倾向或得到升华。但如果没有既有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必须着手来制订它，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或者是在强大而盲目的组织系统中跌跌撞撞，一旦出现危机，就让法西斯主义去冒险；或者，进行体制规划。

但是，在一个计划社会里自由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对于曼海姆来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自由是他所提出用以抵抗现代社会诸种力量的重要价值。他的回答调用了历史相对论的视角。抽象地谈论自由是没有益处的，曼海姆说，每个时代都有建立在它自己独特的问题和可能性基础上的关于自由的概念。

赖特·米尔斯及曼海姆理论的现代应用

曼海姆的分析理路由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210

1916-1962), 这位美国社会学家中最具有特色者之一, 接续下来。米尔斯高大魁梧, 充满自信, 他一直致力于穿透事物直达其隐藏着的核心, 这使他不仅疏离于社会的主流, 而且也逐渐地疏离于他个人的同事和朋友。他的敌人经常嘲笑他是个只有左轮手枪智力的得克萨斯牛仔, 这幅讽刺画多少有些真实的成分。米尔斯在得克萨斯出生, 父亲是位保险推销员, 是米尔斯后来大加嘲笑的中产阶级的一员。米尔斯很早就以反叛的方式与他早期环境中的宗教虔信和商业热决裂。他鄙视当时盛行于美国很多大学中的反智识化的对体育运动的狂热。不过, 当米尔斯 1942 年为得到他在马里兰大学的第一份学术职业而接受面试时, 由于他了解到此大学的校长以前是大学里的运动员, 他录取职员主要是依据他们参加运动团队的情况, 因此米尔斯就编造说他一直是得克萨斯州的重量级拳击手, 而且夸口说他可以打败马里兰队的任何一个人。米尔斯把他的故事编得活灵活现, 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终其一生, 米尔斯一直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未驯服的野人和一个知识界精英的独特结合。当他搬到纽约市, 成为威望甚高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员行列中的一员后, 他会骑着他那巨大的摩托车转来转去。一位同事回忆说, 一个夏天, 他在访问芝加哥大学时住在 C. 赖特·米尔斯的隔壁, 他听见有巨大的声响, 便敲开了米尔斯的门, 发现他正用手枪对着墙进行射靶练习。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回忆道, 米尔斯的夏季度假别墅里没有椅子, 因为他总是在动来动去, 总也不会坐下来, 他甚至站着写作。米尔斯做任何事情都带着狂热的精力。他在研究生院待了三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这期间他一直与他的学位指导委员会进行斗争, 并在学生时代就

发表了好几篇重要论文。他结过三次婚，离过两次，有四次心脏病发作，头一次是在马里兰大学早期的时候，最后一次发作是在进行一场针对美国对古巴革命的政策电视辩论的时候，米尔斯像往常一样，站在不受大众认可的立场上，这次发作结束了他 46 岁的生命。

米尔斯从来不是一个狭义上的学院式社会学家。在 1940 年代早期，他参与了独立的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圈，这些杂志在纽约出版。他一直在努力使他的信息为公众所知，以在公众中产生影响。到 1950 年代他的重要著作出版之时，在公众眼中他已经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这一状况使他的很多大学同事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这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米尔斯公开嘲笑他的同事狭隘、对现实漠不关心；到 1950 年代，尽管他依然是本科生课堂上的演讲明星，但他不再被指派为给研究生教授课程了。米尔斯的精力以及他对工作的沉迷，使那些跟他打交道的人觉得他是个傲慢和自我中心的人。米尔斯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也知道这一点。到 1950 年代后期，他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那里，他被视为一位英雄，因为他突破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一贯政策。 211

米尔斯在他职业生涯的头几年中，主要是寻找从事他的知识工作所需要的工具。他从符号互动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开始，这些是由乔治·赫伯特·米德原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教给他的。米尔斯为关于语言、动机和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还开创了将知识社会学运用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自身的研究。但这些工具都不足以很深地切入到政治及社会变迁

的巨大事务中，于是米尔斯很快就自学了德国的最新社会学。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斯遇见了从纳粹德国出来的流亡者汉斯·格斯（Hans Gerth），后者曾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中的一员，这样米尔斯也就间接受到曼海姆的影响。格斯主要以他对韦伯的专门研究而著名，那时还是研究生的米尔斯和这位年长于他的教授一起策划了一个翻译文集：《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1946年出版，由格斯和米尔斯编辑并作导论。韦伯在1930年就已经被介绍到了美国，对他的引介是年轻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打造其框架的第一块基石，他翻译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过，帕森斯强调的是韦伯的观念论的那一面，即强调价值和文化的优先性，并把他吸收进了功能主义的框架结构中。而韦伯的格斯和米尔斯版本则将其表现为一个更为复杂的马克思的翻版。韦伯没有孤立地论述阶级冲突，而是描述了阶级、地位和权力的冲突；作为斗争的政治在理想与肮脏现实的模糊结合中运行；作为理性的官僚制的各种组织倾向于依照它自己的程序运行。格斯和米尔斯与帕森斯的对立启动了一场翻译之战，在这场战争中，从反功能主义和冲突的角度来对韦伯进行解释的文章不断发表，直到1960年代，完整的韦伯文集终于得以面世。后来作为冲突理论为人所知的东西首先是围绕着这场争辩而成型的。

在他生命的后期，米尔斯写作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其中清楚地说明了指导着他的工作的知识信念。这本书因其对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主流社会学工作的严厉批评而著名。这些主流一方面是米尔斯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东西，例如问卷调

查和统计技术，它们花费很大的工夫去研究米尔斯认为毫不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空洞的功能主义宏大理论，像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那样的东西，它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生活的深奥的分类图示，但这个图示对于解决米尔斯所认为的正以巨大的灾难威胁着现代社会的问题只是更增加了混沌而不是指明了道路。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学的想象力》包含了米尔斯最重要的贡献，提出了他对社会学这一职业的建议。“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方法论专家”，他总结道（我们用当代的习惯用语来解释米尔斯的语言）：我们不能让统计学家、方法论教科书的编写者或其他什么人来规定我们应该用什么研究方法，不应该用什么研究方法；我们应该创造出适合我们的新出现的问题和理论的方法。这一提议用在欧文·戈夫曼和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开创性方法上正好合适，他们 212 以一种被传统教科书中严格的方法论规定所阻止的方式探索了日常生活表面之下的东西。

针对他自己的任务，米尔斯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集体传记”（collective biography）的方法。理论和经验问题的交织产生研究方法。在米尔斯的研究中，他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权力问题，这是曼海姆已经觉察到正在来临的问题：一个由各种大规模的组织构成的社会，依其自身的动力运动，吞噬个人。与此同时，米尔斯是作为一个符号互动论者开始其研究的，他强调个体能动性 and 行动过程，要想在这个组织化的世界中确立人的中心地位。米尔斯总结说，庞大组织的集中化结构把权力集中在组织的高层，因此，他要研究那些处于顶端的人，描绘出他们的整体面貌以及他们如何到达顶端的职业生涯，显示他们的人格和性格是如何被他

们的组织环境所选中塑造。米尔斯和格斯在早期所致力写作的一本很不成功的书叫《性格与社会结构》，这个短语很贴切地说明了米尔斯的集体传记的含义。

米尔斯的毕生事业可以看作一次穿透美国社会的伟大旅行，他观察着每一个已发展成大规模的权力中心的组织部门。对每一个部门他都描绘出一个集体传记或肖像：首先是工运领袖，然后是新产生的白领中产阶级，之后是他所说的“权力精英”，后来他还打算研究苏联的苏维埃精英，以及世界精英出现的可能性。米尔斯的规划是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当时的政治期望来研究每一种可能操纵权力的人。

第一类候选者是劳工运动。从 20 世纪后期的视角看，我们需要费点劲儿才能使意识回溯到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观点上去。对所有我们这些后 1960 年代的一代人来说，当我们想到抗议的激进力量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方向时，我们想到的是为种族公正、种族移民、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和环境危机而做的斗争，劳工几乎进入不了我们的意识，一个例外或许就是将它视为另一种保守的体制，为保护自己的特权而进行着保卫战。而在 1930 年代的视角看来，在那个大萧条时代、那个充满了对近期将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的时代、那个罗斯福新政导致的福利国家的出现的时代，以及面临着被迫接受法西斯主义式解决方式的危险的时代，劳工成为高于其他一切的社会事务。在美国，血腥的斗争在管理势力和工会之间不断展开，前者拥有他们的私家护卫、罢工破坏者和警察，后者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大众。罢工的权利，以及确切地说，工会存在的权利只是在罗斯福当政时才获

得官方的承认，罗斯福政府设立了一个部门来保证工会的正当选举，并确保劳工纠纷在法律的指导下得以解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劳工方面取得了胜利。它以一种新的庞大的组织化联合的方式组织了起来，它汇聚起了巨大数量的工人，他们成为相对于资本家管理层的一个强大的抗衡力，成为一种首要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民主党内。 213

为什么这股新的劳工力量如此有力？保守派认为它是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公开楔入，它会破坏自由企业和私有财产。一些左翼思想家则认为，美国的工会是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一步，它可以避免俄国的独裁社会主义并提供一条通往民主的道路，这种民主不仅是在工场里的民主，它还提供一种资源，可以通过工会选举的力量使政府能代表更广泛的男人和女人。不管怎么说，米尔斯是透过曼海姆的眼镜来看待工会的。集中化的劳工联盟构成了另一类官僚组织。因此，它也同样受制于最早由米歇尔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所发现的惯力相同的力量，后者在40年前经历了与美国工会类似的发展过程。米尔斯在1948年出版的著作《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中指出，官僚制组织并不会乐意扮演反叛的角色，反叛只是工会在初期组织起来为它的生存权利而斗争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一旦它建立起来，官僚制也就嵌入进来。劳工领袖将他们的生命付诸为这一组织的斗争中，随着组织的胜利逐步扩大、地位等级的层级越来越高，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对于这些领袖来说，工会本身就成为了目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全它，如果可能地话就谨慎地扩展它的权力，而不是进行激发激进的社会转型。此外，劳工组织在一个由相互竞

争和相互关联的组织构成的世界中也不过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1940年代，工会与强有力的执政党民主党结成联盟，也因此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结成联盟，这一事件只在很表面的意义上说明了工会力量的源头。它也意味着劳工领袖是一个更大结构中的合伙人，而非挑战者。这种跨组织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其工人的要求与其政治伙伴的要求之间的调停者。劳工领袖不仅是工人的代表，而且已经成为精英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富裕的或具有特权的背景，而且也受到跨组织的精英领域的塑造，在一个由各种权力操纵者组成的同伙群体中玩权力游戏。

因此，工人阶级并不能成为变革和对系统进行更进一步挑战的源泉。在这点上，米尔斯的预言是正确的。

另一当代理论促使米尔斯考察被称之为“新中产阶级”的人群。它指的是新出现的白领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衣着考究，在洁净的办公室而不是肮脏的工厂里工作。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有些偏差，因为马克思忽视了白领雇工与蓝领雇工的区别。无产阶级并不注定会赢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即使其数量曾经几乎占到了工作人口的一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明显，白领雇工这一部分增长成为大多数。从理论上说，这些人也是雇工，他们
214 没有财产，因此也不是资产阶级中的成员，但他们的举止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工人式的。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拥有的专业技术，会不会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阶级，这一阶级将原来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斗争扫到一边，而引入一个智慧的、平衡的政治及公共政策时期？组织研究者，如 A. A. 伯利（A. A. Berle）指出，资本家拥有自己的公司这一旧模式已经过时了，老式的金融操纵者也已

经过时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股票掌握在养老金规划和保险公司手里，因此也就是在雇员自己手里。管理与所有权分离；一场平静的革命已经在进行，资本家将不是被无产阶级的血腥革命所战胜，而是被新的中产阶级的平静革命所征服。

米尔斯在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一书中讨论的就是这一主题。米尔斯警告说，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是纯粹数量上的变化导致了权力的转移，这是统计心理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它忽略了人们受组织形塑的方式。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于工商业中各种大型组织的扩张，它是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中随着新产品的增长而促使的销售力量的大幅扩张中，以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的和私人的）中官僚制的扩张中得以扩展的。旧式的独立的中产阶级已经缩小到只占极少数，尽管在我们的记忆中它还隐隐约约很庞大，并且还影响着我们的政治思想。美国不再是小农场主、小商业主和自由的专业人员的国度。而与这一阶级相连的政治哲学，即旧式的美国个人主义及19世纪关于绝大多数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已经只是成为一套口号，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

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米尔斯判断道，已经成为一种超竞争的身份角逐场，他称之为“身份恐慌”（the status panic）。身份不再依赖于各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自豪感和共同体对各人职业的社会性承认。人们现在在没有个性的庞大组织——“大型拍卖场”（在这里，形象与个性的肤浅表达是可以出售的）和官僚制（米尔斯将其比作在一个巨大的文件柜里将文件移来移去）——中工作。原来的独立职业者如律师、工程师等变成了

雇员，成为各种机构的工具。作为对职业名望缺失的弥补，白领工人在工作之外追求身份标志，他们要求得到最新的物质商品，要跟上最新的时尚潮流。人们成了“愉快的机器人”，脸上挂着微笑，因为他们要保持体面，否则就要失去身份。这就是米尔斯对美国文化变迁的解释，它脱离了被大卫·里斯曼称为“自主导向”（inner-directed）的原来的独立公民之价值观，而转向与工作疏离，只关注永远在变动着的消费与娱乐的流行趋势。米尔斯宣称，新的中产阶级表面上是满足的，但内心是焦虑的，而且对此他们不会承认。

首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是无力的，这与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所描绘的关于“新中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版本全然相异。以米尔斯更为深刻的眼光看来，新中产阶级的集体人格之所以呈现
215 出那样一种形态，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权力资源。他们生存于大型组织之中，其工作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些组织的扩张或收缩，取决于是否被这些组织雇用、提升或解雇。这个系统是非人化的，即曼海姆所说的“组织化的不负责任”，它按照系统的惯性而漂流。

那么，它正在漂向何处？米尔斯晚期的系列著作中给出了更为充分的答案。在《权力精英》（1956）中，米尔斯搜集了各种证据以显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部分，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化了。他不再认为工会和中产阶级是重要的，而大型商业公司、永久性的官僚制和军队才是最重要的组织。在米尔斯看来，美国经济是由几百个大公司所支配的，这些公司的顶层主管人员和它们的所有者构成了国家的上层阶级。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作为制定重要决

策的核心，其地位远超过州和地方政府，而在政府内部，是由各行政部门来启动各项政策的，国会中那些选举出的代表只有盖上橡皮图章的权力。米尔斯认为军队是第三大权力中心，它自行其是地实施其全球战备政策，它寻求自己的联盟，尤其是与公司经济中的供应商达成联盟。米尔斯在“军事 - 工业联合体”这个概念流行之前就对它进行了阐述。

至为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三类组织部门都是相互依赖的。它们都是庞大的官僚制，它们的上层通过财政往来、相互的利益往来和人员的相互交换而结合在一起。一些退职的将军和军官进入到大公司的管理层，另一些则进入到政治系统的各等级中，他们不是通过赢得地方选举而逐步提升，而是横向平移到高层——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这是很自然的事，其最高领导人原来就是一位将军，没有竞选过其他任何公职。商业管理人员不仅控制着财政部和其他内阁部门的高级职位，尤其控制着国防部和对外政策。美国的政策致力于保护海外的商业利益，在私人部门维持着庞大的政府支出，其中首要是军事支出。

由于各种组织的会合，在这些组织中任职的个人的集体传记也日趋类似。军队、商业和政府形塑了相同类型的人格，它们形成一个同质群体，分享共同的权力文化。由于这种类似性，这里没有独立的思想，所有人都假定这些庞大组织的运行是理性的和正当的。

在这一结构中，美国民主的传统机制并不能对这些权力精英构成有效的挑战。那些机制是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制衡原则、地方层面上的权力共享，以及由选出的代表在国家层面上实

现人民的利益。但这些权力精英并不是通过地方民主的训练场而进入其职业生涯的，它是由集团中的精英组成的，他们秘密做出决定，然后将其作为既成事实呈交给国会或公众。政治是由争辩、
216 对替代方案的考量、有时是妥协，有时甚至是僵局构成的。所有这些在美国政治中都有，但它们在大规模的国家事务中不起作用。米尔斯将其称为权力的中等层次，地方共同体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大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及社会力量，而那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中的大部分人只是在军事 - 商业 - 政府官僚制的组织惯性的轨道上乱哄哄地相互争夺。

米尔斯所描绘的美国图卷受到了广泛的挑战，尤其是他将多元化的竞争降为地方性的恩庇政治（patronage politics）的次级层次，以及他关于政府官员、军队军官和公司巨头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统治美国的权力精英的结论。这些批评大部分是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它们不认为在米尔斯认为应该受到指责的现实状况中存在什么问题。他的批评者很多是1950年代冷战政策的支持者，而米尔斯认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商界人士和军队出于他们各自利益而进行的联合，前者要保护他们的特权，后者要提升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从而把整个世界置于核灾难的威胁之下。1960年代以来，米尔斯的观念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越南战争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军队官僚制的进程是如何几乎不受美国社会其他部分的控制。我们已经发现，艾希曼^①审判——他辩护说集中营大屠杀“只是在执行命令”——

① 艾希曼（Eichmann, 1906-1962）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灭绝犹太人的活动。战后逃往阿根廷，后被以色列人逮捕并处绞刑。——译者

给人们带来的道德震动并不只是曼海姆时代的历史遗迹，因为美国人在面临同样的事情：功能理性被应用于对越南农民的灭绝。

如果我们借助曼海姆所描述的现代社会之大型图景来理解米尔斯所论述的东西，那么很多围绕着米尔斯所说的权力指的是什么之类的争论就并不重要了。米尔斯是在阐述美国社会中的相互依赖和集权化（这是曼海姆的理论所提出的），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从地方政治和政党向一群官僚精英的转移。从这一视角看，关于这些精英如何联合，以及他们是怎样有意识地试图操纵我们的社会这些问题就无甚重要了〔尽管即使是在这一点上，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和其他人最近的研究也已经阐述了具有社会一致性的上层阶级对国家政策所施加的超比例的影响〕。确实，在曼海姆为现代社会提供的三种可选择的道路——组织的功能理性的跌跌撞撞和漫无目标、法西斯独裁的非理性，以及人文主义的知识精英的规划——中，米尔斯明确地将美国归入第一种类别。他并不是像某些针对他的批评所指责的那样，浪漫地渴望回到以往农民民主的时代去。他承认美国的组织权力的集中化是一种历史必然现象，他只是希望能将其置于某些人的控制之下，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集中化的危险，并能对多数人民负责。

米尔斯整个一生都在关注向“要塞国家”（garrison state）发展的危险。这一术语来自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30年代的政治理论，它表达了一种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会走向纳粹德国之道路的担忧。让我们在此明确一下，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并不是宣称所有人都会接受希特勒的象征体

系和反犹偏执狂，而是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在从组织上变成一个
217 军事、经济和政府永久融合在一起的状态。每个国家总是会有敌人——从苏联的立场看，是资本家；从美国及其盟国的立场看，是共产主义分子——因为这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存在显得正当。军事花费支撑了经济，阻止了经济跌回到大萧条时期的状况，这种大萧条首先是在德国通过其军备扩张而被克服的，而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国家都克服了大萧条。早在 1940 年代，米尔斯就担心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要塞国家，逐渐向类似德国的方向发展，尽管美国正在与它交战；他支持当时还很微弱的反战运动。战争结束后，组织机器并没有拆除；大军事、大商业和大政府的联盟依旧占据要津。它只是接着去寻找新的敌人，去制造出更新、更昂贵和更具毁灭性的武器。

这些新武器就是核战争装置。毫不奇怪，C. 赖特·米尔斯是最早一批极力宣扬核战争之威胁的美国人之一，并且呼吁为了避免世界的毁灭，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方向。核武器竞赛是官僚制之累积后果和组织化之不负责任的典型事例。大商业机构的发达在于获得巨额的军事订单，组织化了的劳工支持这一做法，因为这意味着巨大数量的工作岗位；政治家们也同样支持，因为它巩固了繁荣，而且不管怎样，它设置了一个基本框架，而政治家们是在这个框架中根据被判定为爱国或是不忠诚而获得选票或是落选。可以想见，同样类型的组织动力学也发生在另一方：在苏联，相对应的组织在军备竞赛中也以不可抵挡的惯力驶向同一方向。结果是摧毁能力的不断升级，到 1980 年代，积累起的核武器不仅能摧毁人类，而且能摧毁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命。

尽管米尔斯没有预见到 1989—1991 年间装备有巨量武器的苏联这一敌人的戏剧性的突然解体，但他在 20 世纪中期的确勾画出了一幅现实的发展图画。而且，他开始在采取措施使我们从那种束缚住我们的、支持这一两极化的世界格局的思想中解放出来。1950 年代在很多方面是 1930 年代的承接者：阶级冲突，左派与右派的对立，似乎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方。1930 年代，工会逐步占据优势地位，自由民主党人进入政府部门；美国与苏联联盟，以抵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右翼的法西斯主义。1950 年代，钟摆开始摆向另一边；美国支持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的敌对力量，不管他们会多独裁；而在国内，自由主义者处于守势，他们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盲从者和代理人。米尔斯看到这种左 / 右两极化的状况需要由第三种力量来打破。他欢迎中立主义的发展，欢迎第三世界国家从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联盟的阻隔中摆脱出来。他成为 1959 年古巴革命的鼓吹者，当时这场革命的目标是挣脱美国支持的独裁统治，保持古巴在世界的独立地位。米尔斯警告说，美国试图将古巴孤立于西半球世界的政策只会导致将其推入苏联的怀抱——又一个灾难性的预言。

尽管米尔斯 1962 年就去世了，但他所致力于的变革方向却 218 开始以公开化的形式突然出现了。首先是民权运动，然后是美国大学里的学生运动，再是 1960 年代的反战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所谓的“新左派”的发展基础。在美洲、欧洲和其他地方，一系列的运动开始兴起，这些运动有意识地要努力成为在原有两极之外的新的方向。米尔斯被 1960 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者尊为指示了这一道路的先驱。尽管他的很多预言一度切中要害，但这并不是

说他的所有分析都是正确的。尤其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他不应该认为自己个人有责任领导一场大规模政治变迁的运动。作为一位处于韦伯和曼海姆传统中的社会学家，米尔斯敏锐地意识到了组织是造成当今世界与以往不同的原因，只有通过利用新的组织资源，使旧有的组织发生转向，才能使这个世界发生改变。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总结了他的政治哲学：“个人困扰就是公共议题。”失业并不是某个人的个人困难和失败（尽管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的观点正好相反），它已被经济系统结构化，这一经济系统交织着各种政治和金融决策，这些决策以个人的失业为代价来控制通货膨胀和获取股票市场的利益。在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米尔斯的这一口号被广泛运用，用来指出婚内虐待和婚姻斗争不只是个人事件，而是植根于更大的性别结构中的。米尔斯的立意并不只是倡导通过发动一场运动来将个人性的事务组织成或转化成政治性的事务。他要说的是个人的问题中已经包含有重要的公共事务。用当代的术语来说，微观是根植于宏观的。这是米尔斯集体传记方法的本质，这一方法考察个人生活模式是如何被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组织所塑造。和曼海姆一样，米尔斯教给我们怎样穿透意识形态，不管它们是何种类型。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世界，它在制造出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出一种公共意识，这一意识使我们看不见实际正在发生着的事情。而米尔斯激励我们去直面这些组织。

第十四章

欧文·戈夫曼和社会交往的剧场

今天的社会学在表面上包含着很多当代美国的主流理想：务 219
实、定量、科学、注重实效。就像研究原子弹或成本核算系统的
技术专家一样，社会学家似乎也沉浸在他们的统计和计算机程序
里，遗忘了在数字和抽象概念之后的人类现实。但是，如果把社
会学在公众印象中的这一明显的方面当作这一学科的全部，那
是错误的，就像我们从现代技术势不可挡的影响中而得出我们
已经成了一个机器人国家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确实，机
器人到处存在，但是人性的因素不断地与它们并现。在美国社
会，年轻的一代一直在奋力争取一场政治理想和个人行为方面的
文化革命，而在社会学界，则一直有激进的经验主义者的运动，
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谜一般的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戈夫曼的社会学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关于被忽略事物的社会学。他研究的主题包括：难堪、不安、自我意识、尴尬场景、失言、丑闻以及精神疾病。他的同事和学生已经开始在绘制出社会的整个底层：吸毒者、犯罪者、骗子、自杀者、崇拜飞碟者、囚犯、袒胸舞者 and 巡逻警察。但这种新社会学并不是对这些隐藏着古怪人群稍做一瞥，它所遵循的是社会学方法的伟大策略中的一支。这一策略首先是由爱弥尔·涂尔干奠定的：既然社会是由规范而被秩序化的，这些规范因为被视为当然之物而通常不被察觉，而社会学家就应该关注那些规范被破坏的事例，以清楚地观测这些规范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它们。戈夫曼所接受的正是这种通过断裂来进行揭示的策略：观察正常运行的公共秩序失效的地方，以便探究通常是什么力量使秩序整合。通过这一方法得出的洞见已经开始自上而下重构社会学理论；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现实自身是如何由人们面对面的交往中所隐含着的理解构建出来的。即使死亡本身的意义也只来自它在无所不在的人类剧场中所扮演的角色。

标签理论

220 这一新取向的某些要素首先出现在关于越轨行为的一种新理论中，并由此开始在社会学中广为人知。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家戴维·马扎（David Matza）阐明了这一理论，并以一系列的论证说明它与以前各种理论的不同。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一个罪犯的？一种理论认为是由于充满压力的环境：萨莉的父母吵得很厉害，后来他们离婚了，她母亲找了份工作，很少在家，萨莉承受

了很大的压力，她怀孕了，后来就成了个未婚妈妈，再后来就成了个犯罪者。另一种理论认为，存在一种犯罪的亚文化，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处境困扰而脱离常轨，而只是因为他从属于某团体，在这一团体中，越轨行为是“正常的”。因此，论证就以这种逻辑展开：萨莉的邻里都是一些底层阶级的家庭，萨莉开始混迹于一个很“酷”的团伙，结果是她成了一个未婚妈妈和一个犯罪者。

被称为标签理论的新理论认为，大多数住在被认为是犯罪地区的人并没有成为犯罪者，而住在“良好”社区中的人也同样可能做违法的事，但他们往往不大会因为这些事而被逮捕或受到正式惩罚，而正是被逮捕的经历会使小小的犯规事件转化为一个完全违法者角色的开端。用标签理论的话来阐述则是这样的：一天晚上，萨莉和她的男朋友待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拥抱过后，她挣脱开，坚持说到回家的时间了。那男孩正要发动汽车，一辆警车开过来，手电的灯光正照着萨莉在扣她胸前的扣子。于是，这个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就是粗暴的命令、被押上巡逻车、压手印、搜身、身体检查、打电话通知父母、被定为违反宵禁令和法定强奸罪，然后是各种训话：警官、青少年法庭的官员、缓刑监督官、学校的管理人员和家长。结果，萨莉在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就出走并怀孕了。

戈夫曼以他在《精神病院》一书中对一个精神病院内部工作状况的分析大大推进了标签理论。精神病院被认为是照顾精神上有疾病者的地方。戈夫曼决定从内部来观察这一机构，他在一家大型的公立精神病院待了一年——不是作为病人（因为他觉得病人的角色会使他被局限在医院的某个部门），而是作为仅次于

病人的最适于观察的角色：娱乐助理（recreation assistant），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医院的主管人知道。他进入了医院，既不像病人那样也不像具有权威的管理员那样受到注意，他近距离地融入到他所在的环境中，以至于他的出出进进几乎不会被人觉察到。“我敢发誓，一分钟前，这个屋子里只有 14 个人”，一位困惑的管理员会这样说。通过他出色的计划，戈夫曼收集到了各种证据以证明他那极端不同寻常的洞见：精神病和其他角色一样，是一种社会角色，而精神病院是人们学会如何适当地表现出精神病的

戈夫曼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他关于自我的模型。戈夫曼吸收
221 了 G. H. 米德的观点，宣称自我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个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从他或她整个一生中与他人的互动空间中刻画出来一个意象。一个孤立的存在是动物，而一个人只有存在于其他人的社会中才能获得基本的人性（humanness）。每个人的自我都是对他人反应的一种反射，每个人又反过来将自己的一部分给了他人。社会牵着手围成一个圈，戈夫曼说，其中每个人都用右手拿回他左手给出去的东西。

通常，一个人通过在各种情境下与各种人打交道的过程获得对自我的感觉。但精神病院极大地简化了生活的环境：这里不存在各种不同关系组成的网络体系，而是一个只有两类社会类别的世界：一类是病人，他们全部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缺陷和没有能力的；另一类是职员，他们全部都拥有在病人那里被剥夺的自由，并且拥有事无巨细地控制病人的权威。医院很大，官僚体制的迫切要求就是要使大量的病人能够被喂饱、穿上衣服、休息、锻炼、

被监视，以及——因为他们背离了正常的社会行为——有时要被强迫去洗澡、被打扮好，防止他们的暴力和毁坏行为，他们通常是作为没有自我尊严和自主权的人被对待的。

而且，作为一个将病人与正常的社会隔开的地方，医院必须是一个“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病人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同样的围墙内，受到同样牢固的控制，面对正式职工的持续的严厉审查，后者对病人的行为进行持续的记录。那些反射他或她的自我的社会资源不仅是使他们屈辱的，而且是铁板一块的；病人无法逃进他们的私密性中，也无法找到对他们的缺陷毫无所知的其他听众。同室者之间的很多古怪行为，包括淌口水、诅咒、在衣服里大便、打架以及逃避任何接触，都可以被视为在枯竭了的行动剧目之外所做的绝望举动，以给予自我以一些自主权。因此，精神病院的正式组织，通过其本质制造出了许多被设定为需要治愈的症状。

上述这些内容并没有完整地概括出戈夫曼和其他人在分析精神病时所用的种种精细和复杂的方式，他们是把精神病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而不是作为无法解释的、随意的和怪异的行为来分析的。^①这种分析的一般形式已经被运用到很多领域：揭示社会服务机构是如何出于组织化的需要，通过提供被许可、被承认的盲人角色让盲人去仿效而将“盲人”从视力有问题的人们当

① 当前在生物化学基础上的对一些精神疾病的研究只是增加了这种分析的复杂性，而不是取消社会因素。不管具有怎样的生理过程，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世界中，即使一个身体有障碍的人也是在与围绕他或她的社会世界的对比中来塑造自己的。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讨论戈夫曼关于将一些人界定为精神病人具有何种社会意义的论述。

中区分出来；揭示在贫民区的学校里，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是如何通过将孩子作为潜在的失败者来对待而使他们陷入失败；最著名的，揭示本是要通过官方运作而使囚犯改邪归正的监狱，是如何事与愿违地使那些初次违法者在一种隐秘的监狱同室文化
222 中被社会化了，而这一文化为他或她装备上了作为一个成熟罪犯的新的自我。这一视角对各种体制的事与愿违的结果持冷嘲热讽的态度，而且对那些试图将那些越轨者和不幸者挽救回主流社会（正是这个社会最初将他们界定为越轨者）的善意努力持相当的怀疑态度。

不过，标签理论及其相关的分析只是戈夫曼和他的同事带入社会学的世界观革命中的一小部分。在本书前面各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更广阔的视角的种种印记。首先，这一革命导致了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它不满于对个人或社会的统计报告和抽象的理论化，而是详尽地考察其对象所经历的情境中所发生的事。其次，它要求将所有的行动和社会身份都看作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产物；这样，越轨行为就不会只是从“越轨者”来解释，而是从将他或她标记为此身份的群体运作的角度来解释。最后，它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崭新的观点基础上：社会现实并不是总是固定地“在那里”的，只需要被描述和记录，它是由个人在应对无限的可能性中构建出来的，这些可能性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以相互矛盾的方式被实现。这种复数的、上演式的（enacted）社会现实观是此革命性突破的本质，戈夫曼的生活剧场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我们可以用它将对生活的理解筑进一种新的社会学当中。

戈夫曼的社会生活剧场模式

共同面临的舞台演出问题，对呈现方式的关注，有理由或无理由的羞耻感，对自己和观众的矛盾态度：这些都是人类境遇中的戏剧成分。^①

既然我们都参与了某个剧班，我们自身就必然带有某种共谋的甜蜜罪恶感。而且，因为每个剧班都在致力于维持某些情境定义的稳定性，为此它们会掩盖或淡化某些事实，因此我们可以推想，演员们都是在某种诡秘行踪中经历其阴谋家的生涯。^②

什么时候人们会觉得不自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给戈夫曼提供了打开日常社会交往的钥匙，而这些交往事实上构成我们所经验的社会的整体。戈夫曼指出，尴尬发生在一个人愿意呈现出的一种特定自我与当时的境况发生了矛盾：当一个据称为富有的人向一个熟人借钱时，当提出约会被拒绝时，当地位不平等的人在电梯里相互回避眼神时。不自在还会发生在人们在对话中表现出没有完全和自然地融入对话，这种状况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或者是自我意识，即他们在与别人交谈时，更多地关注在谈话中如何表现自己而不是谈话本身；或者是“互动意识”，它表

223

-
- ①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p. 237.【此段译文参考了冯钢先生的译文，参见《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译者】
- ② 同上书，第105页。【此段译文参考了冯钢先生的译文，参见《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第89-90页。——译者】

现在女主人对谈话控制过甚或谈话中不自然的停顿中；或者是“其他意识”，这是由于某些人的突出的真诚或矫饰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力而偏离了谈话的主题而造成的，或者是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谈话之外的其他事情中。谈话制造出了一个自身现实的小密闭舱，那些偏离了其标准的人就是正常社会生活的反面角色。与此相对应，也有社交活动中的英雄，正如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拒绝因西班牙舰队的逼近而中断他的十五子游戏，这一传奇就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种风范。

总体而言，社会互动是一种有其自身规范的表演。人们被期望保持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社会面孔，也帮助他人维持他们的这样一副社会面孔。按照新近的标准行事被认为是机敏的。礼貌规则就是发挥这类作用的。因此，善于辞令的人会避开一些具有危险性的题目和会引起争论的论点，或者忽略其他谈话者的这类言论，以免产生谈话冲突；人们会尽力避开失去控制的争执，尽力避免出现停顿或不做应答，因为那会表现出对别人的谈话没有兴趣，人们也会努力以某种看上去自然的方式结束对话，而不表现出他们已经厌倦了对方的谈话。

戈夫曼将这些观察发展成一个关于社会行为的成熟的剧场模式理论。行为不仅包含实用的因素，也包含表达的因素；它被设计出来不仅是要完成各种任务，而且同样也是要传达出一种对现实的界定。社会表演经常是以团队的形式上演的，比如夫妇配合着在家里招待客人、汽车销售员说服一名顾客、工人在主管者来视察时装出努力工作的样子。因此，可以把社会世界区分为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在前台区域，一个群体的任务就是对此

群体的状况进行最佳描述；而在后台区域，表演者在被小心地保护起来的私密区内放下标准、放松自己。正如戈夫曼所指出的，在那些分享共同后台的个体间的社会连结力最强，因为他们必须相互信任，不向外界泄露他们呈现自己的普遍策略这一秘密。

为什么说生活像一场戏剧？戈夫曼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控制让他人看到的现实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武器，几乎所有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权力或者是自由。因此，贵族和上层阶级用他们的财富和闲暇来给自己披上尊贵的色彩，使自己得到尊重；中产阶级则通过将自己置于工人阶级之上而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管理者试图通过在下属面前表现出给人印象深刻的风度而提升他们的权力；工人则通过将他们与老板打交道的场合限制在被小心护卫着的前台区域而保护自己的自主性。

将生活比作戏剧的第二个原因是：要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和公认的现实，那么表演就是必需的。各种境况并不会直接自我界定：他们必须通过象征交流而被构建出来；因此，不管社会生活还具有其他什么性质，它必须是可被表述的。这样，戈夫曼就将米德和涂尔干的观点向前推进了，涂尔干的社会良知观念是要以此显示出作为社会本质的共享意识之存在。戈夫曼将这一概念从抽象的高空拉下来，所以我们不用努力去想象一个意识的大气 224
球笼罩在法国、英国或是美国的上空，构成这些社会的集体良知；相反，我们可以根据千百万小的社会现实来进行思考，只要人们聚在一起就会存在这些现实。

境遇自身具有一种力量，超越构成它们的个人，就像涂尔干所指出的，每个人都对集体良知有所贡献，但在面对它的压倒性力量时又经常是无力的。象征现实的力量随处可见，从教会团体或公共仪式中出现的极有张力的沉默（这种沉默使旁观者噤声无语，使初来的发言者临阵怯场）到那些礼貌交谈中的隐性规则（这些规则区分出了可接受的和不被允许的内容）。通过把情境作为社会戏剧的过程来分析，戈夫曼展示了集体良知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并如何发挥其强有力的效力的。

戈夫曼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关于何为真实的抽象观念，不仅对社会的普通成员是如此，对社会学家更是如此。我们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通常是在特定的地点和情境中发生于当下的某些情况；我们相信为真实的东西是从这一情境中推断出的某些东西。我们遇见了某人，从他的言行中推断出他的品性（值得信赖还是虚伪、有趣还是呆板）和他的地位（重要人物还是平头百姓）。因此，我们总是在将自己呈现给其他人，我们控制自己的行动，以使它们传达出我们希望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当我们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效果：我们注意在参加聚会时不去得太早，以免别人认为我们生活空虚；我们在整洁的起居室前台招待客人，而守卫着卧室这一后台。

我们不仅在向他人展示时将自己的品性和地位构建为漂浮在任何短暂当下之上的永恒现实；而且我们还构建出大型组织，我们将其视为永恒的、超个人的社会结构。我们将会震惊地发现，组织是看不见的。没有任何人曾看见过一个组织。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属于组织的建筑物，或者是组织架构图，它们只是以几何方

式符号化地表现了与组织成员相关的正式规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心理实验就可以看出，一个组织在它的建筑物消失后仍然存在；在没有现任成员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存在，因为它是由一系列看不见的位置所组成的，在原来的成员离开后，这些位置可以由新的成员来占据。因此，我们的世界是由各种只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各种实体（通用汽车、五角大楼、加州大学、旧金山市）所构成的；我们被误导着认为它们都是物质性的事物，因为运行这些象征实体的人通常都待在特定的物理空间中。只要有人相信组织确实存在，它就会有真实的效果，而不接受其规则的人就会被看作罪犯、225 疯子或革命者而受到惩罚。但这些组织要存在下去，它们就必须不断地被演示出来，如果有人成功地改变了表演的脚本，那么组织的形式就会改变，这就发生了我们所说的强权行为（power play）。

在很重要的意义上，社会是一个剧场，它的表演——象征性的社会庆典——是维系它的重要因素。60年前，涂尔干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庆典和仪式结合起来的；而戈夫曼则指出维系社会的仪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处。如戈夫曼所说：

只要表演的表达性倾向最终被接受为现实，那么在当下被接受为现实的东西就会具有某些庆典的特征。避开聚会或是避开职业活动交流的环境而只是待在自己的房间，就等于脱离了现实运行之所。说实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婚礼。^①

①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p. 35-36.【此段译文参考了冯钢先生的译文，参见《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第30页。——译者】

这是对现实的一种极端的看法。社会现实就是人们对它的表述，戈夫曼指出，我们所应该努力去关注的不是人们看上去在谈论的某些独立的事物，而应该在人们谈论时观察他们。终极的现实是个谜，有时是一种神话，我们所能把握的最“真实的”事物就是人们在构建现实中的种种行为。一群自称为“民族志方法学者”（ethnomethodologist）^①的激进经验主义者的运动继续从事着这一问题的研究：人们是怎样在他们的意识和谈话中构建出关于周围的社会世界的观念的。这一运动的领袖是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它建立在德国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洞见（后者的观点又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理解概念的影响）和现代逻辑与语言哲学的基础之上。它也是对戈夫曼式社会学的更为激进的运用。

民族志方法学者

民族志方法学者在他们对人们是如何构建日常现实的细致分析方面超越了戈夫曼。他们的主要发现是：人们看来是根据将现实视为稳固的、既定的和明确的这一观念来行动的，但他们所谈论的社会世界实际上是流动的，在很大程度上受解释的控制，而且不易被发现。

按照加芬克尔的说法，社会交往中包含有很大程度的“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s），即不能被定义，只能被特定

^① “民族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是指对人们处理日常现实的方法学所做的民族志（人类学的客观描述）。

的相关个人在具体情境中心照不宣地理解。像“这”、“现在”和“你”这类词是索引性表达的简单例子；但整个观念体系则更为复杂，它们总是包含着各种概念和关联，人们只是在阅读和谈论 226 它们的时候才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但当被要求对它们做一个精确的表述时，他们最后肯定会说，“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

加芬克尔利用中断显示法来凸显人们的“实践推论”的这些小片段。他的学生们为了在他们所参与的对话中进行实验而忍受了长期的痛苦，他们要求对方给出对意义的完全说明：

对象：嗨，雷。你女朋友怎么样啊？

实验者：你说“她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你是指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对象：我的意思就是她怎么样？你怎么啦？[他看上去颇为恼怒。]

实验者：没什么。只是希望你更清楚地解释一下你的意思。

对象：不提它了。你的医学院入学申请进行得如何了？

实验者：你说“进行得如何了”是什么意思？

对象：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实验者：我真的不知道。

对象：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①

这类实验并不只是要展示人们在交流中经常是心照不宣地、

① Harold 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7), pp.42-43. ©1967, Prentice-Hall, Inc.

想当然地认为谈话对象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些实验也表现出当人们被要求对他们的话做出解释时，他们最终会很生气，而这种恼怒是由于他们逐渐认识到这一追问的线索在原则上是没有尽头的。人们所说的每件事中都确实包含了索引性表达，试图使这些表述客观化，试图要使每一表述最终不还原到“你知道我的意思”这类的话，是不可能的。

人们按照世界似乎具有其客观的本质而行动，他们希望别人也这样行动，尽管这不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加芬克尔的发现是，人们之所以能够一方面在头脑里保持着一种拼缀的、隐形的和模糊的社会秩序，一方面维持着各种社会关系，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任何时候都有着某种固定的东西，并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人们通常并不会互相要求对方解释他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是潜在地具有模糊性的。他们相互之间容许存在不确定性，并设想其确定的意义马上就会在某个时候显示出来。

因此，社会世界实际上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但因为人们没有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还能以一种相当稳固的面貌出现。人们在面对一个组织的代表时通常不会询问他或她的权威的切实基础，或者是否有某项规定要求他们做他们正被要求做的事。相反，他们假定，惯常的做法就是合适的和必需的，他们接受了那些并不是必然加诸其上的角色：温顺的消费者、客户或雇员。加芬克尔让他的学生到一家百货公司去进行一项实验，只出大大少于标价的价钱去购买某些商品，这一实验证实了以上观点。227 生们对完成这一任务颇怀疑虑，因为在绝大多数的美国商场，有一种未成文的共识，即商品必须按照它们的标价出售。他们发现，

一旦他们真的开始砍价——例如，对一件标价为 98 美分的东西出价 25 美分——这就像打破了一道无形的界限。由于他们对控制局面有充足的自信，这使那些售货员显得颇为慌乱和不安。他们经常能感觉到他们所提出的价格至少有可能被接受。显然，标出的价格就是你要付的价格这一强制力的存在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它被遵守；其力量主要来自它从未被挑战过这一事实。

民族志方法学的观点在应用上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的。社会结构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存在；如果有人有足够的权力和自信来推翻约定的共识，那他们就能成功地挑战这些信念。日常个人之间的礼节、尊重、礼貌和权威的整个结构的存在就是因为它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通常它所赖以支撑之物，除了那些相信其稳固性的人对违背者的潜在的社会谴责之外别无他物。那些把社会结构看作社会神话的人就能打破这一气泡；他们镇定地拒绝接受对于情境的惯常界定，这使他们具有了心理上的优势，因为这些惯例的支持者的权力就来自他们确信他们的现实是客观的，而不是一个界定的问题。嬉皮士之能领导一场文化革命，反对对各种情境的约束性的正式界定，就在于他们能够很好地用对日常现实的反界定表述来“刺激刺激人们的脑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实行的无形的社会结构都很容易受到挑战。一个商业组织就是一个由各种规则和角色组成的网络，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同意认为它存在，但由于通常人们并不健忘，那些运行这个组织的人也就不会突然否定其存在。不管怎么说，玩这场象征性的游戏会有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好处——那些这样做的人可以维持生计，获得一定的地位和权威，诸如此类。

国家、警察机关、军队——所有这些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其成员（或者至少是足够多的成员）同意按照以下这一观念而行动，即认为其规则和位置都是真实的事物，而如果他们能够如此行动的话，那他们也能强迫他人如此相信。

但是，即使人类的组织表演行为能带来权力、舒适和财富这类好处，这些组织也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稳固。正式的组织架构图很少能对应于实际的权力配置与合作分工；将军经常会受军士长的支配，老板也许比他的秘书的影响力要小，总统也许要听命于不知名的政客和官僚。现实是可以协商的，即使是在那些不可能彻底否定其最终的有效性的组织中也是如此，而人们如何协商这些组织，就决定了在其内部实际上将发生什么。即使一个组织能够用强制暴力来支撑它宣称的现实，它有时候也要遭受使其受损的怀疑浪潮的冲击。革命就发生在所有人开始怀疑国家权力的时候，与银行由于资金抽走而崩溃是同样的方式。^①从最细微的街上两个陌生人相互避开眼神的相遇、到庞大的帝国，社会秩序说到底都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只有在被普遍相信时才存在，而当人们努力将这些信念转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时，社会秩序也就会发生改变。

戈夫曼的功能必需概念

戈夫曼的立场较此更为保守。他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嬉皮

① 当然，有些组织比这要脆弱得多。绝大多数自愿性的联合，如新的政党、社会俱乐部、全球联盟和邮票收集者协会，最初都要经历一个确认组织是客观现实的热情期。但当对组织存续的怀疑逐渐积累起来，当其信任者离开它那艘正在下沉的现实之船之时，大多数组织发现自己滑回到不再存在。

士。相反，他直接处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传统之中，是个采取更为经验主义取向的塔尔科特·帕森斯。生活中充满了非实用性的仪式，但戈夫曼认为仪式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具有功能必要性。他探索了生活的底层面，但他并不真正同情那些失败者。《精神病院》一书并没有谴责精神病院的员工破坏了精神病人的自我，而是从官僚制整体机制的必然要求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按照同一理路，戈夫曼对礼貌和社会仪式的规则的分析也并不带有讽刺性。在他看来，那些没有按照礼貌互动规则行事的个人会受到尴尬、自我意识和被放逐的惩罚，而这些惩罚是正当否定，因为这些规则对于保持社会现实的运转在功能上是必需的。事实上，戈夫曼将精神疾病定义为不能或不愿很好地履行或遵守社会交往的规则。社会的赏罚是严厉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按照这些规则行事，他就会受到其同伴的惩罚；因为每个人的自我都源自他人，因此每个人都很可能被永久地纠缠于有缺陷的身份中，或者是作为不完善的社会交往者，或者是作为精神病人。但所有这些对于维持社会，以及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保持象征性的现实都是必需的。

和多数功能主义者一样，戈夫曼过于轻易地仅仅因为事物存在就将它们看作必需的。他对传统的中产阶级礼节的描述正在变得过时。尽管他认为这些礼节对于保护自我的边界和维系对社会现实的清晰界定是必需的，但在美国生活最为现代的领域中，个人交往方面日益增长的非正式性和坦率性表明，人可能具有多大的灵活性。他们比戈夫曼所设想的更为坚韧，有时能够做到更为诚实，更为发自内心，去容忍一个不确定的但也更为自由的现实。

最后，戈夫曼没能按照他自己的极端现实主义的路子走下去，而如果走下去的话，他可以看到个人是怎样在努力将自己对现实的定义强加于他人，以及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切是怎样在运作时所具有的潜在的解放效果。可以肯定的是，戈夫曼和民族志方法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能把他们的思想加以社会应用。他们将
229 自己局限于对那些似乎在控制人们的日常行为的规则进行详尽的分析——实际上，这是将关于认识论的哲学思考转化为一项经验研究的事业。

哲学帝国主义

最近所有这些微观社会学的发展的巨大动力都来自哲学。自 20 世纪开端以来，发生了一场哲学革命，其浪潮缓慢地扩散到邻近学科。造成变化的最初影响力甚至是来自一个更远的领地——是从世纪之交的一场数学家之间的争论开始的。这是一场“形式主义者”（formalists）和“直觉主义者”（intuitionists）之间的冲突，前者相信他们可以构建出一个由基本的公理和定义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由此他们可以将所有可能的数学都进行严格的还原，后者则认为数学不能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的发展依赖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每一个新问题找出证据。在 20 世纪的前些年里，形式主义者做出了他们最为雄心勃勃的推进。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试图展示，能够构建出一个自明的纯粹逻辑的体系，以包含基本的数字系统，而且因此，它能包含所有的数学基础。不久，罗素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试图创建一个关于人类语言的更为简单的系统, 由此对文化的另一面的基础进行形式化。

但这些形式主义者的努力都失败了。罗素和怀特海发现他们在他们的体系里造成了各种悖论——在基本逻辑本身内的各种矛盾。1931年, 德国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证明了任何一套公理都是不完全的, 因为总是必须要有至少一条原则处于这一体系之外; 而如果这一原则被结合进一个更大的、更完整的体系, 那么另一条原则又必然处于这一体系之外, 如此等等。几乎同时, 维特根斯坦也放弃了他早期想创立一个关于语言的封闭性的哲学体系的努力, 并得出结论: 语言并不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有限领域, 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被结合, 而是人们可以玩的一套游戏——是人们处理语词的行动, 而不只是人们所意指的事物清单。因此, 谈论事物只是很多种语言游戏中的一种, 而询问、提请注意、开玩笑和给人留下印象——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其他一些语言游戏, 它们与赋予事物以名字的游戏一样, 是真实的, 而哲学家只将后者作为真正的话语。

直觉主义者的胜利从1950年开始就扩散到社会学领域。加芬克尔和民族志方法学者对索引性和意义之无限回溯的关注, 其实是在将维特根斯坦和哥德尔的发现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于是, 我们逐渐了解到, 社会意义如何并不是像我们能指出的具体事物那样是既定的, 而只是我们的社会行动的内容。它们在各种语言游戏中是经验性地可见的, 而这些语言游戏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现实的大部分。

戈夫曼在其后期著作中也捕捉到了这一哲学革命的精神。 230

他以其典型的精致，通过阐述“框架”的概念及其内容，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一个情境，就像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画框里面的东西，而我们是围绕它的画框的角度上去看的。但是，我们也经常能够走出画框，将画框也作为我们观察的内容，这就在此内容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的框架。因此，事实就像是盒子里的盒子，如果我们不做出某种社会行动来将其置于一个可控框架中来聚焦的话。戈夫曼指出，人类行动者通常很注意保持他们的框架的秩序，即使我们在这些框架中出出进进，但我们无法逃脱我们的构造性行为的戏剧化影响。在戈夫曼这里，社会学和哲学融合了，在这一点上，对构成社会现实的舞台机制的研究进入更为敏锐的聚焦中。

微观社会学的影响

戈夫曼和民族志方法学者对社会学领域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社会学第一次显露出了成为一门科学的真正的可能性——一个精确而严格的知识体系，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与他人发生关联时会如此行动，以及为什么我们称之为组织、体制、文化和社会的这些象征性产物具有它们各自特定的模式。但是，只要社会学家们还是疏离于他们试图加以解释的可观察的现实，而只是通过模糊地抽象，或者只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静态的和第二手的资料——通过对人们的态度进行问卷调查而收集来的——来研究它，那这种可能性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可能性。人类的社会行为终于成为关注的中心，不是在非现实的实验室环境中，而是在构成社会本质的真实的交往中。此外，戈夫曼的社会表演模式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工具,运用它,我们可以富有成果地整合以下材料:这些材料同时指向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形塑和表现了个体的个性、构成组织的合作与权威之真正动力学,以及关于人们的社交纽带与亲密关系的协商——它把社会各阶级联结在一起,并赋予他们以地位和群体文化。戈夫曼对涂尔干和米德的综合预示了一种新的、有力量的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弗洛伊德提出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矛盾可以此来解释。戈夫曼和民族志方法学者通过应用韦伯的遗产,提供了一种解释组织和阶级的经验现实的方法,能准确地描述大型结构的动力学,这种结构将面对面的群体联结成一个世界社会。

及时地从这一有利视点出发,我们会逐渐看到人类的另一面,对于而这一方面,以前的思想家只是模糊片面地设想过。在弗洛伊德、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工作中,在涂尔干、韦伯、米德、戈夫曼和其他很多人的工作中,我们重新将人类置于漫长的生物进化的视角下:一群特殊的、具有攻击性的群居动物,通过复杂的感情互动与其同类相联系,能够进行象征性的交流,这种交流能产生出未见的和不可能见的现实,在作为观众的同类面前上演集体性的符号戏剧,并在自己的脑袋里将其概括为抽象的思想,然后为我们的纯粹物理性的星球增添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看不见的世界。我们像动物一样为争取在一个群体中的支配地位而奋斗,这一群体我们轻易是不想去毁灭的;我们的武器不只是牙齿、爪子以及作为它们的机械延伸物的人类制造的各种暴力机器,还有各种仪式和交流,它们作用于人们的情感,通过各种显现在他们眼前和意识中的形象而引导他们。通过这些努力,群体被建立

起来，而其他一些人被排斥在这些群体之外；各种组织得以形成，人们开始争夺对它们的控制；大量的产业被制造出来；艺术、科学及其他象征文化出现了，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网络，它甚至支配了统治者，在面对无生命的化学世界时，它包含了人类意识的螺旋式的复杂性。

我们自身对这些过程的认识正在逐步形成一门社会学。如果说在很远的过去——马克思、斯宾塞和萨姆纳的时代——的社会学家帮助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的世界观，我们期望将来的普遍意识会从今天的社会学发展中得到一种新的娴熟和新的色调：对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彼此间随意发生冲突，尽管相互依赖之链将他们束在一起——的困境和纷乱具有新的娴熟理解，以及对人类的新形象所导致的新的色调。以前的思想家将人类看作或者是遗传的造物，或者是历史因果轮回的产物，是由盲目的罪恶与错误导致之物，或者只是大型结构与环境中的一个齿轮。所有这些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成分，但最杰出的社会学却给出了关于人类本质特性的另一种意象：创造出自己的行动及其意义，并构建出他们以前没未经历过的新的现实的生物。尽管我们受到我们能够轻易创造出或愿意创造出的东西的限制，但不管怎样，这个社会世界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坚固的世界瓦解了，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世界。

第十五章

文化资本、革命、世界体系和全球化： 布尔迪厄、斯考切波和沃勒斯坦的理论

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变迁一直是社会学中的中心议题。伟大的宏观社会学家马克思和韦伯关注权力、财富和文化支配的结构。追随他们的很多代社会学研究者们也是如此。本章我们将与20世纪后期的三位社会学家碰面，他们在将这种关注带入新方向方面贡献最多。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经济分层理论与文化理论结合起来；事实上，文化是阶级支配的关键因素。布尔迪厄是通过将经济资本（即金钱、财产）转化为他所称之为“文化资本”来开展其分析的。也就是说，文化上的投资会在日后转化为经济优势而生利。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是在关于革命的社会学

中施行一种革命的新一波社会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以前通常的观念认为，革命是自下而起的，人们起而推翻压迫性的政府。斯考切波指出，问题是，多数时候叛乱因为上层者远比底层者有权力而告失败。只有在国家因为其自身的危机而崩溃时，革命才能启动。这一讨论路径如今以关于革命的国家崩溃理论而知名。因为导致国家崩溃的原因通常是战争和国家财政，这一理论就扩展为有时被称作国家权力的军事 - 财政理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群中最有名的一位。在马克思最初的理论中，经济变迁推动了社会和政治变迁。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突破了封建主义，导致了革命，并引入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后来马克思又期望，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会导致引入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过程在单个国家中都发生了：比如 1789 年法国革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之一，1917 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预期的会在一个接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首例。对于沃勒斯坦和他的同道者而言，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最重要的线索不是发生在某一特定国家，而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已经包含了一个世界 - 体系（world-system）——也就是，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体系，它组成了自身的一个“世界”。（因此，“世界 - 体系”在拼写时通常是带着连字符的；它并不一定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整个全球，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地理地区的体系，由其成员构成一个世界。）

有些国家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上层阶级；沃勒斯坦称其为“核心”。其他一些是这个世界的工人阶级，它们为核心提供廉价

的劳力和原材料，沃勒斯坦称其为“边缘”。在这二者之间是一些地位上下浮动的社会的区域，沃勒斯坦称其为“半边缘”，它们就像是世界 - 体系里的中产阶级。在此框架下，当今的全球经济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只不过是已经存在了至少五百年的世界 - 体系的一个新阶段。西班牙及其帝国是世界 - 体系的第一个霸权或曰支配力量；美国只是最晚近的一个。与各国内部的革命不同，整个世界 - 体系是循环发展的，从一个霸权转向另一个霸权。

布尔迪厄、斯考切波、沃勒斯坦和许多采取类似研究取向的社会学家们一道建立了一种新的框架，以探究我们的当代社会。一方面，这些视角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揭示了层级体系的构成要素、它的崩溃和革命，以及它与全球的关联。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张力。布尔迪厄特别强调文化，他描述的社会结构相当静态，总是再生着同样的东西。斯考切波的理论则是典型的国家中心理论，首要强调战争和国家预算。沃勒斯坦和世界 - 体系理论家们则强调经济，并将革命定位于世界经济体系中而不是特定国家内。不过这些差异是有益的，它们可以作为社会学家们未来探索的研究课题。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每一种理论在这个拼接游戏中已获得的进展。

皮埃尔·布尔迪厄：符号暴力与文化资本

在近年的法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人物恐怕就是 2002 年去世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布尔迪厄没有像福柯、萨特和列维 - 斯特劳斯那样高的公共知名度。但就社会学而言，他绝对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与其他只是简略涉及社会理论的法国知识分子不同，

234 布尔迪厄是一位活跃于研究界的职业社会学家。他主掌在巴黎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多年，这是法国最重要的经验研究机构。因此，相对于其他纯粹做理论研究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他具有能够发掘出新的研究信息的优势。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研究工作的主要声誉归于了布尔迪厄，但他是得到了很多天才合作者的协助的，其中包括让-克劳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让-克劳德·尚博勒东（Jean-Claude Chamboredon）、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其他一些人。他的小组研究了法国教育体系中的现代生活的文化结构，还研究了高雅文化和低层文化的其他方面：参观博物馆、业余摄影、家庭装饰、高格调设计师的竞争激烈的领域，以及知识分子中的派系结构。布尔迪厄的研究小组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都更多地使我们了解了一个现代社会内部的差异。

但布尔迪厄并不只是一位对这个生活着不同社会阶级的世界的描述者。他还是一位理论家。通过借鉴和综合涂尔干与马克思，以及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且，布尔迪厄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即在他早期职业生涯中对阿尔及利亚山区的卡比尔人部落所做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其理论中加入了一种比较的维度。布尔迪厄指出，不管是在部落社会还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本身都是一种“经济”，它同时与我们惯常称为“经济”的东西，即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相关。文化经济中的分层与物质经济中的分层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互为因果。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领域，与政治领域中典型的争夺暴力

手段的斗争相关。

因此，就有了布尔迪厄的核心概念：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在布尔迪厄与让-克劳德·帕斯隆合著的《再生产：在教育、社会和文化之中》中提出来的，即“它是一种成功地赋予意义的权力，并通过隐藏权力关系而成功地将这种意义赋予合法化，而这种权力关系正是其力量的基础。”这种权力分布极其广泛。它构成了正式学校教育、孩子培养、人们在公共场所展示的风格、信仰和沟通媒介的内容。它们作为文化意义——人们据此来定义世界并确定彼此在世界中的位置——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暴力是隐藏着的，而且必须如此。学校所传授的文化是由主导阶级批准的文化，但学校又必须宣称它在阶级冲突中是保持中立的，因为它只有显得中立才能给主导阶级一方增添权力。布尔迪厄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文化的确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它为纯粹的武力和经济压制增加了一份自己的力量。学校文化是从多种可能性中专断选取出的一种，但它必须隐藏起这种专断性，因为如果它教授的是文化相对主义，那它必然在根基上摧毁自身。

这一主题在布尔迪厄最理论化的著作《实践理论纲要》中被有力地提出来，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他的阿尔及利亚部落调查资料。布尔迪厄声称，社会是通过欺骗，或者说误认（misrecognition）而整合的。这里，布尔迪厄对涂尔干的传统进行了自己的修正。涂尔干曾指出，社会是通过仪式性地创造出对其上帝的信仰而维持团结的。在布尔迪厄看来，这里包含着一种基本的误认，因为社会创造了上帝，但它必须将这一事实隐藏起

来，因为只有人们相信上帝是客观存在的，这一信仰才能有效。马塞尔·莫斯将涂尔干的仪式理论扩展为礼物的交换，后者是原始经济的基础。给予、接受和互换礼物是被社会义务所严格限定的，因为拒绝礼物是一种冒犯，而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礼尚往来，那么他就是在拒斥各种社会纽带。但是礼物这一观念正是要让人觉得是自愿的，而不只是对珍贵商品支付的费用；因此，除非人们否认礼物交换中有义务的成分，否则他们不可能以恰当的、义务性的态度来完成礼物交换。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所采取的路线，他从由婚姻——列维-斯特劳斯将其视为家庭之间以妇女作为礼物的交换——导致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中推导出部落社会的各种结构。布尔迪厄批评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对亲属关系规则的意识形态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什么构成高贵婚姻的正统观念本身是由那些占支配地位的家庭的力量所强加的，这些家庭都在争取结成有利的联盟。但布尔迪厄将这种误认的交换模式更推进了一步，指出不仅是婚姻，而且部落世仇与血仇都是一种礼物经济。在卡比尔人（Kabyle）中，为了保持家族荣誉，侮辱和谋杀必须要得到报复。同时，一个强大的家族又必须要发起侮辱和战争，因为只有有了敌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荣耀。但是在选择攻击的对象时要很小心。例如，向一个虚弱得不能正常打斗的对手挑战或接受其挑战，就会使自己蒙辱。与合适的敌人交战会给双方都带来荣誉，构成另一种隐性的礼物交换。布尔迪厄进一步引申，将其称为（被谋杀者的刀子割断的）“喉咙”经济，也就是“借”与“还”。这是一种荣誉经济，在一种武力强制的伪装下展开。在

这里，布尔迪厄成功地展示了被误认为真正暴力的符号暴力。

对布尔迪厄来说，这一事例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每一次交换”，他说，“都或多或少包含着掩饰了的挑战，只不过挑战与还击的逻辑只存在于每次沟通行动所限定的范围内。”^①这又是莫斯的主题了。每一件礼物都可能使其接受者遭受耻辱，如果他或她不能以具有同等声望的礼物来作为酬答的话；夸富宴（potlatch）上竞争性的礼物赠予就是按照这种逻辑进行的。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讨论的一个主题：部落婚姻模式的规则不仅导致联盟，当所期望的交换不能得到满足时，它也导致仇恨和战争。从缓和状态到联盟状态，再从联盟状态到敌对状态，其中的分界线是很脆弱的。布尔迪厄所概括的正是这种逻辑。

这种误认形式下的文化交流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再生产了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分配。学校教育的主导内容是与主导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文化。这就构成了文化资本，它是将权力关系转换为合法权威的首要手段。每一代新人都要通过这一学校体系，这样就再生产生了合法化的结构：那些在这一系统中获得成功的人由此获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而那些在其中失败的人则认为他们自身的从属地位是合法的和不可避免的。

这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再生产，其中各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得以维持，每一社会阶级中的各家庭则一代代地往下传递着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布尔迪厄将这种传递的基本方式称为习惯

①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4.

(*habitus*)。它意味着对一种专断的文化标准的内化,这种内化首先发生在家庭中,而后又在学校里得以强化。惯习通过自我给养而随着时间的逐渐生成;一种特定的文化消费,如参观博物馆,逐渐发展为对更多同类事物的需求。因此,出生于具有文化优势或文化劣势的家庭的孩子不仅在起点上处于不同的位置并拥有不同的资源,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以这种观点看来,学校教育与其说是创造了象征资本,还不如说是将其置于更为精致的形式之中;就像人们学习母语一样,开始是经验性的和习惯性的,后来则是有意识的、系统性的。个人一旦结束了学校教育,他就获得了一种文化储备,如果这一储备在既定的文化市场上还具有价值的话,那么它就使个人获得了通向特定职业和社会圈子的通行证。因此,个人在这一文化灌输系统中的运动就重构了社会的结构。

在部落社会,象征资本包括荣誉、亲属关系纽带和神话,比如那些在事物秩序中确定男人和女人的支配地位和从属地位的神话。这种文化通过避开对分层的关注,并通过创建出一个权威化的分类体系——群体成员必须通过这一体系来谈论和思考世界——而隐藏了分层。文化再生产出了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其物质经济。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了误认的逻辑和符号暴力。部落经济似乎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计算,而代之以匮乏与奢侈交替进行的风气。卡比尔人的家庭会因为有一次婚礼的奢侈铺张而使自己破产,他们也会为守住家传的土地而不遗余力。而所有这些都是荣誉经济中的行动。与“割喉”的仇杀交换类似,这种出于功利主义考虑的铺张与回绝是获得家庭荣誉,因此也是获得

社会权力的方式。因为声望高的家庭会有一个很广泛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中的人因为这个家庭的慷慨而对它负有一定义务；当遇到集体任务需要完成的话，这样的家庭就能召集到很多帮忙者。当这样的家庭卷入战争时，它能获得很多战士；而当有农活要干时，它能得到很多帮手。在符号市场上的花费会给他们带来权力和重新获得物质财富的回报。各个领域交汇在一起，并再生产出彼此。 237

布尔迪厄相信，这一论述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的。象征资本通常是具有信用的。在部落经济中，它包括积累起来的义务，在需要的时候，它会以劳动力和战斗者的形式得到支付。这种象征资本，与货币一样，是在市场中流通的。“财富，这一权力的最终基础，只有以象征资本的形式才能行使权力，并且是双重地行使。”^① 财富只有在转化为能激发出社会义务，并因此促成构成社会权力的联盟与遵从的诸形式时，它才能再生产出自身。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其文化支配形式有所改变，但原则是一样的。不管在何种情形下，文化市场都是作为符号暴力运行的：“这种从来没有被如此认识的温柔、隐性的暴力形式与其说是人们必须加以承受的，不如说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暴力：信誉的、信任的、义务的、个人忠诚的、好客的、礼物的、感激的和同情的。”^② 事实上，文化资本的这种流通是施行控制的最经济的模式。

布尔迪厄的历史观包括了他所思考的两种社会的类型学，一种是农业型的阿尔及利亚，一种是现代法国。它们分别对应于

①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195.

② 同上书，第192页。

两种控制模式。一种是不断在个人互动中产生和再产生出来的控制，一种是由客观的、非个人化的中介所调节的控制。前者包括部落社会中的仪式交换和仇杀；控制后者的则是非个人化的组织，它们分配各种资格，无论是财产契约还是各种学位。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的区别在于“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客观化程度”。^① 在部落社会，权力是在代表自身的个人之间不断协商的。因此对现代的观察来说，这种社会是个冲击，它较之他们自己的社会既更野蛮，又更个人化和人性化。在现代社会，控制是建立在客观的机制——学校系统的竞争性结构、法院以及货币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其产品看上去脱离于人，而呈现出“物体的不透明性和永久性”。^②

当文化不再是每一个使用它的人直接占有之物，而是变成由书写储存起来时，这两种类型之间就开始发生转换。于是专家们开始垄断了文化，并将其发展为宗教、艺术及各种专门知识的深奥的形式。布尔迪厄所说的这种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它标志着向阶级社会的转化。控制系统的进一步客观化是与教育系统的精致化一同发生的。进行仪式交换的个人化社会是地方性和片段性的，而教育系统则将所有的文化资本统一成一个单一的市场。文化交换中的正式的教育学位就相当于物质经济中的货币；二者都创造出单一的价值标准，以保证自由和普遍的循环。布尔迪厄走得更远，他指出制造经认证的学位的教育系统保证了人们总能依照客观确定的比率将文化资本转

①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184.

② 同上。

换为货币；在文化上的投资总能获得相同水平的经济回报。

布尔迪厄认为，一旦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开始出现，那么它发生转型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阶级社会在持续地、客观地复制自身。政治及经济突变不能改变其结构，这正是由于文化系统的相对自主性。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都不能提供任何解决之道，因为这些运动是由知识界的叛逆者所表述的，而他们自身由于他们所拥有的优越的文化资本而处于社会顶端。苏维埃类型的社会是由意识形态的拥有者所控制的，但其统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正式的转型。学校系统自身也不能成功地被去层化（destratified），这一取向的任何行动都已失败。布尔迪厄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资料说明，尽管学校的入学率大大提高了，社会阶级依然维持着依教育成就所构成的等级。在学校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方面所做的改革也并不能改变这一境况。因为发起这类改革的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就是他们所要改革的系统的产物。不管怎样转向“自由学校”环境、“软性”规范以及对自主和创造性的强调，教育仍维持着一种文化灌输和社会选择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对那些先锋派家庭的孩子最为有利。最新的、最自由的文化只是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另一个复杂化的层面。这个循环圈没有逃脱的出口：反思文化的人是已经被文化培育成型的人。

不只是正式教育，而且是文化的所有领域都已经分层化和正在分层化。在他的巨著《区分》中，他和他的研究同事指出这种关系存在于文化的所有领域，从绘画和音乐的品位到人们吃的食物的种类、与朋友娱乐的方式、购买的家具、观看与参与的运动，

以及人们所关心或拒绝的政治及公共事务。这些都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产物，他们也在时间的历程中再生产着这一结构。以艺术的品位为例，在认为何种艺术作品是美的这一问题上，中上和上层阶级的精英与中下和工人阶级的非精英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差别。较低等的等级坚持一种更为本质化的、内容取向的审美标准（日落、描绘一次首次圣餐仪式的图片），而精英们则将其视为感伤之物而摒弃，他们欣赏那些具有正式审美趣味的图画，即使其内容本身是日常的甚至是丑陋的物体（例如一张粗糙的手的照片）。这两种审美观是等级化的，其中“精英”的标准概括、超越和包含了下层阶级的标准。精英总是超前于“平均的”鉴赏水准而显示出高人一等的状态。他们不仅能将丑陋的物体转换为形式美的作品，而且当中下阶级逐渐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而开始欣赏抽象艺术时，精英们又超前一步，开始欣赏低层阶级的感伤的庸俗艺术或者是“通俗艺术”，具有讽刺意味地将其作为对一度曾为高等艺术的东西的疏离。

艺术品位只是所有文化领域中潜在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这种斗争形式是特别阴险的，因为它表面上似乎超越了庸俗层面上对经济支配和组织化权力的诉求。上层阶级的审美标准自觉地将自身与纯粹的金钱、纯粹的物质事物拉开距离，就好像艺术作品本身，以及积年累月（或者是代代累积）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于培养艺术的鉴赏力和树立鉴赏标准都是必需的——不需要极大额的物质投资似的。而且，精英们教条式地沉浸在他们的标准中，缺乏自我批判，因为这些标准似乎否定了单纯的世俗分层。社会界线自动地得以维持，因为这些人觉得和其他人打

交道很没趣，因为他们喜欢的娱乐方式不一样，与他们交谈往往会陷入关于品位问题的争论中去。同样这些人在他们公开宣称的信念上则可能是“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激进的”，在他们认为是社会阶级的问题上他们决不会允许自己慢待那些人。美学，尤其是有关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的美学在再生产阶级结构方面是极其有力的，这正是因为它宣称自己是与阶级结构无关的。

布尔迪厄的体系是完全自足的。它完全是讽世的、悲观的。我们永远注定是要分层化的，并注定会误认那些束缚我们的东西。我们跳出不了我们自身的皮肤；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在这个铁圈内的位置。在这一观点上，布尔迪厄可能太极端了。他只关注分层体系的再生产系统，而没有对处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变体给予足够的关注。更为全面的一种图景会更多地展现出实际发生于各社会中的冲突以及组织化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群体确实影响了分层系统，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

布尔迪厄的体系的力量在于他努力要创立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他对文化资本和符号暴力的分析可以被称为“关于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他声称经济与非经济领域之间的区分必须取消。传统经济学只不过是“关于实践经济的普遍科学的一个特殊例子，这一普遍科学能够把所有的实践，包括那些声称无利益取向的、免费的因而是非经济性的活动，看作致力于物质和象征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实践。”^① 至今为止，布尔迪厄只给我们提供了这一体系的一个粗略轮廓。因为准确地说，布尔迪厄的经济学还缺乏马克思所试图提供的关于历史变迁的

①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 183.

动力学和关于内部斗争和革命的机制。而我们会在斯考切波和沃勒斯坦那里找到这些。

关于革命的革命性理论：西达·斯考切波

240 1960年代的美国学生意识到了巨大的社会冲突的存在，其深刻程度是之前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达到过的。人们不再把国家设想为始终是一种正面的形象，是法律和秩序的民主保证；我们中一些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还记得那时在亚拉巴马州塞尔马被放出来扑向民权游行人群的警犬，以及由受人尊敬的社会代理机构所实施的其他暴力镇压。本书的作者们就参加过抗议集会，这些集会是在1964年夏天过后，到南方帮助黑人实现选举权的志愿者返回他们的校园时举行的，在那次运动中，几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被几个副警长杀害了。对立性的气氛越来越强烈，学校的官员们参与了对民权示威者的镇压，阻碍他们在校园里组织反对周围社区的种族隔离的示威。

这个时期，多数学生投身于被称为“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运动；他们从圣雄甘地1940年代领导的将印度从英国统治中摆脱出来的运动中获得启发，用身体挡住敌人的道路，在受到暴力攻击时不进行任何抵抗。本书的作者之一还记得他带着一本社会学的书加入到在伯克利的一座行政大楼里举行的大型示威活动，这座大楼被学生们非暴力地占用来抗议对一些领导了民权示威运动的学生的暂令退学决定。这是我们的关于微型革命（minirevolution）的体验；在那些喧嚣的日子里，学校的工作都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在关注学生的反叛，学校终于让步，给予了

学生在处理校园事务方面的一些新的政治权利。

在那些年里，这类事件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都发生过。非暴力的策略并不总能得到维持，有时候事情会升温，尤其是在1960年代后期，民权斗争激化，在很多黑人社区中演变成暴动。1967年夏天，战斗在底特律和纽瓦克的街道上持续了几个星期，几十人被杀害。其他事务也汇合了进来，包括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冲突逐步升级，而后又开始回落。到1970年代早期，一些民权改革的措施开始出台，很多官方的隔离制度被取消，黑人社区和大学校园开始平静下来。

对于经历过那一时期的学生来说，社会运动、冲突和革命并不是些抽象的概念，而是鲜活的现实；我们相信自己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当然，在那一时期，并没有像真正的革命这样的东西困扰着美国政府；只是在一些特别的社区和一两个校园里有过微型革命。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在这—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的思想里留下了印迹。其中的一点认识就是：革命并不必然会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的剧情而发生；革命并不一定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它也不一定要伴随着一个经济阶级的兴起。西达·斯考切波这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最彻底地梳理了这一洞见所推 241
导出的各种结论。

斯考切波当时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她在自传中说，她是在大学入学人数激增时期，从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家庭，进入到一所大学校念书的。在学校里，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追求快乐享受的人有橄榄球和男女生联谊会；其他一些人严肃的学习小组；还有众多的学生政治激进主义者，他们将人们卷入到对正在

美国各地发生的各种更大运动的氛围中。斯考切波加入了密西西比的一个民权教育项目，她与她的丈夫是通过这个项目相遇的，她认为她嫁给了一位注重平等主义的男性是激励她从事其事业的因素之一。在那个时期，女性——尤其是结了婚的女性——在学术界还无足轻重。如我们所了解的，学术的创造性往往包含着进入到作为前辈的重要思想家的人际网络中；斯考切波下一步做的就是这一工作，她进了哈佛开始她的研究生学习，由此获得了当时最为重要的优势条件。

就在几年前，哈佛的学者小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 Jr.）出版了他关于农业社会中的革命发展轨迹的里程碑式的比较性著作。穆尔并不特别关心革命产生的原因，而是关注其结果；他所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民主，有些导致了共产主义，还有一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斯考切波则认为革命的原因也必须得到解释：首先是，为什么会爆发重大的革命？她1979年出版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这一问题做了回答。

书中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改变了现代世界的三次大革命上：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49年的中国革命。斯考切波推翻了一些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她声称，革命并不是由于经济矛盾要冲破现存政治关系的束缚而爆发的，革命的代理人也并不是正处于上升时期的社会阶级。新的社会组织和新的社会阶级是在一场成功的革命转换之后，而不是之前，出现的。因此，法国革命为大规模的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出现扫清了道路，俄国与中国的革命在创造了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创造出了

一个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规性的，它在从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自然发展序列中跳跃了一些阶段。斯考切波则论述道，不是这样，是革命创造了随之而至的经济结构。

革命的主要起因根本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并不是说政治就是一场自由的权力游戏，也不是说革命者可以为所欲为。重要的一点是，政治也是根植于国家这一结构之中的，而国家会经历它自身的危机。斯考切波借用了韦伯的一个主题，指出国家有其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首先是国际性的：政治领袖们关注他们的国际声望，因此也关心能使他们获得声望的军事权力。如果说国家是面向外部的，那它也必须关注内部；国家的领导者必须与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各阶级展开竞争，以使经济剩余用于支付他们的军事账单。在斯考切波的著作发表后，很多历史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国家的行政机构最初是作为一项支持陆军和海军的设置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国家的官僚机制变得越来越庞大，以致它自己就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 242

斯考切波扩展了我们思考阶级冲突的途径。国家成员（the members of the state）因此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他们代表了一种特别的谋生方式：通过军事和行政拨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国家不仅是政治性的，它凭借自身的权力同时也成为一个经济代理人。

如果军事是国家的核心的话，我们就有了一种新的革命理论的起点。只要国家的军事机构还保持团结的话，革命就不可能。革命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保证国家掌权的军队和内部安全力量

崩溃了。以前的革命理论家都关注其他因素，而忽略了这一中心因素。人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指出叛乱的动因；不管是经济上的不满、相对剥夺还是文化张力，只要国家能维持其军事力量，上述因素的影响都微乎其微。那么，什么会导致军事上的崩溃呢？在这里，斯考切波转向她对几场大革命的比较。

法国、俄国和中国都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在军事上或是过度扩张，或是组织脆弱。它们试图赶上一些更为强大的国家，这就造成了国家预算的财政危机。其中有些国家确实在战场上打了败仗，造成了其军队的瓦解。而且我们看到，因为其背后的国际方面的动力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革命的危机在事件发生之前很长时间就已存在。国家试图要赶上其军事对手，不管其敌人做什么，它必须仿效。因此，1700年代的法国认为它必须赶上英国的海军力量；1900年前后的俄国统治者进行现代化以赶上欧洲列国；中国的各项改革是对日本和西方殖民权力的回应。为了赶上外国，统治者引进了一些变革，而从长远看，这些变革注定了他们自身的命运。

- 243 革命要真正成为重头戏，上层与外部的军事瓦解必须与内部和下层的压力结合起来。以往的革命理论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大众运动的兴起是促使革命的后果席卷一切的动力之一。斯考切波注意到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革命类型。第一类是所谓的大革命，这种革命不仅是一种政治的也是一种社会的转换，其变革伴随着阶级的剧变。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中，阶级的兴起是采取农民暴动的形式。

而另一类革命在本质上是政治革命。这方面的例子有 1600

年代的英国革命——它导致了自由主义的议会政府的统治——和 1776-1783 年的美国革命。另外还有 20 世纪中期在第三世界普遍兴起的民族建设 (nation-building) 这种革命类型。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其主要动力都是旧统治体制中的军事控制的瓦解。换句话说,首先是上层出现了瓦解,因而导致政治结构上的革命,但在只发生政治革命的情况下,它并不会与底层的大规模起义同时发生,而后者才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

斯考切波结合她的历史比较来论证她的观点。法国、俄国和中国当时都具有内困外患的危机。另一方面,英国的政治革命是由其外交政策支出造成的财政紧张而引发的,其上层的危机并没有与下层的农民暴动结合。与此类似,1867 年推翻了幕府统治、开启了迅速现代化时代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由外国势力侵入日本而引发的军事危机的结果,但它内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只是在贵族的不同分支中爆发过短暂的战争。

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大革命”既具备了内部叛乱的结构基础,也具备了国家瓦解的结构基础。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着农村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专制国家试图从上层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就会被推向叛乱的边缘。斯考切波遵循她的老师巴林顿·穆尔的研究主题指出,这些政府在无意中加强了农民进行起义的能力。贵族们通常不再对田地的日常工作进行直接的监督,使被疏离的农民与一个遥远的统治阶级对立。政府鼓励在每个地区成立集体性的农民组织;这是出于方便征税的行政管理目的,但是其结果是使农民有了发动起义时可以利用的组织基础。一旦中央体制由于外部的压力而崩溃,这些内部条件就会促成发动真正剧烈的社

会起义。

斯考切波的重要贡献正在于很多关于革命的理论所终止的
244 地方。她提出的问题是：在最初的崩溃之后，革命的重建何以可能？其他很多理论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它们只是关注最初的阶段。然而并不存在着国家重新兴起的内在动因，而且是以一种更集权化的、更强硬的形式出现。为什么国家在第一轮的革命之后没有持续其分裂状态，直到它在此状态下寿终正寝，或者是被外国征服者吞并？为什么经历过这些大革命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力量加强了？

斯考切波论述的逻辑是这样的：重大的社会革命背后的结构性条件最终在于其军事设置和国际关系。军队瓦解的长期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扩张其军事能力方面之努力的失败。为了扩张军事，这些前革命的国家试图通过加强对内控制来榨取国民更多的盈余。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这些国家陷入了瘫痪状态；贵族们反对国家官僚们试图从经济中压榨更多税收的做法。国家要对外更为强大的努力导致了国内的矛盾，这最终激发了革命过程。

从长远看，革命使国家在其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方面更有进展了：使其更有效率和更为强大。只不过以前的国家统治者再也看不到这一结果了，他们的主要对手——那些挡他们道的贵族——也看不到。在每个国家，革命的领导者都主要是小官员阶层，这一阶层大多数参与了革命前的行政改革。他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随着新经济出现的阶级；在法国，不是突破了贵族等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在俄国和中国，不是挑战资产阶级的新兴的工人阶级。相反，他们是在国家官僚制扩张的时候获取了新职位的有

抱负的行政官员。

在大革命中，在国家扩张过程中，这些干部周围爆发了两方面的危机。军事方面，上层出现崩溃，导致财政危机和军队的解体；社会方面，农民自底层爆发起义，而且通常伴随着破坏性的暴力。这两种危机都是通过革命来解决的。军事危机最终被克服，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控制机制的潜在资源；妨碍国家扩张的保守的贵族被农民起义所摧毁。另一方面，农民为革命提供了能量，但他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使他们不能收获革命的成果。他们能够破坏，但不能接管。被接管的是正在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现在它掌握在年轻的低级官员们手中。旧政权的其他残骸碎片被冲走，而他们则留在了舞台的中心。

斯考切波 1979 年的这一论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它回答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遗留下来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导致国家权力的萎缩？为什么革命并没有导致人类自由的提升？为什么相反它却产生出了权威的高度集中化形式和集权主义独裁？斯考切波论述了国家 245 是导致革命的中心焦点；而关于国家的权力会有多大、它将从社会的其他部分抽取多少资源等问题则一直存在着争论。

当然，历史在往前走。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大革命之外还发生了其他革命。其中很多符合斯考切波的政治革命的模式，这些革命没有太多地改变社会结构；在对这些革命的分析上，她关于外部压力和军事 / 财政崩溃的论述颇有效力。到 1980 年代后期，苏联本身很明显地在逐渐瓦解；首先是它失去了对其东欧卫星国的控制，而后是在 1990 年代初期其本土经历了一场反共产

主义的革命。斯考切波所提供的前沿的社会学理论在解释这些过程时是否也同样有效？

她的理论中提到的主要因素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联的瓦解是从中央开始的，先于被动员起来从底层反对它的民众运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压力削弱了中央；在如何加强国家权力的问题上，相互对立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爆发了种种派系斗争。当这些斗争加剧时，以俄罗斯人为主导的苏联不再能够控制其东欧的卫星国，中央的崩溃扩散到了边缘。斯考切波关于国家经由国际军事局势而瓦解的模式再次揭示出了这次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1990年代，改革者们激进地废除社会主义经济而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以斯考切波的模式观之则并不奇怪；不管怎样，斯考切波论述了经济结构和阶级是作为革命的后果而形成的，而不是作为革命之前的原因。也许我们会逐渐学会这样来看待历史：它是由一系列巨大的突变所构成的，使其发生转向的机制来自国际方面的军事压力和财政危机。当这种危机与国内组织阶级起义的条件达到同步时，经济就发生了转向：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或者是反方向转回来。也许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动力过程的最后结局。

在革命理论的探讨方面，斯考切波并不是孤独的。一个包括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内的比较社会学家组成的运动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现代国家兴衰的全面理论，既给出了国家巩固的条件，也给出了国家危机和崩溃的条件。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类型的革命，更好地理解一个社会中国家所扮演的经

济角色，以及从外部影响国家权力的地缘政治。1960年代美国的“微型革命”促使一代社会学家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革命，其成果是获得了对正在改变我们世界之动力规律的更广阔的理论理解，通过像西达·斯考切波所做的这样的努力，社会学的旧传统被修正和扩展了。毫无疑问，她的后继者将在此道路上走得更远。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世界—体系

在最近几十年里，对历史社会学——也就是说，社会学家自 246
己来处理历史——的兴趣逐渐上升。大多数历史学家是专门化的，回避对他们的工作做理论方面的阐发；在这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利用历史资料来进行比较，以期构建出关于社会重大特征的解释模型。已有一些遵循这一理路的知名著作出版，其中包括查尔斯·蒂利基于对法国历史上的革命运动和非革命性运动的历史研究而提出的关于抗议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巴林顿·穆尔对三条通往现代性的道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以及西达·斯考切波基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大革命而提出的比较理论。也许历史社会学家中最具雄心的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通过与一些致力于此的研究小组合作，通过利用极其广泛的历史资料，发展出了一个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社会转型单位来研究的模型。

在沃勒斯坦的模型中，个别的社会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要理解任何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都必须将其置于世界—体系的背景中。16世纪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某些社

会贬至无发展的 (nondevelopment) 位置。更准确地说, 世界被当作一个网络体系, 其中有些地区是核心 (core), 有些地区是边缘 (periphery), 还有一些是半边缘 (semiperiphery) 和外围地区 (external area)。

对于沃勒斯坦来说, “世界” 一词不是严格按照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世界 - 体系” 并不指的是整个地球, 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 (world-in-itself), 是一系列既联结在一起, 对于此系列之外的世界而言又相对自主的社会。有两种主要的世界 - 体系类型: 一种是世界帝国 (world empires), 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将其他国家联结起来, 并从其他国家抽取经济贡赋; 一种是世界经济体 (world economies), 是由战争和经济交换而联结在一起的各种政治单位的复合体。还有第三种可能的类型, 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 它现在还不存在, 但沃勒斯坦相信它会在将来出现。沃勒斯坦对 20 世纪真正有过社会主义经济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所存在过的不过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被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国家。

以上两种世界 - 体系状况的关键区别就在于, 一种 (世界帝国) 是一个征服国家通过收纳贡赋而支配经济, 另一种 (世界经济体) 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做到这一点。像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中国这样的帝国国家, 会限制经济的自主发展。在这种国家, 国家官吏高高在上, 他们不用向地位低下的商人让步; 由于缺乏军事上的竞争, 也就没有激发国家机制及其经济政策向理性化发展的动力。在这点上, 沃勒斯坦遵循了马克思关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因素的思想。从另一方面说, 国家之间的竞争意味着统治者必须向商业和金融利益让步。因此世界 - 体系中纯粹政治

权力的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一个世界经济体中，一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会比其他 247 国家要更强大。这些国家就是核心国家。它们能够在军事和经济上支配边缘国家，因此造成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体系中国际性的劳动分工。边缘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以种植园、奴隶制或其他廉价劳动力体系的形式）为核心国家积累了财富。这一结构在几方面都意义重大。它使核心国家有了一批自由的且报酬相对高的劳动力，这使其降低了国内发生代价甚高的阶级斗争的数量，并为经济产品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消费者市场。核心国家倾向于以积累方式日益富裕：它们的财富增强了它们的军事能力，而后者又反过来增长了其财富。

核心国家的核心地位也使这些国家避免了可能摧毁国家财政的恶性循环。国家为了建立起其军事力量就需要官员去征税，需要支付军队的开支。但往往国家自身就耗费了很多财富。这在中世纪国家中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贵族占有了收入的大部分，而将纳税的负担转给底层的农民。如果农民被压迫得太厉害，他们就可能起来反抗，而这反过来又更提高了要在军事上控制他们的花费。因此就出现了扩展权力与支持这一权力的经济花费之间的恶性循环。这是那些国家起起落落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家有时在权力上超过其他国家，但随即又会因为它们在战争和国内斗争上的花费升高而败落。

一些强大的国家，如 16 世纪的西班牙和法国，陷入于彼此间毁灭性的战争中，并受国内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暴乱的困扰。由此它们从核心位置上掉落下来，比如西班牙就变成

了一个半边缘的国家。沃勒斯坦指出，避开这种恶性循环的方法，就是要能成功地扩展到边缘。因此，军事花费较低和较少陷入到与外国的纷争中的英国在 16 世纪开始崛起，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过了其对手西班牙和法国。在下一个殖民扩张阶段，英国继续占据上风，扩张到了美洲和亚洲，从殖民地中获取经济利益，从而雄立于欧洲。

248 但是正如西班牙和法国所经历的盛衰变化一样，这种命运最终也轮到了英国；而 20 世纪中期崛起的最强大的核心国家美国似乎也注定会失去其世界霸权。在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一种机制，而这正是沃勒斯坦试图剖析出来的。资本主义的世界 - 体系过程是内在地循环的。这种循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周期性危机（在第二章有阐述）类似，只不过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其周期是 10 年左右，而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个周期大概是 100 到 125 年。实际上，沃勒斯坦是把马克思关于特定社会的动力机制的模型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 体系。与马克思一样，沃勒斯坦也寄希望于这个循环会以社会主义革命而告终；但对于沃勒斯坦来说，能真正使资本主义体系发生转型的革命类型必须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

沃勒斯坦的循环动力学是按照以下规律运行的。核心社会具有高技能、高工资的生产经济；边缘社会的经济是低技能、低工资型的。核心社会的繁荣依赖于它们对低工资的边缘社会的剥削能力，也依赖于它们自己的劳动力所提供的对高价商品的有效需求。扩张性循环（A 阶段）开始于对高工资的商品（例如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大于其供给，而对低工资的商品（例如原材料）

的需求也大于其供给。于是核心社会将它们的经济触角伸到了地球上那些新发现的地区。这导致从边缘地区输入的商品量不断增加，而这反过来又使核心社会的高价商品的生产增加。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一个繁荣阶段。

当来自边缘地区的商品供应超过需求时（B阶段），也就到了其转折点。因为不再有利可图，向外扩张开始趋缓。这使核心国家的生产停滞。世界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低迷期。最后这个循环降至最低点。在这段时间中，资本开始更为集中，为下一次扩张做准备。资本积累是在循环中的每个低潮时期会不断出现的一个过程。而且，在经济停滞时期，工人阶级的失业率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困苦会引发阶级斗争的剧变。结果就是迫使对收入进行一定的重新分配。这使对商品的需求提高，又一次为扩张循环的启动做好准备。

沃勒斯坦和他的同事提出，存在一种双重循环（A1-B1-A2-B2）。这一对循环中的第一个循环的下降趋势较为温和；在这一对循环的结尾处有一次经济上巨大崩溃，低工资的生产不仅停滞，而且出现收缩，而高工资的生产（通常是更具有弹性的）则陡然下降。

这一循环的政治方面不仅体现在衰退阶段阶级冲突升级了，而且还表现为核心国家之间的竞争在那些时候会爆发成相当严重的战争。需要经历整个双重循环，大概是100年左右，世界-体系的政治霸权才会发生转移。当原来掌握霸权的核心国家衰弱后，另一个国家会取代它的位置。在A1阶段，一个新的世界权力开始崛起，它在B1阶段处于支配地位，到A2阶段达到顶峰，在

249 B2 阶段开始衰退。霸权从一个核心国家转移到另一个核心国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经济优势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商业和金融超过其他国家时，它就成为霸权国家；于是它就能在军事力量上有更多的投入，从而使它能够支配国际舞台。但这种霸权总是会悄悄溜走。最终霸权取决于技术优势和维持国内秩序的相对较低的成本。为了把阶级冲突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就必须对工人做出更多的让步。而这些让步又提高了生产成本。因为技术总是从其原发国通过模仿而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因此其他初始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就能够占据优势。这样，就出现了持续的进入核心和退出核心的运动，也同时有进入边缘和退出边缘的运动。人们可以看到，尽管沃勒斯坦是在描述历史，但他的模型中的很多因素似乎都可以用来分析当前的形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或许会受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挑战，或者是中国或者是欧盟。

沃勒斯坦在他的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巨著中阐发了他的理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三卷。每一卷都包含着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循环。第一卷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从1450年的最初起飞到1640年前后的财政崩溃；从政治上说，这是西班牙帝国兴盛和衰落的时期。第二卷从1600年代的危机开始，论述到1750年的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期，荷兰崛起成为一个霸权性的帝国，后受到法国专制政权和英国权力兴起的挑战。沃勒斯坦的第三卷论述的是1750年至1917年这个阶段；这是我们传统上称为工业革命的时期，但从世界—体系的视角来看，这是大英帝国达到其经济和政治全盛状态的时期。这一时期在20

世纪早期的世界大战中进入到其危机阶段。从沃勒斯坦的长时段视角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实际上是同一场世界军事危机，中间被艰难达成的停战协议所中断。它们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将是第四卷要讨论的内容：在20世纪，英国衰落了，美国接替了其支配地位。如果沃勒斯坦的模型是正确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也将出现终结这个循环的一场危机。

一些评论家已经提出，世界霸权的新接替者已然显现，这就是中国。沃勒斯坦的第四卷还没有出版，所以我们还无法知晓他的预言的细节。但沃勒斯坦并不认为这一循环会永远持续下去。中国或日本会在21世纪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核心权力也并不是必然，因为这一理论也认为目前的这一循环会是最后一个循环。

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循环的周期越来越短了，这可能是由于资金在全球流动加速所致。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具有内在限制的趋向。其中包括世界上越来越大比例的地区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大比例的个人收入是以工资的形式（而不是不付报酬的强制劳动或传统劳动）获得的，越来越大比例的资本是以机器和商品而不是以土地的形式出现的。一旦未经 250
开发的土地、劳力和非机械化的生产储备枯竭，核心国家将不再能够向外部地区扩张。不再有新的殖民地出现，不再有新的社会加入到边缘区中让核心国家剥削。世界体系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机制将会消失。世界范围内具有高层次的动员力量的阶级冲突将不再可能。这一体系只能是通过转型为一种全新的体系来度过

它最后那场危机。沃勒斯坦预测这最后的栖息之地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

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循环的未来终结的设想表现了一种以新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关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革命的预言失败了，因为这些社会是以它们在世界 - 体系中的地位而获取经济力量的。20 世纪在俄国、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存在过的共产主义政府的掌权，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危机，而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前政府在世界 - 体系引发的战争中被摧毁的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国家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沃勒斯坦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整个模型，并提出一种逻辑，按照这种逻辑，马克思的预言最终还是會实现，但必须是在一个更庞大的层面上实现。

不管怎样，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从 21 世纪初期的视角看，我们是否还能说马克思的分析仍旧适用？1989 至 1991 年的东欧和俄国的反共产主义革命是否改变了整个局面的本质？出人意外地，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沃勒斯坦论证说，在很长时间内，世界 - 体系在整体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在这一体系之外进行选择，但它们做不到。只要它们参与国际贸易，它们就必须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做。它们至多只能作为在国内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某种类型的工商业公司行事，但在国际上它们必须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应对世界市场和金融。因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衰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已经如此紧密地与资本主义世界 - 体系绑在一起，以至

于它们自身的经济受到了资本主义竞争的挤压；它们在军事花费上的巨大投资只会使其境况更糟。要理解社会主义集团的衰败，我们需要的关键理论之一也许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机制的理论。而为了理解俄国以及以前作为它的帝国组成部分的其他国家——它们已经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了——的前景，我们更需要这一理论。

但这一理论是否正确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一理论中的很多因素很具有吸引力，它们就世界 - 体系如何影响其内部各社会的地位问题能有较贴切的解释。实际上，沃勒斯坦所告诉我们的是，单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层面，社会变革的原因是由外部进入内部的。这似乎是一种正确的思路。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较不确定。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其严重程度足以使整个体系走向终结吗？这并不是低估资本主义内部 251 所发生的斗争和冲突；只是我们还没有在理论上确定这些过程是否会在将来持续几个世纪而不是走向终结。按照沃勒斯坦的设计，世界社会主义是能将世界资本主义循环带向终结的唯一转型点。不过，即使是在数百年之后，是否存在像世界社会主义或其他稳定的栖息点，这还是个问题。

社会学如何解释全球化

自 1990 年代的这些年来，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新时代这一观念逐渐兴起，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它。这就是在流行媒体中广泛传播的全球化概念。在知识界，此概念通常是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观点是，世界在收缩，这主要是由信

息技术和互联网造成的。地球上任一点到另一点都可以确实达到即时沟通；观点、影像和信息可以无阻碍地传播到任何地方。世界已经联结成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共同上升到新的市场高度，并面临着同样的财政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威胁。商品和服务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出来并运送到任何地方。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再重要，只有一个大的全球政治。

全球化理论有悲观和乐观之分。我们是处在一个充满自由、创造力和发展，所有老旧的意识形态和偏见都被洗刷干净了的美好新时代吗？还是处于一个各种地方性问题会蔓延至所有地方的全球危机的时代？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需要首先问问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传统是否已经过时。追随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戈夫曼和其他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家们会对全球化、计算机化和因特网做何评论？

包括全球化在内的所有事物都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这是对韦伯的分层范畴（阶级、地位和权力）的次序重组，因为在全球化境况下，从文化维度开始讨论是有益的。

全球化理论倾向于最为关注文化，因为它最核心理论是关于信息及其在全世界流动的理论。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主要论题是，世界是否正在被一种单一的世界文化——有时被称为麦当劳化——所取代，或者说地方文化是否还能存续。就目前而言，据说答案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地方对全球文化模式的适应。但这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互联网的运用才不到20年，一些地方还更晚，因此再过更长的时间，比如说30年左右，

会出现一种完全同质性的世界文化，这还是很有可能的。对于那些认为只有地方性文化是本真的，全球文化是非本真的、商业化的和被操纵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悲观的结论。

但也存在着文化抵抗。全球文化主要是西方化，这在某些地方遭到猛烈抵制，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攻击西方的商业主义，宣称并抨击西方丧失了性道德及宗教价值观。对全球文化渗透进传统主义社会的反抗引发了有时是暴力的反应。不过，即使是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者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采用互联网，并在抵抗中使用现代武器。路边的炸弹可以由手机引爆。全球化的工具可以被用于反抗全球文化本身。

我们来设想一下世界—体系理论会怎样看待全球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他之前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指出，现代社会至少从16世纪起就一直是一个结合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世界经济体。现代欧洲的腾飞是与欧洲人跨洋扩张并将世界其他地方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发生的。更极端的理论家们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为，世界各地早在古代时期就已经通过种种影响了地方权力结构的贸易模式而连接起来了。

由一种世界文化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也不是新现象。世界—体系理论所强调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当前的全球化理论往往会忽略的，是世界从来就是分层化的。总是有一个中心地区，它为半边缘和边缘地区设定了种种趋向。贯穿于近500年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在世界上传布最广泛的文化是霸权中心的文化。1700年代，法国文化是支配性的，落后的德国贵族以说法语来提升他们的文化声望。在1800年代和1900年代早期英国占支配地位的

时期，英国的服装不仅为欧洲和美国的绅士们，而且为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和商业阶层者提供了追寻的样式风格。英国首先发明了流行的运动时尚，今天被称为世界运动的足球就是一项英国的运动，它首先在海外的各英国运动俱乐部中传播开来。

以此视角观之，当前全球化时代——1990年代之后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输出。美国的文化支配并不是由互联网开始的，而是先前趋势的延续。世界-体系理论将美国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霸权。这与好莱坞电影和美式电视连续剧的文化支配是相关的。当代全球文化主要立基于美国式的通讯技术之上。60年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世界已经被主要由美国公司及其海外模仿者所发明和推广的一连串技术所渗透：电影、电视、大型计算机、手提电脑、光纤电缆、卫星、互联网、手机、无线，以及进步过程中的所有其他阶段。而在这些媒体上得到传播的，也是美国式的内容。作为经济和军事-政治霸权的美国，也确立了其文化上的支配。

文化支配看上去似乎比其他类别的支配更为容易：军事和
253 政治入侵会导致抵抗，但即使是抵抗者也喜欢穿戴美国式的牛仔
裤、运动装、运动鞋和棒球帽。美国文化战胜英国和法国文化而
占据支配地位，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事情，与一场戈夫曼
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文化革命相伴而兴。欧洲的精英
推行的是一种绅士的高端风格，而美国人则发明了一种随意穿着
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反声望的，力图使穿着看上去尽可能地随意。
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文化冲突并不是西方风格
与非欧洲的本土衣着的冲突，而是保持不列颠时代领带-上衣

式正式穿着的人们与那些由美国的大规模服装市场而导致流行的随意穿着的人们——比如从伊朗到委内瑞拉的革命者——之间的冲突。

今天的全球文化所展示的是与之前各阶段存在过的世界 - 体系霸权同样类型的支配。世界 - 体系理论认为,文化只是经济支配的一翼。我们不应将文化想象成飘浮在空气中自我维持的东西,而是需要从文化制造产业的角度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文化产业有两大内容:生产文化的技术,以及由它们传送出去的文化。今天物质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制造出诸如手持微型计算机这样的产品,这之前,有笔记本电脑、电视机、照相机、电唱机和电话,这一长串的产品之流可以回溯到至少是 19 世纪,而自 1920 年代以来,这些产品一直是经济制造领域中一个爆发性增长的部分。就业 (employment) 中另一重要的一块是文化的非物质部分——电影和电视演播室、广告代理商以及所有其他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们生产出的东西。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文化生产部门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增长部门(如果我们将旅游经济包括进来的话——这是一种通过旅行来出售文化的方式——则更是如此)。它已经取代了所谓的烟囱经济或者“铁锈带经济”(rust-belt economy),后者是由工厂生产汽车、冰箱和其他大型消费品,这种方式在 20 世纪初占主导地位。

但这只是内容上的一个变化,而不是世界经济形式的变化。世界 - 体系扩张的每一阶段,随着霸权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有其首要的经济产品:在西班牙霸权时期是金银,早期殖民地时期是农业产品,19 世纪是铁路、隧道和海运,然后是 20 世纪早期

的大型消费品，以及 20 世纪晚期和 21 世纪早期的文化产业。今天所发生的众多革新是令人惊叹的，但没有什么是史无前例的：例如在铁路环绕地球伸展的时期，对于经历这一变化的人们来说，这同样是令人惊叹的；当土著人首次遇见持枪的欧洲探险者时，他们同样无比惊讶。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变化速率在加快，也许并不确实；几个世纪以来，世界 - 体系一直持续的变化似乎是保持同样的速率的。

254 这里还有更深的一点。现代世界 - 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是围绕扩张市场而组织起来的。扩张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即扩展到全世界，同时也是技术意义上的，即生产出新的产品和设备。某些产品和技术发生了变化，但基本的模式仍在重复：商业竞争催发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从地理上看，这些革新趋向于集中在金融和军事权力所在的核心地区，然后向外扩展到发展中地区，然后再到边缘地区。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通常也是劳动力最便宜的地区，所以有一种向外推移的模式，即以最小的成本来让其他人承担简单枯燥的低等工作，而将设计和提升产品的工作放在中心。世界治理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征服殖民地转为今天世界上正式独立的国家，但在这些形式之下，经济和社会过程仍然保持着同样的状态。

文化产品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前沿，最快的增长和最大的利润皆出于此。任何一种经济都包含常规的物质生产这一块：食品、住宅、交通、建设、服务、零售，诸如此类；因此，即使世界上某一特定区域并没有处在新产品的前沿地带，它也可能在这些更为传统的部门产生增长。并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被新产品同等

程度地渗透；这正是中心、半边缘、边缘之关键区分所在。一些远离中心的地方正在经历曾为历史早期阶段之前沿的生产类型。比如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构成就是在消费品方面的急追猛赶，而这些产品曾经构成20世纪早期美国和欧洲的增长浪潮。纯粹的增长率本身并不能使某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世界—体系的中心在金融活动和企业家行为所驱动的最新的发展前沿之地。关于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导者的预测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假设上；因为这并不只是一个达到之前产品数量的问题，而是在性质上转变成经济革新中心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成功建基于在市场中获得利润，而这意味着要在竞争者中保持领先；大的利润总是存在于最新的市场中，不管这些新市场是指新的地理区域，还是通过介绍并传播新产品或新的风格模式，使消费者感受到需要某种新东西的冲动。因此，所谓高科技变化时期实际上是一种很早就确立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利润驱动的基本模式。当然，新产品总是不同于之前的旧产品；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新”本身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一种长期模式的重复。

那么，从何种角度上说，当今的全球经济不同于以往各种全球经济？它更为全球化吗？虽然美国人购买的很多东西都是在中国或孟加拉生产的这一点很令人震惊，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开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甚至更依赖于世界贸易。再向前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纺织品的侵入摧毁了印度棉花产业；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从美洲输入黄金，刺

255 激了欧洲经济。尽管今天围绕全球的交通和通讯方式明显更为快捷,但这是否会导致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结构还并不明朗。

对当今全球经济的乐观解释认为,整个世界正在被现代化。可以设想,将来每个人都会拥有电脑,再进一步,每个人都会有美国式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尽管在当今世界的各个地方,中产阶级(或者严格地说,是中上层阶级,即中层阶级中的特权精英)的确看上去都很相似,但总体上的不平等结构则并不显示出上述乐观图景。相反,过去30年中世界各地的一个主要趋向几乎都表现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这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各社会内部,还存在于各社会之间。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里,比如美国,20%最富有的人和其余人口之间的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剧。这种模式在前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更为触目惊心;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不平等程度有巨幅增长;中国之转向市场经济则使原本在生活方式上极其接近的各阶层之间开始出现鸿沟。从各社会比较的层面看,世界上的富裕国家拉大了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现在的世界比1950年代的世界远更不平等。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好的理论是一种解释,而不只是对某一趋势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理论追随的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种论述是什么造成了不平等——社会阶级间财富与收入的差别——以及在历史上是什么造成了不平等的变化的理论。其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通过扩张,尤其是通过引进新的技术来获取利润。不过由于新技术取代了劳力,所以只需要更少的劳力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提高了失业率并降低了消费力,因此经济革新和扩张浪潮之后总是紧随

着危机，企业破产，但又被更大的企业拉升起来。马克思将此理论化为这样一种过程：繁荣 - 破产的商业循环会逐渐导致一场极严重的危机，严重到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革命所取代。尽管这一理论部分是符合事实的——在过去的 200 年甚至更长时期，周期化的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最终的大危机却一直沒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

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一种回答，即核心国家的资本主义总是能通过向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扩张来挽救自己。根据这一解释路径，当整个世界都完全被资本主义渗透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扩张了；以前亚洲的偏远地方现在已成为世界生产的中心这一事实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将不远了。

另一种解释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还在延续，并不是因为地理上的扩张，而是由于新的科技革新产生出了新的市场。尽管节省劳力的机器极大降低了工厂雇工职位，集装箱海运也几乎不再需要码头工人，但新的高科技产品创造了新的工作。这是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不管暂时性的繁荣 - 破产周期会怎样起起伏伏，²⁵⁶ 资本主义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指出，目前的高科技革新浪潮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它生产出各种代替白领工作岗位的机器。以前节省劳力的技术缩减了体力劳动阶级而扩大了中产阶级，而网页则正在消灭中产阶级的工作。文书和管理部门正在被自动化，这就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于是产生了所谓的沙漏形的劳动力结构，数量很少的富有的金融家和专业人士在顶部，底部是一大片贫穷人口，而实际上没有中间阶层。关于高科技的乌托邦观念中有一个缺陷，即它一直忽视所有权问题，就好像新

的技术会自动使所有人都受益。现在我们面临将来确实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即一小部分人会占有计算机体系，机器人将运行各大组织，而世界上的其余人口则随时可能失业。这些拥有高科技的精英是生活在美国、日本还是我们设想的迪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构模式：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及其将导致的阶级冲突。

全球化提供了这些问题全面展开的更大舞台，但它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将来会发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危机吗？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会导向一个世界政府下的社会主义。一种不那么激进的可能性是，会有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权，国际间达成协议来规范市场并重新分配财富以抵制不平等。第三种可能则是，就像以往一样，繁荣 - 破产的循环将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尽管总是有艰难时期，但历史似乎总能从艰难中走出。世界 - 体系理论所说的 100 到 150 年的长时段循环模式也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结构总是在不断重复，只是霸权地位在世界的各区域间转换。因此，说美国霸权的时代将要在 21 世纪的某个时候——也许是 2040 年左右——结束，而被另一个霸权所代替，或许并不是妄言。（中国被认为是新的候选者，但因为前文所提到的理由，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关于理论的讨论还没有结束。世界 - 体系理论认为，一个大阶段向另一个大阶段的转换是伴随着周期性的世界战争的。世界 - 体系霸权不仅是由经济和文化主导的，而且还是由军事主导的，必须通过一场战争，霸权中心才会放弃权力。这就引导我们转向全球化的第三维度——政治。

当代的全球化政治是否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在 1990 年代早

期的兴奋氛围中，人们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世界和平和协作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已经结束，我们从此将处在一个开放市场和开放沟通的时代。没过多久，现实显现出来，新的冲突展现在主舞台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西方的军事对立及后者以新的战争形式的反击；左派的、反资本主义政权的复兴（这在拉丁美洲尤其突出）；再加上经常性的地区冲突、专制性的政府，以及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种族屠杀 257 甚至是种族灭绝。

回过头看，1990年代早期的热烈宣言今天看来似乎不过是当时美国战胜了其意识形态敌人时的一种狂热。事实上，这一事情之所以发生，与其说是因为美国的优势地位，还不如说是因为苏联陷入了一场正好符合斯考切波所说的国家中心模式的革命。苏联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军事费用使国家财政不堪承受，并将精英们分裂为改革者和遵循共产主义传统者，并且为持不同政见运动在民族复兴的形式下动员力量打开了道路。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预见到苏联的瓦解，即使其世界-体系理论版也没有预见到。正如我们在整本《发现社会》中所强调的，社会学需要一种多维的理论，而韦伯的阶级、地位和权力的框架依然能为我们提供相关维度。由斯考切波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则向我们显示了权力运作自身的动力学是怎样的。尽管我们已经论证过世界-体系理论能够与发展到目前全球化阶段的各历史时期的状况相符合，但我们依然需要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理论方面整合起来。

对于国内政治的分析同样需要如此。即使在一个信息技术将全世界都连接起来的时代，地方国家（local state）依然存在，在所有这些国家内部，各社会群体都在奋力争取进入政府权力的各职位。各社会阶级依然具有他们各自的经济诉求——虽然富裕阶级目前已普遍占据了有利地位。正如韦伯派社会学家已强调的，地位群体比经济阶级更易动员，因此各地的大多数政治活动都是由围绕文化身份和共同体（尤其是族群和信仰方面的共同体）而组织起来的群体所组成的。这些政治活动也包括了一些新的社会运动类型，这些运动聚焦于某些观念问题，如环境、性别偏好，或为支持被压迫者的无私斗争。这些运动的参与者是韦伯意义上的地位群体，即围绕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这些赋予他们以道德声望——而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现在我们称其为网络）。我们较难观察到的是，尤其当我们是这些运动的参与者时，社会运动从来不能结束冲突。建立在更新的文化观念上的更进一步的运动总是会被创造出来，尤其是在创造新文化的资源变得如此普遍以来。诸如互联网这样的科技可以帮助各种运动进行动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边——或者其他任何特定运动——就肯定会胜利。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很容易进行运动动员的时代，因为有大量的动员资源。但这对参与运动的政治谱系中的各方都是同样的。至少自 20 世纪伊始就已经是这样了。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工人能够进行动员，但法西斯分子也能进行动员，同样，禁酒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能动员。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各种重要运动的阵容不断变化，但其模式是相似的，即没有任何单独一种运动能够遮蔽所有其他运动。

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即使在一个通信和动员形式在全球大规模扩张的时代，政治依然是一个多方冲突的 258 领域。有时候，其结果就是陷入僵局。有时候，这种僵局会稍被打破，权力暂时转移。不过从长时间看，这一直是政治的性质。在理论上还看不出这一性质会有很快改变的趋向。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些表面现象上不同于历史上以往的各时期，但今天正在进行着的社会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与以前相同的，而我们需要利用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传统来解释它们。整体而言，对全球化的高度乐观信念是不切实际的。对于诸如是否会有—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或者当前不平等程度提高的种种趋势是否会持续等问题，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理论来做出较准确的预测。这里正是新一代社会学家大有可为之处。

最后，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是关于大范围的世界和长时段的历史变迁的宏观理论。那么处理微观理论的那部分社会学是怎样看待全球化和未来的？宏观理论较之微观理论，倾向于更悲观。在宏观世界中，经济总是关乎阶级差异和不平等，关乎繁荣和破产的循环和危机；权力总是关乎战争与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权谋、支配与抵抗。在宏观视角下，甚至文化也通常被视为文化霸权的一种形式，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再生产了整个不平等系统。微观社会学并不否认这些模式，但它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维度。对于涂尔干及其传统而言，社会互动首要是通过情感和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来寻求团结感；文化是更为地方性和片段化的，因为人们关注他们自己群体的共享象征符号时，文化就在我们的意识中进进出出地闪现。像戈夫曼这样

的微观社会学家，就展现了各种小仪式的隐现是如何构成了我们私密生活中的各种剧目，并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信息技术的时代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社会学家已经开始研究人们如何使用手机、无线电脑设备、iPod、手持通讯设备，我们发现，人们使用这些科技产品主要是为了与他们认识的人以及与他们最觉熟悉亲切的文化保持小型的仪式联系。尽管计算机化具有其非个人化和疏离的方面，但世界的微观维度并没有变得更加冲突或更为疏离。这是因为在微观层面，人们是积极的、充满能量的能动者，因此我们最希望做的就是实现更多的戈夫曼式的微观仪式。

在最宏大的世界层面——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历史和每日新闻了解到的——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冲突和危机上。但微观社会学通过更为细节性的环节来观察事物，并且能够令人信服地揭示社会现实的更为广泛的切面。在人们倾注大部分心力的较小世界中，对意义和团结感的探索还在继续。

索引

(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 Achievement, versus ascription 后致性
对先赋性 192
- Addams, Jane 亚当斯, 简 82
- Adler, Alfred 阿德勒, 阿尔弗雷德 72
- Adorno, Theodor 阿多诺, 西奥多 42, 202
- Aesthetic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社会
分层与审美 238-239
-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
advancement ~ 的成就 181-182
- Booker T. Washington 布克·T. 华盛
顿 162-164, 172-174, 177
- civil rights protests 民权抗议 240-
241
- Du Bois 杜波依斯 169-176, 170
- race heroes 种族英雄 180
- religion and 信仰和 ~ 179-180
- social mobility ~ 的社会流动 180
- stratification ~ 的分层 175, 176-182
- Agape, versus Eros 亚加倍 (普世之
爱) 对厄洛斯 (性爱) 137, 138
- Alienation 异化 39-42
- Althusser, Louis 阿尔都塞, 路易 42
- Altruism 利他主义 66, 67-68, 73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 美国社会科学推进
协会 82
-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美国
经济协会 82
-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美国
历史协会 82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社会
学杂志》 188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 82
- American Prison Association 美国监狱协会 82
-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 82
-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243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美国社会学评论》188
-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美国社会学协会 82,18
- Anal phase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肛门阶段 134-135
- Ancient Judaism* (Weber)《古代犹太教》(韦伯)123
- Anderson, Elijah 安德森, 伊莱贾 182
- Anderson, Nels 安德森, 纳尔斯 163
- Anomie 失范 100
- Anthropology 人类学
Nietzsche and 尼采与 ~ 63-65
Sociology and 社会学与 ~ 13
- Antichrist, The* (Nietzsche)《反基督者》(尼采)69,70
-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71, 72-73,86
- Apollonian style 日神(阿波罗)风格 64
- Applied sociology 应用社会学 5-6
- Aptheker, Herbert 阿普特克, 赫伯特 173
- Aquinas, Thomas 阿奎那, 托马斯 203
- Aron, Raymond 阿隆, 雷蒙德 138
- Art,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社会分层与艺术 238-239
- Ascription, versus achievement 先赋性对后致性 192
- Assimilation, in Park's theory 帕克理论中的同化 163-164
-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sane 精神病患者保护协会 82
- Asylums* (Goffman) 精神病院(戈夫曼)220, 228
- Atlanta University 亚特兰大大学 176
-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 (Adorno)《权威人格》(阿多诺)202
- B**
- Bachofen, J. J. 巴霍芬, J. J. 63
- Balance of power, in U. S. government 美国政府中的权力制衡 53-54
- Barnard, Chester I. 巴纳德, 切斯特·I. 167
- Bauer, Bruno 鲍尔, 布鲁诺 28
- Bebel, August 倍倍尔, 奥古斯特 46
- Bentham, Jeremy 边沁, 杰里米 75-76
- Bentley, C. C. 本特莱, C. C. 173
- Berle, A. A. 伯利, A. A. 214
-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斯坦, 爱德华 42
- Berry, Duc de 贝利, 迪克·德 19
- Beyond Good and Evil* (Nietzsche)《超越善与恶》(尼采)69
-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Freud)《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138
- Biases 偏见 3-6
- Biologism 生物学主义 85-87
- Birth o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

The (Nietzsche)《音乐精神中悲剧的诞生》(尼采) 62

Bisexuality 双性恋 138

Black Bourgeoisie (Frazier)《黑人资产阶级》(弗雷泽) 177

Black Civilization, A (Warner)《一种黑人文明》(沃纳) 164, 179

Black Metropolis (Drake, Cayton)《黑人都市》(德雷克和凯顿) 176-182

Black Panthers 黑豹党 175

Black Students (Edwards)《黑人学生》(爱德华) 178

Blau, Peter 布劳, 彼得 115

Blumer, Herbert 布鲁默, 赫伯特 159

Boas, Franz 博厄斯, 弗朗兹 171

Boltanski, Luc 博尔坦斯基, 吕克 234

Bonald, Louis de 博纳尔, 路易·德 23, 48

Bourdieu, Pierre 布尔迪厄, 皮埃尔 232, 233-239

Bowles, Samuel 鲍尔斯, 塞缪尔 12

Brandes, Georg 勃兰兑斯, 格奥尔格 70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 费尔南德 252

British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英国社会科学协会 82

Brown, John 布朗, 约翰 172

Bücke, Ernst 布鲁克, 恩斯特 129-130

Bureaucracy 官僚制

Christianity as 作为~的基督教 123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8-209

Michels's oligarchy in 米歇尔斯论 ~

中的寡头制 201-202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3

Weber on 韦伯论 ~ 113-116

Bureaucratic conservatism 官僚制保守主义 204, 206, 209

Bureaucratic drift 官僚制的发展趋势 215-217

Burgess, Ernest 伯吉斯·欧内斯特 146, 163

Business 职业、商业

African Americans and 非洲裔美国人与 ~ 178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5-217

C

Capital (Marx)《资本论》(马克思) 40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alienation and 异化与 ~ 40

conflicts within ~ 内部的冲突 27

fascism and 法西斯主义与 ~ 197

i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中的 ~ 251-258

in Max's economic theory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 ~ 36-39

in Max's political theory 马克思政治理论中的 ~ 33-35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3-214

Weber's theory 韦伯的 ~ 理论 122-125

women in ~ 制度中的妇女 46-47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 ~ 248-251

Carnegie, Andrew 卡内基, 安德鲁 172

Catholic Church, relativism and 相对主

- 义与天主教会 203
- Causality 因果关系 39
- Cayton, Horace 凯顿, 霍勒斯 176-182
- Celebrity 名人 149-150
- Centralized governments 集权化的政府
economic crises and 经济危机与 ~ 57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6,
58-59
in wartime 战争时期的 ~ 55
- Ceremonies. 仪式 见: Rituals
- Chamboredon, Jean-Claude 尚博勒东,
让 - 克劳德 234
-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Gerth,
Mills)《性格与社会结构》(格斯和
米尔斯) 212
- Charcot, Jean 夏尔科, 让 131
- Charismatic legitimacy 卡里斯玛合法性
117-118, 137
- China 中国 191, 249
- Chinese revolution 中国革命 241, 242-
244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Bauer on 鲍尔论 ~ 28
as first bureaucracy ~ 作为第一个官
僚制 123
Freud on 弗洛伊德论 ~ 140-141
Nietzsche attack on 尼采对 ~ 的攻
击 64-66, 71-72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Freud)
《文明及其不满》(弗洛伊德) 139
- Civil laws 民法 95-96
- Civil rights protests 民权抗议 240-241
- Class. 阶级 参见: social stratification
-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
177, 178-182
versus color-caste ~ 对种族等级 179
- Lynd's research 林德对 ~ 的研究
164-165
in Marx's political theory 马克思政
治理论中的 ~ 32-35
in Marx's sociology 马克思社会学
中的 ~ 30-35
- Mead's failure to address 米德对 ~
的忽略 158
- research methods and 研究方法与 ~
165-166
in Weber's stratification 韦伯的分层
中的 ~ 109, 111, 116
- Class conflict 阶级冲突
Bourdieu on 布迪厄论 ~ 239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性别分层
与 ~ 45
in Marx's economic theory 马克思
经济理论中的 ~ 38-39
Skocpol on 斯考切波论 ~ 242
- Class 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31-32
- Cocaine use 可卡因使用 130
- Collective biography 集体传记 212
- Collective conscience 集体意识 94-98,
224
- Color-caste, versus class 种族等级对阶
级 179
- Commercialism,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
尔论商业主义 51-52
- Communication 交流, 沟通
dolphin 海豚 89

- Garfinkel 加芬克尔论 ~ 225-226
 Mead 米德论 ~ 154-155
 sociobiological view 社会学的 ~ 观
 87-88
 Communism 共产主义
 anti-Communist revolution 反 ~ 革
 命 245
 Max's philosophy 马克思的哲学
 40-41
 primitive 原始 ~ 43-44
 women and 妇女与 ~ 46-47
 Communist League ~ 者同盟 29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共产党宣
 言》(马克思) 29, 30
 Comte, Auguste 孔德, 奥古斯特 21-25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23, 48
 Durkheim and 涂尔干与 ~ 93
 as founder of sociology ~ 作为社会
 学创始人 3, 22
 on "great being" ~ 论 "伟大的存
 在" 24-25, 137
 Saint-Simon compared to 圣西门与 ~
 的比较 23
 on social change ~ 论社会变迁 23-
 24
 Spencer and 斯宾塞与 ~ 24, 79-80
 three stages of knowledge 知识的三
 阶段 21-22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The (Engels) 《1844 年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 29
 Condorcet, Marie Jean, Marquis de 孔
 多塞, 马奎斯·德 16
 Conflict theory 冲突理论 211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
 种族平等委员会 175
 Conscience 道德感, 良知 133
 Freud 弗洛伊德论 ~ 133
 Nietzsche 尼采论 ~ 68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6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bureaucratic 官僚制 ~ 204, 206, 209
 Comte's 孔德的 ~ 23, 48
 traditional 传统 ~ 204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炫耀性消费
 177
 Contracts, in Durkheim's theory 涂尔
 干理论中的契约 93-94
 Cooley, Charles Horton 库利, 查尔
 斯·霍顿 145-151
 criticism of 对 ~ 的批评 150-151
 influences on 对 ~ 产生的影响 146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与工作 145-
 146
 theories ~ 的理论 146-150
 CORE 种族平等委员会 175
 Core states, in world-system 世界 - 体
 系中的核心国家 233, 246, 247-249
 Coulanges, Fustel 库朗热, 菲斯泰尔
 164, 96
 Crime, social norms and 社会规范与犯
 罪 97-98
 Criminal laws 刑法 95-96
 Criminology 犯罪学 85
 Crisis, The 《危机》174
 Crowd, the (Le bon) 《乌合之众》(勒庞)

- 137
Crozier, Michel 克罗齐埃, 米切尔 115
Cuban revolution 古巴革命 217
Cults 崇拜
 ancient Greek, Roman 古希腊罗马的 ~
 64
 Comte's 孔德的 ~ 24-25
 Saint-Simonians 圣西门主义者的 ~ 20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资本 232, 233-239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文化分层 111-
 113, 238-239
Culture 文化
 globalized ~ 全球化 251-253
 society as 作为 ~ 的社会 22

D

- Dadaists 达达派 198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Mead and 米德和 ~ 153, 154
 theory of evolution 进化论 78, 90
Das capital (Max) 《资本论》(马克思)
 30
Dawn, The (Nietzsche) 《朝霞》69
Death instinct 死亡本能 137-139
Decentralized governments,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分权化的政府 53,
 58-59
Deception 欺骗 234-235
Delinquent Gang, The (Thrasher) 《犯
 罪团伙》(思拉舍) 163
Democracy 民主
 Cooley on 库利论 ~ 148
 defined 界定 ~ 116

-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0-59
Democracy in America (Tocqueville)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49,
 56-57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201
Democratization, in Mannheim's
 political theory 曼海姆政治理论中
 的民主化 207, 208
Derivatives, in Pareto's system 帕累托
 体系中的派生物 186
Descartes, Ren 笛卡尔, 勒内 39
Descent of Man, The (Darwin) 《人类的
 由来》(达尔文) 78
Developing nations 发展中国家 24
Deviance 越轨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 97-100
 labeling theory and 标签理论和 ~
 220-222
 Park on 帕克论 ~ 163-164
Dewey, John 杜威, 约翰 146, 153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德尼 16
Differentiation 分化 见: Division of labor
Dionysian style 酒神风格 64-65
Disorganized areas, in Park's theory
 帕克理论中的无组织的地区 163
Distinction (Bourdieu) 《区分》(布尔迪
 厄) 238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分工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 93-97,
 103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2-194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 ~
 247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he
 (Durkheim) 《社会分工论》(涂尔干) 93, 95, 103

Divorce 离婚 85

Dolphin research 海豚研究 89

Domhoff, G. William 多姆霍夫, G. 威廉 216

Domination 支配 237, 252-253

Douglass, Frederick 道格拉斯, 弗雷德里克 172

Drake, St. Clair 德雷克, 圣克莱尔 176-182

Dream interpretation 梦的解析 131

Dreyfus affair 德雷福斯事件 91-92

Du Bois, W. E. B. 杜波依斯, W. E. B. 169-176, 170

Booker T. Washington and 贝克·T. 华盛顿与 ~ 172-174

as elder statesman 作为政界元老的 ~ 175-176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work ~ 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 175

as founder of African American sociology ~ 作为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的创立者 170-171

life and studies ~ 的生平与研究 169-170

NAACP and NAAP 和 ~ 174

Theoretical influences on ~ 受到的理论影响 171-172

Durkheim, Emile 涂尔干, 埃米尔 91-104

Bourdieu and 布尔迪厄与 ~ 234,

235

Compared to Simmel ~ 与齐美尔的比较 142, 145

Comte and 孔德和 ~ 24, 93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y ~ 对社会学的贡献 8, 10, 93, 100

criticism of 对 ~ 的批评 103-104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社会学发展史中的 ~ 4, 11, 13

on deviance and solidarity ~ 论越轨与团结 97-100

on division of labor ~ 论劳动分工 93-97, 103

Dreyfus affair and 德雷福斯事件与 ~ 92

Goffman and 戈夫曼和 ~ 224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和工作 92-93

Pareto and 帕累托和 ~ 187

Parsons and 帕森斯和 ~ 192, 193, 196

on religion ~ 论宗教 100-102

Duster, Troy 达斯特, 特洛伊 182

E

Ecological succession 生态型的继替 163-164

Economic crises 经济危机

centralized government and 中央政府与 ~ 57

in Marx's theory 马克思理论中的 ~ 36-37, 38

Economics 经济, 经济学 参见: Globa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in ~ 中的分化 193

- founding of ~ 的创立 75
- Keynesian 凯恩斯 ~38
- in marriage 婚姻中的 ~ 45
- Marx's 马克思的 ~ 30-31, 35-39
- Pareto's work 帕累托的研究 184
- in revolution theory 革命理论中的 ~
241-245
- sociology and 社会学与 ~ 12-13
- Weber on 韦伯论 ~ 119-120
- in world-system 世界 - 体系中的 ~
246-251
-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经济分层 110,
113
- Economy and society* (Weber) 《经济与
社会》(韦伯) 107
- Education 教育
-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的 ~
173, 177
- cultural capital and 文化资本与 ~
237-238
- Nietzsche philosophy and 尼采哲学
与 ~ 73
- Reformism and 改良主义与 ~ 82
- Reform through 通过 ~ 改革 84-85
- Edwards, Harry 爱德华兹, 亨利 178,
182
- Ego 自我
- concept ~ 概念 136-137
- in secondary process 次级过程中的 ~ 133
-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
139
-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he (Durkheim) 《宗教生活的基本
形式》(涂尔干) 100-101
- Elementary Structure of Kinship* (Lévi-
Strauss)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列维 - 斯特劳斯) 235
- Eliot, T. S. 艾略特, T. S. 198
- Elite. 精英 参见: Upper class
- in Mannheim's political theory 曼海
姆政治理论中的 ~ 209
- in Pareto's system 帕累托体系中的 ~
186-187
- Ellison, Ralph 埃里森, 拉尔夫 181-182
- Emmanuel, Arghiri 伊曼纽尔, 阿尔吉
雷 12
- Employee relations, Tocqueville on 托
克维尔论雇佣关系 51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
书》188
- Enfantin, Barthelemy-Prosper 昂方坦
20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 gender stratification theory ~ 的性
别分层理论 42-47
- Max and 马克思和 ~ 29, 41, 42
- England 英国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23-124
- as industrial society model ~ 作为工
业社会典型 80-81
- liberalism ~ 的自由主义 75-81
- in world-system ~ 在世界 - 体系中
247-248
- English revolutions 英国革命 243
- Enlightenment 启蒙

- economics and 经济学和 ~ 32
 philosophies of ~ 哲学 4, 12, 16-17
 relativism and 相对主义和 ~ 203-204
 religion and 宗教和 ~ 74
 Equality,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平等 50-59
 Equilibrium system 平衡系统
 Pareto's 帕累托的 ~ 185, 186
 Parsons's 帕森斯的 ~ 191-192
 Eros 厄洛斯 (性爱) 137-139
 Erotic freedom 性爱自由 43, 46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
 (Malthus) 《人口论》(马尔萨斯) 76
 Ethnomethodologists 民族志方法学者 225-228
 Eugenics Society 优生学协会 86
 Evolutionism 进化论
 consequences of ~ 的结果 90
 Cooley on 库利论 ~ 147
 Darwin on 达尔文论 ~ 78
 Mead on 米德论 ~ 153
 Parsons and 帕森斯和 ~ 195
 in reformist movement 改良运动中的 ~ 83
 Spencer on 斯宾塞论 ~ 78-81
 Sumner on 萨姆纳论 ~ 81
 Wilson on 威尔逊论 ~ 88-89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42, 72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on Man and Animals, The (Mead) 《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米德) 154
 External area, in world-system 世界 - 体系中的外围地区 246
F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77
 Facts, versus values 事实对价值 5-6
 Family 家庭
 Engels on 恩格斯论 ~ 43-45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0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in Germany 德国的 ~ 197
 in Italy 意大利的 ~ 187, 197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5, 206, 209
 Marxists' explanation 马克思主义对 ~ 的解释 197-198
 Michels on 米歇尔斯论 ~ 202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6
 Feagin, Clairece Booker 费金, 克莱瑞斯·布克 180
 Feagin, Joe R. 费金, 乔·R 180
 Feminism 女权主义 参见: Gender stratification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与 ~ 46-47
 Mills and 米尔斯与 ~ 218
 in socialist Germany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 ~ 46
 Ferguson, Adam 弗格森, 亚当 75
 Finance, in Weber's theory 韦伯理论中的财政 119
 Fleiss, Wilhelm 弗雷斯, 威廉 138
 Flirtation, Simmel on 齐美尔论调情 144
 Formalists 形式主义者 229

- Förster-Nietzsche, Elisabeth 福斯特-尼采, 伊丽莎白 70-71, 72
- Foxes, in Pareto's system 帕累托体系里的狐狸 186
- Fragments on Ethics* (Mead) 《伦理学论丛》(米德) 159
- "frames" concept "框架" 概念 230
- France 法国 参见: French Revolution centralized government 集权化的政府 58-59
- reason and revolution 理性与革命 16-17
- in world-system ~ 在世界-体系中 247
-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42, 202
- Frazier, James 弗雷泽, 詹姆斯 64
- Frazier, E. Franklin 弗雷泽, E. 富兰克林 176-178
- Freedom 自由
-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9
-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2, 54, 57
- Free will 自由意志 194-195, 196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参见:
- France
- context of ~ 的背景 16-17
- economics and 经济与 ~ 33, 34, 59
- Mead on 米德论 ~ 154
- revolution theory and 革命理论与 ~ 241, 242-244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127-141, 130
- attitudes toward 对 ~ 的态度 131
- on death instinct ~ 论死亡本能 137-139
-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 7-8, 11, 13
- early life and work ~ 的早期生活和工作 128-133
- ego 自我 136-137
- Eros 厄洛斯(性爱) 137-139
- id 本我 136-137
- later career 后期职业生涯 139
- libido theory 里比多理论 135-136
- on love 136 ~ 对爱情的观点 137
- in Nazi Germany ~ 在纳粹德国 139-140
- on neurosis ~ 对神经官能症的观点 135
- Nietzsche and 尼采和 ~ 72
- Parsons and 帕森斯和 ~ 192, 196
-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 初始过程和次级过程 133-134
- on religion ~ 关于宗教的观点 139, 140-141
- repression theory 压抑理论 132-133
- sexual development stages 性发展的各阶段 134-135
- superego 超我 136-137
- unconscious 无意识 127-128, 132-133
- Fromm, Erich 弗洛姆, 埃里克 202
-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Gerth, Mills) 《马克斯·韦伯: 社会学论文集》(格斯和米尔斯) 211
-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

Goffman 戈夫曼论 ~ 228-229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0-191,
 196
 predecessors ~ 先驱 147-148
 roots ~ 的根源 23
 Functional rationality 功能理性 208-
 209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The (Barnard)
 《管理的功能》(巴纳德) 167
Future of an illusion, the (Freud) 《一种
 幻想的未来》(弗洛伊德) 139

G

Gallup, George 盖洛普, 乔治 165
 Galton, Francis 高尔顿, 弗朗西斯 85
 Game stage of socialization 社会化的
 游戏阶段 157
 Game theory 博弈理论 93, 94
 Gandhi, Mahatma 圣雄甘地 240
 Garfinkel, Harold 加芬克尔, 哈罗德
 225-226
 Garrison state 要塞国家 216-217
 Garvey, Marcus 加维, 马库斯 174
 Gates, Henry Louis, Jr. 盖茨, 小亨
 利·路易斯 182
Gay Science, The (Nietzsche) 《快乐的
 科学》(尼采) 69
 Gender stratification 性别分层
 Engels on 恩格斯论 ~ 42-47
 Nietzsche philosophy and 尼采哲学
 与 ~ 73
 sociobiological view 关于 ~ 的社会
 生物学观点 89

Generalized other 一般化的他人 89,
 156-158
 biologism 生物学主义 85-86
 sociobiology 社会生物学 87-90
 Genital stage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生
 殖阶段 135
 Geography, as U. S. advantage 美国的
 地理优势 55
 Germany 德国
 fascism in ~ 的法西斯主义 197
 Nazis 纳粹 139-140
 Nietzsche's acceptance in 尼采在 ~
 被接受的情况 70-71
 Social Democrats ~ 的社会民主党
 人 198
 Weber on 韦伯论 ~ 125
 in world war I ~ 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 208-209
 Gerth, Hans 格斯, 汉斯 211
 Gestures, Mead on 米德论姿态 154-
 155
Chetto, The (Wirth) 《聚居区》(沃思)
 163
 Giddings, Franklin H. 吉丁斯, 富兰克
 林·H. 82, 146
 Gift exchange 礼物交换 235
 Gintis, Herbert 金蒂斯, 赫伯特 12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Marxist predictions and 马克思主义
 的预言和 ~ 37-38
 as phase of world-system 作为世界-
 体系阶段的 ~ 233
 theories ~ 理论 251-258

Glocalization 全球本土化 251
Gobineau, Arthur de 戈比诺, 亚瑟·德 59, 86, 87
Gödel, Kurt 戈德尔, 库尔特 229
Goffman, Erving 戈夫曼, 欧文 219-231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 11
Durkheim and 涂尔干和 ~ 98
focus of ~ 的关注主题 219
“frames” concept “框架”概念 230
Freud and 弗洛伊德和 ~ 8
functional necessity 功能必需 228-229
labeling theory work 标签理论研究 220-222
theatrical model of social life 社会生活的剧场模型 222-225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The (Zorbaugh)
《黄金海岸和贫民窟》(佐尔博)
163
Golden Rule 金箴 159
Goldstone Jack 戈德斯通, 杰克 245
Goode, William J. 古德, 威廉·J. 191
Government 政府
Centralized 中央集权的 ~ 56, 57
French,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法国的 ~ 58-59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5-217
U. S.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 ~ 53-55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 42
“Great Being” “大我” 24-25, 137

Great revolutions 大革命 241, 242-244
Greece, ancient 古代希腊 30, 64
Group theories 群体理论
current knowledge 当前关于 ~ 的知识 4
Simmel on 齐美尔论 ~ 144-145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 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166
Weber on 韦伯论 ~ 108-109

H

Habermas, Jurgen 哈贝马斯, 于尔根 42
Habitus 惯习 236
Harris, Marvin 哈里斯, 马尔文 13
Harmann, Eduard von 哈特曼, 爱德华·冯 128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188
Hawthorne effect 霍桑效应 167
Hegel, George 黑格尔, 格奥尔格
alienation and 异化和 ~ 40
on history ~ 论历史 28, 138-139
idealism 唯心主义 39-40
Marx and 马克思和 ~ 39-40, 42
on Reason ~ 论理性 28
Weber and 韦伯和 ~ 116
Heilbroner, Robert 海尔布龙纳, 罗伯特 13
Helmholtz school of medicine 医学上的赫尔姆霍茨学派 129
Hemingway, Ernest 海明威, 欧内斯特 198
Heredity 遗传 85-87

Heterosexuality 异性恋 138

High tradition, versus low 高级传统对低级传统 168

Hilferding, Rudolf 希法亭, 鲁道夫 42

History 历史
Comte stages of 孔德划分的 ~ 阶段 23
Hegel on 黑格尔论 ~ 28, 138-139
sociology and 社会学和 ~ 14, 246
Weber on 韦伯论 ~ 118-125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59, 197, 198

Hobbesian problem of order 关于秩序的霍布斯问题 192

Hobo, The (Anderson) 《流浪者》(安德森) 163

Hobson, John 霍布森, 约翰 37

Homo economicus 经济人 75

Homo sexualis 性人 138, 139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138

Honor,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荣誉 51

Horkheimer, Max 霍克海默, 马克斯 42, 202

Hughes, Everett 休斯, 埃弗里特 167

Hull House 赫尔堂 82

Human behavior 人类行为
laws ~ 的法则 83
motives ~ 的动机 109, 185-186

Human chauvinism 人类沙文主义 88-89

Hum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 146, 163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Cooley)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库利)

146, 148

Hume, David 休谟, 大卫 39

Hyman, Herbert 海曼, 赫伯特 158

I

Id 本我

concept ~ 概念 136-137

in primary process 初始过程中的 ~ 133

Idealism 唯心主义 39-40

Ideal types 理想型 106, 111

Ideas, control of 对观念的控制 31-32

Ideological bias 意识形态偏见 4

Ideology and Utopia (Mannheim)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曼海姆) 202

Imagination, in Cooley's theory 库利理论中的想象 149-150

Immigration 移民 83, 86

Indexical expressions 索引性表达 225-226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 8, 96, 99

Simmel on 齐美尔论 ~ 145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2, 56

Individuals, versus society 个人对社会

Cooley on 库利论 ~ 147, 149

Mead on 米德论 ~ 152-153, 156

Industrialism, Saint-Simon on 圣西门论工业主义 18-19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24-124

Industrial society 工业社会

Liberal reforms 自由主义改良 77

Spencer on 斯宾塞论 ~ 80-81
Inequality 不平等 255
Instinct of combinations 组合的本能
185-186
Instinct of group persistence 群体延续
本能 185-186
Institutions, Cooley on 库利论各种体
制 148
Interaction - consciousness 互动意识
222
Interdependence 相互依赖
in bureaucratic drift 官僚制发展趋
势中的 ~215
in Mannheim's political theory 曼海
姆政治理论中的 ~ 207-208
International Workingma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协会 41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Freud)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 131
Intuitionists 直觉主义者 229
Invisible hand theory 看不见的手理论
Freud and 弗洛伊德和 ~ 136
individuals and 个人和 ~152
Parsons and 帕森斯和 ~ 195
Smith's theory 斯密的理论 75
Spencer and 斯宾塞和 ~ 80
invisible man (Ellison) 《看不见的人》
(埃里森) 181-182
Invisible world, society as 社会作为一
个不可见世界 142-145
Iron Law of Oligarchy 寡头铁律 198-202
Iroquois society 易洛魁社会 43-44

Italy, fascism in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187, 197

J

James, William 詹姆斯, 威廉 169
Janet, Pierre 雅内, 皮埃尔 131
Japan 日本
as core power ~ 作为核心权力 249
love in 日本的爱情 191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 243
Jaspers, Karl 雅斯贝斯, 卡尔 106
John Brown (Du Bois) 《约翰·布朗》
(杜波伊斯) 17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 82
Johnson, Charles 约翰逊, 查尔斯 176
Jones, Ernest 琼斯, 恩斯特 140
Joyce, James 乔伊斯, 詹姆斯 1
Judaism 犹太教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71, 72-73,
86
Freud on 弗洛伊德论 ~ 140-141
Judicial system, U. S. 美国的司法系统
54
Jung, Carl 荣格, 卡尔 138
Juvenile delinquency 青少年犯罪 220

K

Kabyle tribe 卡比尔人部落 234-239
Kant, Immanuel 康德, 依曼纽尔 39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 约翰·F. 116
Keynesian economics 凯恩斯经济学 38
Knowledge, Comte's stages of 孔德的

- 各知识阶段 21-22
Koller, Carl 柯勒, 卡尔 130
- L**
- Labeling theory 标签理论 220-222
Labor 劳动, 劳动力
 profit and 利润和 ~ 35-36, 38
 in Weber's theory 韦伯理论中的 ~ 119
Labor theory of value 劳动价值理论
 35, 38, 76
Labor unions 工会 41, 84, 212-213
Laing, R. D. 莱恩, R. D. 73
Laissez-faire Liberalism 放任自由主义
 77, 206-207
La Mettrie, Julien de 拉梅特里 136
Lasswell, Harold 拉斯维尔, 哈罗德
 216-217
Latency stage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
 潜伏阶段 135
Laws 法则
 of human behavior 人类行为的 ~ 83
 natural 自然 ~ 76, 77
 retributive versus restitutive 惩罚 ~
 对赔偿 ~ 95
Le bon, Gustave 勒庞, 古斯塔夫 137
Lectures on Physiology (Brücke) 《生理学讲演录》(布鲁克) 129
Legislation, reform through 通过立法
 改革 84
Legitimacy, political 政治合法性 116-
 118, 137
Lenin, V. I. 列宁, V. I. 37-38, 42
Lesseps, Ferdinand de 列色普斯, 费迪
 南德·德 20
Lévi-Strauss, Claude 列维-斯特劳斯,
 克劳德 98, 234, 235
Lewin, Kurt 列文, 库尔特 166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75-85
 in America 美国的 ~ 81-85
 bourgeois 资产阶级 ~ 81-85
 founding of ~ 的创立 75
 opposing sides ~ 的对立面 75-76
Libido theory 里比多理论 135-136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Booth) 《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布斯) 77
Lilly, John C. 利里, 约翰·C. 88-89
Lions, in Pareto's system 帕累托体系中的
 狮子 186
Living and the Dead, The (Warner) 《生
 者与死者》(沃纳) 164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31
Loggins Vernon 洛金斯, 弗农 170
Lombroso, Cesare 龙勃罗梭, 恺撒 85,
 87
Looking-glass self 镜中自我 148-150
Louis, Joe 路易斯, 乔 180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六
 (法国国王) 17
Love 爱情
 Freud on 弗洛伊德论 ~ 136, 137
 Goode's functional analysis of 古德
 对 ~ 的功能分析 191
Lowenthal, Leo 洛文塔尔, 利奥 202
Low tradition, versus high 低级传统对

高级传统 168, 183-184
Lukacs, Georg 卢卡奇, 格奥尔格 42
Lumpenproletariat 流氓无产阶级 31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 罗莎 42
Lyell, Charles 莱尔, 查尔斯 78n
Lynd, Helen Merrill 林德, 海伦·梅里
尔 164
Lynd, Robert 林德, 罗伯特 164-165
Lynd, Staughton 林德, 斯托顿 164

M

Macro-sociology 宏观社会学 258
Maine, Henry Sumner 梅因, 亨利·萨
姆纳 63
Maistre, Joseph de 迈斯特, 约瑟夫·德
23, 48
Malinowski, Bronislaw 马林诺夫斯基,
布罗尼斯拉夫 98, 135
Malthus, Thomas 马尔萨斯, 托马斯
29, 76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
uction* (Mannheim) 《重建时代的人
与社会》(曼海姆) 206
Mann, Michael 曼, 迈克尔 245
Manners,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论举
止 50
Mannheim, Karl 曼海姆, 卡尔 202-209
Max and 马克思和 ~ 6
Mills and 米尔斯和 ~ 213, 216
on politics ~ 论政治 206-209
social relativism 社会相对主义 202-
206
Marcuse, Herbert 马尔库塞, 赫伯特

42, 202
Marquand, John P. 马昆德, 约翰·P. 164
Marriage 婚姻
Engels on 恩格斯论 ~ 43-45
Levi-Strauss on 列维-斯特劳论 ~
235
social-problems perspective and 社
会问题视角与 ~ 85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0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26-42, 28
on alienation ~ 论异化 39-41
Bourdieu and 布尔迪厄和 ~ 234
on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
论阶级和阶级意识 30-32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y ~ 对社会学
的贡献 27
controversial nature 关于 ~ 的争论
26-27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
会学发展史中的地位 4-5, 11, 12
Du Bois and 杜波伊斯和 ~ 171-172
economic theory ~ 的经济理论 35-39
legacy ~ 的遗产 41-42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与工作 27-30
political theory ~ 的政治理论 32-35
reactions to 对 ~ 的反应 6-7
on religion ~ 论宗教 4, 31
system overview 对 ~ 的系统归纳 30
Wallerstein and 沃勒斯坦和 ~ 246,
250
Marxists' views 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97-198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37-38

socialism 社会主义 42
 Mass society theory 大众社会理论 56
 Material interests,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阶级意识和物质利益 31-32
 Matriarchy 母权制 44
 Matrilineal descent 母系继嗣 43-44, 46
 Matza, David 马扎, 戴维 220
 Mauss, Marcel 莫斯, 马歇尔
 Bordieu and 布尔迪厄和 ~ 234
 Durkheim and 涂尔干和 ~ 100
 on ritual ~ 论仪式 98, 235
 Mayo, Elton 梅奥, 埃尔顿 167
 McDonaldization 麦当劳化 251
 McKenzie, Roderick 麦肯齐, 罗德里克
 146, 163
 Mead, George Herbert 米德, 乔治·赫
 伯特 151-159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y ~ 对社会学
 的贡献 3, 13
 criticism of 对 ~ 的批评 158-159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
 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3, 13
 Goffman and 戈夫曼和 ~ 220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与工作 151-152
 theories ~ 的理论 152-158
 Mechanical solidarity 机械团结 95
 Mechanical view of universe 机械论的
 宇宙观 129-130
 Medicine, Nietzsche philosophy and 尼
 采哲学与医学 73
 Medieval society 中世纪社会 15-16, 30-
 31, 33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 243

Mental illness 精神疾病
 Goffman's definition 戈夫曼对 ~ 的
 定义 228
 heredity in ~ 的遗传 131
 labeling theory and 标签理论和 ~
 220-221
 Nietzsche's 尼采的 ~ 70-72
 social-problems perspective and 社
 会问题视角和 ~ 85
 of Weber 韦伯的 ~ 107
 Meritocracy 精英统治 20
 Merton, Robert K. 默顿, 罗伯特·K.
 158
 Meslier, Jean 梅利耶, 让 16
 Metacommunication 元信息传递 88
 Metaphysical form, defined 形而上学形
 式的定义 21
 Meynert, Theodor 梅内特, 西奥多 130
 Michels, Robert 米歇尔斯, 罗伯特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
 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6-7
 Iron Law of Oligarchy 寡头政治铁律
 198-202
 Weber and 韦伯和 ~ 106, 124
 Micro-sociology 微观社会学 230-231,
 258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 ~ 177-
 178, 181
 in Marx's economic theory 马克思经
 济理论中的 ~ 38-39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3-214
 shrinking ~ 萎缩 256

-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论 ~ 57
in world-system 世界 - 体系中的 ~
233, 246
- Middletown* (Lynd) 《中镇》(林德) 164
-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Lynd) 《转变中的中镇》(林德) 164
- Militant society 军事社会 80
- Military 军事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5-217
in revolution theory 革命理论中的 ~
242-245
- Military-fiscal theory of state power
国家权力的军事 - 财政理论 232
- Mills, C. Wright 米尔斯, C. 赖特 210-
218
criticism of 对 ~ 的批评 216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与工作 210-218
Mannheim and 曼海姆和 ~ 213, 216
on Parsons ~ 论帕森斯 189
versus Parsons ~ 对帕森斯 211
- Mind, Self, and society* (Mead) 《心灵、自我与社会》(米德) 152
- Mind and Society, the* (Pareto) 《意识与社会》(帕累托) 185
- Minirevolutions 微型革命 240-241, 245
- Misrecognition 误认 234-235, 236
- Modern World-System, The* (Wallerstein),
《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 249
- Mommsen, Theodor 蒙森, 西奥多 106
- Money 金钱 40
- Monogamy 一夫一妻制 44-46
- Monotheism, Freud's theory 弗洛伊德的一神教理论 140-141
- Moore, Barrington, Jr. 穆尔, 小巴林顿
241, 246
- Morality 道德, 道德感
Cooley on 库利论 ~ 147
Mead on 米德论 ~ 159
Nietzsche on 尼采论 ~ 66, 67, 72
Sumner on 萨姆纳论 ~ 81
- Moral norms,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道德标准 94-95
- Moral philosophy 道德哲学 74-75
- Morgan, Lewis Henry 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 43
- Moses and Monotheism* (Freud) 《摩西和
一神教》(弗洛伊德) 140-141
- "Mother right" 母权 44
- Motives, for human behavior 人类行为的
动机 109, 185-186
-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ad) 《19世纪的思想运
动》(米德) 152
- Multivariate analysis 多元分析 111, 166
-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
184, 187, 197
- Myrdal, Gunnar 默达尔, 冈纳 174

N

- NAACP NAACP (全国有色人种发展
联合会) 74, 175
-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16, 18, 28, 59
-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58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全国有
色人种发展联合会 (NAACP) 174,

- 175
-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 全国慈善和教化联合会 82
- National Negro Business League 全国黑人商业联合会 177
- Native Son* (Wright) 《土著之子》(赖特) 181
- Nature laws 自然法 76, 77
-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 78, 81
- Nature-nurture issue 先天-后天论题 87, 175
- Nazis 纳粹 72, 139-140
- Negro Author, The* (Loggins) 《黑人作家》(洛金斯) 170
- Negro Family in Chicago, The* (Frazier) 《芝加哥的黑人家庭》(弗雷泽) 176
-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razier) 《美国的黑人家庭》(弗雷泽) 177
- Negro Problem, The* (Du Bois) 《黑人问题》(杜波伊斯) 173
- Neurosis, Freud on 弗洛伊德论神经官能症 135
- New Men of Power, The: America's Labor Leaders* (Mills) 《权力新贵: 美国的劳工领袖》213
- Newton, Isaac 牛顿, 艾萨克 16
- Niagra Movement 尼亚加拉运动 173-174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弗里德里希 60-73
- anti-Christianity 反基督教 65-66, 71-72
- Apollonian/ Dionysian style 日神(阿波罗)风格/酒神(狄奥尼索斯)风格 64-65
-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11
- followers of ~ 的追随者 70
- influence of ~ 的影响 72-73
-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与工作 60-63
- on life's value ~ 论生命价值 68-69
- madness of ~ 的疯狂 70-72
- superman of ~ 的超人 69
- theory of will ~ 的意志理论 66-68
- Nirvana principle 解脱原则 133, 138
-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非暴力直接行动 240
- Nuclear war 核战争 217

O

- Objectivity 客观性 2-3
- O'Connor, James 奥康纳, 詹姆斯 12
- Odum, Howard 奥得姆, 霍华德 176
- Oedipus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 135
- Ogburn, William F. 奥格本, 威廉·F. 165
-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Tocqueville)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58
-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Darwin) 《物种起源》(达尔文) 78, 153
- Oral stage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口唇阶段 134
- Organic solidarity 有机团结 95-96
- Organism, society as 作为有机体的社会

- Comte on 孔德论 ~ 23
Cooley on 库利论 ~ 147
Ferguson on 弗格森论 ~ 75
reformist perspective and 改良主义视角与 ~ 83
Spencer on 斯宾塞论 ~ 79-80
Organizations 组织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2-218
oligarchy in ~ 中的寡头政治 198-202
research on ~ 研究 166-168
Weber on 韦伯论 ~ 113-116
Oriental Despotism (Wittfogel) 《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 202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Engels)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 42-43
Other-consciousness 他人意识 22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Bourdieu) 《实践理论纲要》(布尔迪厄) 234-235
Overspecialization 过于专业化 9
Owens, Jesse 欧文斯, 杰西 180

P

- Pan-African Congress 泛非洲大会 171
Pan-African Movement 泛非洲运动 176
Pareto, Vilfredo 帕累托, 维尔弗雷多 184-187
criticism of 对 ~ 的批评 186-187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12

-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和工作 184-185
Parsons and 帕森斯和 ~ 184, 187
System ~ 的体系 185-186
Pareto optimum 帕累托最优 184
Park, Robert E. 帕克, 罗伯特·E.
criticism of 对 ~ 的批评 186-187
Du Bois and 杜波伊斯和 ~ 176
Hum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 146, 163
Race relations work 种族关系研究 162-163
Parsons, Talcott 帕森斯, 塔尔科特 188-196
Contributions to sociology ~ 对社会学的贡献 196
criticism of 对 ~ 的批评 196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era of ~ 时代 183-184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和工作 183, 188-189
versus Mills ~ 对米尔斯 211
Mills' s opinion of 米尔斯对帕森斯的评论 189
Pareto and 帕累托和 ~ 184, 187
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 论心理学的发展 134
on religion ~ 论宗教 120, 194-195
Sorokin and 索罗金和 ~ 188
theory of society ~ 的社会理论 189-194
Weber and 韦伯和 ~ 123, 188, 193, 196, 211

- Particularism 特殊主义 192
- Passeron, Jean-Claude 帕斯隆, 让-克劳德 234
- Patrilineal descent 父系继嗣 44-46
- Patrimonialism 世袭制 113-116
- Pattern variables 模式变量 192
- Peace, in industrialism 工业主义下的和平 20
- Pereire brothers 皮埃尔兄弟 20
- Periphery states,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 233, 246
- Perls, Fritz 皮尔斯, 弗里兹 8, 73
- Personalistic organizations 个人性组织 113-116
- Phallic stage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性器阶段 135
- Philadelphia Negro, the* (Du Bois) 《费城的黑人》171, 175
- Philosophes* 启蒙哲人 16, 74
-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社会学和哲学 229-230
- Philosophy of the Act, The* (Mead) 《行动的哲学》(米德) 152
-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Mead) 《现在的哲学》(米德) 152
-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artmann) 《无意识的哲学》(哈特曼) 128
- Phrenology 颅相学 22
- Play stage of socialization 社会化的游戏阶段 157
- Pleasure principle 快乐原则 133, 138
- Point of No Return* (Marquand) 《无法回头》(马昆德) 164
-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Thomas, Znaniecki)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 160, 161-162
- Political Parties* (Michels) 《政党》(米歇尔斯) 199
-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 13
-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政治分层 110-111, 113
- Politics 政治
- black bourgeoisie 黑人资产阶级 178
- globalized 全球化了的 ~ 256-257
-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4-209
- Marx's theory 马克思的 ~ 理论 32-35
- Michels's oligarchy in 米歇尔斯论寡头 ~ 201-202
-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5-216, 218
- Pareto on 帕累托论 ~ 187
-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6
- sociology's influence on 社会学对 ~ 的影响 11
- Weber on 韦伯论 ~ 116-118, 125-126, 137
-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 ~ 246
-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76
- Positivism, of Comte 孔德的实证主义 21-25
- Poverty 贫穷 76
- Power 权力 76
- in Mannheim's political theory 曼海姆政治理论中的 ~ 208

Marx's philosophy and 马克思哲学和 ~ 41
Mead's failure to address 米德对 ~ 的忽视 158
Simmel's group size theory and 齐美尔的群体规模理论和 ~ 145
Power Elite, The (Mills) 《权力精英》(米尔斯) 215-217
Power groups 权力群体 109, 111, 116
Pragmatism, Mead's 米德的实用主义 153, 159
Preconscious 前意识 133
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 前契约的团结 93-94, 96
Preplay stage of socialization 社会化的预演阶段 157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 初始过程和次级过程 133-134
Primary groups 初级群体 150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Mills) 《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 77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Spencer) 《社会学原理》(斯宾塞) 79
Prisons 监狱 84
Profit, as exploitation of labor 作为对劳动剥削的利润 35-36, 38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见: Working class
Property ownership 财产所有权
classes divided by 按 ~ 划分阶级 30-33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性别分层和 ~ 45
Prostitution 卖淫 45
Protestant ethic 新教伦理 107, 112,

121, 122-123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Weber)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 107, 122-123, 188, 211

Psychology 心理学

Comte on 孔德论 ~ 22

social 社会 ~ 149

sociology and 社会学和 ~ 13-14

Pure sociology 纯粹社会学 5-6

Q

Questionnaire surveys 问卷调查 165

Quételet, Adolphe 奎特勒, 阿道夫 98

R

Race heroes 种族英雄 180

Race Matters (West) 《种族事务》(韦斯特) 182

Race relations 种族关系 参见: African Americans

future of ~ 的未来 182

Park's research 帕克对 ~ 的调查 162-164

research methods and 调查方法和 ~ 165

Thomas's research 托马斯的 ~ 调查 160-162

Race-relations cycle ~ 圈 163

Racism 种族主义

biologism and 生物学主义和 ~ 85-87

emergence of ~ 的兴起 74

European 欧洲的 ~ 131

Marx's political theory and 马克思

- 的政治理论和 ~ 35
- of reformers 改良主义者的 ~ 86
- in sociobiology 社会学中的 ~ 88-89
- Radcliffe-Brown, Arthur 拉德克利夫 - 布朗, 亚瑟 98
- Ranke, Leopold von 兰克, 利奥波德·冯 106
-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 Cooley on 库利论 ~ 147
-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8-209
- Weber on 韦伯论 ~ 118-125
- Rational-legal legitimacy 法理性的合法性 117-118
- Reality 现实
- ethnomethodologists on 民族志方法学者论 ~ 225-228
- Goffman on 戈夫曼论 ~ 222-225, 228, 230
- Reality principle 现实原则 133
- Reason 理性
- Freud and 弗洛伊德和 ~ 127
- Hegel on 黑格尔论 ~ 28
- religion versus 宗教对 ~ 16-17
- Recurrence, eternal 永恒复归 69
- Reference groups 参照群体 158
- Reformism 改良主义者 77, 82-85
- Religion 宗教 参见: Christianity
-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的 ~ 179-180
- American culture 美国文化 55-56
-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古希腊罗马的 ~ 64
-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 96, 100-102
- Enlightenment and 启蒙运动与 ~ 74
- Freud on 弗洛伊德论 ~ 139, 140-141
- Marx on 马克思论 ~ 4, 31
- Medieval society 中世纪社会 15-16, 31
-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20, 194-195
-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哲学突破 120
- reason versus 理性对 ~ 16-17
- relativism and 相对主义和 ~ 203
-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离 55
- Spencer on 斯宾塞论 ~ 80
- stratification in ~ 中的分层 111
- Weber on 韦伯论 ~ 120-123
- Religion of China, The* (Weber) 《中国的宗教》(韦伯) 123
- Religion of Humanity 人道教 24-25
- Repression theory 压抑理论 7, 132-133
- Reproduction 再生产 236
-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Bourdieu) 《再生产: 在教育、社会和文化之中》(布尔迪厄) 234
-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201
- R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
- Black Metropolis* 《黑人都市》178-179
- development of ~ 的发展 8-10, 165-166
- Du Bois' s *Philadelphia Negro* 杜波依斯的《费城的黑人》171
- Durkheim' s *Suicide* 涂尔干的《自

杀论》98-99
 Of Mills 米尔斯的 ~ 212
 Mills on 米尔斯论 ~ 211-212
 multivariate analysis 多元分析 111, 166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组织研究 166-168
 Pareto's 帕累托的 ~ 187
 Residues, in Pareto's system 帕累托体系中的剩余物 185-186
 Restitutive law 赔偿性法律 95-96
 Retributive law 惩罚性法律 95-96
 Reuter, Edward 路透, 爱德华 176
 Revenge 复仇 69
 Revolution theory 革命理论 232, 240-245 参见: *specific revolutions*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大卫 29
 Riesman, David 里斯曼, 大卫 214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The (Harris)
 《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哈里斯) 13
 Rituals 仪式 97-98, 225, 228, 235
 Robespierre, Maximilien 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利安 16, 17
 Robinson, Jackie 鲁滨逊, 杰基 180
 Role taking 角色承担 155
 Rome, ancient 古罗马 30-31, 64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斯福, 富兰克林·D. 116
 Ross, Edward A. 罗斯, 爱德华·A. 82, 84, 86
 Rossi, Alice S. 罗西, 艾丽斯·S. 158
 Roth, Guenther 罗思, 冈瑟 116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让-雅克 16

Rudwick, Elliot 鲁德威克, 埃利奥特 173
 Russell, Bertrand 罗素, 伯特兰 229
 Russia, Weber on 韦伯论俄国 124-125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241, 242-244

S

Sade, Marquis de 萨德侯爵 17
 Saint-Simon, Henri de 圣西门, 亨利·德 17-20
 Comte compared to ~ 与孔德的比较 23
 on industrialism ~ 论工业主义 18-19
 Salomé, Lou 莎乐美, 罗 63
 Santayana, George 桑塔亚娜, 乔治 169
 Sartre, Jean-Paul 萨特, 让-保罗 42
 Savigny, Friedrich von 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冯 106
 Scheler, Max 舍勒, 马克斯 203
 Schutz, Alfred 舒茨, 阿尔弗雷德 13, 225
 Science 科学
 biologism 生物学主义 85-87
 Comte on 孔德论 ~ 21-22
 Saint-Simon on 圣西门论 ~ 18
 Scott, Joseph 斯科特, 约瑟夫 178
 Secondary groups 次级群体 150
 Secondary process 次级过程 133-134
 Secrets 秘密 145
 Segregation, in Park's theory 帕克理论中的分离 163
 Self 自我

- Cooley on 库利论 ~ 148-150
- Goffman on 戈夫曼论 ~ 220-221
- Mead on 米德论 ~ 154-156
- Self-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 222
- Self-indications 自我指示 154
- Selznick, Philip 塞尔兹尼克, 菲利普
115, 201-202
- Semiperiphery states, in world-system
世界 - 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 233,
246
- Sentiments, in Pareto's system 帕累托
体系中的情感 186
-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
离 55
- Sexual behavior 性行为
Eros and 厄洛斯和 ~ 38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性别分层和 ~
43-45
repression and 压抑和 ~ 132-133
- Sexual development stages, Freudian 弗
洛伊德派的性发展阶段 134-135
-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77
- Sheriff, Muzafer 谢里夫, 穆扎弗 158
- Simmel, Georg 齐美尔, 格奥尔格 142-
145
compared to Durkheim ~ 与涂尔干
的比较 142, 145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
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11
Weber and 韦伯和 ~ 106
- Skocpol, Theda 斯考切波, 西达 232,
233, 240-245, 242, 246
- Slavery,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奴
隶制 55
- Small, Albion W. 斯莫尔, 阿尔比恩, W.
82, 160
- Smelser, Neil 斯梅尔瑟, 尼尔 193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invisible hand theory 看不见的手理
论 75, 136
Marx and 马克思和 ~ 29
moral philosophy 道德哲学 75
- SNCC SNCC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
会) 175
- Sociability, Simmel on 齐美尔论社交
144-145
-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Sorokin)
《社会与文化动力学》(索罗金) 188
- Social change 社会变迁
Comte on 孔德论 ~ 23-24
Mead on 米德论 ~ 156
-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2-194
-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
in Germany 德国的 ~ 198
Michels on 米歇尔斯论 ~ 199
- Social dynamics, Comte on 孔德论社会
动力学 22-23
- Social integration 社会整合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 99-100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1-192
- Social interaction 社会互动 222-225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4-205
Marxists' view 马克思主义者的 ~ 观
42
Marx's philosophy 马克思的 ~ 哲学 27

- Pareto on 帕累托论 ~ 185
- Saint-Simonians' 圣西门主义者的 ~
19-20
- view on war ~ 战争观 198
- Wallerstein on 沃勒斯坦论 ~ 246
- women and 妇女和 ~ 46-47
-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 ~
248-251
-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
-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的 ~
180
- in Marx's political theory 马克思政治理论中的 ~ 35
- Mead's failure to address 米德忽略了 ~ 158
- research methods and 研究方法与 ~ 168
- Sorokin on 索罗金论 ~ 188
- Social norms 社会规范
-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 97-98
- Goffman on 戈夫曼论 ~ 219, 228
-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4-195
- Social organization 社会组织
- ethnomethodologists' view 民族志方法学者的 ~ 观 227-228
- in Pareto's system 帕累托体系中的 ~
186
- sociobiological view 社会生物学的 ~
观 88-89
- Social Organization* (Cooley) 《社会组织》(库利) 150
- Social physics 社会物理学 98
- Social-problems perspective 社会问题视角 82-85
-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 149, 166
- Social reform 社会改革 77
- Social relativism 社会相对主义 202-206
- Social self 社会自我
- Cooley on 库利论 ~ 148-150
- Mead on 米德论 ~ 154-156
- Social statics, Comte on 孔德论社会静态 22-23
- 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分层 参见: Class
- African American 175, 176-182
- Bourdieu on 布尔迪厄论 ~ 238-239
- in industrialism 工业制度中的 ~ 20
- Mead's failure to address 米德未注意 ~ 158
- in Michels's oligarchy 米歇尔的寡头制中的 ~ 200-201
- in theory of will 意志理论中的 ~ 67-68
- Weber on 韦伯论 ~ 108-113
- Social system, The* (Parsons) 《社会体系》(帕森斯) 189, 190
- Social teleis principle 有计划的社会进步原则 82, 83
- Social work, reform through 通过社会工作进行改良 84
- Society, concept 社会的概念 3
- Sociobiology revival 社会生物学的复兴 87-90
-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Mills) 《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 211, 218
- Sociology 社会学
- applied versus pure 应用 ~ 对纯粹 ~ 5-6
- Chicago school of ~ 芝加哥学派 82,

- 160, 162-164
- contemporary fallings of 当代 ~ 的衰落 159
- contributions of 对 ~ 的贡献 10-12
- difficulties in ~ 中的困难 2, 6-7
- early American 早期美国 ~ 82-85
- ethnomethodologists' influence on 民族志方法论学者对 ~ 的影响 230-231
- high versus low tradition 高级传统对低级传统 168, 183-184
- historical 历史 ~ 246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 发展史 2-10
- macro versus micro 宏观 ~ 对微观 ~ 258
- research methods development ~ 研究方法的发展 8-10
- term coinage 术语创造 22
- Solidarity 团结
- deviance and 越轨与 ~ 97-100
- division of labor and 劳动分化与 ~ 93-96
- in religion 宗教中的 ~ 102
- Sorokin, Pitirim 索罗金, 皮季里姆
- Cooley compared to 库利与 ~ 的比较 151
- Parsons and 帕森斯和 ~ 188
- Souls of Black Folk, The* (Du Bois) 《黑人的灵魂》(杜波依斯) 172, 175
- Space concepts 空间概念 102-103
- Spain, in world-system 世界 - 体系中的西班牙 247
- Species consciousness 种类意识 153
-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赫伯特 78-81
- Comte and 孔德和 ~ 24, 79-80
- Cooley and 库利和 ~ 146
- Durkheim and 涂尔干和 ~ 93
- evolutionary theory 进化理论 78-81
- Freud and 弗洛伊德和 ~ 7
- Parsons and 帕森斯和 ~ 189
- on religion ~ 论宗教 80
- Wilson and 威尔逊和 ~ 89
- Stanford, Leland 利兰, 斯坦福 84
- Star system 明星系统 149-150
- State breakdown theory 国家崩溃理论 232, 241-244
-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Skocpol) 《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 241
- Statistics 统计学
- founding of ~ 的创立 85
- in r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中的 ~ 165-166
- Status groups 地位群体 109, 111, 116
- "Status panic" 身份恐慌 214
- Stratification 分层 见: Gender stratific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Strindberg, August 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 70
-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 42
-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arsons) 《社会行动的结构》(帕森斯) 189, 194-195
-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175
- Student protests, in U. S. 美国的学生抗

- 议 240-241
- Substantial rationality 实质理性 208-209
-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s 持续渐进 187
-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20
- Suicide (Durkheim) 《自杀论》(涂尔干) 98-100
- Summa Theologica (Aquinas) 《神学大全》(阿奎那) 203
- Sumner, William Graham 萨姆纳, 威廉·格拉汉 81, 82, 84, 86, 89
- Superego 超我 134, 136-137
- Superman (Nietzsche's) (尼采的) 超人 69
- Supply and demand 供应与需求 75
-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Du Bois) 《对从非洲输往美国的奴隶贸易的压制》(杜波伊斯) 170
- Symbolic capital 象征资本 237
-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象征互动论 155, 157, 161
- Symbolic nature of society 社会的象征本质 3, 9-10
- Symbolic violence 符号暴力 233-239
- 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 同情式反省 150-151
- Sympathy 同情, 同情心
Durkheim on 涂尔干论 ~ 96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1
- System, society as 作为系统的社会 189-190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 (Spencer)
《综合哲学体系》(斯宾塞) 79, 189

T

- Taine, Hippolyte 丹纳, 海伯特 70
- "Talented Tenth" "有天赋的十分之一" 173
-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全球化和技术 251, 256
-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TVA) 201-202
- Theatrical model of social life 社会生活剧场模式 222-225
- Theological form, defined 神学形式定义 21
- "Theoretical Importance of Love, The" (Goode) 《爱情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古德) 191
-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第三世界的发展 24
- Thomas, William I. 托马斯, 威廉·I. 160-162
-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罗, 亨利·戴维 145
- Thrasher, Frederick M. 思拉舍, 弗雷德里克, M. 163
- Thus Spake Zarathustra (Nietzsche) 《查拉斯图如是说》(尼采) 63, 69
- Tilly, Charles 蒂利, 查尔斯 245, 246
- Time concepts 时间概念 102-103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阿列克西·德 48-59
on American culture ~ 论美国文化 49-

53, 55-57
 conservative nature ~ 的保守性 48
 on French 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 ~
 论法国政府的中央集权化 58-59
 government service 政府服务 58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与工作 49
 mass society theory 大众社会理论
 56
 principle behind insights 洞见背后
 的原则 99
 on U. S. government ~ 论美国政府
 53-55
 Toennies, Ferdinand 滕尼斯, 费尔迪南
 德 6, 106, 114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Parsons)
 《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帕森斯)
 189
 Traditional conservatism 传统保守主义
 204
 Traditional legitimacy 传统合法性 117-
 118
 Transsexuality 变性 138
 Trotter, W. M. 特罗特, W. M. 173
 Trust, in Durkheim's theory 涂尔干理
 论中的信任 93-94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杜尔哥,
 安-罗伯特-雅克 16
 Tuskegee Institute 塔斯基吉学院 172-
 173
 TVA TVA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201-
 202
Twilight of the Idols, The (Nietzsche)
 《偶像的黄昏》(尼采) 69, 70

Tyranny,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暴政 52

U

Unconscious 无意识 127-128, 132-133
 UNIA UNIA (全体黑人进步联合会)
 174
 United States 美国
 cultural domination 文化主导地位
 252-253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81-85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49-57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 ~ 248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192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
 ion (UNIA) 全体黑人进步联合会
 (UNIA) 174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82,
 160, 162-164
 Upper class 上层阶级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的 ~
 177, 180
 Elites 精英 186-187, 209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 ~
 233, 246, 247-249
 Urban League 城市同盟 175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75-76, 77
 Utopian communities 乌托邦社区 82
 Utopias, Mannheim's 曼海姆的乌托邦
 206

V

Values 价值, 价值观

- bias in ~ 中的偏见 5
versus facts ~ 对事实 5-6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5
Parsons on 帕森斯论 ~ 192, 194-195
Vaux, Clothilde de 沃·克洛蒂尔德·德
24
Veblen, Thorstein 凡勃伦, 索尔斯坦
86, 177
Verstehen 理解
 Black Metropolis and《黑人都市》和 ~
 179
 Du Bois and 杜波依斯和 ~ 170, 171
 Schutz and 舒茨和 ~ 225
 Weber's method 韦伯的 ~ 方法 106,
 112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216, 240
Violence, symbolic 符号暴力 233-239
Völkpsychologie (Wundt)《民族心理
学》(冯特) 154
Voltaire 伏尔泰 4, 16, 139

W

-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 理查德 61, 62
Wagnerian movement 瓦格纳运动 61-
62
Wallerstein, Immanuel 沃勒斯坦, 伊曼
纽尔 232-233, 246-251, 247, 252
War 战争
 Freud on 弗洛伊德论 ~ 139
 Tocqueville on 托克维尔论 ~ 57
Ward, Lester 沃德, 莱斯特 82, 83
Warner, W. Lloyd 沃纳, W. 劳埃德 98,
164-165, 179
Washington, Booker T. 华盛顿, 布克·T.
162-164, 172-174, 177
Wealth, in America 美国的财富 55
Wealth of Nations, The (Smith)《国富论》
(斯密) 75
W. E. B. Du Bois: *Voice of the Black
Protest Movement* (Rudwick)《W. E.
B. 杜波伊斯: 黑人抗争运动之声》
(鲁德威克) 173
Weber, Marianne 韦伯, 玛丽安娜 46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105-126
 on capitalism ~ 论资本主义 122-125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y ~ 对社会
 学的贡献 10-11, 108
 Cooley compared to 库利与 ~ 的比
 较 151
 in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 在社
 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4, 6-7, 12
 Du Bois and 杜波依斯和 ~ 170, 171-
 172
 on economics ~ 论经济学 119-120
 on history ~ 论历史 118-125
 life and work ~ 的生平与工作 105-108
 Nietzsche and 尼采和 ~ 60, 72
 on politics ~ 论政治 116-118, 125-
 126, 137
 on religion ~ 论宗教 120-123
 Robert Michels and 罗伯特·米歇尔
 斯和 ~ 124
 Skocpol and 斯考切波与 ~ 241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论社会分层
 108-113
 Wallerstein and 沃勒斯坦和 ~ 246

“Weber thesis” “韦伯命题” 122
 Weismann, August 魏斯曼, 奥古斯特 138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77
 West, Cornel 韦斯特, 康奈尔 182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 西方电气公司 167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Mills) 《白领: 美国中产阶级》(米
 尔斯) 214
 White-collar workers 白领工人 213-214
 参见: Middle class
 Whitehead, Alfred North 怀特海, 阿尔
 弗雷德·诺思 229
 Will, theory of 意志理论 66-68
Will to Power, The (Nietzsche) 《权力意
 志》(尼采) 71
 Wilson, Edward O. 威尔逊, 爱德华·O. 87-
 90
 Wilson, William Julius 威尔逊, 威廉·朱
 利叶斯 182
 Wirth, Louis 沃斯, 路易斯 163
 Wittfogel, Karl 魏特夫 202
 Wittgenstein, Ludwig 维特根斯坦, 路
 德维希 229
 Women's movement 妇女运动 见:
 Feminism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中
 的 ~ 177, 180-181

in Marx's theories 马克思理论中的 ~
 34, 37
 in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中的 ~
 233, 246
 World-system 世界-体系
 i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中的 ~ 252-
 258
 Wallerstein's theory 沃勒斯坦的 ~
 理论 233, 246-251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disillusionment and 幻灭和 ~ 198
 Mannheim on 曼海姆论 ~ 208-209
 Weber on 韦伯论 ~ 125
 Wright, Richard 赖特, 理查德 181
 Wundt, Wilhelm 冯特, 威廉
 Durkheim and 涂尔干和 ~ 93
 Mead and 米德和 ~ 154

Y

Yankee City studies 《扬基城》研究
 164-165, 179
 Young, Donald 扬, 唐纳德 176
 Young Hegelians 青年黑格尔派 28

Z

Znaniecki, Florian 兹纳涅茨基, 弗洛里
 安 160, 161-162
 Zola, Emile 左拉, 埃米尔 91
 Zorbaugh, Harvey W. 佐尔博, 哈维·W.
 163

译后记

本书的第六版曾于2006年以《发现社会之旅》的书名出过中译本。译本出版后，通过各种渠道发现的一些翻译错误，这几年如芒在背地刺激着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以翻译第八版的机会重新修订以前的译文。较之第六版，第八版在一些篇章内容上有较大的增删改动，全书的形式编排也有些调整。新译和修订工作比我原设想的要耗时更多。而修订过程中不时新发现的前版的翻译错误，一次次使我顿生惕厉之心。在从事学术译著编辑工作十年之后，我自己的翻译实践又一次深切地提醒我，学术著作的翻译是如何布满不易察觉的陷阱，如何需要如履薄冰的谨慎。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帮助，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高丙中教授、中国社科院何蓉博士、陈德中博士的指教。尤其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康老师，在前一译本出版后，他给我发来了涉及一百余处错译词语的勘误表；如果说这一新译本在质量上有所提高的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康老师的指正。

这本论述西方社会学思想发展史的著作之所以能在四十年里不断修订再版，其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来自它对社会思想各流脉的精要论述，还得自它生动流畅的笔触和深入浅出的风格。我希望能在译文中多少体现出这一特色。但囿于本人的学识和语言水平，译文中定还存在不确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李霞

2012年10月